

# 红军长征全史

杨成武

第二卷

## 百川归海

——红二方面军战史

● 柏福临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F.A. 14

K264.405  
21  
22

# 红军长征全史

第二卷

## 百川归海

——红二方面军战史

本卷主编 柏福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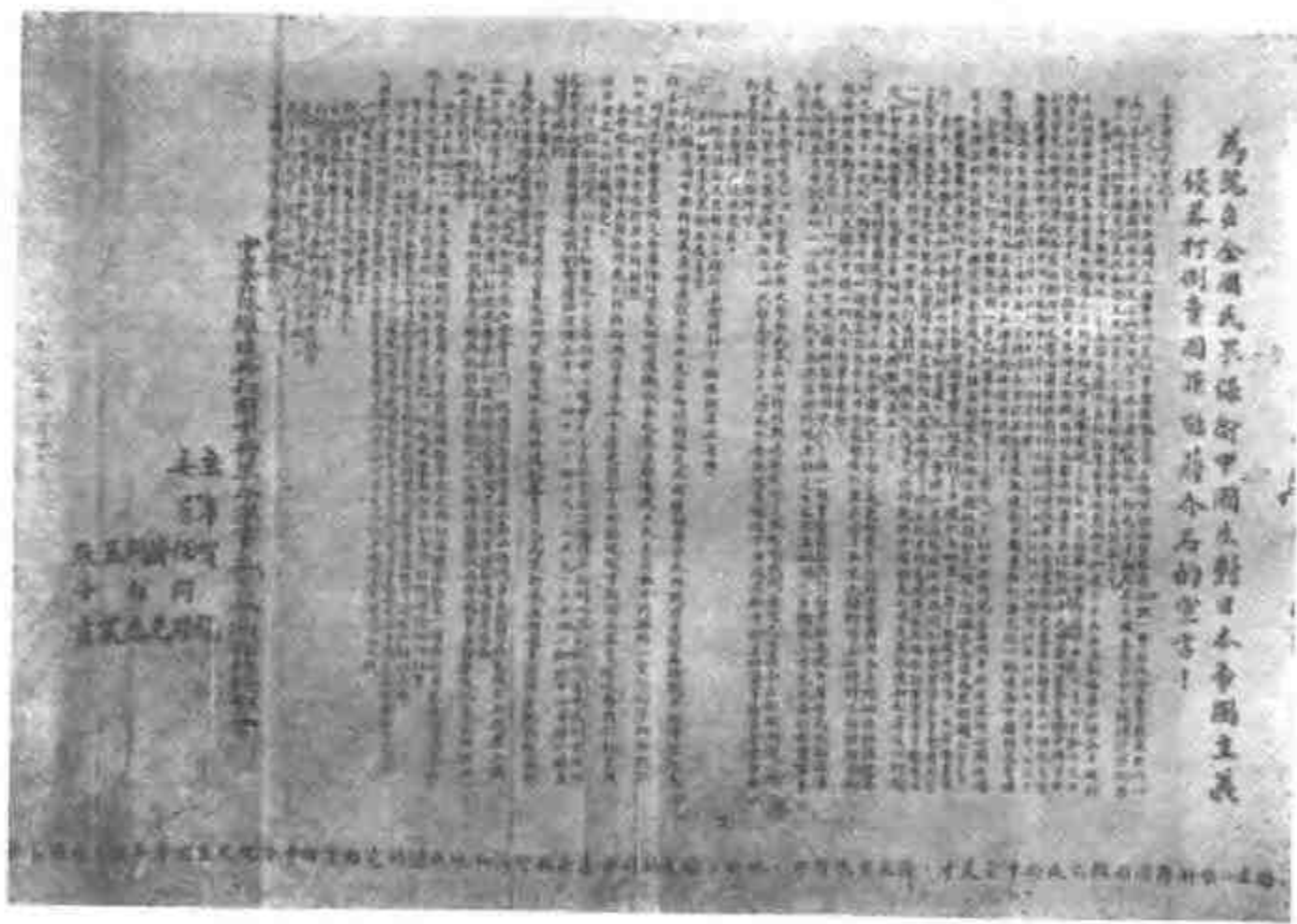
412837



红三军黔东独立师政治部写的庆祝二、六军团会师的标语



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在黔东特区松桃白果喻家祠堂墙上写的标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于1935年8月26日发布的宣言。

书名题写 杨成武

顾问 叶 飞

总 主 编 柏福临 刘喜发

本卷主编 柏福临

本卷编著 孔凡岭 李安增

---

紅軍長征

千古流芳

李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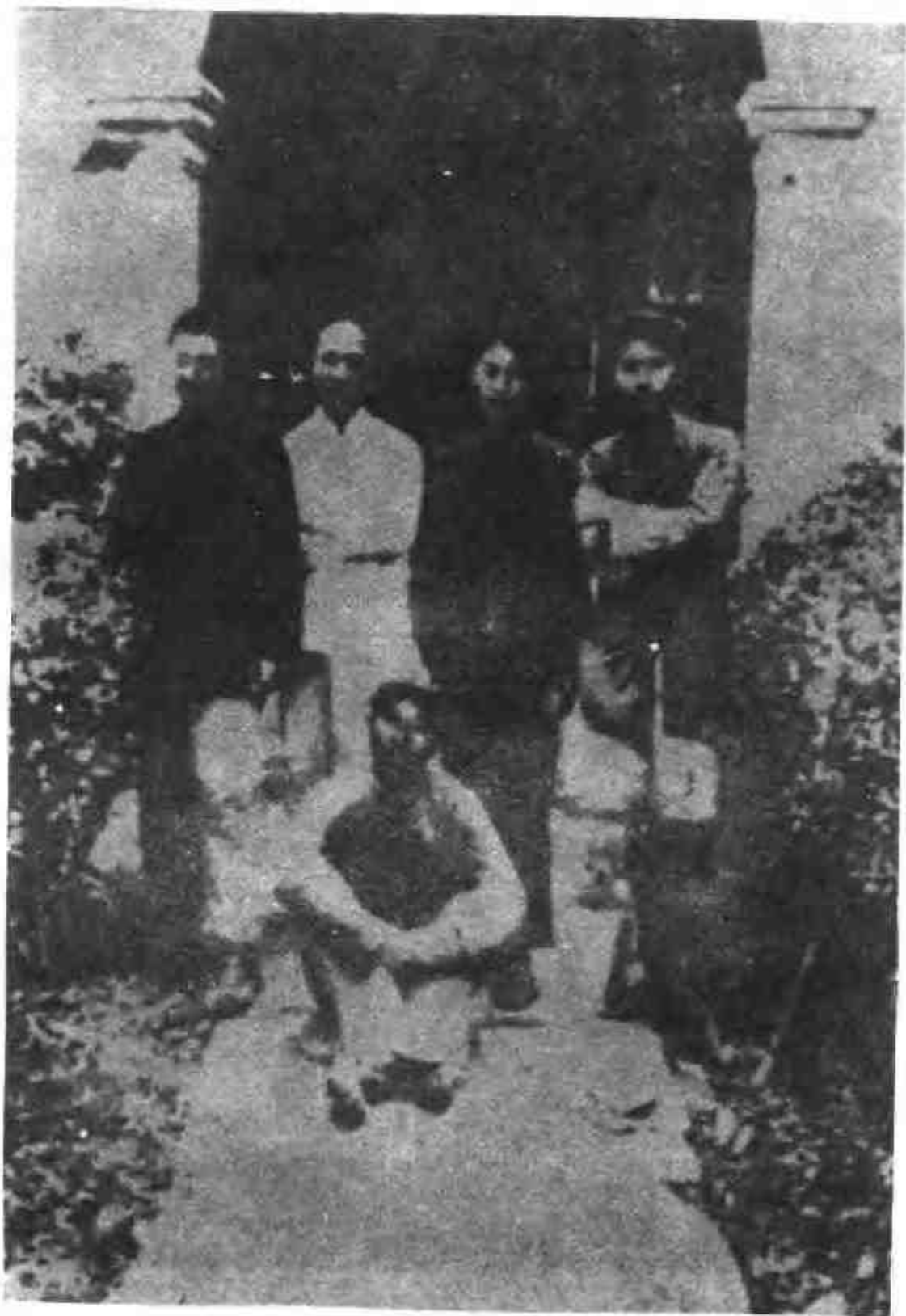




长征以后到陕北的贺龙



长征时期的任弼时



长征时期的贺龙（左一）、任弼时（右一）、  
关向应（右二）、王震（中坐）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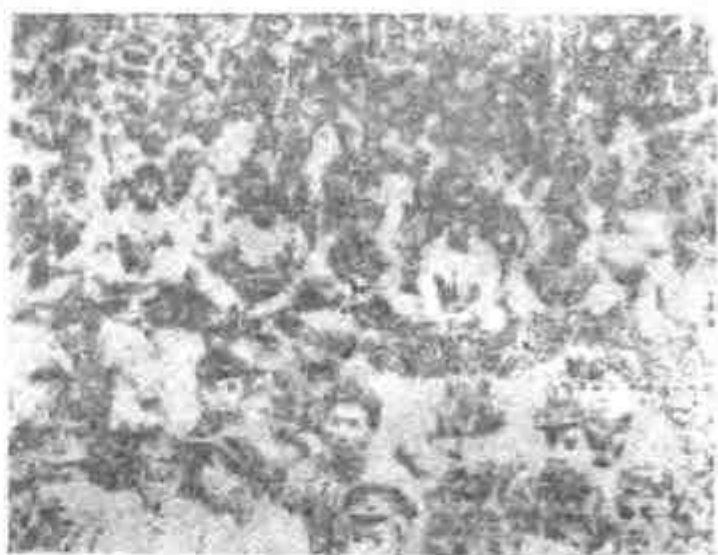
朱德、王首道、肖克(左一)、徐海东等留影



1935年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挺进湘中地区时，肖克（前排左起第四）、王震（前排左起第二）、夏曦（前排左起第三）与红六军团部分指战员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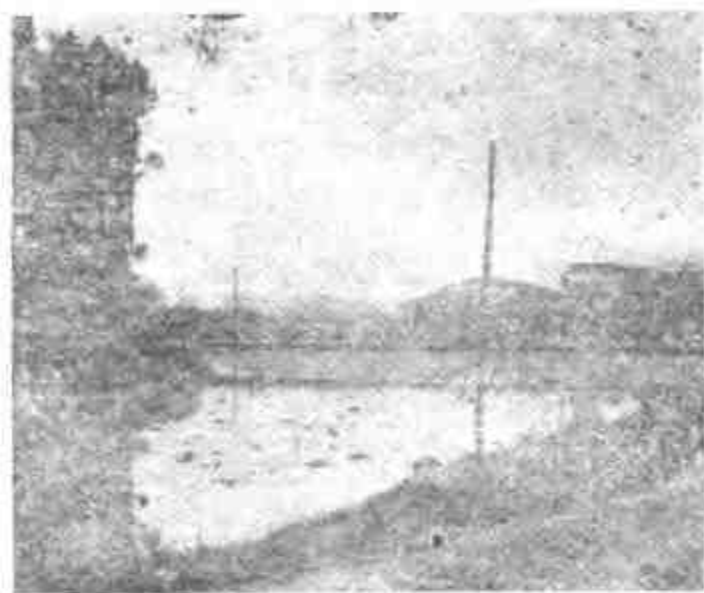
湘鄂川黔省委机关所在地  
——永顺县塔卧丁家坳子



红二、六军团部分同志在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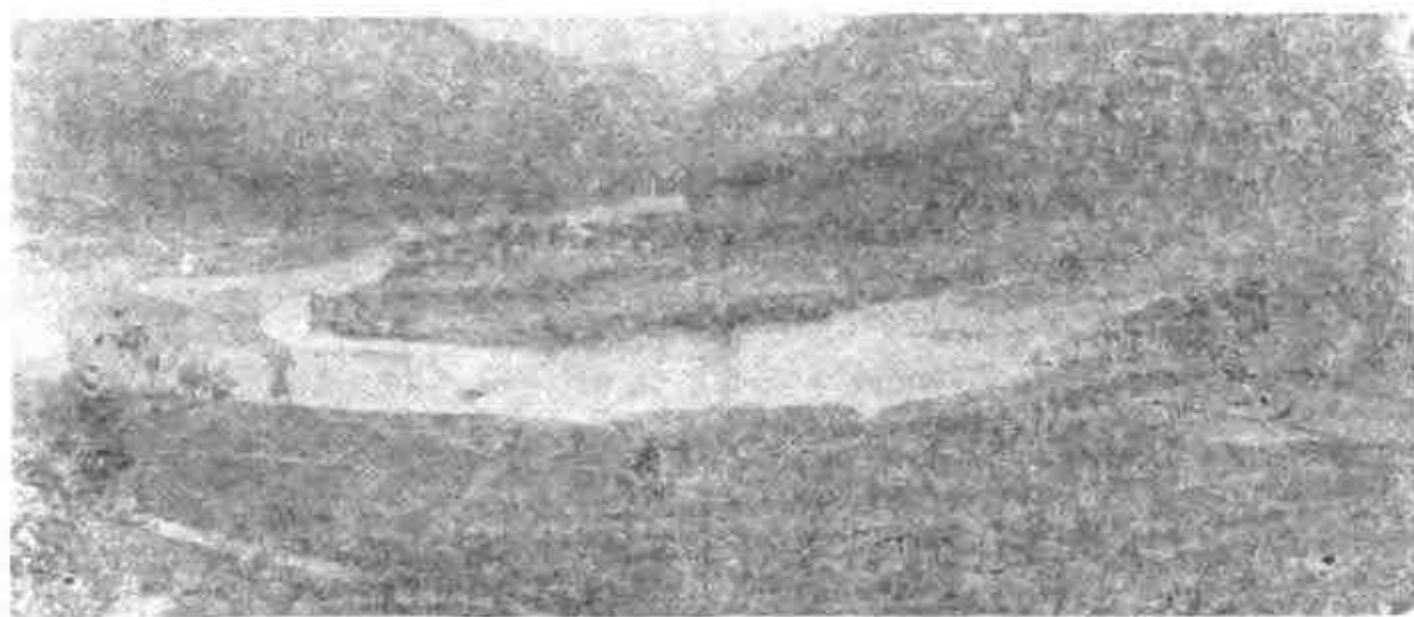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于1935  
年发布的第一号布告



永顺十万坪战斗战场遗址



湖北咸丰忠堡战斗战场遗址



桑植县陈家河战斗战场遗址

---

# 目 录

序 言	(1)
-----	-----

## 第一章 贺龙转战湘鄂川黔

一 初进洪湖闹年关	(1)
二 活跃在湘鄂边	(14)
三 红二军团的成立及演变	(22)
四 人间悲剧	(31)
五 七千里转战	(39)
六 二次肃反	(43)
七 夏曦受窘枫香溪	(49)

## 第二章 红六军团的西征

一 红六军团的由来	(63)
二 “小长征”	(72)
三 “金蝉脱壳”	(86)
四 转战湘桂黔边	(98)
五 贺龙、任弼时相会在木黄	(107)

## 第三章 武陵山下红烂漫

一 龙家寨大捷	(114)
二 分田分地真忙	(131)
三 丁家溶会议	(138)
四 敌军围困万千重	(146)

---

五 打到外线去..... (159)

**第四章 路漫漫**

一 再见了桑植、大庸..... (172)

二 恶战湘黔边..... (181)

三 回旋乌蒙山..... (198)

四 飞渡金沙江..... (208)

**第五章 滚滚洪流向北方**

一 甘夜沸腾了..... (224)

二 贺龙、任弼时与张国焘的交锋..... (237)

三 并肩北上..... (250)

四 横扫甘南..... (264)

五 西北局与岷州会议..... (270)

六 会师欢聚将台堡..... (279)

主要参考文献..... (294)

---

# 第一章 贺龙转战湘鄂川黔

## 一 初进洪湖闹年关

1928年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半年前曾是全国革命中心的武汉，阴云密布，寒风凛冽。街头岗哨林立，军警搜索巡逻。灰暗的街灯下，通街大道街口墙上张贴着悬赏10万大洋捉拿贺龙的通缉令，更增添了恐怖气氛。

这时，从东方旅馆里走出十余人，全是商人打扮，其中一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副墨镜，身穿狐皮袍，颈系大围巾，酷似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只见他往街旁布告上瞟了瞟，轻蔑地淡淡一笑，不慌不忙地朝江边码头走去。

此人是谁？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原来，这正是布告上国民党所要缉拿的贺龙。

贺龙之所以走上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与其穷苦的出身不无关系。1896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九），贺龙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取名贺文常，字云卿，学名贺平轩。前有三个姐姐：贺民英、贺五姐、贺风莲。父亲贺士道，母亲王金姑，连同祖父母，全家8口人，共有两亩屙屎不生蛆的薄地，一座四扇三间的木板房。人多地少，生活异常艰难，贺龙6岁时还没穿过裤衩，七八岁时就不得不参加劳动。除干农活外，冬闲时便跟父亲或亲友出外做工、挑脚、赶骡子。十来岁就经常出人县城糶米，曾到过千里之外的涪陵赶骡子，因此很小就能骑马。13岁那年，为惩罚县领班陈小涛的两个儿子曾吃过官司。这样，过早的辛苦劳动，繁重的生活重担，遭受的压迫剥削，培

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地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

1916年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运动，波及湘鄂川黔边境，正在赶骡子运盐的贺龙，满怀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愤恨，为反对当地官府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发动同他一道运盐的苦力，用两把菜刀捣毁了芭茅溪盐局子，拉起民军队伍，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历任团长、旅长、澧州镇守使。

袁世凯的帝制梦破灭后，随之而来的是北洋军阀的混战割据。贺龙对此十分愤懑，在他担任镇守使期间，捣毁过一块丧权辱国的有关教案的石碑；扣留过一只私运军火的日本轮船，指责他们助长了中国内乱。

贺龙当时对国弱民穷忧心忡忡，对官场上浑浑噩噩、你争我夺的丑态极为厌恶；而对兴起的革命民众运动，则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奉行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任师长、军长职务，成为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左派领袖。

正在这时，北伐军中的共产党组织派周逸群等人到他的部队工作。对此，贺龙很支持也很尊重他们。周逸群是贵州铜仁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逸群在贺龙所在部队中不断发展党员，有一天，一个营长跑去问贺龙，可不可以参加共产党，贺龙鼓励他说：“这好得很嘛！赶快参加。”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准备借召集庐山会议之机，分化、消灭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军队，贺龙、叶剑英、叶挺洞察了这个阴谋，把部队直接开到了南昌。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亲往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把南昌起义的意图告诉了他，并征求其意见。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并接受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的起义军总指挥职



务<sup>①</sup>，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成功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起义军挥戈南下，准备夺取广州，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南征期间，贺龙多次向周逸群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会昌战斗后，部队进抵瑞金，周恩来向前委提议讨论贺龙的入党问题。前委一致同意了这一提议，批准贺龙入党，随后由介绍人周逸群、谭平山立即找贺龙谈话。

9月初，在瑞金绵江边的一所小学里举行了贺龙的入党仪式。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举起右手，庄严地向党宣誓：“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永不叛党！”

瑞金休整后，贺龙率部经福建的长汀、上杭，进驻广东的潮汕。在敌军的猖狂进攻下，起义军失利退到流沙。起义军在乌石又遭伏击，领导核心被冲散，起义最终失败。

贺龙率众突围后，抵达揭阳。根据党的决定，他由汕头经香港转赴上海寻找中央。抵沪后，开始中央决定他和刘伯承、林伯渠同去苏联学习，后因党的机关遭敌破坏，贺龙没有成行，于是同周逸群商量，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经请示中央，得到批准。

对于这段情况，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李维汉回忆：“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许多人辗转到上海是由组织部门负责接待的。贺龙同志也转到了上海。他名声很大，是个‘危险人物’。我们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当时我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利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

---

<sup>①</sup> 贺龙于1950年2月所填干部简历：“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军事上任总指挥。”

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俟农民起来。事后，我把与他谈话的情况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秋白同志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下呢？我说：我以为可以。去俄国湘西由他自己决定。先叫他们到湘西去试一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会后我去找他谈了话。在谈话中，他表示不愿意去莫斯科，要回湘西。……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去。”

1928年1月上旬，中央组织了湘西北特委，由正在汉口负责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到湘西建军，开辟根据地。随后，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十余人乘江轮由湖北省委机关同郭亮接上了关系。

这时，湖北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暴动，贺龙遂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计划腊月二十三日晚上，乘人们“祭灶”燃放鞭炮时举义，同时号召工人罢工。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之际，不幸，腊月二十二日党的一个印刷厂被破坏，起义计划暴露，于是敌人加强戒备，全市戒严。起义不能举行，省委决定贺龙等人立即撤离武汉，这就发生了本章开头的一幕。

对此，贺龙后来回忆：“我们包了一条船，搞了两支枪和一些子弹。一支打得响的我带上，另一支打不响的别人带上，化装成商人，离开武汉。当时码头上的敌人盘查很严。我穿着皮大衣，围围巾，戴黑眼镜，走到敌人面前打开大衣让敌人搜。看我像资本家，就放我过去了。”<sup>①</sup>

贺龙一行登上轮船后，又遇到了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同情分子，人们机警地将他让到账房里。船在涛飞浪涌的江面上急驰直进，经过鹦鹉洲时，遇上敌巡江汽艇的检查，贺龙在账房先生和工友们的掩护下，安全脱险。

---

①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走了一天一夜，船到洪湖边的新堤坝。贺龙眺望长江和洪湖的港汊，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心情异常兴奋起来，他对周逸群说：“我以前赶马来过这里，这是天然的打游击的好地方！”

提到打游击，自然想到武器上，没等周逸群答话，贺龙又接着说：“哪里有枪，老子搞他些就好了！”

听到搞枪，卢冬生很感兴趣，连声赞成：“哪里有武器，就在哪里动手。”

贺龙便向船员们打听道：“你们经常在江上跑，知道哪里有团防吗？”

一提到团防，船员们无不气炸了肺，因为他们常遇到这些家伙的袭击，遭到盘查勒索，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立即有人回答说：

“上面的观音洲，就有一股小团防，常逼着轮船靠岸，可恶极了。”

“你们到观音洲把船靠一靠，我们上岸‘拜会’一下他们，行不行？”

“行！”船员们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观音洲，船向岸边靠去。贺龙带了六七个人闯进了团防驻地。

团防队长正蹲在地上逗小孩，几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他不禁大吃一惊，刚想站起来掏枪，贺龙伸出铁钳般的大手，向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自我介绍说：

“我是贺龙，前来借枪用用，若不放心，可打个借条。”

那团防队长听说“贺龙”二字，早吓得屁滚尿流，舌头不听指挥，一时说不出话来，正在伺机反抗，只听门外“叭”的一声，扭头一看，一个团防兵已栽倒在地。原来卢冬生将意欲反抗的哨兵击毙。

团防队长见势不妙，只好乖乖地将4条步枪、4支驳壳枪全部交了出来。

船又开航了，走了一程，贺龙等人在一个叫反嘴的集镇边登陆。这样，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千里洪湖。

洪湖，位于武汉市西南方，跨洪湖、澧利两县，与湖南省接连，面积438平方公里，像一颗巨大晶莹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荡漾，水天一色。

贺锦斋是贺龙的族弟，1919年贺龙在桑植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时，他人所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又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师长，并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转到上海，党组织要他先到洪湖拉起队伍。1927年11月，他就在石兰县藕池建立起一支100多人的游击队。

贺龙还没下船，就看到沿江有家茅棚，站着一些人朝船喊，便说：“迎上去，看看。”结果，正是贺锦斋的游击队，真叫人喜不自禁。原来，贺龙等离开武汉前，党组织就通知了贺锦斋，所以他们早就在此等候了。

会合后的第二天，周逸群了解到不远的村子里有4家土豪，便对贺龙说：

“胡子，我们给土豪拜年去！”

贺龙明白了他的意思。

“对！对！让人们知道共产党并没有躲入世外桃源。”

除夕之夜，正当豪绅们张灯结彩，欣喜若狂，欢庆他们半年来反共的胜利之时，贺龙带人赶到那个村子，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头子，把土豪家的财产分给了穷人。这时打出了“四十九路红军”的旗号，并以“北路游击总指挥”的名义发出布告，张贴标语，从而扩大了影响。在洪湖地区的河湖港叉中，穷苦农民、渔民们高兴地传送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共产党又闹起来了！”

为了不失时机地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扩大革命武装，周逸群通过原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过经理处长，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潘

锦城，找到了石首中心县委和沔阳、监利、华容等县委负责人，随后又与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取得联系。1月23日，正是旧历年，周逸群在监利县荆口镇召开了联席会议，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年关暴动计划，并决定将各路游击武装予以整编。1月底，在监利的下车湾，将贺锦斋的游击队和活动于监沔边界的萧仁鹤、邓赤中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和在公安活动的邹资生的游击队整编为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以贺锦斋为军长，军下设一大队，大队辖二区队，各区队设三分队，共300余人。全军由湘西北特委领导，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

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首先在监利开始行动，经过十几天的连续作战，先后拔除了何堡、尺八口、聂河、毛琯、上车湾、朱河镇等土豪、团防队盘踞的据点，歼灭了一批土豪劣绅、恶霸和团防头子，同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政策。

当地最大的一股土匪头子叫张烟灰，有100多人，80多条枪，他不但在水上抢劫，而且在村庄里横行，群众强烈要求把他除掉。如何动手呢？贺锦斋向贺龙介绍了他的情况后说：

“此人狡猾得像狐狸，只可智取，不可硬擒。”

贺龙听罢，略加思索，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把他请来！”

张烟灰被派人“请”来了，他身上别着两只短枪，目光睨来睨去，注视着四周动静。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请他吸鸦片。一拿起烟枪，他便忘记了一切。这时，只见贺龙眉毛闪了闪，卢冬生便举起枪来，将其击倒。该股土匪群龙无首，纷纷缴枪投降。

后来，又从沙市来了一个姓黄的国民党骑兵团长，带了五六十支枪，妄图收编贺锦斋的游击队，贺龙又把这股敌人的枪缴了。

监利县年关暴动后，贺龙等率部渡江南下，支援华容县领导的元宵节暴动。2月7日夜，到达范家岭，不料敌军已撤走。部队

踏着冰雪追至长岗庙，发现敌人驻在村内庙中，几名队员隐蔽地接近庙门，手起枪响，击毙了守门敌兵，然后蜂拥而上，将睡梦中的敌兵全部缴械。

工农革命军在贺龙等领导下连战皆捷，声威大震，给了鄂西各县人民以极大鼓舞。在1928年3月施元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石首的东西乡，农民均在我党领导之下，故此县工作情形较好。在骚动的开始，缴调关团防枪械后，民众蜂起，在我们的指导之下，大杀豪绅地主30余人，焚毁田契亦很多。”<sup>①</sup>

年关暴动，蔓延到湘西、鄂西、鄂中广大地区，推动了以上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在上述同一报告中说：

“自监利、石首、华容三县大骚动后，所有邻近之沔阳、汉川、潜江、公安、南县等地农民均大动起来，烧杀之事，无日不有，反动方面，恐慌异常，虽各地有驻军防范，但多不敢出地区一步，即可见其一斑也。”<sup>②</sup>

然而，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和当时还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年关暴动中也出现一些错误和缺点。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又贸然进攻监利县城。战前，由于对城内敌情不明，判断有误，认为城内没有多少敌人。部队突入城内之后，发觉城内驻扎敌人一个旅，工农革命军强攻不下，伤亡十余人，最后被迫撤出战斗，移兵石首境内。

工农革命军撤往石首后，周逸群、贺龙在焦山河召开会议，决定将游击武装交给鄂中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领导，贺龙、周逸群偕贺锦斋等按照党中央原来计划转往湘西开辟工作。

焦山河会议之后，贺龙、周逸群稍事准备，于1928年2月20日出发，翻山越岭，过河渡湖，经澧县、石门、慈利等县，前往

<sup>①</sup> 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2页。

桑植。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经知道贺龙回到了湘西，于是调遣了几个县的武装埋伏在通往桑植的要道口妄想逮捕他。桑植县的民团头子陈策勋，因其叔父陈图南在南昌起义前被贺龙处决，扬言要为其叔父报仇。

尽管敌人张下了罪恶的罗网，但由于贺龙的崇高威望，许多开明人士暗中传递情报，有的民团甚至排队相迎，派人护送。这样，贺龙于2月28日顺利地到达了自己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

贺龙回乡，使这个一度被乌云笼罩的村庄顿时沸腾起来。

乡亲们闻讯后奔走相告，人们川流不息地前来探望。和他一同回乡的贺锦斋当时曾赋诗一首，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情形：

大地乌云遮太阳，  
一朝消散又重光，  
忽闻各处人喧闹，  
胡子果然转故乡。

谷志标后来也曾回忆道：“那时我正在洪家关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教书，听说贺龙同志回来了，我就同他的族友亲戚和南昌起义失败归来的旧部属，前去拜访他。

“来访的客人对贺龙同志的归来，表现了热情的欢迎和诚挚的慰问，同时又向贺龙同志叩询了国共分裂和南昌起义的一些问题。贺龙同志带着愤怒的表情，把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的经过，大略说了一番之后，接着又把他革命到底的决心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国民党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可是劳苦大众都说共产党是救星；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没找到，现在找到了，

就跟它走到底。国内军官有上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各有派系；我咧，杆子系吧。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只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救国救民，才有真正的出路。共产党一定能成功，蒋介石一定垮台，乡亲们看吧。”

由于贺龙严正地斥责了国民党的叛变，使大家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正确的了解，并得到很大启发，因而对贺龙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毅然参加革命斗争的英勇行为，无不表现出敬仰和拥护。

第二天，贺龙被乡亲们围住正谈得热烈之时，忽有几匹战马朝贺家飞奔而来，只见几位女兵飞身下马，簇拥着一位40多岁的女将向院子里走去。

“可把你给盼来了！”人还没进家，话语声就进了院里。

贺龙闻声慌忙站起，飞走几步迎上前去，叫了声“姐姐”，姐弟俩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贺龙稍微定了下神，便仔细端详起姐姐来：只见她身穿粗布衣，腰里别着两只短枪，眼角已出现鱼尾纹，眼睛闪闪发光、炯炯有神，人瘦了许多，但仍精神抖擞，十分威严。

这就是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香姑）。

贺民英的丈夫是洪家关附近杜家山人，因组织一支农民队伍被军阀陈渠珍杀害。心痛欲裂的她挺身而出，接替丈夫的职务，被拥为农民军的司令。她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活动于湘鄂边界一带，身边经常只带30多条枪、50余人的小队伍，杀富济贫、惩恶除害，深受当地人的爱戴，打仗时她可调遣很多杂牌队伍。她听到弟弟回乡的消息，便通知萧善堂、刘玉阶两个团，萧杰然、曹丕成等4个连，一共300多条枪、1000多人，向洪家关汇集。她把队伍驻扎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自己带了几个女兵回家。

“你能够调遣多少队伍？”贺龙边端详姐姐边问。

“1000多人。”贺民英回答着，然后望着一些陌生人问：



“这些同志都是随你一起来的？”

这时，贺龙才想起，光顾和姐姐说话，竟忘了介绍客人。然后指着周逸群、卢冬生等人说：

“这些都是参加南昌起义的英雄好汉，现在带着党中央的指示，要在湘鄂西组织红军，创建根据地。”

“好，我第一个报名参加，1 000 多人交你指挥。”

周逸群笑容满面地走上前去，紧紧握住贺民英的手说：

“香大姐，我代表党组织感谢您对革命的支持！”

晚上，乡亲们陆续散去，贺民英也回部队去了。贺龙点起一盏油灯，与周逸群、卢冬生等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贺龙对贺锦斋说：

“你拟点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贴出去，让群众知道我们回来是干什么的。”

贺锦斋很快就写了一些像诗一样的标语口号，并贴满了全村。接着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搞得热火朝天。

当时的桑植，分散在全县八乡号称“八大诸侯”的农民武装，不仅各自拥兵自重，而且相互之间经常大动干戈，互相火并。贺龙回到洪家关后，就先把他的亲族及旧部召集起来，告诫他们说：“不要自相残杀，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经过宣传，发动了群众，也动员了许多地方武装。除贺民英主动分出 20 余支长枪和 30 多武装人员，交于湘西北特委领导，贺龙的老部下王炳南、李云清等率领 300 多人的武装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外，贺龙的亲族贺满姑、贺容姑、贺文炎、刘玉阶等人的队伍，也成为湘西北特委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此外还收编了一支土著武装。至 3 月底，贺龙即组织了一支拥有 3 000 多人、2 000 多支枪的队伍，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军长贺龙，师长贺锦斋，贺桂如、李云清分任一、二团团长，还编了几个支队。

工农革命军成立后，湘西北特委又组建了中共桑植县委，李良跃任书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接着贺龙率军进占桑植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收编土著武装，壮大了革命军，在湘鄂边树起了第一面革命武装的旗帜。

桑植暴动后，贵州军阀李鑫的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即倾巢出动，向革命军队猛扑过来。贺龙指挥部队与敌激战于梨树垭、三屋回等地，均失利。随后革命军相继退出桑植县城和洪家关。在苦竹坪与敌交战中，革命军再次失利，部队损失很大，周逸群同部队失去联系后转移到石首，贺龙率余部退往桑植、鹤峰边的红土坪、堰垭等地，收集失散部队，决心继续坚持斗争。对此这年9月，贺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此间自闰二月洪家关和苦竹坪之役以后，因受四十三军的严重压迫和逸群同志等的失散，党的工作即陷入停顿状态。”<sup>①</sup>

6月，获悉敌龙裕仁旅退出桑植，转往鄂西，贺龙率工农革命军于桑植的小埠兴伏击敌之后卫，击毙敌旅参谋长张策，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军威复振，随之乘胜重占洪家关。有些失散的部队又陆续归来，并有旧部下文南甫等率队参加，使工农革命军再度激增到1500人。桑植团防陈策勋、姜文周等进袭洪家关，革命军迎战失利，贺龙率部撤至罗峪休整。

这时，陈协平经过周折到达罗峪，带来了湖南省和湘西特委关于把湘西北特区并入湘西特委，在红军中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的指示，贺龙为前委书记。

湘西前委成立后，作出了对革命军进行整编的决定，8月1日，在召开南昌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时，宣布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未到职），下辖一个师两个大队，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王炳南、贺文

<sup>①</sup> 《贺龙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

炎任大队长，全军约 1 500 余人。

在组织整顿的同时，贺龙和前委还抓紧部队中党的建设和思想整顿，各大队设立党代表，注意从上兵中吸收党员，纠正和克服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和作风，以实现原旧部队的改造。

在整顿中贺龙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教育，对违犯纪律者，即使是领导干部，也不姑息迁就。如前委作出开展打上豪分田地的群众斗争时，贺锦斋怕伤及自家的田地，不同意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将宣传土地革命的标语撕掉，还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贺龙为此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1928 年 9 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前委对锦斋如此举动本决定开除其党籍，继因他表示忏悔，请求处分，并愿随红军下去暴动，故仅予以留党察看并撤消其前委委员的职权。”

贺锦斋认为这是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在实践中认真改正错误，思想上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了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一切的崇高信念。

为执行湘西特委关于策应湘东红军行动的指示，1928 年 8 月 20 日，贺龙率红四军由桑植向石门推进。9 月 9 日凌晨，在泥沙遭石门罗效之团防的袭击，贺锦斋在掩护贺龙突围时，身先士卒，沉着镇静地指挥部队还击，不料一颗流弹飞来，献出了他年仅 27 岁的生命。

在牺牲前两日，贺锦斋在给他弟弟的家信中写道：

“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sup>①</sup>多年教育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

在这封信中，还附有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sup>①</sup> 指贺龙，因其原名贺文常。

云遮雾绕路漫漫，  
一别庭帷欲见难。  
吾将吾身交吾党，  
难能菽水再承欢。

贺锦斋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贺龙等重要干部，实践了他“吾将吾身交吾党”的钢铁般誓言。

冲出重围，转移到桑植、鹤峰边界的贺龙和红四军指战员，得知贺锦斋阵亡的噩耗后，异常悲痛。接着，贺龙妹妹贺满姑，在随大姐作战时，不幸被俘，就义于桑植县城。贺龙把仇恨深深埋在心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更加坚定地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 二 活跃在湘鄂边

1928年9月，贺龙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突围后，退往桑植、鹤峰边界，进入湘鄂交界的大山丛中。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追剿，形势一天天恶化，贺龙和战士们在深山野林中风餐露宿，数九寒天，缺粮缺衣。没有电台，与中央也失去了联系。

怎么办？

这一天，他正在山头盘腿坐着沉思，忽听有人喊道：

“香大姐来了！”

贺龙为之一振，扭头一看，只见不远处有30多个人赶着几匹骡子，正朝这里走来。大姐贺民英骑在马上，身挎两支盒子枪，在女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显得格外精神威风。还是半年前部队分开活动时，她带了一支人马在200里外的四门岩、桐柘湾一带活动，如今在贺龙最困难的时候，她又出现在贺龙的面前。

贺民英翻身下马，望着弟弟缺少血色的面容和一个个骨瘦如柴的战士，她拍着贺龙的肩膀说：

“你看你，成了猴子王啦。一群猴子怎么打仗？”

“姐姐，您怎么来了？”贺龙握住贺民英的手问道。

“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音讯，我想处境一定会很困难，所以想办法给你们送来点东西。”接着，让几位战士卸下了骡子驮的子弹、布匹和银元。

在这里，贺民英住了两天。她对弟弟说：

“队伍队伍，一定要‘武’，光躲在山里怎么行？一定要拉出去！”

在她的启示下，贺龙召集人开会，决定整顿队伍，安置了老弱病残和遣散了动机不纯分子，积极发展部队中的党团组织。经过整编，全军仅剩91人，72支枪。此时湘西前委受湘西、鄂西特委的委托，负责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更名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为书记。

不久，卢冬生带着中共中央8月8日给湖南省委和贺龙的指示信，回到了红四军。信中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介绍了毛泽东、朱德领导建立根据地的情况和经验，指示湖南省委和贺龙：要扩大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贺龙，得到了中央的指示，真如久旱逢甘霖。

贺龙和前委据此制定了新的行动方针，决定将部队带到咸丰地区，在黑沿、猎狗耳石一带开展工作，收编改造“神兵”，壮大红军队伍。

当时鄂西遍地是“神兵”，仅利川县就有十多万。这些“神兵”，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多为反抗苛捐杂税而组织起来的，大多数不欺压群众，但也有一部分被地主恶棍所掌握。

利川县有个较大的集镇，叫汪家营，内有一个叫李长青的“神兵”头头，兼团防队长，还是哥老会的头子。手下100多名打手，三四十条枪。这家伙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人送外号“铁拐李”，老百姓背后称之为“魔王”。

贺龙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一天，部队开到离汪家营不远的的一个村子边，只见迎面来了几个人，老远就趾高气扬地叫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贺龙以江湖口气答道：“请老哥快去给大爷请安道喜，就说我王胡子特来入伙！”

“真的吗？”

“大爷的门槛这样高，要是瞧不起我，只好另寻宽厚之贤主。”贺龙假装发火，扭身要把队伍拉着往回走。

对方几个人见状又咕咕噜噜地商量了几句，赶快换嘴道：

“要真是投奔大爷来的，就不要走了，请稍等片刻，我们前去通报。”说罢，转身回镇里去了。

不一会儿，就听镇上三声枪响，随之有一队人握着枪涌了出来。一个为首的袍哥，远远地就抱拳搭话：“各位，大爷有请！”

贺龙略略和他招呼了一下，就大摇大摆地向镇上走去。那位袍哥在大铺子门口停下，自己先进去通报。

少顷，咣啷一声，大门洞开。只见里面是一个大院子，一座高大的堂屋高踞正中。从大门到堂屋的阶沿上，密密层层站着两排人，个个手握长枪，虎目而视。

王炳南第一个跨进门去，接着贺龙，再后就是贺炳南等，几十人分成两队，鱼贯而入，留下20余人守候在门外。

进到院子里，王炳南忽然停步，高声喊道：

“既是朋友，为何刀枪相见？”

这时，高坐在堂屋里的老团总，慢吞吞地站起身来，假意喝道：“贵客来临，谁叫你们拿枪来？赶快把枪架起，两旁侍候！”

那些团丁听得主子的命令，赶快劈劈啪啪把枪架起来，垂手站立两旁。

等那团总说了声“请”，贺龙一行这才跨步向前。进入堂屋，

按哥老会的规矩行礼完毕，又互相寒暄了一阵，便分两边坐下。这时，只见王炳南突然拔出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然向老团总脖子刺去。“铁拐李”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咕咚一声栽倒在地。旁边的贺炳南也动手把另一头目刺死。

外面的两排红军人正好对付他们两队，一个个将其拦腰抱住，门外的20名红军一拥而入，端枪喝道：“不许动！”把架着的枪统统收缴起来。

这时，贺龙手掂盒子枪，站在廊檐下高声宣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打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今天特来汪家营，剪除作恶多端的‘铁拐李’。你们愿意为穷人打天下的，参加我们队伍的，我们欢迎；不愿干的发路费回家！”

听了贺龙的话，团丁们从惊恐中镇定下来，除少数离去外，大部分随即参加了红军。

这次行动不仅为当地老百姓除了一害，而且得了39支枪，加上原有的，共100多支；队伍也扩大到了200人。后来又打开建始县城，杀了县长，缴获不少物品，然后又折向东南前进。

路上，听老百姓讲，鹤峰的邬阳关，有个“神兵”大队，平时种地，锣一响就集合起来，打仗时头上捆红，身上系绳索，上阵前先吃朱砂，然后一拥而上，“刀枪不入，煞是厉害”，队长叫陈宗瑜。他们不枪老百姓，专跟国民党作对。

贺龙对这支“神兵”队伍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它虽是迷信团体，但都是被压迫的穷人，遂决定争取他们，准备亲自去找陈宗瑜谈判。大家不敢让贺龙贸然去，便先派人进行联络。派去的人回来说：陈和其父都很高兴，他们企盼早日与贺龙会面。

于是，贺龙带人前往邬阳关。陈氏父子早在关口等候，没费什么唇舌，他们便爽快地答应参加贺龙的红军。

陈宗瑜令人敲起大锣。锣一响，不多时，四乡就有大群大群的人向邬阳关集拢而来，手上拿的除了大刀，就是一丈多长的梭

鏢。一共 300 多人，同贺龙的红军会合一块就有 500 多人，声势扩大了。

在鄂阳关，贺龙对部队再次整编，增补了前委委员，贺龙为书记，前委之下设支部。前委对红四军的行动进行研究，决定打到鹤峰去。

鹤峰城背倚大山，前面临河。县衙门在河对面的山坡上，驻扎着百多个敌人。红军在夜里悄悄接近，在山上的各个关口附近布置好兵力，把敌人包围起来。

次日拂晓，发起冲锋。战士们有的端着枪，有的扬起大刀，有的举着长矛，怒吼着向敌人扑去。四面山上的枪一响，敌人不知来了多少人马，吓得丢下枪四处奔逃；跑不及的就跪下磕头作揖哀求饶命；活捉了十余人，经教育当时就参加了红军。国民党县长带领数十人跑出城外，被战士们追上击毙。随即解放了鹤峰县城，时为 1929 年 1 月 8 日。

这一仗共缴获八九十支枪，“神兵”大队也在战斗中得到锻炼。

打完这一仗，贺龙率红四军进驻河畔之书院一带，努力从事党的工作：一、扩大没收土地与建设苏维埃的宣传；二、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并捉拿反动分子；三、焚烧县公署及豪绅地主之契纸、房屋；四、筹备县苏维埃的建立。<sup>①</sup>

1 月 13 日，在鹤峰县城召开了 600 人群众大会，正式宣告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吴天锡、汪景云、徐锡如、汪毅夫、陈宗瑜等为委员，吴天锡为主席。大会公布了“苏维埃大纲”、“耕田农有法令”，以及取消苛捐杂税、焚毁地主田契文约等法令。

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是该县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的成立，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随后红四军即在湘鄂西前委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同时加紧发

<sup>①</sup> 《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旧历）十二月初七日。



展农村中的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并成立了地方革命武装。

至此，红四军几经挫折，终于摆脱了困境，在湘鄂边站稳了脚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9年6月上旬，“桑鹤联防剿匪临时指挥”陈策勋一面纠集团防向红四军进逼，一面对敌驻桑植杂牌部队周朝武部攻击。贺龙决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袭击桑植。于是率红四军进入桑植境内，6月14日经洪家关向县城进击。经3小时激战，再次攻克桑植。随之前委立即派出干部，建立桑植县临时县委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农民自卫军。同时还在龙山、宣恩、五峰、长阳、石门边界地区广泛开展工作，分配土地，建立政权。至此，湘鄂边根据地已拥有两座县城，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是红四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贺龙后来回忆说：“……部队面貌，也有相当改变。新的建军路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已经开始执行。接受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建立了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在和鄂西区红六军会师以前，又坚决进行了几次内部转变。兵员补充主要是吸收贫苦农民。这才把这支部队逐渐改造与建设成新型的人民革命的武装。”

湘鄂边革命形势的发展，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湖南省长何键下令湘西军阀独立十九师师长陈渠珍迅速“进剿”。陈渠珍命令驻永顺的旅长向子云马上出兵，还遍贴告示：杀死贺龙者，赏光洋5000元。

骄横的向子云不把这点“共匪”放在眼里，指使他的一个团长周寒之和永顺县县长带了2000人马前往桑植。

贺龙早得情报，便派一连人在桑植与永顺交界的利福塔阻击。周寒之见红军不多，便下令猛冲，红军且战且退，绕过赤溪河渡口，经过洋公坛，退到南岔那边去了。

周寒之紧追不舍，当行至南岔河边，只听一声枪响，伏兵四起，激战两小时，周的2 000人马全被消灭，自己也命丧黄泉。

正在向子云闻讯大骂周寒之无能，败在一群乌合之众手里之时，有人送来了一封信。向子云看后气得脸色铁青，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这信是贺龙派人送来的。向子云原是贺龙的旧部，贺龙熟知其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弱点，便故意激他：让他不要再来，来又是周寒之的下场。

向子云自恃人多枪好，认为打败红军不成问题，便决定亲自出马，立即向上司何键打电报说：“即日亲赴桑植围剿，誓灭共魁，以报党国。”又向湘西剿共司令拍胸脯说：“五千光洋给我准备好，我就拿贺龙的首级来兑现。”

他给每个士兵发了一条绳子，说是“要把红脑壳一个个捉回来”。又听说红军里头有“神兵”，十分勇猛，便准备了许多竹筒，装些乌鸡狗血，说是泼在“神兵”身上，神法就失灵了。向子云准备停当之后，1929年7月1日，便率3 000人马向桑植扑来。到了利福塔，枪就打响了，原来遇到一小支红军的阻击。向子云下令猛攻，很快冲破了“防线”，红军“败退”而走。向子云大喜，率部追杀不舍。到了澧水赤溪渡口，见有不少船只，于是命令赶快乘船过河，继续追击。

红军退至桑植县城时，连城也没进，就继续向城东“败退”。

城内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向子云以为红军早就被吓跑了，十分得意，便带先头部队开进城去。眼看着他的旗帜徐徐升到城头，立时露出不可一世的气势，吩咐部下分别向上司何键和陈渠珍报捷：“桑植‘共匪’已基本肃清，不日即可凯旋归去。”并命令后续部队渡河，逐次向桑植开进。

这时，向子云的部队，部分已经进城，尚立脚未稳；部分行进在去桑植的途中；部分还在渡口。这样兵分三部，使得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而桑植城地势险要，一面靠水，三面环山。

正当向子云踌躇满志，大庆“胜利”之时，忽听一声枪响，城外各山头上立时都扯起了红旗。红旗带着红军，满山遍野冲向县城，预伏在城内的红军也向敌发起冲锋。枪声、喊杀声顿时响彻云霄。这时向子云才如梦方醒，大叫：“我们中了贺龙的‘空城计’了！”

当敌突遭袭击，陷于惊慌失措之际，陈宗瑜率领的红四团在东门外出现了。他们一色的红缨枪，像一条火龙似的沿东门外300多步高的石阶昂然直上。警戒城东门楼的敌人，一见这种景象，早已吓慌了神，两挺机关枪一枪未放，撒腿就跑，而且边跑边喊：“神兵来了！”红军紧紧追赶。敌人内部人踩人、马踏马，乱成一团。敌人这时也没忘记他们的“法宝”，把那些乌鸡狗血直往“神兵”身上泼，但是，却无济于事，一个个都没逃脱被俘的命运。

不多时，敌人被歼大半，向子云集合残部，向南门突围，直奔赤溪河，企图抢渡逃命，红军乘胜追击。

当红军把敌人追出桑植城后，突然彤云密布，雷声大作，下起了倾盆大雨。敌人不熟悉此地道路，慌乱中有的摔进水沟，有的掉进池塘。后来红军在一个积满了水的深坑里捞出了不少枪支和淹死的敌兵。

向子云好不容易逃到澧水边的赤溪渡口，只见河而洪水滔滔，原来的渡船早都无影无踪，回顾身边残兵败将，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正在这时，早已等候在河畔的一支红军，如同天兵下降，猛然冲杀过来。敌人你推我挤，跌地落水，乱成一团，纷纷投降。向子云见势不妙，慌忙溜下骡子，照其屁股狠狠抽了一鞭，骡子下了河，他紧紧抓住骡子尾巴，企图泅水逃命。这时河水吼声更大，浪头更高，向子云被大浪翻上翻下。忽然一个巨浪卷来，他手一松，便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才知，他的尸体沿河而下飘到津市，脖子上还挂着驳壳枪。

战斗至下午4时结束，除山上逃跑敌100余人外，其余全部

被歼，缴获各种枪支千余。

经过这一仗，红四军迅速扩大到4 000余人，建立了第一、二路指挥部、特务营，声威大震。

后来有人总结说：“这次战斗的成功之处，在于针对敌人弱点，成功地设下了‘空城计’，诱敌进城；利用敌人梯队逐次前进，兵力分散，指挥不便的弱点，集中兵力，将敌砍头截尾，分段歼灭。在战斗中采用了迂回包围战术，先包围进城之敌，将其歼灭；尔后及时转移后边；截断赤溪河渡口，南北夹击，将其全歼。”<sup>①</sup>

这次战斗后，至今在湖南桑植、永顺一带仍流行着这样一首民谣：

贺龙将军献空城，  
喜煞永顺向子云；  
自投罗网逃不脱，  
全军覆没快人心。

赤溪大捷后，红四军迅速扩大，党内亦成立特支，下设四个支部。不久又成立训练队，专门培训干部。

### 三 红二军团的成立及演变

1930年春，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到鹤峰，向湘鄂边特委传达党中央指示，命红四军东下洪湖与红六军会师。

红六军是以周逸群为首的鄂西特委直接组织起来的。1928年夏初，周逸群在湘鄂边与贺龙失散后，到沙市组成鄂西特委，后又转至宜昌、石首，发展了这一带的革命斗争。他还曾秘密地回

---

<sup>①</sup> 顾永忠等：《贺龙用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9页。

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指示他要发展洪湖根据地。

1929年3月，在江陵沙岗召开了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洪湖地区各县都建立了赤卫队和小块根据地，并正式建立了由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监、沔游击队和段玉林、彭子玉领导的江右游击队。两支游击队作战多次，建立了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红色政权，并攻克了石首县城。

随着游击队的发展，洪湖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2月5日，扩编游击队，正式宣布成立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兼任政治委员，不久，许光达任参谋长，段德昌、段玉林任纵队司令（后纵队又改十六、十七两师），尔后，周逸群指挥红六军挺进江南，为两军会师扫清道路。

1930年2月，贺龙指挥红四军东下洪湖。走前，前委开会决定，湘鄂边的桑植、鹤峰两县和五峰、长阳、宣恩等部队地区的工作由汪毅夫负责，贺民英任游击队司令员兼湘鄂边妇联主任，贺炳南为独立团长，共率2000余人保卫苏区。

3月4日，红四军抵达宜都渔洋关时，遭到川军郭汝栋部的顽强阻击，不得已而折回五峰，顺势攻下县城，接着转往鹤峰休整。

3月20日，红四军二次东下，在五峰湾歼灭了大恶霸孙俊峰的团防，救出了被敌关押的同志，同时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接着连克数地，进入澧县境内，击溃追敌，俘80余人，缴枪80余支。此后为安置伤员整理部队，再次折回五峰清水湾一带。

5月初，贺龙率部第三次东下，准备占领公安，探明红六军活动情况。由于敌军放水堵截，再次退入澧县境内，在张家场击溃敌一个营，缴枪50余支。6月18日率部攻克公安县申津渡，因未得红六军行动消息，加之河水暴涨，遂又转至松滋西斋待机会师。

贺龙三次东下受阻，但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因而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补充

了五六百名战士。

1930年7月1日，红六军攻下公安，贺龙得悉后，第四次挥师东进，直插公安县城。4月，两军终于突破千难万险，在公安会师。7月7日召开了两军前委联席会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并组成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共计1万余人，5000余支枪。

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贺龙所说：“它和鄂豫皖、湘鄂赣红色地区相呼应，构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的包围。这是党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作为这个胜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韧努力的结果。但从革命发展的渊源来说，应该追溯到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民运动。这是一条红线。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和原有农民运动的基础分不开的。”“关键在于路线正确与否。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的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

应当说，贺龙的分析是正确的，深刻的。同时也可看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把一切功劳都归于党，归于毛泽东，归于军队、人民，归于周逸群等其他同志，而唯独没有他自己。但谁都明白，他为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作出的贡献是尤为卓著的。

红二军团成立之际，正当蒋冯阎桂中原大战，国民党大批正规军开赴前线。前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首先集中力量，以6个月的时间，拔除苏区内的白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以建立中心根据地，然后逐次开辟敌人统治较弱的襄河北岸京山、钟祥、潜江、天门等地，并向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逐渐使湘鄂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样，红二军团就有了控制长江、襄河两岸，进

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后方。

当时，在洪湖沔阳一带有一个反动武装组织——白极会。它远在清朝时，就曾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时又受土豪湖霸的操纵，投靠国民党，和红军作对。沔阳大土豪陈彦达从天门县招来了白极会头子周亮，在各地发展白极会，胁迫每家一人参加。入会后发一把勾链枪，作战时吞黄表，喝朱砂，念念有词地祷告：“天神保佑，刀枪不入，长生不死，富贵荣华。”他们骚扰苏区，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

面对白极会的猖獗，红军指战员们无不对其恨之人骨，贺龙决心要消灭它。1930年8月，贺龙派段德昌率领红军，配合各地赤卫队和广大群众，开展了消灭白极会的人民战争。

为了揭穿白极会“刀枪不入”的鬼话，贺龙把活捉来的几个胸口画着“太极图”的会首，当场枪决，打破了他们的欺骗宣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位于内荆河畔的峰口镇，北面有座三孔石拱桥，名曰五风桥，当白极会匪被打得四处逃窜败退到该桥时，红军早就在桥面上撒满了碎玻璃、瓦片、石渣，光着脚板的白匪一到桥上就被扎得喊爹叫妈，一个个束手就擒。

在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红军攻下了白极会的重要据点小河口，一举打垮会匪几千人。部队乘胜前进，直抵仙桃。开始没有打赢，后贺龙亲自前往，还编了奋勇队，猛攻敌人，终于把仙桃拿下。接着挥师解放了沔阳、天门、应城、安陆、皂市等许多城镇，分散在这一带活动的白极会终被消灭。

消灭了白极会，进一步发展了洪湖地区的大好形势，打击了反动派，巩固和扩大了苏区，宣传和动员了群众，开创了湘鄂西苏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红二军团成立后的短短3个多月，就取得了巨大成绩，可惜的是，由于党内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红二军团的影响

日益加深，特别是中央代表邓中夏的到来，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使红二军团遭受惨重损失。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常委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在全国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左”倾路线由于周逸群、贺龙等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始终没有在湘鄂西苏区得到贯彻。以周小康为首的鄂西特委自始至终多次向中央报告，指责贺龙、周逸群的所谓右倾错误后，中共中央决定排斥周逸群对红二军团的领导。1930年9月间，鄂西特委改为湘鄂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8年参加“学生救国会”，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中共二大、三大、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职。曾领导过开滦煤矿、京汉铁路、省港工人大罢工，是中共北方组织的创始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江苏省、广东省省委书记。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回国。由于他在国外工作两年多，对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对湘鄂西苏区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从服从中央的立场出发，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

9月20日邓中夏一到湘鄂西苏区，就立即速发信函给周逸群、贺龙，命令其将部队调回，集中于洪湖附近，准备贯彻中央指示。

同一天，邓中夏赶到洪湖苏区中心周家嘴，当晚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命令红二军团渡江南征，配合一、三



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会议根据贺龙、周逸群的建议，为使红二军团南征后，后方根据地不受损失，首先要攻下监利，巩固和统一苏区内部。

部队攻下监利后，24日，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将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因邓中夏随军行动，决定周逸群专任地方工作，代理特委书记兼联县政府主席，周小康改任组织部长，因旷继勋调回中央，决定十七师师长段德昌升任六军军长。

会议期间，得知一、三军团已退出长沙，向湘东转移，这时，邓中夏本应放弃南征计划，但他没有这样做，继续坚持执行“左”倾中央的指示，命令部队依然渡江，直捣长沙，想以此激起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

英勇的红二军团将士，顽强战斗，10月，连克南县、华容、官塘、藕池、石首、公安；11月，克津市、石门、临澧。共歼敌万余人。但是，南征的初步胜利，是在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暂时性胜利，是不巩固的。因为红二军团离开原有苏区远征，流动作战，失去基地依托，不仅有失掉原有根据地之虞，而且易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新区遭敌围攻。

据此，周逸群等湘鄂西特委领导人数次致信邓中夏，要求他率部速返苏区。11月26日，前委在合口召开会议，贺龙、段德昌等表示支持湘鄂西特委意见，经藕池撤回苏区。但邓中夏固执己见，命令部队再次攻打津市、澧州。

攻打津澧，红二军团伤亡极大，六军参谋长牺牲。此时敌人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调集重兵，逼近鄂西苏区，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红军只得撤出津市，撤围澧州，转移到松滋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

12月12日，前委召开紧急会议，邓中夏仍不顾贺龙、段德昌的反对，坚持不回鄂西苏区，并准备集中兵力，与敌进行决战。还

将段德昌调离六军，改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命他带领一批伤病员，绕道公安县，返回苏区江陵一带，另任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汤慕禹为六军军长。

段德昌曾气愤地对贺龙说：

“胡子，这实际上是撤我的职啊！我有什么错误！”

领导层意见有分歧，部队左右徘徊，趑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红六军置于杨林市一线，红二军置于公安一线。敌李觉部从容布置兵力，分三路向杨林市、街河市集结。红六军临时应战，头天到达杨林市，第二天就遭到敌袭击。部队和敌拼消耗，打阵地战，红军急行军5里多路，抢占杨林市北面山头，把刚收编的苟司令带领的队伍留在杨林市。

早晨8点钟左右，敌军朝山上猛扑过来，第一次冲锋被我打退后，又组织第二次进攻。这时，忽然从杨林市方向冲来一群人，从后面对红军射击，原来是苟司令反水了。

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红军激战到下午3点多钟，伤亡不少人，弹药也快用完了，不得不向纸厂河方向转移。但河上的木桥已被苟司令放火烧毁，无法通行。这时，从后面和河前面射来了密集的子弹，敌保安大队人马越来越近了。

正在危急时刻，忽见贺龙扑通一声跳入河中，举着手中的驳壳枪高声喊道：

“同志们，不要惊慌，扑过河去，消灭敌人！”

贺龙洪钟般的吼声、从容不迫的神态，顿时给慌乱的战士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一个个如入水蛟龙，泅河抢渡，杀向对岸敌军。一登岸，就把敌人冲得狼狈逃窜，面把后面追来的保安大队也甩在河对岸。

杨林市一战，红二军团伤亡很大，特别是红六军，因汤慕禹到任不久，对部队情况不熟，指挥上分散兵力，使十六师严重受挫，十七师被敌截断，一个后卫团遭覆灭，部队损失达1/4强。

对此作战指导上的错误，邓中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承认，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没有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原则，以致结果虽然占领了无数城池，都随得随弃，而前方与后方完全断绝。”<sup>①</sup>

红二军团杨林市失利后，辗转到达湘鄂边鹤峰一带。邓中夏虽认识到部队南征以来的最大错误是单纯军事观点，但是他坚持认为，纠正上述错误不是下湖，即回洪湖苏区，坚持向外发展的斗争方针；而是上山，即在湘西扫清反动势力，将鹤峰、五峰、石首、华容一线联系起来，实行向外扩展，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计划。

按照这个方针，红二军团转战湘鄂边近3个月的作战行动，仍没有同建立根据地相结合，部队在流动作战屡次受挫的情况下，人员从由石门出发时的3万减至不足2万人，部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在此情况下，湘鄂两特委致信邓中夏，严厉批评其南渡西征以来的“左”倾错误和后来的退却逃跑错误，要求他率部返回鄂西，以救正在遭敌“围剿”的苏区。

1931年3月间，红二军团前委在枝柘坪召开会议，会上，围绕部队行动方针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贺龙等绝大多数主张返回鄂西，援救根据地燃眉之急。邓中夏则坚持其“上山”的主张，反对“下湖”。他不顾多数反对意见，行使前委书记的最后决定权，确定了北渡长江，开辟荆（门）、当（阳）、远（安）苏区，以救洪湖苏区的方针。他认为“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同时，按照中央指示，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邓中夏，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红二军缩为第

<sup>①</sup> 《二·六军中夏关于南渡后战争概况及今后行动原则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月2日。

七师，红六军缩为第八师，将周逸群、段德昌在鄂西苏区发展的武装编为第九师。并组成以邓中夏为书记的红三军前敌委员会。

部队打到荆门、远安后，贺龙让王一鸣率第七师插一条腿到沙洋去，使部队从潜江回洪湖。而邓中夏却硬要打当阳，要在鄂北找“井冈山”。

这时，敌人向红军合围过来，王一鸣部伤亡惨重。邓不听劝阻，武断地决定许光达第八师增援，结果无济于事，红三军败退远安以北马良坪一带。

5月11日，合围之敌跟踪而来，红三军陷入重围。贺龙指挥部队与十余团敌人激战数日后，利用夜幕掩护向北突围，进入鄂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许光达率二十二团掩护贺龙突围后，攀悬崖绝壁，向西转移到房县、兴山交界地区，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个多月。

至此，邓中夏的“击赵救魏”以策应鄂西苏区的计划完全落空，开辟荆当远根据地也成了幻影。

之后，前委决定攻取均州作为依托，在敌人统治还比较薄弱的均州、房县、保康、南漳地区开辟根据地。5月22日攻克均州。7月，转战于房县、兴山边界的许光达闻讯后率部归队。经过艰苦斗争，以均州、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逐步形成，使红三军在被动状态中得到暂时休整和补充。

1931年9月上旬，贺龙、邓中夏等获悉段德昌率红九师主力正沿襄河北上的情报后，便在青峰镇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要回洪湖，贺龙不顾邓中夏的极力反对，坚持要求红三军主力南下，与红九师会合。最后邓被迫同意。

9月28日，红三军主力终于在刘猴集同红九师胜利会师。当晚，红三军前委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万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的指示精神，传达了中共中央给红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说：

一、立即撤销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夏同志必须立刻离开二军团。

二、二军团必须立刻向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的方向发展，要沿途发展与组织群众，要组织游击队，……巩固与扩大湘鄂西的苏维埃区域。<sup>①</sup>

会议作出《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去的万涛代替邓中夏出任红三军前委书记、政治委员，红三军立即回洪湖苏区。

邓中夏随红三军回潜江后，精神压力很大，加上疾病折磨，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了来湘鄂西工作后的教训，向中央写了一份七八万字的检查报告。年底他化装乘船回到上海。1933年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负责支援遇难同志及其家属的工作。同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因叛徒出卖，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9月21日遇害于南京雨花台，年39岁。

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无疑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红二军团南征北渡，远离苏区，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受到很大损失。他被调离是必然的。

不过，走了一位立三路线的代表，又来了一位王明中央的钦差大臣，他给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 四 人间悲剧

1932年9月3日，湘鄂西苏区首脑机关所在地——瞿家湾，一边，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红军战士喊着誓死保卫苏区的口号，同进犯之敌进行着殊死的决战。他们有的子弹打光了，就举起石头砸向敌人，有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另一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1931年6月29日。

边，一长串“犯人”，个个五花大绑，被押送到洪湖水边，随着一阵“叭叭”枪响，惨烈地倒在血泊之中，接着一个个装得鼓鼓囊囊的麻袋又被扔进水里。一阵冷风刮起，吹散了鲜血染红了的湖水。

被枪决者是什么人？麻袋中装的又是何物？

原来，这是夏曦第一次大肃反中的“辉煌”成果：在湘鄂西苏区所“挖”出的1000多名“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分子”，在部队突围之前，命令政治保卫局加以解决：跑得动的赶到湖边枪毙，被折磨得走不动的便用麻袋装了扔进湖中。

其实，这1000多人，多是创建湘鄂西苏区的革命元勋，他们没有死在枪声相闻的阵地上，却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下。夏曦所制造的这场历史悲剧，洪湖人民是难以忘怀的！

人们不禁要问：夏曦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全面推行其错误路线。夏曦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来到了湘鄂西苏区。

夏曦，湖南益阳人，字蔓伯、蔓白。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后去苏联学习，曾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1930年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3月被派到洪湖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

夏曦上任伊始，就全盘否定湘鄂西苏区长期斗争中所创造的成绩，把该区的创始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逸群排斥于领导集团之外，并撤销了他的湘鄂西联县主席的职务。这时正值敌人对洪湖江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之时，周逸群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不久，夏曦签发了《湘鄂西省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粗暴无理地指责红三军第九师北上接应七八两师走得太远，脱离了苏区，应负长江南岸苏维埃政权丢失的主要责任，矛头直指三军政委万涛。万涛率部前去接应七八师的行动，本是根据省军委和夏曦的指示，现在却出尔反尔，因此对此《训令》极为不满，除上书中央外，同夏曦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贺龙也批评夏曦此事处理不当。

夏曦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公然撤掉了万涛的红三军政委的职务，由他自己兼任，并给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英警告处分，批评贺龙“一贯右倾”。还撤销了军、师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大团，由他直接指挥。

这些无理做法，自然遭到绝大多数干部的反对，省委向中央报告：不同意夏曦兼任红三军政治委员，请另派人加强对军队的领导。

1931年12月，宋盘铭从中央回苏区，带来了中央指示。指示把红三军整编为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贺龙仍任军长。不久，关向应被中央派到红三军任政治委员。

关向应（1904—1946年），辽宁金县人。原名关致祥，满族。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国，1927年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国后任团中央书记。1930年在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1年在上海被捕，出狱后不久，于1932年初到湘鄂西苏区，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和红三军政治委员。

关向应来到之时，正值夏曦领导下的湘鄂西分局在洪湖苏区监利县周家嘴召开湘鄂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会上夏曦遭到多数人的批评，开始时极为孤立，处境困难。关向应的到来，传达了

中央“左”倾领导人支持夏曦的意见，这样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压力，倒向了错误路线一边。

关向应虽然在组织上按照中央的指令传达了上述错误思想，但他在许多斗争策略上是从湘鄂西苏区实际出发的，并和贺龙领导红三军打退了敌人的“进剿”计划。后来，他在实践中愈来愈感到“左”倾中央的错误，在很多问题上与贺龙等的意见相同。但因关向应在立三路线时期负责中革军委工作，执行过立三路线，夏曦对此紧紧抓住不放，造成开始时他不能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使夏曦畅行无阻地推行起错误路线来。

军事上，夏曦醉心于“城市中心论”，冒险攻打大城市；土改中，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侵犯中农利益；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于对“左”倾路线持怀疑反对态度的同志，一律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进行排斥、迫害。特别是把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同肃反扩大化结合在一起，使党和红军的许多干部被诬杀，造成了惨重的历史悲剧。

自1931年以来，“左”倾中央就多次发出文件，要各根据地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加紧进行“肃反”。1932年1月在夏曦主持下召开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便将肃反的任务明确提到日程上来。决议案认为：“湘鄂西苏区的改组派活动非常厉害，这是反革命来消灭苏维埃红军的主要阴谋，还须动员广大的群众来肃清这些反革命。”不久，夏曦又以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其中写道：“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肃反的教训，很严重地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



为了领导肃反工作，专门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由省委书记杨光华和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成林参加的肃反委员会。还成立了有独立工作系统的政治保卫局，它不受党委领导、监督，只要夏曦一句话、一张条子，就可将人逮捕或处决。

政治保卫局在办案过程中采取的是逼供、诱供、指名问供的方法，凭屈打成招的口供罗织人罪，定案处理。

1932年5月上旬，红军在襄北作战时俘虏了一个叫张锡侯的国民党下级军官，省委政治保卫局审讯时，有人指认他是奸细，张开始否认，后经严刑逼供，便承认自己是什么“统一国民党”的成员，与中共天汉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是同乡，又是同伙。政治保卫局便将杨逮捕，杨承认张是同乡，是个被驱逐出苏区的富农分子。但夏曦、杨光华对其口供很不满意，遂对其严刑拷打，杨被迫供认苏维埃政府和红三军的一些人与他们是同伙，准备发动武装暴乱等等。政治保卫局便按杨的供词捕人，对被捕者严刑逼供，于是层层株连，到处捉人，涉及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甚至红军战士和普通群众，也成了肃反的对象。在大规模地逮捕、逼供、诱供、指供后，便是大批的杀害。

应当指出的是，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是夏曦、杨光华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采取的极不正常、极不正当的手段，借以打击、迫害不同意见者。贺龙对此曾评论说：“红三军回洪湖的一些争论是四大会上的争论和‘肃反’杀人的根子。”<sup>①</sup>

“肃反”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怀疑中央分局路线的正确，提议取消中央分局与进行反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斗争，……首先是暗藏党内的反革命分子。”<sup>②</sup>因此，“反国际路线的斗争，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应遭到严

<sup>①</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

<sup>②</sup>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1932年1月21日。

重的打击。”<sup>①</sup>

二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阻碍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应受到严厉的无情的打击。”<sup>②</sup>

三是：“调和派企图替机会主义作辩护的工具或是抱着党内和平心理，不愿得罪人的敷衍主义，对于仇视批评和怠工抵抗党的批评的分子，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sup>③</sup>

四是：“红军中应当执行严格的集中军事纪律，任何执行上级指示的怠工与反抗，都要无情的予以制裁。”<sup>④</sup>

除以上几种情况外，凡历史上同“改组派”成员、“第三党”中某些有过合作或共事关系的党、政、军负责干部，统统作为“肃反”的对象，予以怀疑、打击和迫害。

仅据1932年7月8日，“肃反”开始后不久，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记载，被打击的省委委员、省苏维埃执行委员、部长以上的干部23人，工作人员四五十人，党校学生半数以上是“反革命分子”；宜昌、湘鄂边特委，江陵、沔阳、川阳三县的党组织，均为“改组派”所包办；江南县委除一名书记外，其余均是“改组派”分子；只有监利县委比较“纯粹”。

被杀害的大批领导下部，多为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人。如万涛，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重庆、武汉、鄂西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7月任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周逸群一起，领导鄂西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在洪湖、白露湖和华容东山一带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1930年初被派往湘鄂边根据地，传达中共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和鄂西红军会师的指示，后任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同年9月任中共湘鄂西特委委员、副书记。1931年6月任中共湘鄂西省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同年9月任红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sup>①②③④</sup> 《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32年1月27日。

兼政治委员。曾与段德昌率红三军九师转战潜江、沙洋、荆门一带，接应第七、八两师返回洪湖根据地。万涛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对夏曦等人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遂成为打击对象。1932年9月，被以“改组派”的罪名杀害，年仅28岁。

同期被杀害的党政高级干部还有：

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

尉士筠：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

张宗理：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

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

刘革非：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彭之玉：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西苏维埃党团书记。

潘家辰：湘鄂西省委巡视员。

张昆弟：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

彭国材：湘鄂西政治保卫局局长。

许 栩：湘鄂西苏维埃经济部长。

戴补天：湘鄂西苏维埃银行行长。

朱子贞：湘鄂西苏维埃司法部长。

夏曦在后方开展的大肃反，很快扩散到红三军。1932年夏，就诬陷杀害了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孙德清。孙德清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战功赫赫。1929年10月到湘鄂西工作，参与指挥了黄陵矶、文家墩战斗。他一回到师部就被捕，遇害时年仅28岁。

诬杀孙德清后不久，接着又杀害了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湘西分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柳直荀。柳直荀，1898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又名柳克明。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共产党。早年参加过新民学会，成为毛泽东的好友。1926年被选为湖南省政府委员，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大

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二十军三师做政治工作。同年冬去上海，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到鄂、豫、皖巡视工作。1929年底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长江局秘书长。1930年春以中革军委巡视员和中央长江局特派员身份，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参与领导成立红六军。7月成立红二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前委委员。9月兼任红六军政委。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后任军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春，任红三军八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他回湘鄂西苏区潜江后，看到许多党、政、军干部在肃反中被诬杀，便找政治保卫局辩论，还写信质问夏曦，结果被罗织了许多罪名，予以逮捕，在部队撤离洪湖苏区时，被害于监利县周老嘴，时年34岁。

此外，夏曦等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红七师参谋长赵奇、周荣光；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周子服；红九师参谋长张应南、胡梯，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其中相同职务者，是在前任者被捕后委任的。

由于大批干部被杀，致使夏曦感到“肃反以后干部自然减少了，这是当前一个困难。”<sup>①</sup>“（一）政治工作干部：军委政治部仅有一个主任，缺组织、宣传两科干部。三军政治部仅有一个主任，缺组织、宣传两科干部。八师政治部仅有一个组织科长，缺主任及宣传科长。九师政治部缺主任及组织科长，仅有一宣传科长。团政委缺三个。”“（三）军事干部：缺三个团长”，“缺师参谋长二人（七、八师）；军校缺政治军事教官；军委缺各科科长，仅有唐赤英同志一个孤家寡人的参谋长支持门面。”<sup>②</sup>据夏曦给中央的报告称：被杀的红三军团长6人；团政治委员5人；团参谋长6人；

<sup>①</sup> 《湘鄂西夏曦报告》，1932年7月8日。

<sup>②</sup> 《湘鄂西夏曦报告》，1932年7月8日。

红军医院院长 2 人；还有营长 16 人。

贺龙后来回忆大肃反时的情况说：

“洪湖的县区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sup>①</sup>

## 五 七千里转战

正当夏曦全力开展“肃反”之时，蒋介石部署了对苏维埃区域的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苏区的国民党军在 10 万人以上。面对严峻的形势，夏曦提出“寸土必争”等错误口号，说什么“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sup>②</sup>结果，红三军东奔西突，在辗转作战中伤亡很大。敌人步步进逼，8 月中旬开始进攻瞿家湾。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提出集中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敌的意见，并得到关向应的支持。但夏曦却主张分兵，坚持两个拳头打人，并用他分局书记的最后决定权，否定了正确意见，决定把部队分成两半：一半由他带领第七师和警卫师一个团固守洪湖苏区，在东荆河南岸筑堡，以阵地阻击敌人；另将第八、九两师和警卫师另一个团共 5 个团，由贺龙、关向应带往外线，先打敌军右翼，再打敌军左翼。

夏曦带领的部队，分兵堵口，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节节败退。

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部队，跳出重围，围战潜江、荆门，猛攻么口川军的两个团，有力地钳制了敌军右翼。当转战到京山，准备击敌左翼时，瞿家湾等苏区中心地带已经陷落。

<sup>①②</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 年 1 期。

至此，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2年10月上旬，夏曦、王炳南等率独立师第一团从洪湖突围到了大洪山地区，同贺龙、关向应、段德昌领导的红三军主力会合，此后20天里，夏曦一面加紧肃反，一面带领部队在大洪山地区游荡。

10月下旬，红三军领导人发现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从大洪山西进的情况，立即在枣阳王店召开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有的主张寻找红四方面军，有的主张恢复洪湖苏区，有的主张开到豫西甩掉敌人，择机打回洪湖。整整争论了一天，直到晚上，夏曦才决定：全军转移到湘鄂边。

接着讨论行军路线。夏曦主张走近路，强渡襄河、长江，直插湘鄂边；而贺龙、关向应、段德昌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襄河、长江这一段，敌人已设下重兵，强渡纯属冒险，毫无成功的希望。贺龙提出，应寻找敌人防守薄弱的地区，首先进入豫西，然后取道川东，再向湘鄂边开进。最后，贺龙的意见被会议接受。

这时的红三军，已疲惫至极，加之肃反中错杀了大批干部，军政指挥人员齐全的营团几乎没有，组织编制也不健全，连不成连，排不成排，这种情况尤以红七、八师为甚。洪湖沦陷后，医药全部损失，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长途远征，的确是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危难之际，夏曦已失去一向盛气凌人的态势，茫然不知所措，贺龙见状力挽危局，自告奋勇地说：

“我带队伍！”

经过简短的动员之后，贺龙率部翻过桐柏山，开入豫西、伏牛山地区。那时，部队没有这个地方的军事地图，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上面只画着几个大地名。山里人户稀疏，道路崎岖，有时找不到向导，总是在林子里绕圈子。国民党马鸿逵

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有时晚上刚宿营，发现了敌情，又要行军赶路。山里粮食缺乏，部队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有的人吃了毒菜便腹疼拉肚子，有的人饿死、病死在山里。

马鸿逵的部队一连追了7天。一天，贺龙率部来到一座叫作崔林的大山之下，从望远镜里看到，悬崖峭壁下只有一个约2000米长的山口子可以通过。他立即让通讯员把贺炳炎找来说：

“马鸿逵这条疯狗老是跟在后面，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我们行军还会很困难。”

贺炳炎是位勇将，虽然近来肚子里装的都是树皮、野菜，脸上的颧骨突起好高，眼睛也陷了下去，但一听说要打仗，情绪马上高涨。他看了看两边的山崖，立即明白了贺龙的意思，充满信心地说：

“请老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大部队翻过了山，贺炳炎带一个团隐蔽在山口两边的悬崖上，敌人进入埋伏圈后，贺炳炎一声枪响，全团一齐猛烈开火，敌人毫无准备，顿时慌作一团。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敌人在山嘴上遗下大批尸体，狼狈退去。在打扫战场时，战士们除了收捡枪支弹药外，特别看重敌人的干粮，许多天没有见到粮食的战士们，嚼着面包、饼干，风趣地说：

“敌人知道我们吃的困难，派马鸿逵送给养来了。”

马鸿逵遭到这沉重打击，丢了几百人，再也不敢尾追红军了。

崔林伏击战获胜后，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战士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继续西征了。

过了荆紫关，进入陕南，前面便是武关。据侦察员报告，国民党在关内驻有一个旅，关外布置了两个旅配合，碉堡林立，岗哨森严，轻易打不开，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去四川时，经过离此不远的漫山关，打了一仗，损失不小，红三军前锋部队就收容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伤病员。

部队在离武关不远的村子宿营下来，贺龙把王炳南、贺炳炎等人找来，对他们说：

“能不能过武关，是我们这次西征突围成败的关键，怎么过去，请大家发表意见。”

听了贺龙的话，有的人主张打过去，有的人认为应绕道而行。在大家发表完意见后，贺龙说：

“我们的部队现在很疲劳，硬拼不是办法；绕道走就更加疲惫，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听了贺龙的方案，大家频频点头称是，然后开始分头行动。

原来，贺龙预先了解到，敌人对武关虽说把守很严，但对一般行人还是放行的。这一天，不少人拥挤在关前，有挑柴的，有贩山货的，有提礼物访亲问友的……经过一番盘查，才允许陆续进入关内。站在关口不远处的贺龙，时而远眺通向关口的山路，时而望着已作好了战斗准备的部队，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不一会儿，猛见关内燃起一片冲天火光，贺龙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一齐向关内冲去。这时关内关外，枪声大作，炮声隆隆，喊杀声震天。

原来，那些陆续进关的都是红军化装的便衣队，他们进入关内，便将挑着的柴草点着，以此为信号，接着里应外合，内外夹攻，很快消灭了敌人，占领了关口。

在这里，部队得到了枪支弹药、粮食、军衣，继续向西前进。经过竹林关，再从洵阳、安康之间渡过汉水，沿着川鄂边境南下。

12月中旬，红三军主力进入巫山境内，逼近长江天险。为了保证部队安全过江，贺龙派出一些便衣侦察员寻找当地党组织，终于找到了坚持当地武装斗争的巴东游击队。他们得知红三军的到来，异常高兴，将长江沿岸敌军兵力部署情况向贺龙作了详细介绍。

贺龙决定避实就虚，抄近路直扑江岸，于是在巴东游击队的



配合下，飞兵奇袭巫山大昌镇，将疏于防备的川军一个营和保安团一部全部歼灭。紧接着，红三军以两个团为先锋，从大昌镇出发抄山路急行军，以迅猛的动作逼近长江北岸，然后趁夜色掩护，顺利渡过长江。

先头部队渡江后，又一鼓作气，占领巴东县城南面的制高点，第二天拂晓，红三军攻占巴东，后续部队全部过江。

12月下旬，贺龙率部离开巴东后，经野山关进入湘鄂边区的鹤峰县鄖阳关。至此，红三军完成了7000里远途大转移。

这次征战，历时两月，差不多每天都行军打仗，中间只休息3天半时间。7000里行军路上，到处播下革命火种，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

七千里转战中红三军干部战士在没有根据地，没有游击区为依托的情况下，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三分之一左右。部队从大洪山出发时有一万四五千，到鹤峰时还剩9000人了。”<sup>①</sup>减员的人员中，除战死、饿死、病死者外，便是被夏曦所搞的“火线肃反”所诬杀。

## 六 二次肃反

1932年洪湖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本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然而夏曦却认为是由于肃反运动搞得不彻底和所谓“改组派”捣乱所致。因此，10月间当红三军一到大洪山，又马上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因为这次肃反是在远途转移中进行的，故称“火线肃反”；又因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没有带出来，故“火线肃反”所打击的对象全部是红三军指战员。

它首先从诬杀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开始，接着杀

<sup>①</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

害了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然后诛杀营团干部 200 余名。

红三军在 7 000 里大转移中经常日行百里，而且是交替掩护，边打边走。有时逮捕的人多了，来不及处理，夏曦就将这些人编成一队，由政务处长姜琦派人看管。在“火线肃反”中，姜琦实际上成了夏曦之下，红三军所有人之上的人物，权力很大。他随身带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谁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曦同意，就将其逮捕、处决。“有的指挥干部在火线上负了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sup>①</sup>在部队翻越秦岭山脉时，夏曦命令将 100 多名“犯人”用绳索连绑，每人身上背上两支枪和其他东西，随部队行军。后又在一夜之间，除一名卫生干部和两名副团长外全部被处决。

夏曦还曾两次企图对贺龙下手。

一次是在王店，夏曦十分严厉地让贺龙写声明书，他说：

“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意把贺龙说成改组派的保护伞。

贺龙听后气愤万分，针锋相对地说：

“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 12 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向我要十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了你五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

停了停，贺龙接着说：

“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sup>②</sup>

夏曦理屈词穷，一时无言答对，弄得他下不了台。

另一次是在竹林关，夏曦因贺龙、关向应对其提出批评，便带人将贺、关警卫员的枪都下了，贺龙闻讯十分气愤，他找到夏

<sup>①</sup> 黄新远：《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湖南党史资料通讯》，1982 年 9 期。

<sup>②</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 年 1 期。

曦，向其提出严厉质问：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

然后把身上带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也掏出来往桌上一放，愤怒地说：

“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一番话顶得夏曦张口结舌，他慑于贺龙在红三军中的崇高威望，终于没敢动手，只得悻悻而去。

1933年1月1日，红三军攻占鹤峰，第二天转移到太平、毛坝一带。在毛坝，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会上，他虽然表示同意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但却借口红三军内部不纯，主张进行“清党”，同时加紧“肃反”。2月上旬，夏曦再次提出要继续进行“肃反”，并提出解散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取消政治机关，以“创造新红军”。他的这一主张，遭到了贺龙等人的坚决反对。贺龙义正辞严地指出：

“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讲不出。”<sup>①</sup>

宋盘铭也说：

“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段德昌气愤地质问夏：

“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sup>②</sup>

在大家强烈反对下，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议。

1933年3月，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召开扩大会议，夏曦在长篇

---

①②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

发言中，断言根据地的丧失是“改组派”、“第三党”造成的，提出要在党内苏维埃政府内和红三军内进行更深入彻底的肃反，并不顾贺龙等的反对，一人拍板，悍然决定解散红三军和地方的各级党团组织，撤消红三军各级政治机关。

红三军中解散党团组织后，一段时间内只有4名党员。因为这期间有组织关系的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人。前边3人是中央分局和红三军领导人，卢冬生在第三次肃反后任红七师师长，他是在上海加入党组织，又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中央分局开扩大会议，有时就不让他参加，或虽让他参加，但不准发言，卢冬生只能算半个党员，故另有“三个半党员”之说。

在解散党团组织的同时，第三次肃反又从逮捕段德昌开始。段德昌是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对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十分不满，曾对人讲：“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来，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了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sup>①</sup>对于夏曦大搞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组织的错误行径，段德昌更是坚决反对，他曾当面质问道：

“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完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都被你杀了。现在你又要取消烈士用鲜血缔造起来的共产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敌人？”

段德昌深知自己对夏曦所进行的斗争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他曾亲手抄写了于谦的《石灰吟》，将其贴在石洞里，表达自己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千锤百炼出深山，

<sup>①</sup> 《庄东晓关于湘鄂西的报告》，1934年1月23日。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只留清白在人间。

夏曦果然进行了打击报复。当时，在湘鄂边恢复苏区的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段德昌多次提出打回洪湖去，利用那里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自然条件，恢复和发展苏区。于是，夏曦便诬指段德昌是“准备把九师带走，脱离军部，准备叛变。最后在刘家司准备暴动。”<sup>①</sup>

1933年4月的一天，夏曦派人通知段德昌到中央分局开会，一进门便被逮捕，随即召开了公审大会。会上，段德昌昂首挺胸，侃侃而谈，他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叮嘱同志们：

“不要忘记共产党，不要忘记洪湖苏区的人民！”<sup>②</sup>

到会的人无不声泪俱下。

但夏曦不听贺龙的一再劝阻，不顾广大指战员的意愿，竟将一代英雄段德昌杀掉。段德昌遇难时，年仅29岁。

在诬杀段德昌的同时，株连到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

王炳南，1892年生于湖南桑植县袁家坪的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入贺龙部队当兵，后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二十军任营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家乡组织武装，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贺龙指挥下，率部转战桑植、鹤峰、五峰等地，成为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王炳南平日沉默寡言，性格耿直，作战勇敢，深受士兵和当地群众的爱戴。段德昌被害后，王炳南也受到牵连，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

① 《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1934年2月16日。

② 段传新回忆，载《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告中说：

杀段德昌开始，“同时肃清从荆当运转回鹤峰之独立师。这个独立师之干部基础，是王炳南独立团的。这个独立团团团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均是改组派，以前单独在湘鄂边，经过改组派几年的活动（从1930年到1933年）全部的干部差不多都加入改组派，到这时方开始全部的肃反。”<sup>①</sup>

贺龙对王炳南十分了解，曾亲自找夏曦谈话，认为他没有问题，应该放，但王炳南被刑讯逼供，折磨得遍体鳞伤，“隔几米就闻到臭味，他身上伤得没有一点好地方。”<sup>②</sup>最后还是被害，时年41岁。

王炳南被杀后，夏曦又下令逮捕了王炳南的次子，并残酷地将其杀害。还逮捕了王炳南已怀孕数月的妻子，在严刑逼供下，胎儿流产。

此外，还捕杀了其他一些同志。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次肃反“共逮捕了236人，主要是段德昌与军参谋处长和湘鄂边独立团的改组派分子”。于是，“火线肃反”后已出现的党和红军中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更加严重起来。

随着肃反的恶性发展，夏曦完全处于与红三军广大指战员严重对立的位置。他所推行的“左”倾政策越是不得人心，受到红三军干部战士的抵制反对，他越是认为“反革命”还在捣乱。刚愎自用、独断专横的夏曦更加怀疑一切，仇恨一切了，于是在第三次肃反之后，接着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

它首先从杀害红九师政治委员宋盘铭和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等人开始。其理由就是这些人反对他解散党团组

<sup>①</sup> 《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9月15日。

<sup>②</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

织和进行清党。

这次肃反，持续到1934年夏季结束。据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共逮捕172人”<sup>①</sup>。实际上远不止此数。

前后四次肃反，当年夏曦给中央的报告说共“逮捕3000多”，这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当时“左”倾分子简直杀红了眼，杀到后来红三军几乎没有什么党政干部了。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就连他身边的4个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3个。

贺龙后来回忆说：“解散党、团组织 and 第三、四次‘肃反’后，红三军中的党员中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和我四个人，根据地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干部损失最大。”<sup>②</sup>

到1934年4月，红三军从1933年春的9000多人，锐减为3000多人，枪多人少，有时一人要背几支枪，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红三军正面临覆灭的边缘。

## 七 夏曦受窘枫香溪

在根据地问题上，夏曦自撤出洪湖后，先曾准备放弃湘鄂西到川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拒不进行发展和巩固湘鄂边根据地的工作，致使湘鄂边根据地尽失。红三军再次失去依托，流动游击于鄂川边界一带。

1933年7月24日，夏曦在宣恩县烧巴岩主持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研究粉碎敌人进攻的斗争方针问题，贺龙、关向应等提出：

<sup>①</sup> 《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9月15日。

<sup>②</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

红三军应首先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对地主豪绅，按其罪恶大小、财产数量区别对待；对“神兵”武装，则尽力采取争取、分化、瓦解的政策，一般不采用武力解决的办法，以免在苏区树敌过多。

但是，夏曦从“左”倾立场出发，批评贺龙、关向应的主张是“革命不彻底”的政策。

双方争论了3天，最后夏曦勉强同意了贺龙、关向应的主张，但却又认为，集中也不能击破敌人，必须进行分开游击。因而决定把红三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贺龙、关向应、汤福林率领红九师，转移到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游击，开辟新苏区；另一部分由夏曦、卢冬生率领红七师，在鹤峰地区坚持斗争。夏曦以为自己 and 卢冬生是湖南同乡，故提出和红七师一起行动。

会后，贺龙、关向应指挥红九师经宣恩沙道沟南下咸丰，然后经利川活动于鄂川边境地区，8月中旬，部队进入咸丰。在这里，贺龙利用封建势力内部矛盾，分化地主、七劣掌握的“神兵”，争取了咸丰黑洞数百名“神兵”参加红军，并将其编入特科大队。

之后，又在利川夹背一带活动，开展扩红工作，相继吸收了近千名农民参加红军，壮大了红三军的主力。另外，在红三军的帮助下，利川的小河、毛坝，恩施三县场等地建立了几支地方游击队，并在这一带建立了数个工作基点。

10月间，敌新三旅和湖北省保安团向红九师发起进攻，贺龙率部与敌多次交战均未获胜，部队转往湘鄂川边流动。在流动中，与敌多次交火，皆未打好，部队遂转往湖南龙山一带。

夏曦带领红七师活动时，一开始就离开了“巩固苏区”的目标。红七师在行动中只顾往外线长途奔袭，没有同根据地的斗争结合起来，而且离开根据地时，还将苏区大部分游击队及地方干部编入七师，使苏区群众在对敌斗争中失去了依靠的力量，致使原定的发展巩固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



1933年12月初，红九师和红七师在恩施石灰窑相遇，一同转移到咸丰大村。19日，中央分局开会检查烧巴岩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情况，研究部队行动方向。

这时全军只剩4000人左右，行军时从队首可望到队尾。夏曦已经一筹莫展，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关向应也怀疑红三军能否自力更生，谈到今后的行动，他说：一个办法是进兵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这还要看湖北敌人是不是跨界追击；另一个办法是向两大苏区（指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靠拢，以保存革命的力量。

关向应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办法，原是贺龙在游击六县时提出的新方案。那时贺龙对他说：小关，川东南酉、秀、黔、彭，战略地位重要，我过去驻防过很长时间，地方上熟人不少；现在驻彭水东南面的杨其昌，就是和我一起通电北伐的结拜兄弟。我看可以进军川东南，创建新的根据地。经过关向应同意，贺龙派人给杨其昌送去密信，约他进秀山，接应红军入川。杨当即应允。关向应这时所以提出“两个办法”，意思是说第一个办法能否执行得通，要看湖北敌人的态度。第二个办法，才是他的本意，说明他也缺乏信心了。

贺龙坚决不同意向两大苏区靠拢的意见，仍主张进军酉、秀、黔、彭。他批评关向应说：

“为什么一定要靠方面军？难道我们手里拿的不是枪，肩膀上没扛着脑壳吗？！”

关向应接受了贺龙的意见，声明撤销第二个方案。

会议最后决定，把“恢复湘鄂边”的斗争口号，改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首先进军酉、秀、黔、彭。

1933年12月下旬，红三军移兵川境，击溃了大路坝、中坝和黔江城郊之敌，于22日攻克黔江县城，歼敌一个团大部。之后，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并吸收数百“神兵”参加红军。

1934年元旦，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向黔江反扑，红三军避开强敌，撤出黔江，进入利川境内。此后，红三军先后往返于湖南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地，因给养匮乏，弹药奇缺，部队战斗力减弱，与敌交战数次，均无战绩。

大村会议后，夏曦的情绪便开始低落，宣传群众、发展武装和地方党组织等任务，全被他放弃了。中央分局的“实际工作陷入麻痹消极的状态，特别是黔江退出至江垭作战这一时期，陷入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着”<sup>①</sup>。由于处于被动、流动状态，部队转战在湘鄂川边的崇山峻岭之中，生活困难，疾病流行，部队减员日增。加之主要领导者对胜利失去信心，部队政治机关还未恢复，思想工作薄弱，红三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部队士气低落，违纪现象也时有发生。

为摆脱红三军的严重困境，1934年4月14日，中央分局在利川境内的十字路召开会议。会上贺龙建议，首先进攻彭水，尔后向西阳、秀山、黔江发展，创建根据地。他说：

“这个地区是四川、湖南交界的地方，反动势力统治薄弱，封建主、地主比较集中，贫雇农多，物资也较丰富；我的老关系多；山大，有利条件多，这是创建根据地的理想地方。”

会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作出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决议。

4月下旬，红三军进入酉阳境内，稍事休整。这时四川军阀田钟毅进逼而来，红三军避敌转移。5月9日，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三军指战员冒着倾盆大雨，跋涉百里，出敌不意地奔袭彭水县城，歼敌一营，俘敌400余人，缴枪300余支，士气为之大振。

正当贺龙、关向应在彭水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创建鄂川新苏区工作之时，夏曦又轻率地否定十字路会议决议。他惧怕敌人，一心避战，认为：“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地势不

---

<sup>①</sup> 《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4年9月10日。

好，敌人来了不得了，决定过乌江入贵州。”<sup>①</sup>这样，在鄂川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又成了泡影。

5月中旬，红三军撤出彭水，进入贵州省后坪县境内。这里虽然敌人的压力不大，但人烟稀少，贫穷落后，部队给养问题不易解决，指战员有时几顿吃不上饭。于是部队又经务川的干水坝、德江的泉口寺，向沿河县境内前进。6月1日逼近沿河县城，敌慑于红三军的声威，一接火就溜之大吉，部队顺利进城。

从大村会议到攻占沿河县城，红三军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流动作战，广大指战员吃尽了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的苦头。

就在红三军面临重重困难，四处游荡之际，蒋介石一面以重兵围逼，一面亲自派遣反动政客来到红三军，对贺龙进行劝降。贺龙立场坚定，憎爱分明，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策反阴谋，而且了解了我们所需要的情况。

1933年12月，红三军在宣恩、恩施一带游击。一天，部队宿营下来，夜幕已经降临，饭后，贺龙在司令部里思考着下步的行动方向，忽然，警卫员进来了。

“报告军长，哨兵带来一个人要见您。”

“让他进来。”

不多时，警卫员从外面领进一人。只见他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见了贺龙，微微弯下身子，皮笑肉不笑地说：

“如果不错，您就是贺将军吧？”

“我就是贺龙。”贺龙说完，又仔细打量了一下来人，并不认识。然后问道：“你是……？”

“鄙人姓梁，名素佛，”来说着，从衣袋里取出精装的进口香烟，毕恭毕敬地递到贺龙面前，“请将军抽烟。”

“我喜欢这个。”贺龙从身上摸出烟斗往空中一晃，说完便装

---

<sup>①</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了一锅，吧哧吧哧地吸起来。

“将军生活简朴，克己奉公，真是名不虚传。”梁恭维道。

“先生到此，不知有何贵干？”

“将军多年忙于军务，驰骋疆场，可曾记得熊贡卿先生吗？”

“熊贡卿！”贺龙稍加思索，眼前便浮现出一位大腹便便，满口社交辞令的政客形象来。那是在他当澧州镇守使时认识的。1925年4月，贺龙率部驻防湘西澧州时，湖南省长赵恒惕曾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他为管辖七县的澧州镇守使。因对贺龙不放心，同时另派时任湖南省议员的熊贡卿，作为省府代表驻澧州镇守使署，监督贺龙行动。双方有过半年的接触，怎么能不认识呢？

“熊贡卿怎么啦？”贺龙急切地问。

“他想登门拜访，同将军叙叙旧情，谈谈前程。”说着，从身上掏出熊贡卿的亲笔信来。

贺龙接过信，打开一看，满纸都是恭维奉承话，但字里行间闪着刀光剑影。

原来，熊贡卿后来投靠了蒋介石，因他与贺龙曾有过这段关系，此刻蒋介石特派其与“剿共”行营的梁素佛到湘鄂西来，熊贡卿先派梁前来送信联络。

看罢此信，贺龙已明白了梁、熊的用意，他强压胸中的怒火，与梁素佛寒暄了几句，然后对警卫人员说：

“带客人去休息。”

等梁走后，贺龙便赶快将此事报告中央分局，并坚决要求杀掉蒋介石派来的反动说客。

夏曦、关向应看了熊贡卿的信后，一致认为，熊贡卿求见的目的是“游说”“策反”，但是自从洪湖突围时电台丢掉后，分局对外地的敌我情况都一无所知，为了弄清蒋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破坏情况，了解外面信息，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军。

于是由关向应起草，以贺龙的名义写了一封表示允许熊贡卿

来红三军司令部的信。

第二天一早，梁就得到了这封信，他以为缺口已经打开，便兴高采烈地回施南复命去了。

1934年1月12日，熊贡卿带着十几名随从和礼物，乘轿来到红三军军部。贺龙按中央分局决定，不露声色，“热情”地接待了熊贡卿。

当时，部队正从利种公鸡岭向咸丰、宣恩转移，熊贡卿和他带的随从被指定跟在军部后面行军，途中贺龙同熊进行了频繁接触，夏曦、关向应也多次找其谈话。老奸巨滑的熊贡卿，开始还守口如瓶，但在贺龙等机智地周旋下，终于吐露了蒋介石集团已经向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派去奸细的情况，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从熊口里不会再能得到新的信息；同时考虑到他在红军中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对我们的情况也了解了不少，绝不能纵虎归山，于是采取了果断行动。

一天晚上，军部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公布了熊贡卿“策反”活动的经过，并宣布了中央分局关于逮捕并处决熊、梁的决定。接着，贺龙命令刘开治带领五六个警卫员来到熊贡卿的住所，对他和梁素佛说：

“我们军长请二位先生有要事相商。”

这两个家伙见晚上来请，满以为他们几天来的“工作”已经奏效，策反即将成功，便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迫不及待地随警卫人员而出，一路上边走边做着立功受赏、升官发财的美梦。不料刚迈进红三军司令部，两条绳索便分别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利令智昏的熊、梁二人此时才如梦方醒，一时呆若木鸡，吓得瘫倒在地。

与此同时，熊带领的警卫班也被缴械。

第二天一早，部队向桑植方向开进。行至新场附近的山垭口时，红三军在这里召开了公审大会。贺龙在会上讲了话，他愤怒

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劝降”阴谋，正气凛然地说：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欺骗不了红军！”

在宣读了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布告后，几位红军战士推着熊、梁往田坪外走去，不一会儿，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声。

处决熊贡卿、梁素佛，使军心大快，士气大振，它进一步坚定了指战员们的革命意志，鼓舞了革命到底的斗争精神。“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口号声四起，响彻云霄。

1934年3月17日，夏曦、贺龙、关向应联名报告中共中央，说明了此事的经过：

“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敌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介石已派四个人（有二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已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贺龙的坚决行动，表明了他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也使部队指战员受到深刻教育。为此，关向应事后在团干部大会上曾号召广大指战员学习贺龙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贵的品德。

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是处于极端艰难环境中红三军干部战士的精神支柱，正是它，使全军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红三军占领沿河之前，原以为沿河为川黔边境重镇，北连川省之黔（江）、彭（水）、酉（阳）、秀（山），东接湘鄂之永顺、鹤

峰，可以在这里建立湘鄂川黔边区。然而，攻克县城之后，贺龙等立即察勘地形，认为乌江分劈沿河县城，河西、河东不好兼顾，不便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于是红三军于6月2日主动撤出，继续向黔东深入。

红三军从沿河县城撤出后，分几路行动，贺龙率红三军主力到沿河中界、印江刀坝、德江枫香溪一带；覃实安团长及其所属各营，到川境酉阳县的南腰界；红三军九师一部进入松桃县的麻阳、永安一带。红军基本上把沿河、德江、印江、松桃以及川黔边酉阳之南腰界控制在自己手里。

黔东一带，山岳连绵，地瘠民贫。“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就是当地贫困情况的真实写照。加以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极端严重，人民群众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因这里从来没有党的基础，人们对红军也不了解，当红军初到时，许多穷苦人家也都四处躲避。为此，贺龙、关向应多次召开会议，向指战员强调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组织部队向驻地周围群众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和红军的严明纪律。贺龙随时注意团结各方人士，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贺龙曾亲手释放了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红军攻占沿河时，戴一家逃匿山林，后因在山里实在呆不下去，不得不下山来。他下山后，被红军战士带到军部，有幸见到贺龙军长，贺龙按照红军的政策，让这位局长回沿河邮局照常工作。

同时，红三军还争取过来不少活动于川黔边境的“神兵”，组织了印江、沿河、德江三县的“神兵”独立团，后来又促成他们联合为黔东纵队。

有了川黔边界部分地盘，初步发动了群众，贺龙和关向应感到纠正夏曦错误，恢复党团组织，创造苏区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交换意见后，又和卢冬生商谈了这些问题。在他们三人的努力下，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江县枫香溪五族学学堂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由分局书记夏曦主持，分局委员、军

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参加，卢冬生不是分局委员，算是列席。

会议一开始，夏曦仍老调重弹，认为黔东地形不好，军队内部敌情严重，主张进梵净山，继续进行肃反。

贺龙首先发言，他简单回顾了撤离洪湖根据地以来到处流荡，没有根据地依托的艰难，强调建立根据地问题的重要。他说：“白鹤还有个滩头，野鸡还有个山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

贺龙越说越激动，说着说着便站了起来，要求分局同意即刻在印江、沿河、德江、酉阳一带创建苏区，停止肃反，恢复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等。

关向应对部队的思想动向及红三军撤销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后给部队带来的不良后果，作了详细的分析。

贺龙再次发言。他说：

“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党组织，怎么领导？谁来领导？‘支部建在连上’，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央也肯定过，为什么今天又反了呢？！”

卢冬生坚决支持贺龙、关向应的意见，与夏曦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夏曦理屈词穷，无言答对，最后只好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因为这时的夏曦，在一系列的失败和挫折面前，早已由“左”倾冒险转为消极悲观，已失去了过去那种“钦差大臣”专横跋扈的气势，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再也难以行使其“最后决定权”，没敢一人拍板定案，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大家的意见。

会议最后作出三项决议：

- 一、在黔东开辟红色根据地，创建黔东特区；
- 二、红三军立即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同志负责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
- 三、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枫香溪会议是贺龙、关向应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次会议，是红三军摆脱“左”倾桎梏的伟大转折，像一声春雷，给红三军带来新的生机。

晚上，贺龙主持召开红三军团以下干部会议，关向应以自我批评的方式传达会议精神，部署工作，受到干部们的热烈拥护，掌声经久不息。只有夏曦态度消极，情绪低沉，他起初说不参加会议，被贺龙请到会场后，也一改以往长篇大论，夸夸其谈的演讲习惯，闷坐会场中间，自始至终，一言未发。

枫香溪会议后，夏曦更加消极，正如后来贺龙所说：“夏曦在黔东时期，一直是消极的，红军到宿营地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做什么工作。”<sup>①</sup> 这从客观上来说，反为红三军干部战士放开手脚创建新苏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因此，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开辟黔东苏区的工作进展迅速，各级革命政权都先后建立起来。

枫香溪会议之后，红三军从军部、各师和警卫部队中抽调了100多名干部、战士，组织了一支武装工作队，先开办训练班，学习政策及掌握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然后分赴沿河、酉阳、印江、松桃、秀山等地各乡村寨发动群众。

工作队每到一地，大力宣传红军主张，到处贴满了“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不拿穷人一针一线！”“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后来，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某些标语保存下来，这些标语已成为贺龙和红三军创建黔东特区的历史见证。

6月27日，红三军在枫香溪召开了群众大会，并通过了《沿河县第五区革命委员会斗争草案》，为创建黔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迈出了第一步。

---

<sup>①</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934年7月21日至22日，是黔东六县人民难忘的日子，这两天，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会的有特区所辖各县的代表共135人，会上正式宣布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夏曦代表中共湘鄂西分局作了报告。他说：“今天这个大会，在贵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是我们工人农民出头的日子！”

会上选举了32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贵州高原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的诞生，它推动了群众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在红三军支持下，相继建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等5个独立团，另外还组建了10个游击队，地方武装发展到3000人。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现在的黔东苏区，包括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界，建立了17个区革委，约百多乡苏，约有近10万人口，纵横约200里。在这个区域土地都已经没收或分配了。”

7月21日，党中央派的交通员到达沿河县红三军军部，带来了中共中央5月6日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中央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由于中央指示信着重批评了中央分局的错误，夏曦对其存有抵触情绪，直到8月1日，才召开有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参加的中央分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信及五中全会决议案。

中央指示信中说，湘鄂西分局派了一个叫黄德标的师政治委员来中央汇报工作，可是黄德标对中央分局及红三军的情况什么也没有讲清楚。

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听了甚感吃惊，因为他们都不知道黄

去中央这件事，夏曦为什么背着分局其他成员这样干？

指示信严厉批评分局说：你们“完全不相信群众和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与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指出，“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确切的、夸大的！”“最不能容忍的是‘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简直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

指示信要求：必须坚决纠正错误的肃反路线，立刻恢复党内的正常状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和团的组织，吸收广大的穷苦群众的积极分子，密切并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消灭由于错误的肃反而造成的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

会议讨论中，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同意中央的批评，而夏曦存有抵触情绪，在就恢复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停止准备中的第五次“肃反”等问题上，同夏曦发生激烈争论。夏曦理屈，又不愿公开认错，便迁怒于卢冬生，借口卢冬生是列席代表，蛮横地禁止卢冬生的发言。会议进行了一天，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8月4日，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再次召开，在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下，夏曦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原则上通过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决议检讨了肃反中的错误，由此取消了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停止了长达两年多的错误“肃反”，党和红军内长期存在的那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开始逐步消除，发展了枫香溪会议的精神，巩固了刚刚建立的黔东苏区。

黔东苏区的创建与巩固，对红三军及后来湘鄂川黔苏区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贺龙后来对此评价说：

“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很大的一个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组织，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很大转变。……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sup>①</sup>

---

<sup>①</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

---

## 第二章 红六军团的西征

### 一 红六军团的由来

红六军团是在湘赣苏区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湘赣苏区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以井冈山为枢纽，包括永新、莲花、吉安、宁冈、酃县、遂川、泰和、安福、吉水、分宜、峡江、新余、萍乡、攸县、茶陵、桂东、资兴等十余县。除井冈山外，尚有武功山、梅花山、小岗山等山，整个地区山高林密，峰峦起伏，利于游击战的发展。

湘赣苏区的北面，是湘鄂赣苏区，它位于罗霄山脉的北段，是个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地。

湘赣苏区的东南面是中央苏区。因此，它自创建起，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侧翼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联系的通道，对中央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起着拱卫和桥梁作用。

红六军团就是在湘赣边及湘鄂赣边地区的主力红军，它是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挺进赣南闽西地区后，由留在原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赤卫队、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合编而成的。

1930年秋，湘东特委在毛泽东亲自授意下，抽调各地游击队的一部分，组织和成立了这个区域的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以刘沛云为师长，谭思聪为政委，田可平为政治部主任。

独立一师成立时只有两个团，第一团团团长张维，政委陈正华。人员400余，枪240余支。第二团团团长谭家述，政委王震。第三

团下辖三个营。全团 400 人，枪 200 支。王震自始至终在这个部队工作，发挥着骨干作用。

王震，生于 1902 年，湖南浏阳人。1922 年，他在长沙当铁路工人，参加工人运动。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长。1929 年组织茶陵游击队，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他革命热情高，坚决锐敏，刚毅果断，经常率领部队独当一面。

湘东独立师成立时，茶陵游击队编为三团第三营。1931 年 1 月，根据特委的决定，抽调地方武装成立独立一师第二团。1931 年 7 月，苏区中央局决定王首道、林瑞笙、张启龙与甘泗淇来到湘赣边，随即将湘东南特委、西路分委合并为湘赣临时省委，这两个区域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由省委统一领导，统一调动。这个区域的主力红军就是独立一师，其编制有司令部、政治部、军需处、医务处、特务连，共 1 000 多人。原师长刘沛云另调工作，李天柱接任师长。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从井冈山下来的，无论是作战、组织部队、训练部队、群众工作都有丰富的经验。

政委谭思聪，原是茶陵县委书记，他革命热情高，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平素不爱讲话，但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有极高的威信。

师参谋长谭家述与一、三团团长也都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有能力有经验，作战机动灵活。

因此，这支队伍政治上继承了井冈山的传统，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会做群众工作，熟悉如何打土豪分田地，如何进行宣传等等。

军事上也是得到朱、毛红军的真髓，有单独活动的的能力，善于找敌人的弱点予以袭击；善于夜行军、急行军；整个军队发挥了人民军队的特点，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继承和发扬了井冈山红军的优良传统。

为了集中力量，打破敌人即将对湘赣发动的“围剿”，1931年11月，中共湘赣省委决定，将独立第七团（原系遂川独立营，是由游击队编成，临时省委成立后将其调至永新，补充一些永新人；吉安独立营又编进一部分。共200多人）、红色警卫团合编成独立第三师。师长冯建元，政委甘泗淇（兼），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全师两个团，每团三个连，师直一个连。

1932年春，王震参加全苏代表大会归来，公布了军委成立湘赣军区，统一武装指挥的命令：张启龙为总指挥，甘泗淇为政委。

军区成立后，独立一师和独立三师会合，在甘泗淇和王震率领指挥下，先后打了两个胜仗后，宣布以独一、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第八军。开始没有军部，由独一师师长李天柱兼代理军长，师政委王震兼代军政治委员，师参谋长李达兼代军参谋长。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成立后，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大规模“围剿”，通过政府和各种群众团体，运用报刊、集会、演戏等多种形式，开展了扩大红军的竞赛，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和兄弟争当红军的热潮。从1932年3月到6月的3个月里，全省就有6741人参军，使湘赣边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于是成立了新的独立师和独立第十二师。新独立师以茶陵地方武装组成，谭家述、曾毅之分任师长和政委。独立第十二师，以南路地区的地方武装组成，叶长庚、魏垣任师长、政委。

1932年10月中旬，中央派蔡会文、萧克来湘赣领导军事工作。10月底开始组建军部，萧克任军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王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每师三个团。

第二十二师，由原独立一师改编，谭家述任师长，王震兼政治委员。

第二十三师，由原新独立师改编，杨茂任师长，谢国喻任政治委员。

第二十四师，由原独立第三师改编，戈勇任师长，胡楚文任政治委员。

第八军成立后，在萧克、蔡会文领导下，工作有了很大转变。萧克、蔡会文都是井冈山下来的军事干部。

萧克，生于1908年，湖南嘉禾人。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就读于嘉禾甲种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到叶挺部任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回乡在湘南组织中共基层组织。1928年1月任宜章县黄沙堡游击队长，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副营长，率部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四军连长、营党代表、营长。1929年春任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同年秋任纵队参谋长。1930年6月任红四军三纵队纵队长。10月纵改称师，任红四军十二师师长。1931年6月任红一方面军独立五师师长兼师委书记，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蔡会文与萧克同岁，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郡中学学生，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7月入叶挺第二十四师新兵营，任第一连党代表。后转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连党代表，随部队上井冈山。1928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连党代表、营党代表、军教导队党代表。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随军转战赣南、闽西，任红四军三纵队一支队党代表，参加古田会议。1930年6月任红一军团三军政治委员，与军长黄公略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取得重大战果。1931年冬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在萧蔡领导下，第八军的工作有了很大转变，干部开始看战斗条令，干部军事技术日益提高，开始走向铁的红军道路。4月间湘军六十四师陶广、六十三师陈光中进攻湘赣苏区。在这个战役中我军取得了棠市、九渡冲之廉价胜利。这些战斗显示了党的领



导正确和八军首长指挥战斗的才能及战术素养，以及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精神，特别是在棠市战斗中，截获敌人辎重 400 余担。”<sup>①</sup>

对于军事上的成绩，甘泗淇评论说：

“①他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人，有长期的丰富的战斗经验，对于军事是有把握的。特别是萧克，大部时间都在前线指挥，算是‘身经百战’；②对于湘赣红军的训练、战术的提高，以及部队的建设，从他们到来后都有很大改进。萧克对这些有不可磨灭的功绩。”<sup>②</sup>

为加强对湘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1933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派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6月中旬，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湘赣红军第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湘鄂赣红十六军改为红十六师，湘鄂赣红十八军的五十二师改为十八师，由红十七师、十六师、十八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但此时并未公开，也未组成军团领导机构，十六师也未来湘鄂苏区，暂由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

对此，萧克回忆说：

1933年“6月间在永新，我们按军委命令，将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十七师，我为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李朴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王震同志为主任），下属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但这时，红六军团没有设立领导机关，也没有使用过红六军团的番号。”<sup>③</sup> 这是红六军团最早的出现。

直到1934年7月下旬，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成立以任弼时

① 谭家述：《红六军团诞生和发展略历》，《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958页。

② 甘泗淇：《红六军团发展史》，《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973页。

③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准备西征，遂于该年8月在桂东寨前圩正式宣布红六军团建制。

红六军团的建立及后来的发展，与一位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被誉为“党的骆驼”的任弼时。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隐珠山下白沙河畔塾塘乡的一处称为“时中馆”的唐家桥新屋一个贫苦的乡村教师家庭。12岁初小毕业后，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读书，后到长郡中学学习。192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和萧劲光、任作民等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回到上海，1925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长。1927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代表中央去长沙，指导湖南省委工作。1928年初，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年夏在上海参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加强对湘、鄂、赣、闽等省农民武装暴动的指导，提出“创造乡村割据”的口号，参与决定将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红军。7月，被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10月在安徽巡视工作时被捕，1929年3月经营救救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不久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11月于上海再次被捕，获释后于1930年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3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年1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组织建设，发动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后又任中共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领导组建红六军团。

1933年5月的一天，任弼时来到禾川镇——江西永新县的县城，湘赣省委机关就设在这里。同行的有湘赣省委副书记刘士杰——一个平头、白皮、瘦个子的人。

当他们来到禾川中学时，已经有人在那里等候欢迎，这就是

代理省委书记陈洪时——戴眼镜，操江西口音的矮个子。

稍稍歇息后，陈洪时便绘声绘色地汇报起省委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成绩：

“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已经批斗了原省委书记王首道，肃反也在大张旗鼓地深入进行。下一步，将继续批斗省委及下面的一些‘右倾’干部，如张启龙、张平化、王恩茂等等。”

任弼时边抽烟边记录着。

陈洪时讲得眉飞色舞，满以为会得到新任省委书记的表扬，谁知任弼时最后不动声色地说：“好吧，让我先熟悉情况再说。”

陈洪时、刘士杰二人刚走，又进来一些领导人：有年轻、优秀的军区负责人萧克、王震；有正直、诚恳的省委常委张子意；有被人称为忠厚长者的方维夏……

第二天一早，任弼时就开始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首先找到正在受批判的原省委书记王首道。王首道对他说：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展游击战争，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不久，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开始抓“AB团”和搞“肃反”，也杀了不少人，但后来发现有些同志根本就不是“AB团”也被抓了，便产生怀疑，并准备加以制止。认为有疑问的尚未处理。

任弼时又找王震了解情况。他和王震早就熟悉，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王震是湘赣边区代表团的支部书记，任弼时当时为中央局组织部长。他向王震详细询问了湘赣边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并向代表们讲授党的建设。

王震早就对陈洪时、刘士杰等人有看法，他认为以王首道为书记的原省委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在肃反斗争中不是右，而是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接着，他向任弼时谈了省委让他前去逮捕张平化这件事。

1932年春，湘赣省政治保卫局轻信口供，说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AB团”分子，省委决定让王震带人前往百里之外的该县去逮捕他。王震说到了那里，“头两天，我作了一些调查，看他不是反革命，因为那里的根据地很小，敌人随时都可能去袭击，他们没有丢掉那块根据地，而且还不断地有所巩固和发展。他要是反革命，能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坚持那么久长时间吗？所以第三天我找到他说：‘我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省委的决定，现在你既是县委书记，又兼任赤卫大队的党代表，一身二任，工作太繁重，所以省委决定解除你县委书记一职，让你集中精力专门担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接着让带去的县委书记作交接。张便愉快地到部队去了。”

王震认为，原省委轻信口供，随便捉人是错误的，而陈洪时、刘士杰等人比原省委更“左”，动不动就捉人，更是错误的。为此，他还为张启龙受打击的事发过脾气。

任弼时一边认真地听，一边不断地点头，最后他说：“看来你的意见是重要的。”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任弼时认识到，王首道、张启龙等是一批好干部，尽管他们也有缺点，但他们把湘赣省的工作搞得比较出色，而陈洪时、刘士杰等人的做法是错误的。

这一天，任弼时正在一个叫“里田”的地方和王震商量工作，突然，甘泗淇纵马奔来。一下马，就气喘吁吁地说：

“刘士杰把张启龙关到保卫局去了！”

大家的心猛地悬了起来，保卫局是陈、刘一伙控制的“肃反”机关，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任弼时急忙整装出发：“我回去看看。”

他走出门来，跨上战马，顶着满天星斗，迎着清凉晚风，马不停蹄地赶回永新，找到刘士杰，果断地说：

“关张启龙是错误的，应马上把他放出来！”

“张启龙罪大恶极，应无情打击，决不能手软！”刘士杰喷了

一口烟说。

“不管他有多大错误，也不能把他当敌人对待！”

刘士杰无言答对，只得同意放人。

王首道后来回忆说：

“弼时同志不只听一面之词，他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王震等许多忠实同志的意见，采取慎重的态度，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对张启龙等同志也称是‘刀下留情’了。在王明‘左’倾路线猖獗的时候，任弼时同志能基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较客观地处理问题，就这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很不容易了。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我被撤职以后，被调整到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我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特地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予一点帮助。当时我算是犯了错误的人，能够得到领导的关怀，得到同志式的帮助，内心感到多么温暖啊！后来，我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批准。”<sup>①</sup>

任弼时较客观地分析处理问题，将王首道、张启龙、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从教条主义的打击下拯救出来。

当然，在当时中央的错误路线下，任弼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左”倾路线的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说：

“新省委时期表现得更‘左’一些的，表现在旧省委还犹豫的，新省委肯定了，杀了，捉杀了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等。但也不能说后来肃反是怎样扩大化，因为建立了革命秩序，不会使肃反那样无组织地发展下去。”<sup>②</sup>

<sup>①</sup> 王首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怀念任弼时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8页。

<sup>②</sup>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以任弼时为首的新省委，在军事政策方面也比旧省委更“左”。任弼时认为：“旧省委在执行‘左’的军事路线方面，只是打过一次分宜，而新省委在五、六两月基本上接受了新的军事路线。”“后来在松山战斗后才改变。”<sup>①</sup>

新省委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虽然更“左”了，但也还有它的成绩，概括地说，是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上，在扩大武装和组织长征上，都有成绩。

## 二 “小长征”

1933年秋，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集中100万大军，对中央、湘赣等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宣布与蒋介石政府决裂。

福建事变局部打乱了蒋介石四面包围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迫使其从“围剿”部队中抽出10个师的兵力开往福建。这时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战机。但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继续把中间派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下令将位于东线的红军主力，调到赣江东岸去攻永丰地区的敌人，让十九路军单独与蒋军作战。

1934年1月中旬，在十九路军失败前夕，中革军委命令六军团红十七师北上到湘鄂赣根据地会合红十六师，破坏南浔路，以切断敌之交通线，威胁南昌，牵制吸引赣江以东的敌人重兵，从面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1月24日，红十七师4000湘赣子弟，在年轻师长萧克的率

---

<sup>①</sup>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829页。

领下，从安福瓜畲出发，26日凌晨，在红十八师的配合下，于分宜县境东部的肖公渡击溃了沿河设防的保安队，出其不意地渡过了袁水，直逼黄沙。

黄沙位于赣西北九岭山南麓，是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盆地有一条隘路，通向一个漏斗形的小平原，这是湘鄂赣红军的游击根据地。红十七师准备在这里歇下脚，等待与红十六师会合，然后继续北上。

2月2日晚，部队赶到黄沙。第二天一早，敌人追击部队便占领山头，对红军发起进攻，红军撤到对面山上抵抗。

上午八九点钟，敌人飞机对红军轮番轰炸，中午，敌机来的更多了。师长萧克拿出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发现地上有三条长长的白洋布，中间一条最长，有十几米，旁边两条较短，也有六七米，由北朝南，摆了个箭头形，正好指向红军阵地。

“陆空联络信号”，他不由自主地叫了声。

于是，萧克立即命令几个战士在我军阵地上摆上了同样的标志信号。

这时，敌机不知朝哪里扔炸弹了。

双方对峙，一直延续到下午3点。

利用这段时间，我军调整了部署，然后向敌主要阵地发起猛攻，以少量兵力控制敌正面山梁，主力从侧翼的杂柴蓬里攻上去。敌人垮下去了，乱作一团，从山上滚下，我军紧追不放。这时敌机又来了，朝前面丢了一二十颗炸弹，挨炸的都是敌人。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我们的追击部队和敌尾部相接，飞机上看不清你我，认为红军追得快，把他们后面的部队也当作红军了。当飞机分清时，炸弹已丢光了，只好飞回去。这更有利于我军的追击，直追到潭山，天黑了才回到黄沙。

黄沙一仗，是以劣势兵力打敌优势兵力的一场恶战，是红十

七师北上的第一仗，它俘敌二三百，打死打伤四五百，缴获颇丰。红军也伤亡400多人。这一仗，使我军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与堵截，获得了暂时休整机会，为今后十六师继续北上，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在黄沙战斗打得正激烈之时，萧克写信给红十六师。当时他们正在九仙汤附近的山沟里隐蔽休息，接信后马上增援，晚上10点到黄沙，两个师会合了。

之后，两师一齐向北前进。

2月20日到了武宁横路铺，打了敌人区公所，便继续向东前进，到了瑞昌的小坳。这时接军委电报，命令轻装，迅速破坏南浔路。两师商定，红十六师留在小坳，警戒武宁方向；红十七师向马回岭车站前进。

红十七师到了马回岭车站附近，当时，既没有破路工具，又不懂破路技术，敌人又从各方面压来，不得不回到九渡源山区。

不久，敌十六师和暂四旅、独四十三旅，气势汹汹向红军扑来，妄图同我决战，一举歼灭红军于富水、修水之间的狭小地带。红十七师远离根据地，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与红十六师又联系中断，处境十分危急。为甩掉敌人，师首长当即决定，攻占柘林，强渡修水，到敌兵力薄弱的修水以南活动。

于是部队连夜冒雨行军，向柘林镇开进。走了100多里，来到离该镇不远的一个小山崖下，部队原地休息，商量渡河办法。

这时，已经雨住天晴，四周仍是漆黑一片，电话排长冯祖武就势靠在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上休息。

“一班长，上去听听。”他对身边的班长陈贵连说。

小陈拿上耳机，蹭蹭地爬上电杆，把耳机往电线上一挂，惊喜地喊：

“排长，有人讲话。”

“莫叫，仔细听。”



原来，敌第十八师当天也要到柘林镇一带布防，现在正用电话通知镇联保大队长准备粮草，配合敌军拦截红军渡河。

冯祖武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侯营长。营长一面派人报告上级；一面召集干部制定了夺取柘林的计划。

不一会儿，萧克师长骑马从后边赶上来，询问了情况后说：

“好，同意你们的计划，但一定要机智果断，随机应变。伪装敌人要像敌人的样子，遇到盘问，就说是国军十八师先遣队。”

于是，侦察连和前卫连的战士，换上了白军服装，扛着青天白日旗，在侯营长率领下，直奔柘林镇。

天刚黎明，便赶到了修水北岸。修水是江西五大河流之一，这里是下游，水深流急，柘林镇隔河相望。它靠山面水，镇后山上，怪石嵯峨，林木葱郁，地势险要，对岸沿堤敌人布有炮火。

河对岸有几个人影在晃动，只听一个家伙扯着破锣嗓子喊道：“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快把船摆过来！老子是十八师先遣队。”

河对岸，钻出个胖子，登上河堤，手搭凉棚，朝红军这边张望，不大功夫，三只木船荡了过来。

“先遣队”上了船，向对岸划去。

上岸后，斜挎盒子枪的矮胖子点头哈腰地对侯营长说：

“兄弟是联保大队长，知道长官要来，特在这里迎接，镇长在前面街上等候。”

红军除留两个班在河边警戒，其余的人开进镇子。

不多时来到一座深宅大院门前，联保大队长进去报告，不一会儿，走出一个架着金丝眼镜、蓄着八字胡的家伙。联保大队长介绍说：“这是我们镇长。”

“恭候、恭候长官，请到舍下用茶。”八字胡满脸堆笑。

“不”，侯营长把白手套一挥，十分傲慢地问道：

“大部队马上就到，粮草准备好啦？”

“好了，好了”，八字胡点头哈腰，“杀了几头猪，还有几石白米。”

“大队长，”侯营长转向矮胖子，“你手下多少人？”

“200多，”矮胖子毕恭毕敬，满脸奴才相。

“马上集合，我要训话！”

“是！”

一阵哨子响后，许多人提枪携弹跑来，不一会儿，联保大队长整好了队伍，矮胖子喊了“立正”，跑到侯营长面前，敬了礼，“报告长官，联保大队全部到齐，请阁下检阅！”

侯营长不慌不忙地走到队伍前边，清了清嗓子，然后十分威严地说：

“我军大部队马上就到，你们的任务是找船搭浮桥，武器留在这里，由我部看管，带开！”

狡猾的八字胡，偷偷地扯了扯矮胖子的衣角。“这，——这，”矮胖子眼望侯营长，结结巴巴想争辩。

“你他妈的敢违抗军令！”侯营长把手枪一拍，接着上去两个战士噉哩咔嚓，下了胖子队长的盒子枪。

“别误会，别误会。”八字胡故作镇静，随说随向后退，右手向腰里伸去。一个战士手疾眼快，顺手往他腰里一掏，掏出一支手枪。

八字胡这时才如梦方醒，嘴唇哆哆嗦嗦地问，“你们是——？”

“我们是红军！要命的就把枪放下！”

随之，枪支扔了满地。

船工们听说来了红军，很快架起了浮桥，早上8点，红军就过了河，完全跳出敌人的战役包围圈。

过修水后，敌人增加了6个团的追兵，想阻止我军返回湘赣根据地。2月26日，红军转移到了修水县的石溪，在这里作了短暂休整。

3月1日，敌两路追兵已到，红军甩开敌人，继续向西转移，于2日晚，在修水县的米苏，击破敌人的防堵，又于漫江击溃敌第五十师一个旅的袭击，胜利地通过了武宁、修水、铜鼓封锁线，5日，到达幽居革命根据地，找到了湘鄂赣省委。

当时，湘鄂赣边根据地分割为20多块，粮食极为困难，敌人太多，干部伤亡很大，师长萧克和参谋长李达都挂了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回湘赣苏区，并得到中革军委的批准。

师党委提出了“挥师南下，强渡袁水，打回湘赣去”的响亮口号，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听说回湘赣去，大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这时，敌5个师的兵力，向幽谷合围，红军趁敌立足未稳，向北突围，然后斜插入湘，同敌兜了个圈子，又折转向南，3月16日傍晚，渡过了汨罗江。

第二天，部队到达浏阳坳，放眼望去，一片荒山野岭，渺无人烟。经过频繁的战斗和长途跋涉，部队已减员很多，给养也全部用光了。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大家到丛林中找野果子挖野菜充饥。

萧克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挖野菜的战士，两道剑眉中间拧成了个疙瘩。

“参谋长，咱们还有几匹马？”

“两匹，后勤还有两头骡子。”李达回答。

“杀掉，分给大家吃。”萧克右手往下一砍说。

“师长，您那匹……”几束探询的目光同时投向师长消瘦的脸。

“都杀掉，”他斩钉截铁地说。

这样，在荒山野岭上，就着野菜、野果，大家吃了一顿骡马肉。然后红十六师北回幽居，红十七师继续南返。

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红十七师甩掉了敌人4个团的尾追，连夜泅渡袁水，3月20日左右，胜利地回到了湘赣根据地。

对红十七师的远征南浔路，萧克曾评论说：

“我们北上湘鄂赣，队伍并不大，只4 000人，两个月时间，纵横驰驱，敌人调动46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我们。我们打垮了敌人的6个团，冲破了敌人5次大兵团的战役包围，烧毁了敌人无数的碉堡，纵横3 000里，算个‘小长征’吧！由于我们积极行动，钳制了敌人大量兵力，起到了配合中央红军反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作用。”<sup>①</sup>

蒋介石鉴于消灭红军的计划一再落空，气急败坏地训斥敌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督剿”不力，敌师长朱耀华、彭位仁、岳森、郭汝栋等，一律降级记过。由此可以看出红十七师这次行动的意义和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了。

萧克又指出：

“红十七师的北上行动，是失策的。……从军事来说，我们一个小游击兵团加上不足2 000人的红十六师，北出南浔路，很难达到破坏南浔路的目的，也就不能有力的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对支援十九路军的行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其次，从湘赣苏区来说，十七师北上与红十八师分开行动，致使湘赣苏区的中心根据地受到损失。待十七师回湘赣，与十八师会合时，永新已经失守。这时红十八师实际只有五十二、五十三两个团，红十七师也削弱了。应该说，这是受中央‘左’倾错误影响造成的后果。”<sup>②</sup>

1934年1月，红十七师北上以后，留下十八师在湘赣根据地坚持斗争。当时敌人调动了6个正规师，一个补充总队的兵力，采取构筑堡垒、步步紧逼的方法，四面包围湘赣革命根据地。敌侵占龙源口之后，进而占领了根据地中心永新县城。

---

①② 萧克：《红十七师北上行动的回顾》，《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2~1043页。

为保卫根据地，红十八师及根据地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斗争，打退了敌人的部分进攻，保住了永新的花溪、黄岗和石灰桥三块地区。地方武装游击活动的开展，曾迫使敌人龟缩在永新、莲花等据点里，不敢轻易活动，但由于敌我兵力过分悬殊，因而无力扭转根据地日益被紧缩、分割的不利局面。

3月27日，红十七师2600多人胜利到达永新象形、花溪地区，与红十八师会合，他们只作了短暂的休整，便投入了迎击敌人进攻的战前准备。

敌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认为红十七师劳师远征，元气大伤，企图乘机一举消灭红军于袁水以南、禾水以北地区。为此，他一面督令所属部队继续构筑碉堡，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一面调整兵力部署，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3月底，湘赣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红六军团的作战行动问题。会上，刚从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回来的王震，传达了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

第二次全苏大会期间，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团支部书记的王震向中央汇报了湘赣的情况，李德规定只谈3个小时，王震费了很大的劲写了汇报稿，结果只谈了一个半小时，就不让讲了，并匆匆作了决定，要湘赣红军坚决执行“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

同时，王震又把汇报稿送到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那里，临回湘赣前，毛泽东找王震谈话。他在询问了湘赣的情况和军委对湘赣的指示精神后说：

“你们部队很纯洁，很有战斗力。”

停了下，他又说：“打堡垒战？你们有好多人？好多枪？堡垒对堡垒你摆得满吗？你的司令部摆到哪个堡垒上？”

他吐了几口烟，又继续说：

“不能那样打嘛！我认为还是那‘十六字诀’好，集中力量打

歼灭战，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打敌人的头、尾或腰。一口吞不下去的东西，就不要一口吞下。同时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并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的仗，你们会打呀！如果分散起来守，敌人就可能对我们各个击破。”

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王震把中革军委指示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都作了传达，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激烈争论。

陈洪时说：“我们应坚决执行军委的指示，十七、十八两师分散行动。”

任弼时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和毛泽东一起工作过，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有较深的认识，主张按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办。

最后，多数人支持任弼时的意见，并作出决议：打运动战，不打堡垒战。

这时，本来是滕代远任军区司令员，因未到职，省委要王震代军区司令员并召集十七、十八师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

按照省委会议制定的新的作战方针，取得了沙市战斗的胜利。

沙市是位于江西永新县城西北的一个小村庄，是通往莲花的必经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

4月4日，红十七、十八师连夜开往澧田、沙市以北的山地隐蔽集结，三个团担负正面突击，一个团负责打援。

5日拂晓，侦察部队发现敌4个旅成一路纵队像长蛇爬行那样向澧田开来。他们依仗人多武器好，有恃无恐，做着打头阵、抢头功、领重赏的美梦，一步步走进红军的埋伏圈。

待敌四十三旅先头部队进到涂下陇和汤溪地段时，埋伏在两侧的红军五十一团和永新游击大队首先开火。霎时，枪声响彻山谷，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乱作一团。

紧接着红四十九、五十二团相继开火，占领谭家后山和悦义

亭的红五十三团在部分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将敌四十三旅和后继部队割断，死死阻击敌增援部队的进攻。这样，担任正面突击的三个团便把敌分割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将其吃掉。

红军居高临下，各种火力一齐扫射，各个山头喊杀声连天，敌人被挤在一条狭小的小路与河谷里，死的死，伤的伤，乱作一团，还没等其清醒过来，红军指战员一个个跳出战壕，像猛虎下山，冲向敌群。

敌旅长侯鹏飞见状不妙，连声大叫：

“顶住，给我顶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谁敢后退半步，老子就毙了他！”

无奈兵败如山倒，任凭他叫破嗓子也无济于事，敌兵一个个抱头鼠窜，争相逃命。敌八十五团团长徐本桢也带着小部残兵向永新河南岸方向逃去，刚到河心，就被赤卫队员活捉。

侯鹏飞仍不死心，亲自率领旅直属队和八十四团抢占大路北侧的王坳和练屋里一带高地，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增援。

红军将士乘胜进击，又集中围歼扼守在练屋里高地之敌。敌军是在仓促间占领的阵地，来不及构筑工事，加之多数遭红军打击，已成惊弓之鸟，早无斗志，指挥失灵，怎经得起红军的猛攻？尽管旅长在旁拼命督战，还是难免覆灭的命运，最后连侯鹏飞也乖乖地当了俘虏。

为了挽救四十三旅的覆灭，敌人集中两个旅的兵力，向红五十三团发起猛攻，妄图突破这道防线。红五十三团指战员众志成城，坚守阵地，顽强地阻击了优势敌军，先后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锋。接着，指挥部命令该团乘敌不备，主动出击。于是，红五十三团集中一个营的兵力，向敌后侧突然发动袭击，将敌四十七旅击溃。敌军另一旅见状不妙，慌忙退去。这样，红军一个团阻挡了敌人两个旅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打援和阻击的任务。

经过3小时的激战，红军全歼了湘敌王牌军十五师四十三旅。

除毙伤敌一大批外，还俘虏旅长以下1 0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 000余支（门）。

沙市战斗是运用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打的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它的胜利，给深入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打击，挫败了敌人企图消灭红六军团于禾水和袁水之间的狂妄计划，暂时地缓和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紧张局势，配合了中央红军，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

沙市战斗后，敌人继续向湘赣根据地增派兵力，企图消灭红六军团于花溪、石灰桥狭小地区。

当时，蒋介石从战略预备队中，由赣东抽调精锐的、全为德国装备的李抱冰第五十三师，并调鲍刚旅进至赣西，使位于湘赣苏区腹地的湘军由4个师增至5个师、1个独立旅，共30个团的兵力。并在各县城之间构筑了大量碉堡群，建立联线，扩大控制区，分割封锁苏区。

此时，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要以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保卫永新平坝子，打败敌人的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

为此，湘赣省委发出了紧急动员，提出“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以全部兵力保卫方圆不过30余公里的永新平坝子。全省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在花溪、象形以北和永新城北及松山、金华山诸地区，广筑碉堡工事，准备以阵地防御战阻击敌人的进攻。

6月3日，敌首先以4个旅向红军金华山阵地发起猛攻，接着又以3个旅进攻红军松山等阵地。

松山位于永新城东北的怀忠以东两公里处，是永新、安福大道必经之路。这座小丘陵的标高180米，横长纵短，东高西低，北缓南陡，与周围的山峦不连接，是个孤立的制高点，易攻难守。

松山正东是神功山，正南是香炉山，东侧山脚有一村庄叫“松山老居”，附近地势平坦，是一块狭长的垄坝，阶梯式稻田密



布其间，射界开阔，有利于敌我发挥火力。松山山顶的各侧有一沟壑，便于红军部队隐蔽出击。

蒋介石令第五十三师开往安福，担任安福、永新的建碉堡任务，使安福、永新连成一片。

敌第五十三师到达安福后，师长李抱冰召集军官会议，李说：“建碉前进，必招致红军截击，本师单独作战，必须十分慎重。”

会上，李接受众人建议，决定从安福南境的金田起，向永新建碉前进。每日行程5华里，以一个旅担任警戒，一个旅建碉。

曾任中共泰和县委书记的叛徒左娜向敌五十三师一五九旅旅长李清献提醒说：

“萧克共有6个团，以四十九、五十一团战斗力最强，必在松山截击。”

敌到安福后，即以第一五七旅和一五九旅向松山攻击，并以一五九旅担任主攻，另一旅担任掩护和警戒。

该敌于6月30日推进至松山以北的山岗，构筑碉堡工事，准备发起突击，敌以4个步兵团配置第一线，共1万人。

红六军团决定，将指挥部设于金鸡坡，观察所设于香炉山，以五十一团坚守松山主阵地；五十团为右翼，位于神功山阵地。四十九团位于香炉山，为师第二梯队。后来随着战斗形势发展，该团一部与第一线的五十一团并肩作战。红军学校和地方游击队位于敌前进的右侧，担任钳制警戒任务，配合红十七师作战。

这样，红六军团已放弃了以往的灵活机动战术，执行在敌包围圈内实施内线消极防御的阵地作战，以短促突击的战术与敌死打硬拼，不惜一切代价背水一战。

红十七师五十一团部署三营坚守主阵地，一营在其左翼，主要是以侧射火力杀伤、顶住敌人，支援三营坚守的主阵地。

7月1日下午8时，敌五十三师先以炮火轰击红军松山阵地，接着以飞机进行轰炸扫射，步兵开始运动前进，展开冲击队形。为

掩护步兵冲锋前进，敌同时以轻重机枪向红军猛烈射击，并压制破坏红军阵地火力和工事设施。数十挺轻重机枪，如同飓风暴雨般进行扫射，一场惊心动魄的浴血战斗开始了。

红军沉着应战，采取正面顶住，侧面反击的战术，埋伏在村落前沿的分队，对发起攻击之敌，以猛烈火力阻击在田垄里，迟滞敌进攻行动，然后利用地形、地势进行隐蔽分散，从右侧撤回防御阵地待机。

当敌先头部队进到村落后沿时，即在迫击炮、平射炮、重机枪等火力掩护下，集结整队，准备冲锋，待敌爬到山坡鹿砦前沿之际，红军重机枪火力阵地首先猛烈扫射敌冲锋队形，手榴弹也在敌群中开花，杀伤了大批敌人，打乱了敌战斗队形。敌遭打击后，惊恐万状，首尾不能相顾，纷纷退滚到山腰和山下。

红军右翼部队乘机发起反冲锋，加上左翼一营火力的杀伤，敌纷纷向后逃窜，溃退到进攻出发阵地。红军出击部队也从右侧分散隐蔽返回待机阵地，伏击分队则继续留在村落，仅以少数人员位于前沿警戒。

正当红军修补、加固防御工事之时，敌人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时，萧克师长、甘泗淇主任亲临松山阵地视察，当进入三营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敌阵地时，敌突然以猛烈火力袭击红军指挥所，甘泗淇主任的警卫员当场中弹阵亡。

萧克师长临走时再三叮嘱营长，要很好转运伤员，隐蔽防炮，依托阵地杀伤敌人。

敌人的第二次进攻，炮火更加猛烈，掩护步兵跃过田垄，逐渐接近村落，并同红军伏击分队发生激战。此时，红三营和一营指战员迅速从山背后进入塹壕，准备抗击进攻之敌。敌人这次增加了兵力，组成左右两路，主攻的一路朝三营防御阵地正面涌来，黑压压一片，另一路向红一营防御阵地攻击。

红一营以猛烈火力进行侧击，支援三营打击正面之敌。

敌人还没进到鹿砦前沿，就被红军火力、手榴弹压在山坡上，被迫卧倒射击，匍匐爬行。红军两个营密切协同，乘敌立足未稳，从两侧出击，并追击到村庄，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格斗，逐屋争夺，终于把敌驱逐出村庄，恢复了原来态势，打垮了超过红军两个营6倍以上兵力的进攻。

同时，红军也伤亡俱增，付出很大代价，弹药消耗过半。

就这样，至当日下午，红军又连续击退了敌人的3次进攻。

敌人用3个团的兵力，与红军鏖战10个多小时，进行血肉争夺。红军10次往返出击，连续战斗，枪筒打热了，阵地上树木的叶子也被扫荡一光，村庄屋上的瓦片破碎不堪，到处是残墙断壁，弹坑累累，敌尸遍野，松山仍在红军手里，岿然不动！

与此同时，敌另一支向红军右翼神功山进行佯攻的部队，也被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击退。

松山防御战是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的重要一战。这次战斗，打出了红军的军威，以伤亡数百的代价，挫败了敌人的连续进攻。敌亡营长2人、官兵数百。

这次战斗，也是一次典型的“短促突击”的战例。尽管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短促突击战术可以取得有限的成果，但在红军弱小的时候，坚守局部阵地并不能摆脱被动地位，更不能保存有生力量，而且对保卫苏区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故战斗后的第三天，松山仍被敌军占领。

对于这一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的教训，王震曾总结说：

“短促突击的仗是不好打的。如果依靠这种打法即使取得了胜利也只是局部战术上的胜利。这样打的结果是我们不动，敌人也不动。我们不离开阵地，敌人也不离开工事，实际上还是碉堡对碉堡。所以松山及金华山两仗尽管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自己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而且最后阵地没守住，根据地照样丢

了，省委机关和红军部队不得不转移到牛田一带。”<sup>①</sup>

### 三 “金蝉脱壳”

1934年7月23日，湘赣革命根据地永新县牛田一所房子里，电键声嗒嗒，机要员陈琮英熟练地译出了很长的几页电文：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

接着，电报明确地讲述了撤出湘赣的理由：

“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封锁与包围，企图阻止我们力量的向西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电文还阐述了这一决定的目的：

“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区之作战。”

“最大限度的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发展游击活动中加倍的扩大化。”

“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电令并对红六军团向外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

“由黄坳、上下七一一带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队，或其以南

---

<sup>①</sup> 王震：《突围前湘赣苏区》，《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转移到现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区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区域。”

“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并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

“以后即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连〔联〕络。”

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安排：

“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最后，电报还对训令的传达问题作了规定：

“这一训令仅限于给省委常委、六军团及军区首长，不得丝毫下达。一切准备及第一步行动，应伪装进攻湖南军队的行动。……一切准备工作统限八月中进行完毕。”<sup>①</sup>

紧急！这是中央新的战略决策。陈琮英赶忙把它送到任弼时的手中。任弼时连夜召开省委常委及六军团及军区首长紧急会议。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电令后，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讲话。

陈琮英将电文送给任弼时之后，便匆忙赶回住处，老远就听到孩子的啼哭。她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屋，抱起孩子，把奶头塞进婴儿嘴里。哭声停止了，孩子在妈妈怀中慢慢睡去。

按往常，这时她该把孩子放下，去忙着处理其他事务。然而今天，她再也不能那样做，她把孩子紧紧抱住，好像怕被人抢走似的。

是啊，从中央电文中，她知道部队要转移了，带着婴儿行军

---

<sup>①</sup> 《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训令》，《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12～816 页。

打仗能行吗？丢下吧，实在不忍心啊！从小失去母亲和几次丢掉孩子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她的眼前：

陈琮英是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人，她出生后才4个月，母亲就去世了。12岁那年，父亲把她送到乡村教师任思度家里，给他的儿子任培国当童养媳。任培国就是任弼时的学名。

1916年，她来到长沙城里一家小袜厂当织袜女工。随后高小毕业的任弼时考上长郡中学，也进城上学来了。陈琮英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补助任弼时继续读书。

1920年，任弼时离开长沙到上海去苏联学习，1924年学成归国，在党开办的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并担任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像他这样一个有资历的人，想在大城市里找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是毫不困难的，然而他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对陈琮英依然一往情深。不久便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正式结婚。

陈琮英毕竟是位穷苦姑娘，到了大城市就显得土里土气了，她在街上常会遭到一些少爷淑女们的冷眼相待，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安。弼时便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做党的秘密工作，同敌人进行斗争，你也要学会斗争！”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陈琮英常常抓紧时间自习、练字、学文化，任弼时自然成了她的家庭教师。

1928年10月，在白色恐怖中，任弼时到南陵县巡视工作时被捕。陈琮英闻讯后心急如焚，她接受了组织上让她营救任弼时的任务，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苏明，爬上拉煤的火车，连夜赶往长沙，请了律师，一同赶到安庆，随后又回长沙作了安排，终于将弼时救出。然而，由于风吹雨打，苏明不慎患了肺炎，爸爸刚出狱，她便夭折了。

1931年3月，党中央调任弼时到苏区工作，当时陈琮英即将分娩，弼时放心不下。陈琮英对丈夫说：“我不会出事，你放心去吧！”弼时走后一星期，她生下女儿远志。

孩子出生不多日，因向忠发叛变出卖，陈琮英和孩子一起过了半年的监狱生活。关于这段情况，后来陈琮英曾向中央写过《关于向忠发叛变事实情况》的报告：

“1931年3月，弼时同志调任中央苏区工作，我仍留上海。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在向家我住了约二三个月。因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将向忠发转移他处居住（当时不知去何处），同时将我与向的小老婆杨淑珍安排到一家新开的旅馆暂住。记得在旅馆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月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也被押到。我们当时互不相识，后知道都因向忠发叛变才被捕的。”<sup>①</sup>

陈琮英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向对她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陈当时抱着刚出生3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后来陈琮英母女俩被押送龙华监狱，出生不足百日的女儿跟着妈妈身陷囹圄。狱中的生活可想而知，远志没奶吃，又黄又瘦，难友们把每顿小米碗漂着几点油星的菜汤省下来给琮英喂女儿。约半年，经党营救才得以出狱。

陈琮英出狱后不久，便接到周恩来从中央苏区发来的电报，要她立即去苏区。这时，她多么想带着女儿一起去啊！但一考虑到工作，又不得不忍痛把她送回湖南老家托付给婆母。

1932年三八节那天，陈琮英到了福建长汀和任弼时会而了，

<sup>①</sup>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劫后重逢，百感交集。刚到苏区时，她看到丈夫工作繁忙，身体不好，便把自己从白区带来的几件衣服拿去换了鸡蛋，给他滋补身体。她感到弼时需要她的照顾；她也再不能离开弼时！

1934年4月，在湘赣边区工作的陈琮英，生下一个男婴，夫妻俩给他取名“湘赣”。前面两个孩子，一个夭折，一个远离身边。这年任弼时30岁，陈琮英32岁，中年得子，钟爱之情可想而知。弼时无论工作多忙多累，回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先去看看孩子。

然而，现在又要远征了。陈琮英左右为难：

为了孩子，留下来？不能！弼时不能没有她的照顾；部队不能没有机要员。

带着孩子行军？也不能！这只会给部队增加负担。

想着想着，泪水不知不觉掉了下来。

“哭什么？怎么了？”不知什么时候，任弼时开会回来已站在了她的身边，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妻子，明知故问地说。

“湘赣怎么办？”陈琮英把企盼的眼光投向丈夫，等待着他最后定盘。

“你看呢？”遇事丈夫总是先征求妻子的意见。

“我不知如何处理。”

“那就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吧！”

“嗯！”陈琮英流着泪点了点头。

“不要难过了，为了新中国，为了更多的父母不失去孩子，只好这样了。”

听了丈夫的话，琮英的心里好像平静多了。她放下孩子，找了件自己的旧衣，忙着给孩子改制衣服。

弼时又伏案疾书，准备明天会议的讲话提纲。

根据中央电令精神，湘赣省委和军政委员会对突围行动作了周密慎重的研究，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1) 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军区一级机关与六军团直属部队



合并，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基层，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齐全。挑选了2500多名青壮年和500余支枪补充给红六军团。补充了弹药，筹集粮草、物资。

(2) 清理医院的伤病员，动员能够随军行动的跟随部队转移，不能行动的作了安置。

(3) 动员回家的战士归队。

(4) 还从地方上抽调250名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在政治机关领导下，负责行军宣传，以及沿途打土豪、分财物，并在新区建立革命政权和扩大红军工作。

为了保密，根据中央规定，这次行动的目的起初没有告诉部队的指战员。同时在部队行动前，省委对地方工作作了研究和部署，按中央指示，留下陈洪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省委讨论时，任弼时、张子意、吴德峰、谭余保、刘士杰、萧克和王震都不同意。因为这时陈洪时的个人主义发展很严重，对革命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而且在工作上一一点干劲都没有。当时王震提议把张子意留下任省委书记；张子意又要求王震任军区司令员。讨论中提出的不同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但后来中央回电还是决定把陈洪时留下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5年6月叛变投敌，1940年骑马跌死），由谭余保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洪时叛变后，由谭余保任省委书记。

军政委员会组成后，对红六军团的突围部署进行了缜密的研究，决定在敌人兵力薄弱、空隙较大的湘军和粤军接合部，突破敌人封锁线，向桂东地区转移。

红六军团突围之前，采用“金蝉脱壳”之计，派出地方武装独立红五团伪装主力，打着红十七师的旗号，活动于牛田、津洞及赣河沿岸万县的下东、沙塘一带，设路标，号房子、写标语，广造舆论，声言分兵三路，渡过赣水向东挺进，以迷惑和牵制敌人。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派出部分兵力于8月5日攻占衙前，把

敌人内层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建立掩护主力突围的侧翼阵地。

1934年8月7日下午，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团军政委员会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从横石、新江口一带出发，在敌人衙前至五斗江之间穿过，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于当晚袭占遂川县的藻林，歼灭了守敌。

这时，湘敌急令其两个师尾追红军，粤敌六个团也兼程北上，妄图包围红军在桂东、上犹和遂川之间地区。

红六军团将士不顾酷暑、疲劳和饥饿，昼夜兼程，9日占领太安、猴子岭，随即通过敌人在寒江至广东桥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于11日到达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跳出了敌人长期经营的战役包围，冲破敌人全部纵深防御。

这次行动，中革军委指示一切重要东西都要带走，故完全是搬家式的，开头油印机、造币石等什么都带上了。可是搬了两天就搬不动了，为了轻装，一路行军一路丢。

红六军团的神速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蒋介石旋即命令湖南军阀何键，急派刘建绪为“第四路前敌总指挥”，驰往衡阳，企图在北上粤军配合下拦阻红军西进。敌一面命令十五师和十六师跟踪追击红军，一面命令广西军阀李宗仁调其部下廖磊率桂敌七军十九师和四十二师向湖南进击，借以阻止红军南下广西。

1934年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

红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六军团指挥员们便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设在大草地上的会场。军团首长一个个扎着绑腿，踏着草鞋，腰间的皮带上插着乌黑发亮的左轮手枪。他们跨出指挥部，从长长的队列前走过，目光扫视着全场干部，最后走到一个土包包上。

萧克主持了誓师大会，宣布会议开始。

任弼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电文，高声宣读道：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

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长征行动最高领导机关，弼时为主席。

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稍微停了下，他继续宣读道：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

政治委员：王震

参谋长：李达

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下面接着又是一阵掌声。

他将命令插入口袋，再一次用目光扫视了全场，然后提高声音说道：

“同志们！英勇无敌的红军干部们，我们已经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军的企图。但是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险，我们还要前进，要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今天我们离开了我们亲手开创的湘赣苏区，但我们以后一定还会回来的。希望同志们作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

任弼时简要地介绍了远征的目的、意义，公布了中央7月23日电令的基本精神。最后举起拳头在空中晃了晃，激动地喊道：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我们一定打回来！”指挥员们眼含热泪，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呼声。

任弼时讲完话站到了一旁。

军团政委王震代表军政委员会任命了红六军团十七、十八师首长：

第十七师：萧克兼任师长，王震兼任政治委员，李达兼任参

谋长，张子意兼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第四十团，团长吴正卿，政治委员晏福生。第五十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第五十一团，团长金成忠，政治委员苏杰。

第十八师：龙云任师长，甘泗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方理明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第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政治委员李笑岩。第五十三团，团长张振坤，政治委员余导群。第五十四团，团长赵雄，政治委员魏×青。

接着王震发表简短讲话，他说：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是中央及中革军委领导下的一次有深远革命和历史意义的伟大战略行动，它打破了敌人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牵制了比我们多十几二十倍的敌人，从全局上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五次‘围剿’的部署。”

稍微停了下，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我们转移的第一步——突围已取得成功，在敌人如此残酷的进攻下，突围为什么能成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外，就是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能保持旺盛的士气和革命必胜的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罗炳辉有一句名言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就不相信那么大一个中国，你蒋介石一个人能吞下？我们离开了湘赣，为什么不能在全国建设二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湘赣！”

“建设更多的湘赣！”干部们跟着呼喊起来。

最后，由军团长萧克宣布了红六军团向西进军的命令后散会。

午饭后，各连队分头进行战斗动员，然后以班为单位展开了热烈讨论。

由于敌情发生变化，红六军团改变了原准备在湘南地区停留休整的计划。当晚，便从寨前圩出发，踏上了西渡湘江的征途。

1934年8月12日晚，经过战斗动员的红六军团，借着夜色，悄悄地离开了寨前圩。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外，听不到任何人讲话。近万人的队伍，蜿蜒曲折摆了好几里路长。

队伍经过汝城县田庄圩，跨越资兴县潞口、彬县狮子岭，通过郴耒公路，于8月17日进入耒阳县境。

8月18日，临近新田县。

20日清晨，袭击新田县城，全歼该城守敌。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人民群众拍手欢迎。

部队在城内稍事停留，张贴标语，宣传革命，便匆匆离去。

21日，到达零陵县的白水岭、铲子坪、分水坳、白泥坳、菱角塘等地。

23日，进入离零陵县城不远的略江口、蔡家埠。

前面便是奔腾的湘江，红军原准备在此抢渡西进。

然而，这时敌情已万分危急。

原来，当部队越过郴县——宜章公路后，湖南军阀何键已察觉红军的渡江意图，急忙调兵沿湘江防守。同时指令部队加紧追击，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沿岸。

红六军团赶到江边时，湘敌第十九师和桂敌第七军共9个团已先行赶到湘江沿岸，在从祁阳到零陵地段上展开；敌长沙独立三十二旅向零陵和东西方向开动，桂军也向这方面调集；敌追击部队十五师已到达阳明山西南侧，敌十六师正向常宁急进。

湘江这一带江宽水深，船只都被敌人拉到左岸。

上有敌机不断侦察骚扰，下有敌船经常穿梭巡逻。

红军处境十分危险，看来在此强渡是不行了。

军政委员会果断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渡江的计划，迅速向东转移，进入阳明山地区，依托阳明山有利地形，先打击尾追之敌；如果得手，即在此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作为暂时立足之处。

8月24日晚，枪声密集，红六军团以少数兵力猛攻零陵，作出强渡湘江之势。主力则秘密集中，马衔嚼、人禁声，一切发白闪光的物品都用锅灰擦黑，然后折向东南，大步插向桐了墙，入庙门口、祖爷庵。

8月25日，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阳明山地区，这里海拔2000多米，山高林密，昼夜温差很大，当部队于午夜之后登上山时，气温骤然由热变冷，大家被冻得浑身发抖，于是，各处升起篝火，偎依火旁，度过了后半夜。

天刚发亮，任弼时、萧克、王震便登高观察，这才发现这里地广人稀，区域狭小，靠近交通要道，缺乏回旋余地，并不适于建立革命根据地。

同时，又据警戒部队报告，发现敌十五、十六师，桂系十九师，独立三十二旅已开始从南、北、西侧三面向阳明山进攻，军事形势也于红军不利。

三位军首长当即决定：放弃在此暂时立足的计划，采取与敌兜圈子、巧周旋的灵活战术，甩开敌人，寻找渡口，相机渡江。

随即部队从阳明山东面撤出，26日进到白果市。

这时，发现敌人跟踪而来，部队又立即向东前进，绕过敌第十五师侧翼部队，急转南下，火速行军，于29日到达嘉禾附近。

嘉禾是萧克的家乡，他对这一带十分熟悉，自然给部队提供了方便，行军速度进一步加快了。

当敌人发现红军行踪向南追击时，红军却又由嘉禾附近掉头向西，很快甩开尾追之敌，远走高飞。

8月31日，红六军团从道县南部徒涉沱水，于9月1日行军至广西北部的灌阳县文市。

部队刚刚住下，任弼时便让通讯员叫来原在红七军工作过的袁任远，问道：

“你们红七军原来是从哪里过湘江的？”

他指的是1930年，李立三命令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离开广西去攻打长江过湘江的那一次。

“是在广西全州。”袁任远回答。

“那里可以涉渡，是吗？”

“是的，水很浅。”

任弼时取过地图，很快找到了全州的位置。

“仔细谈谈吧。”

任弼时详细地询问了全州的情况，然后同王震、萧克一起，商定了巧渡湘江的大胆方案。

这时，敌刘建绪判断红六军团准备从全县西北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便命令第三十二旅补充第一总队和4个保安团在黄沙河一带展开，命第十六师同时电请位于道县以北的桂军第十九师继续尾追红军。命第二十四师急进至兴安、全县，沿交通要道设防，阻拦红六军团西渡湘江。

但是，广西军阀另有打算，他们怕红六军团入桂，命令二十四师紧急收缩，以加强桂林城防。

敌军内部的不协调，给了红军摆脱敌军防堵尾追的时机。

红六军团首长判明敌情，决定在全县界首地区强渡湘江。

这时敌军两个师的兵力从后面压过来，强渡湘江有被敌拖住的危险。任弼时、萧克、王震认为，要顺利过江，必须集中兵力，狠杀敌人一个回马枪，击溃尾追之敌，然后才能从容渡江。

于是命令红军将士在文市附近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桂敌第十九师、湘敌第十六师误认为红军远途而来，连续行军，已成疲惫之师不堪一击，故贸然轻进。9月3日，当他们逼近文市时，红军战士突然反击，打敌措手不及，一举击溃敌8个团的追击。

次日上午，红军乘胜前进，在永安县与全县之间的界首地区

胜利渡过湘江。

湘江自广西入湖南，江水浩淼，山奇水秀，风景如画。战士们无意观赏这美丽景色，渡江后迅即向西延城急进。

蒋介石用尽心机，企图阻拦红军西渡湘江的计划彻底破产，但仍贼心不死，命令各路敌军继续对红六军团堵截，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和狂轰滥炸。当红六军团行至西延（资源县）的山区时，敌机尾随而至，对红军低空扫射。战士们奋起还击，用机枪打落敌机1架，缴获敌机枪1挺、左轮手枪2支，机上敌人毙命，飞机炸毁。

9月5日，红六军团进占西延县城，全歼该城守敌。部队在此稍事休整，以迎接新的战斗。

红六军团西征以来，一连贯的神速动作，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使其惊慌不已。当时的《大公报》曾载称：何键对六军团的战略战术十分恼火，称红军“匪徒狡诈，时而冒充国军，欺骗民众；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自叹“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

一个叫胡达的敌旅长在给何键的电报中也叫苦不迭，说国军往往比红军多走几倍的路，有时“两天吃不上饭”。

消息传到红军战士们之中，大家捧腹大笑起来。

#### 四 转战湘桂黔边

1934年9月8日，广西省东北边境的西延县车田，无线电波传来了中革军委新的训令：

“目前红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六军团就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9月20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独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在川黔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



军团首长们接过电报，迅速在地图上找到城步、绥宁、武冈的位置，它们位于西延的西北面，属于湖南的西南部，西临贵州，南靠广西。

“从中央近日的电报来看，从敌伪报纸透露的一些消息看，中央苏区的处境更险恶了。”任弼时手拿烟斗，深深吸了一口后说。

“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钳制敌人，直接与中央红军的行动相配合。”萧克接着猜测说。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也要转移？”王震问道。

“有可能吧。”任弼时下决心说：“就按中央电令指示办吧，我们行动的意义那就更大了。”

9月11日，部队由车田出发，往西北开进，进占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准备继续夺取城步、绥宁、武冈一带。

晚上，军团首长研究行动方案，萧克首先发言，他说：

“根据敌情报告，湘敌李觉指挥第一、第二补充总队、第五十五旅第一〇九团，分路向城步方向紧追不舍；桂敌第二十四师也由龙城向城步方面急进；湘敌独立三十二旅和桂敌第十九师也沿西延城至城步大道，向我军压来。以上诸敌，企图以重兵合围，歼灭我军于城步地区。我们该怎么办？”

说完，他以期待的目光看了下任弼时和王震。

“如执行中革军委训令精神，继续在这一地区，不仅难以立足，而且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王震说。

任弼时稍加思索后说：

“我们向中央请示，改变行军路线。”

于是，红六军团首长急电中革军委，陈述当前敌情，提出新的行军方案。中革军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全军立即经丹口、道通往西，向贵州境内前进。

红军这一行动，出其不意，使敌围歼红军的企图破产。

9月18日，红六军团进至靖县境内的打乌团、哨团和新厂一

带。这时尾追之敌也判明了红军将向西北方向运动，进入贵州同红三军会合的意图，便以重兵部署于新厂以北堵截，湘敌补充第二总队主力从靖县以南中央桥出发，经五里冲向新厂追击，于19日拂晓开至五里庙一带。

湘兵补充第二总队的两个团则邀功心切，孤军冒进，且战斗力不强。红六军团领导决定抓住战机，予以消灭，以取得行动主动权。

军团首长命令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以迅猛的动作抢占岩崖山、全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阻止敌人前进，待主力部队集结后，同时投入战斗。

9月19日上午8时，敌补充第二总队集中优势兵力向红五十二团守卫的全线吊葫芦阵地发起攻击，早已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待敌人一靠近，就进行了猛烈还击。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翻滚，敌人发起的多次冲锋皆被红军挫败。

激战到10时左右，天空突然彤云密布，狂风骤起，霎时间大雨倾盆。敌人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继续进攻，以另一部兵力向西迂回，企图利用雨幕掩护，突袭红军岩崖山主峰阵地。

素有在恶劣气候条件下作战传统的红军，早已料到敌人的企图，当敌人一进入阵地前的射程内，便予以暴风骤雨般的还击，敌人屡次攻击，皆被击退，阵地前陈尸累累，雨水和着血水横流。

这时，红十八师主力和红十七师踏着泥泞冒雨赶到岩崖山，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发起反攻击，激战至黄昏时分，毙敌200余人，俘敌官兵3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300多条，敌军两个团被红军全部击溃，狼狈窜回靖县。

新厂之战后，尾追之敌不敢轻易近前，红六军团分两路向贵州黎平、锦屏挺进。

这一带是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历代反动政府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政策，造成民族间尖锐矛盾，给红军的行动带来很大

困难。任弼时指示部队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根据军团政治部的要求，红军所到之处，都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和敌军残害苗、侗族人民的罪行，讲明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求解放的道理，认真做好沿途山寨寨主和土司头人的争取工作。红军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坚持露营野外，不住民房，不违禁忌，红军医生主动登门为群众看病。用了躲避在外的群众的东西，原处留条留钱，对遭受敌军迫害的贫苦群众，予以必要的慰问和救济。

这样，很快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由敌视而变为友好。他们积极为红军当向导，指引渡口，绑扎木筏，架设浮桥，使红六军团顺利渡过清水江。

接着，红军又在清江县的八挂河渡过潯水，原计划向铜仁、江口方向进军，与活动在思南、印江、沿河一带的贺龙部会师；但因敌军先红赶到潯水以北地区拦堵，于是，红军又于9月25日撤回潯水南岸，准备西向黄平，绕过潯水，寻敌空隙，渡过午阳河；再向铜仁、江口方向前进。次日，红军在清江县地区与敌交战，击退湘桂敌军尾追部队，9月30日，经镇远、台拱进战黄平县的瓮谷垅地区。

这时，湘敌五十五旅、三十二旅和桂敌第十九师已由潯水以北地区赶来，分别布防于施秉、镇远、三穗一线；黔敌军阀王家烈之四、五、六团也陈兵在黄平一带。为摆脱这些敌人，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0月1日在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了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县城，全歼该城守敌。

当时，红六军团指挥行军作战的用具十分缺乏，萧克后来回忆说：

“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

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sup>①</sup>

部队打下黄平县城后，进行了短期休整。党小组长小何利用休整的机会，召开了一次党小组会议。

西征开始，任弼时就和警卫员、公务员、收发员编在一个小组里。小何见任弼时忙，便没有通知他。

当收发员刘承珍从任弼时门前走过时，正好被任弼时发现，他问：“小刘，干什么去？”

“开党小组会去。”

“为什么没通知我呀！”

“看您工作忙，没有告诉您。”

“那可不行，我应该参加组织会议。”于是，任弼时放下手头工作，和小刘一块来到开会的地方，并对小何说：

“在党内，任何个人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的一员，都要服从组织，绝不能做特殊党员。”

他拍着小何的肩头又认真叮嘱道：

“下次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一天，供给部门发给每人两块银洋，任弼时开完会后，警卫员小李叫他去吃饭，他不肯马上去，要先把那两块银洋领来交党费。

“我已替您领来了，也帮您交了一块钱的党费，剩下一块留着零花。”

任弼时听罢，立时皱起了眉头，“你知道为什么要交党费吗？”

小李答不上来。弼时和蔼地对他说：

“根据党章规定，交纳党费是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也是衡量

---

<sup>①</sup>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党员组织观念的一个重要标志。交纳党费的时候，你心里就想着党组织。所以这党费一定要自己交，至于交多少那倒没有关系。”

最后，任弼时让小李把代交的钱取出来，然后他又亲手交到党小组长的手里。

任弼时就是这样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分要求自己。他的行动，影响着一大批红军将士。

红六军团在黄平县稍事休整又继续往西前进，10月3日，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一带。这时又接到中革军委命令：

“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领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

10月5日，红六军团掉头东北，分两路进入石阡县，并向甘溪镇进军。

当时，湘军李觉、桂军廖磊、黔军王天锡等正在镇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红军的阻击。

会后，他们在镇远、余庆、施秉、石阡一线设防，并将何键的补充第一总队、桂军第二十四师、黔军王天锡部由南向北推进，妄图把红六军团消灭在甘溪附近。

7日拂晓前，红六军团按照十七师、军团部、十八师的序列，向石阡的甘溪镇前进。计划到那里休息，然后利用夜色掩护，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东挺进。

上午10时，红军前卫团进至甘溪时，捉到敌人两个侦察兵，得知敌第十九师已经接近甘溪。

对此紧急情况，前卫部队指挥员没有派出部队占领阵地，掩护军团主力展开兵力或迅速转移，而将主力停止在离甘溪不远的河滩里，上级传令部队就地休息1小时，包括架锅烧水做饭。

派出警戒后，部队就散在河滩里，有的战士到村边找柴禾垒锅台。炊事员掉了队的单位，各人使用搪瓷茶缸自己做饭。小小河滩里，人喊马嘶，十分热闹。

李真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

“我们的前卫指挥员可能受到中央军委电报中所说‘桂敌现向南开动’的影响，当部队进到甘溪时，既不派出远方侦察，又不派出警戒部队控制甘溪的制高点，直到敌人进到甘溪东北200公尺时才发现。”<sup>①</sup> 但为时已晚。

这时桂敌第十九师两个团进入离甘溪镇不远的小河沟。敌人发现红军后，一方面把一部分桂军沿小河沟两岸摆开，向红军靠近；一方面派另一部分桂军抢占了甘溪附近的白虎山和群宝山，控制了制高点。

红军前卫部队发现敌情，当即下令五十一团在甘溪镇北头迎击敌人，该团迅即占领街南的青龙嘴高地。同时命令刚进入甘溪镇西街的红四十九团一营立即投入战斗。

敌人利用甘溪河作隐蔽，偷偷摸进甘溪镇西街红四十九团阵地。红军一位战士发现敌人，用一张桌子作掩体，端着机枪向敌横扫，打死打伤敌军多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红四十九团阵地被敌占领。

敌人集中火力猛攻镇北头五十一团阵地，截断了红五十一团与军团主力的联系。红五十一团战士坚定沉着，浴血奋战。一位战士高举两枚手榴弹，跳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该团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拖住了大量敌军。

这时，红六军团主力正在离甘溪几华里的红岩一带，因与前卫部队失去联系，一直未弄清甘溪战斗情况。当发现敌主力向红岩扑来时，王震当机立断，调红军随营学校一部占领老车土、龙骨屯阻击敌人；自己率领主力走红岩大土村南山丛林中经四方堰向大地方转移。

王震估计敌人来势凶猛，又派五十一团替换红校阻击敌人，并

<sup>①</sup> 李真：《挺进黔东》，《红军黔滇驰骋风云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掩护在甘溪的四十九、五十一团及红校向主力靠拢。

之后红六军团分成了三部分：

红四十九、五十一团冲出敌人重围后，未能找到主力，在李达率领下，转战于黔东地区。几位身负重伤的战士，在撤出战斗后，隐蔽于甘溪东南大湾丛林中，敌人多次搜捕都没有找到。一天，被当地民团头子突然发现，立即下山调集团丁搜捕。这几位伤员自知目标暴露，为了不落入敌人之手，他们将枪砸毁，奋力爬到一座崖边，毅然滚下陡崖，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

红六军团主力在转移途中，下令后卫部队十八师师直和五十二团迅速转移走马坪。后卫部队在师长龙云率领下，穿过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历尽艰险，到10月中旬，经石阡的公塘、白沙转至晏家湾、川岩坝一带，在这里遭敌合围，全体将士临危不惧，顽强抵抗，与敌激战三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多壮烈牺牲。龙云师长率部突围时身负重伤，在转移施秉途中不幸被捕，押往贵阳，后转解长沙，被何键杀害，时年27岁。

红五十团完成掩护任务后撤出阵地，随主力跟进。“部队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极其严重的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sup>①</sup>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一天，被包围在大山深壑中的部队侦察员请来一位向导，任弼时便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

向导是位乐观爽朗的山农，热情地介绍了这一带的情况。他

<sup>①</sup>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看着人们焦急的样子，将袖子一卷道：“你们急什么？不要急。山山有路，路路通南京嘛！”

任弼时眼睛一亮，“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我说，山山有路，路路通南京！”

“山山有路！”

任弼时立即要政治部主任张子意把这句谚语记了下来。

指挥部命令部队集合，任弼时拄着木棍，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打量着秋风下的队列。

萧克宣布了突围命令，王震作了战斗动员后，部队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向导，接着是萧克、王震，然后是任弼时。他边走边对身后一位同志说：

“往后传：‘山山有路’。”

“往后传：‘山山有路’。”

……

民谚在队列中传诵着，从队首一直传到队尾。顷刻，整个部队出现了一阵轻微的激动，好像一股新鲜血液注入了每一个人的躯体，一股股活力在躁动。

在向导的引导下，部队进入伍德附近的一条人迹罕至的夹沟。

这时，南面的湘敌补充第二总队，北面的桂军都发现了红六军团主力，敌军从南面进攻红军，萧克命令红六军团教导队特务连坚决抵抗。他们从黄昏激战到午夜，掩护军团主力安全地通过了夹沟。

拂晓时分，当部队踏着惨淡的月光走出深涧时，全军上下才为完成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突围任务而长舒了一口气。

随后，红六军团主力沿着石阡、镇远大道向东疾进。

甘溪战斗中，湘桂黔三省的敌人，一共出动了24个团的兵力，大大超过红军力量，但是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以气吞山河、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对进攻之敌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甘溪激战中，红军虽然遭受严重损失，但由于全体指战员的艰苦奋战，最后终于突破敌人的围堵转危为安。军团的领导基本无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种子，并实现了与红三军的会师。因此，它应是一次付出沉重代价而获得成功的战例。

几十年后，萧克回忆说：

“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从此，六军团战胜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和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了。”<sup>①</sup>

## 五 贺龙、任弼时相会在木黄

甘溪战斗失利后，与主力失散的红十七师第四十九、五十一团各一部，由四十九团特派员和五十一团樊营长负责组织部队，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继续前进。400多人的部队在深山丛林中转了几昼夜，未能找到主力。

李达回忆：

“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应该首先找到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然后迅即回头支援红六军团主力。于是，我把这400余人临时组成了一个先遣支队，按照预定方向，飞奔前进。

“我们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辗转，由德旺绕道梵净山西侧，到了甘龙口附近。我们听当地老百姓说，这一带常有部队活动，但不知道是什么部队。我又详细询问了一些情况。从这些蛛丝马迹判断，这很可能就是贺龙同志率领的队伍。得到这些线索后，我们都很兴奋。”

---

<sup>①</sup>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这个时候，贺龙、关向应也在寻找红六军团。红三军的电台在洪湖突围时丢失，因而不能与中央和中革军委保持无线电联络。贺龙看到贵州报纸上说：红六军团最近闯进黔东黄平、瓮安一带，正与湘桂黔三省追兵交战中。后来决定夏曦率独立师留守后方，贺龙和关向应带领主力南下，迎接红六军团。

10月15日，李达率领部队到达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地区。他给贺龙写了一封信，大意是：

我们是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前来找二军团会合的。我是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头，要和贺老总会面。

贺龙见信，喜出望外，就和关向应等会见了李达。得知六军团主力还在同敌人战斗中，当即研究了接应六军团的办法，立即率领主力部队经沿河县南下，顺着李达部的来路，绕过梵净山东侧，迎接红六军团主力。

红三军进到江口县境的木根坡，同正在寻找红三军的郭鹏、彭栋才率领的红五十团会合。随后，部队兼程南下，途中挫败湘黔军的拦截，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减轻了红六军团的压力。他们活动于沿河、印江一带，寻找红六军团主力和失散战士。

10月24日，部队来到印江县一个叫木黄的山村。

突然，侦察员报告：前而发现“敌情”。

贺龙马上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天已傍晚，雾瘴弥漫，视野不清，只听对面“叭叭”的枪声传来，战士们准备还击。

贺龙皱了下眉，命令先不要开火。因为他发现对方打枪有些奇怪：沉着，不乱发，不像国民党部队的打法。

“你们是什么部队？”贺龙命令战士喊话。

“我们是红军！”对方清楚地回答，“你们是什么部队？”

“我们也是红军！”“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们是红三军。”

“我们是红六军团。”

贺龙神色一震，立即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他透过雾气，看到对方果然是穿着红军制服的兄弟，肯定地说，“是他们。”

战士们欢呼起来，“啊，我们可找到你们啦！”

“弼时同志在哪里？”贺龙跑上前去，急切地问。

“贺胡子，我在这里。”任弼时扔掉拐棍，往前急跑几步，紧紧握住了贺龙的手。

“你好，贺龙同志！”

“你好啊，弼时同志！”

两位“胡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有谁能体会到此时此刻两人激动的心情呢！

贺龙，这位当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自回湖南后，多年带着部队爬山越岭，餐风饮露，赴汤蹈火，转战湘鄂川黔。在“左”倾路线下，部队多灾多难。“根据地搞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他多么希望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现在，终于见到了从井冈山来的亲人，怎不叫他像孩子似的朗朗大笑呢！

而任弼时呢？带领部队经过80多天行军，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攀险峰，穿幽谷，忍饥饿，冒酷暑，在苗岭山地辗转反侧，像大海捞针一样，终于找到了多日来所要寻找的红三军，完成了中央交给的战略转移任务，怎不叫他热流暖遍全身呢！

两双大手紧紧地、久久地握在一起。

关向应、萧克、王震也都同贺龙一一握手、拥抱。

随后，他们手握手步入红军军部驻地——原国民党乡公所水浒庙。

木黄是白区，为防敌人的袭击，当晚，部队转移到松桃县的石梁。

石梁村沉浸在一片欢歌笑语之中。先期到达的黔东独立师的司号员在街头吹起了军号，火红的军旗迎风招展。

红三军政治部宣传队员们，用石灰水在高大的张家祠堂的墙壁上书写了“庆祝红六军团与红三军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幅标语，街头巷尾挤满了慰问红军的群众。

红六军团从木黄沿河而上，红三军在圈马河、龙家大坝等地设置茶桌，热情慰问红六军团的战友。胜利会师的喜悦洋溢在每位指战员的脸上。

26日，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

这天，南腰界到处充满了战友相见的欢歌笑语。指战员们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拥向会场。收割了庄稼的猫洞大田里，挤满了转战南北的红军战士、各路游击大军，以及身穿各种民族服装的群众。

会场四周飘扬着红旗，用石头压着的红绿标语，放在会场周围，用木板搭起的主席台上方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师庆祝大会”。秋风阵阵吹来，横幅哗哗作响，像条火龙腾空而起。

司号员吹响了预备号音，雄壮的曲调，震动群山，喧哗的会场顿时肃静下来。

两军团首长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等，在一片掌声中走进会场，健步登上主席台。

大会由夏曦主持。首先，由任弼时向两军团指战员宣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和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统一指挥二、六军团。会场上立即爆发出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着贺龙讲话，他说：“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路跋山涉水，打了不少胜仗，战胜了敌人，来到这里，我们表

示热烈的欢迎！”说着，带头鼓起掌来，下面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等场上安静下来后，他扫视了坐在会场一边的六军团的指战员，接着说：“我们知道大家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也是应该的。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息，这里根据地是新开辟的，不很巩固，我们必须去创造更大的根据地。”他幽默地说：“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脚板上。敌人还在追我们，所以我们还要走路。今天开完会，明天就要出发啦！”

停了下，贺龙将目光移到整个会场，继续说：“同志们，今天我们两军团会师是大喜事。要讲的话，千言太少，万句不多。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一句：跟着共产党走，红军就有希望，革命就能胜利。”

他稍微放低了下声音，又说：“讲几句老话，大家不要见笑。据说从前贵州有个夜郎国，大概很小吧。有一年他的国王问汉朝派来的使者，说：‘汉朝的地方，有我夜郎大吗？’因而后来就有‘夜郎自大’的说法。这是闭目塞听、盲目骄傲的意思。我这个人有没有夜郎自大的思想，以后请大家监督，随时帮助。”

贺龙把目光又移到会场的另一边，这里坐的是红二军团的部队。他提高声调说：“二军团的同志都特别要注意，会师会师，我们会见老师了，今后一定要虚心向六军团的老师学习！”

贺龙讲话后任弼时又讲道：

“同志们，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有两个意义。第一，庆祝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我们红六军团从江西出发后，天天盼望与红二军团会合。今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第二个意义，”他举起了两个指头，“今天又是个起点。从今天起，我们两支部队要亲密团结，互相学习。我们要打更大的胜仗，来庆祝我们的会师。”他对六军团的同志们说：

“同志们不要骄傲，要把红二军团的同志当作自己的兄弟和先

生，好好向他们学习。不管干什么，都要尊重红二军团同志的意见。”

庆祝大会在雄壮的军乐声和战士们的欢呼声中结束。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红六军团长途血战，使他们有了一个落脚点，部队得到了短暂休整，从而保存了骨干力量。

红六军团在大量减员的情况下，抽调 30 多名干部到红二军团工作，进一步充实了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

贺龙对红六军团干部战士非常关心，他对二军团卫生部长说：“六军团的马匹部分失落了，你把卫生部的马匹拨给他们一部分。还要挑一匹好骡子送给任弼时政治委员。”还指示供给部，将筹得的粮、肉、款送给红六军团，并要求部队抽调人员上山割细草，为红六军团战友打草鞋，还嘱咐军团部值班参谋，在两军团共驻一地时，站岗、放哨等勤务全部由二军团担负。

两军团紧密团结，步调一致，广大指战员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共勉互学，士气大增。贺龙后来说：“二、六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sup>①</sup>

萧克也评价说：“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sup>②</sup>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他曾挥毫题词：

①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②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二六军团，历尽艰险。  
木黄会师，三军欢唱。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  
沅澧波涌，狂飙燎原。  
赤区重建，湘鄂川黔。  
抚今追昔，怀梵净山。

---

## 第三章 武陵山下红烂漫

### 一 龙家寨大捷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如何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成为摆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首长面前的最重要课题。

红六军团的西征，实际起了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作用。1934年初，国民党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自瑞金、云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红一方面军退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

红二、六军团会师之时，正是中央红军冲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向第二道封锁线开始冲击之际。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计划，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如何策应中央的行动，便成为二、六军团活动的中心。对此，萧克回忆说：

“会师后，我们立即对当时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境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sup>①</sup>

10月23日，在刚刚会师后的木黄水浒庙紧急会议上，任弼时向贺龙等传达了党中央派遣六军团西征的意图，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贺龙简单地向红六军团领导人介绍了湘鄂川黔边的地理民情及敌我形势后说：

---

<sup>①</sup>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或是建立以梵净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或是进入湘西寻求新的发展。”

他说：“梵净山的地形作为根据地固然好，但活动范围太窄，离群众远，且冬天积雪，部队过冬有困难；到湖南发展比较有利，梵净山可以作为必要的退路。”

对贺龙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

会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联名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建议：

第一，“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两军团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

第二，“加强黔东根据地的党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巩固和发展原有根据地的基础上，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是“左”倾统治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于红二、六军团所处的环境及面临的形势缺乏正确认识，坚持要红二军团留在黔东根据地内活动，督令红六军团单独向乾城、凤凰地区开进。

中革军委 10 月 26 日给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来电：

A. 二、六军团会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B. 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sup>①</sup>

接到电报时，已近午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等连夜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sup>①</sup> 《中革军委致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报》，1934 年 10 月 26 日。

任弼时把电文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

好一会儿，没人吭声。人们在沉思着，有的在吧哧吧哧地抽着烟，不大的房子里顿时烟雾缭绕。

“老总，您对这儿情况熟悉，还是先讲讲吧！”任弼时看了看正在抽烟的贺龙后说。

贺龙又深吸了一口，抹了一下胡子，“好，要我谈，我就不客气，先来亮亮我的看法。”

他说：中革军委这个计划，有点不妥。我们两个军团各只有三四千人，分开活动力量弱，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另外，凤凰那边的情况我熟悉。第一，那边是军阀陈渠珍长期盘踞的地方，反动统治根深蒂固。而且那里大多数是苗族人。六军团要是单独去，生活习惯和讲话都和他们不一样，很难立足。

第二，那里从清朝以来都是屯田养兵制，每个寨子都有官田，养有兵勇，对外来武装有传统敌对情绪。

第三，那里的民间枪支，至少有10多万支，一被王八蛋们利用，就不好对付。

第四，那里穷，难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

因此，六军团单独开往凤凰那一带是不行的。

他停了下又说，至于说红二军团继续留在黔东也不妥。黔东根据地纵横200里，人口只10万以上，人少粮缺，民贫地瘠，部队给养和兵员补充有很大困难，以此狭小地域很不利于我军机动兵力，不利于红军以后的发展。因此我的意见是：

“第一，不能分兵，二、六军团要一块行动；第二，不能停留在黔东；第三，也不能开往凤、朝、永地区。”

“那应该往哪里去呢？”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

“往湘西！”贺龙坚定地说。

随后他走到挂着地图的墙边，用手指着标有永顺、桑植和龙山的位置说：

“我们还是两个军团一起行动，往永顺、桑植那边去最好。”

“我赞成贺老总意见。”萧克首先说，“那里过去是贺老总领导的部队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老总在这些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而且湘西的敌人力量薄弱，只有陈渠珍部三个旅和三个保安团，约万余人，总兵力不大，战斗力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练出好队伍。”

关向应、王震等也都发言，支持贺龙的意见。最后，任弼时作出结论说：“看来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立即向中央汇报我们的意见。”

于是任弼时起草了电文，10月27日与贺龙等再次联名致电中革军委，除陈述继续坚持两个军团统一指挥、集中行动的理由和意见外，提出主力不再直接向乾城、凤凰地区前进，其原因是上述地区敌人“武装多，且极强，经常可动员万人，系受陈渠珍节制”的部队；因此，两军团明日向龙潭前进，至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间，然后向乾城、凤凰地区发展。

然而，“左”倾中革军委仍坚持原定计划，不过这并没有动摇二、六军团领导人从实际出发确定战略方针的决心。

10月28日，两军团领导人再次致电军委，力陈两军团统一指挥、行动，及发动湘西攻势的理由：

“1. 根据总司令部及我们所得谍报，敌五、一两支队在松桃、秀山间，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荣洞坊。松桃之木岩河船只少，不能徒涉，且敌必有防备。2. 六军团除五十二团外，计3300余；除留伤病员外，只有3000。二军团及独立师3900余，卫戍及伤病员200余，枪3700支。二军团每支枪子弹不过10发。3. 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

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任何一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此后，中革军委对红二、六军团首长的电报长时间没有明确答复。当时，中央红军正准备过第二道封锁线，部队携带大批辎重，行动迟缓，数万人马在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上拥挤，而敌人则以8个师从古龙岗、兴国出发跟踪追击；何键部在湘南赣西，陈济棠部在粤北，桂系李宗仁部在桂北一带部署兵力，拦截红军。“左”倾中央领导人已经从消极防御变为逃跑避战，他们拒绝从实际出发，在强敌面前惊慌失措，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全无章法，更不能对红二、六军团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了。

任弼时、贺龙等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同中革军委领导人的这场电报上的争论，正确答案只能从实践中找。试想，如果红二、六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分开行动，孤军向指定地区开进，很可能造成被敌各个击破的严重后果，怎么能组织大的战斗，吸引大量敌人，从而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呢？

就这样，为了对革命负责，任弼时、贺龙等不顾“左”倾中央的反对，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立了两军联合行动，发动湘西攻势的正确方针。

据此，部队进行了整编，统一调配了干部，红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原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改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

原红三军的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方理明，参谋长韩克西，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十和第十二团。

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政委袁任远，参谋长周天明，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

红六军团由萧克、王震分别继任军团长和政治委员，谭家述

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六军团因减员暂缩编为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三团。

同时，进一步恢复和健全了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机关。将原六军团的政治部改为二军团的政治部，六军团建立新的政治部，先后从六军团抽调 100 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担任四、六两个师的师政委和大部分团政委。

经过改编，虽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是中央代表，原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原是南昌起义总指挥、二军团军团长，在军内威望很高；关向应原是六届中央委员，红三军政委，这样实际已形成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1934 年 10 月 28 日，部队分路出发，撤离南腰界。

南腰界人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唱着《十送红军》的歌，欢送红军踏上进军湘西的征程。

一送红军出大门，  
全村邻里倚门哭眼泪盈盈，  
粗茶淡饭未能尝，  
为着穷人急急忙忙奔前程。

二送红军出村口，  
几番回首三脚两步难行走，  
难言红军恩情重，  
万古千秋永远铭记在心头。

……

十送红军千里远，  
路茫茫无奈太阳往西偏，  
朝行夜宿多保重，

杀尽土豪但愿你们早回还。

出发前，为迷惑敌人，留在川黔边境坚持游击战争的黔东独立师的一个团以及地方干部向西挺进，然后转南，由甘家堡、土门等地奔向铅石坝、枫香溪一带。红二、六军团的主力则挥师北上，首先进攻川东的酉阳，将敌军西调。

国民党酉阳县县长易之明得知红军北上，屡次要求田冠五旅派兵增援。田冠五则要易之明死守，而自己却龟缩龙潭，以防被歼。

10月30日，各军分两路进逼酉阳城，设防于官清的田冠五部闻风溃退，县城易之明部也纷纷逃窜。

不过，红军先遣团并不攻城，意在围攻据点，待主力通过后，立即撤回跟主力前进。两路红军在麂角附近的鸟儿垭会合。

此时，湘西军阀陈渠珍纠集三个旅共万人，从永顺、保靖间向北运动，企图阻止红军入湘西。

红军先经鄂西咸丰县百福司向抬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按照红军“指挥”进到抬头寨南面的贾家寨时，红军马上又甩开敌人，由抬头寨突然调头东进，于11月7日占领湘西重镇永顺县城，取得了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

永顺，群峰环抱，城楼残缺。城西南的猛洞河，在险峻的绝壁下匆匆流过，哗哗的流水声在山谷里引起轰轰回响。据说，这里原称“八蛮之地”，历代鞭长莫及。后来从江西来了一个姓彭的人，在此建立霸业，号称土王。土王传到十三代，无恶不作，不仅抢占田土、财产，还要对出嫁的姑娘强行“初夜权”。于是被激怒了的群众奋起反抗。他跑到清朝政府那里，献出版图，表示永远顺服朝廷。于是，清朝皇帝派来官军镇压民变，并诏赐这里一个浸透统治者意愿的地名——永顺。

如今，永顺不那么“顺”了。贺龙、任弼时挥手之间，工农造反者的红旗，飘扬在这座湘西中心县城的上空。

占领永顺之后，二、六军团在此进行了短期休整。政治部派出宣传队、工作组，深入大街小巷，向居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号召商户开门营业，保护城镇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宣传队、工作组还深入广大农村，配合各地驻军，向农民群众做宣传工作，发动穷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11月10日，成千上万的永顺市民和附近贫苦农民在县城召开大会，任弼时、关向应等向群众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同时，在宣传队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没收城里军阀地主恶霸的财产，分给贫苦人民。穷人高兴地说：“共产党和红军这样好，我们真是翻身解放了！”

大会经过参军动员号召后，群众纷纷报名，当场就征集了300多人，成立了三个新兵连。部队还积极筹集粮款、布匹，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做好了各种战斗准备。

11月上、中旬，陈渠珍在凤凰召开“剿匪”会议，成立“剿匪”指挥部，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分四路纵队，即以龚仁杰为第一纵队司令，周燮卿为第二纵队司令，杨其昌为第三纵队司令，皮德沛为第四纵队司令，共10个团约万余人，一齐向永顺扑来，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围歼红军于永顺地区。

初冬的深夜，已略带寒意，红军指挥部的房子里，灯火辉煌，烟雾缭绕，部队首长们正热烈地讨论着迎敌对策。

萧克，这位年轻的军团长，首先发言。他分析敌情说：

“现在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正被我中央红军吸引在湘南；湖北省军阀徐源泉部队，大部分散在鄂西施南和洞庭湖滨的津市、醴州。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这一股。”他停了下又接着说，“该敌虽然数量多于我，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子弟，但均为严酷战争铸冶的觉悟战士，加之两军领导指挥统一，团结一致，同

时还可得到群众支援，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消灭这股敌人。消灭了这股敌人，才能够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跟。”

听着这位年轻人的深刻透辟的分析，贺龙不断地点头称是，他站起来说：

“萧克同志的分析我完全同意，陈渠珍这股敌人，我们只有消灭它，才能在湘西站住脚跟，而且我们完全能够消灭它。”

“那就欢迎他们来吧！”任弼时摸着小胡子说。

“对，我们要诱敌深入，把它放进来打。”接着贺龙谈了自己的设想，王震、关向应又补充了一些意见，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拟定了。

这时，雄鸡已唱过头遍。

第二天上午，贺龙召集了城内各界代表会议。他说：

“鄙军来到贵地，多有打扰，冒犯之处，请多多批评。连日来承蒙各界支持，使我军各项工作开展顺利，鄙人深表谢意。今还有一事相求，不知大家能否帮忙？”

听此，人们纷纷说，贺将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国为民，有什么需要我们出力的尽管讲。

贺龙究竟有何事相求呢？

原来，城西南猛洞河上有座木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向敌示弱，麻痹骄纵敌人，决定将它买下烧掉。

说完用意，贺龙指着桌子上的一包东西说：“这是五百元大洋，请诸位费心在仗后再重修一座。”

听到贺龙买桥，人们都深感惊奇，纷纷议论说：红军打仗为了老百姓，别说是一座桥，再珍贵的东西我们也舍得，怎么能要钱呢？贺将军告知我们一声就算是瞧得起我们，钱无论如何不能要。

贺龙说：“如果大家不肯收钱，那么桥我也就不能烧了。”

为了战胜敌人，不烧怎么行？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让商



会收下，仗后由商会组织重修。

10月13日，贺龙派人将木桥烧毁，同时在城内街道上弄得灶具满地，一派狼藉混乱景象，以迷惑敌人。然后率领红军退出永顺城向北转移。

14日，敌军气势汹汹逼近永顺，看到木桥烧毁，渡过河来，又见城内一片混乱景象，以为红军畏惧害怕，仓皇逃跑，故骄横异常。龚仁杰、周燮卿声称“共军不堪一击”，“不日即可获得全胜”。加紧督师紧追，谁都想争得头功，急不可待地要与红军决战。

贺龙率部撤出永顺城后，命令一小部分兵力与敌交锋，且战且退，牵着敌牛鼻子走，故意骄纵敌人，使其疲惫，而主力部队则经赶龙、孟岗坪、吊井岩、沙岛湾、枫香坪继续撤退。

途中，各级政治机关干部深入连队做宣传鼓动工作，针对部分干部战士对连续撤退转移想不通的情况，讲清走路是为了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的道理，使战士们做到进退不疑走路不怨，艰苦能忍。干部发挥模范作用，照顾体弱战士和伤病员。使全军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士气高昂。

转移途中，贺龙几次准备设伏，都因条件不理想而放弃。开始在永顺城北设下伏击圈，但等了一天，追赶而来的只是敌军小股部队，其主力没有离开永顺县城，如果红军突然一击，容易打草惊蛇，使敌龟缩县城固守，于是又继续后退。

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又在吊井岩设伏。此地离永顺县城70里，有条石板大路直通城里，路旁山山相连森林密布，但敌人并未来追。第二天，部队又转移到颗砂、塔卧一带，敌人终于追来。由于这里地区狭窄，不便大量歼敌，贺龙决定暂时不打，继续后撤。

敌军连日追击，一直未遇红军抵抗，便愈加骄横无恐，放心大胆地追来，一直追到永顺城北90华里处的龙家寨。

龙家寨是十万坪谷地的中心。谷地南北长约15里，东西最宽

处不过数里，谷底平坦，两侧山势低缓，油茶树茂密，杂草丛生，地势复杂。据说十万坪因当年土司王在这里点兵 10 万而得名。

贺龙、任弼时率部到达十万坪时，发现这里就是歼敌的一个绝好战场。于是便查看地形，构筑掩体，将部队埋伏在龙家寨东侧太保山上。

11 月 16 日，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进入十万坪谷地，一个黑点，又一个黑点，在大路上出现了，争先恐后地向口袋深处拥了进来。当天下午，当敌军进至碑里坪一带，正准备号房、派粮、生火做饭时，贺龙一声令下，两军团指战员一个个如猛虎下山，立即从丛林中冲杀出来，向敌人猛压过去。

红六军团从侧翼向周燮卿部发起猛攻，红二军团从正面山坡上向龚仁杰旅压下。十分疲惫的敌军，做梦也没有想到“仓皇败退”的红军会在此设伏，立即乱作一团。有几小股敌人企图顽抗，因抵不住红军的猛烈攻势，很快垮了下去。很多人喘息未定，便当了俘虏。敌人大炮还没有架好，便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断后的敌杨其昌旅，收容周、龚残部，退守总河村，企图阻止红军发展，负隅顽抗。但是他们经不住红二、六军团前后夹击，也很快土崩瓦解。

溃散的敌人，一部分躲进附近的深山密林，一部分拼命向永顺逃窜。贺龙把一位师长叫来，命令其率部抄小路去追。

敌人从大路逃窜，经过马家朝、瓢砂、吊井岩，路程 100 来华里。红军从小路前进，经过杉木河、岩板铺、北门村等地，只有 60 华里。敌人刚刚进城，红军早已抢战山头，等候了好久。枪声一响，敌人想往南逃走，但木桥已被烧掉，面对汹涌的猛洞河，敌人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周燮卿、皮德培、杨其昌等几个狡猾的家伙率少数残兵败将沿河溜走。

11 月 17 日上午，红军第二次占领了永顺城。龙家寨伏击战取得辉煌战果，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 3 个旅，俘敌 2 000 余人，缴获

大批军用物资。

龙家寨大捷，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是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密切配合，正确地运用战略战术方针和战术原则的结果。萧克曾说：“万坪大捷奠大业。”<sup>①</sup>它不仅使部队在装备上得到较大的改善，更主要的是为尔后东出，继续发展攻势，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这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红二、六军团重占永顺县城后，接着二军团一部乘胜占领桑植县城。23日，红军主力从永顺、桑植分两路向大庸进军。24日，红军主力与预先秘密入城的侦察人员里应外合，歼灭守敌朱际恺团一个营，朱际恺仓皇逃命，营长被活捉。红军解放了大庸县城永定镇。至此，红二、六军团已占领了永顺、桑植、大庸三个县城及广大地区，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二、六军团取得龙家寨大捷之时，中央红军正分两路向道县、江华西进，准备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前进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西路军和北路军薛岳、周浑元部共16个师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同时电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贵州军阀王家烈，各派部队分别到湘桂、湘粤、湘黔边堵截。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规定湘、桂、黔各军在红军渡湘江以前赶筑工事相机堵截，聚歼中央红军。

红二、六军团领导对党中央的处境十分关注，对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充分予以策应。龙家寨大捷之后，旋即乘胜挥师南下，

<sup>①</sup> 萧克：《游金鞭岩·黄狮寨》，载1984年1月1日湘西自治州《团结报》。

准备给陈渠珍部更大打击，争取在永绥、乾城、松桃和凤凰建立新的根据地，并留下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团二营，在永顺、龙山、保靖地区活动。

当红二、六军团主力进到酉水北岸主村时，因敌军已有防备，未能渡过酉水，正当这时，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

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军。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敌情的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源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的苏区，应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两军团为取得协同动作，暂归贺、任统一指挥。<sup>①</sup>

接到中央的电报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决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带领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的第十六团及地方工作干部，留在新区内恢复和建设根据地；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第五十一团立即北上，从大庸南下，准备先取沅陵，然后挺进湘中，威胁在湘南一带堵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侧背，策应中央红军突围。

12月7日，红军进袭沅陵县城，守敌原黔军廖怀忠第八师等部4个团已经有备，红军攻城3日不克，就沿沅江东下，乘虚向桃源、常德地区挺进。

① 《中革军委给二、六军团的电报》，1934年11月。

此时，蒋介石为加强常、桃的防守，急令驻鄂北的湘军罗启疆独立二十四旅，由黄陂乘轮船赶到常、桃一带。罗启疆以其第七〇一团放在桃源北面的浯溪河；第七〇二团放在桃源与常德间的陬市、河澧地区；第七〇〇团在桃源居中策应；旅部直属部队协同当地保安团担任常德城防，企图在常德外围与红军决战，以“消耗和疲劳红军的进攻，保持常德和桃源两城不失，使红军不得威胁和进攻长沙。”

12月15日，常德、桃源一带下了场大雨，道路泥泞不堪，贺龙决定利用恶劣天气，出敌不意，奇兵奔袭，歼敌于浯溪河。

浯溪河位于桃源以北，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集镇，是通往三阳港、溪河、陬市和常德的要道必经此处。

16日黎明，浯溪河一带山雾似蒸，苍茫一片，敌人还在梦中，红军先头部队似天兵而降，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最先到达的红军十二团，似一把尖刀直插敌军正面阵地前，控制了白洋河有利地形，形成了对浯溪河的包围态势。

敌军发现红军控制了制高点，利用红军主力部队尚未到达的机会，向红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白洋河一带高地炮声轰鸣，硝烟翻腾，英勇的十二团指战员，以压倒敌人的气概顽强反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有的战士身负重伤，坚持不下火线，背靠树木、土坎上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倒下了，干部便迅猛上前，接过烈士手中的枪，向敌人猛烈射击。

拥有绝对优势的敌人，继续用猛烈炮火轰击着山头，不断冲锋，连续攻打山头。山野上烈焰腾腾，像一只燃烧的火炉，连树木也着火了。红军的军旗打出许多窟窿，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进攻，但终因伤亡过大，渐渐支持不住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只见一队人马从阵地一侧飞奔而来。贺龙勒住全力奔驰的枣红马，满头大汗地立在马蹬上，一手提着驳壳枪，帽沿掀得老高，脖子上挂着望远镜，衣服扣子敞开

着，眼睛闪着灼人的光芒，大呼一声：“同志们，我带的4个团来了，我们要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贺老总来了！”阵地上一片欢腾。

“同志们，冲呀！”

阵地上的指战员和增援上来的主力立即转入反攻，呐喊着向山下敌人猛扑过去。

贺龙在一处山崖前面，跳上一块巨石，嘴里衔着点燃的烟斗，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敌人的阵地。接着，他向一位团长下达命令，要他立刻率领部队，从左侧绕到敌人后面去。

不一会儿，在敌人后侧响起激烈的枪声，敌人顶不住前后的夹击，犹如江河解冻，慌乱地溃退下去。这时，从桃源赶来增援的两营敌人，也和溃兵混在一起，漫山遍野地向南奔逃。

贺龙一步从石头上蹦下来，向警卫员喊道：

“拉马来！”

贺龙两手攀着马鞍，一脚踩着马蹬，对站在身边的通讯员说：“立即命令各团猛打猛追。”

说完，他翻身上马，枣红马甩开鬃毛，扬起尾巴，四蹄腾空，像流星击风，飞也似地驰骋在大路上。

追击的路上，到处都是敌人丢弃的弹药、武器，狡猾的敌人，看红军追来，把成百成千的银洋撒在路上，看到这种情况，贺龙在急驰的马蹄声中，边跑边对行进中的战士们喊道：

“同志们，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不要拣白洋，后勤部派有专人去拣，我们的任务是追击敌人！”

红军沿着大路，一气追了70多里，敌人设于常德、桃源间的两道防线也都被红军击破。

敌旅长罗启疆由常德乘汽车赶来督战，一见狼狈逃奔的败兵，吓得扔了汽车，扯掉中将军衔，混在他的“家乡子弟”兵中，窜回常德城中。17日，红军占领桃源县城，18日，围攻常德。

浯溪河一战，歼敌一个整团又两个营，击溃敌人一个团，取得了湘西攻势以来的第二大胜利。

红二、六军团发起浯溪河战斗之时，正值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占领了黎平老锦屏地区，向剑河方向前进，准备渡过清水江，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占领的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建议，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执行这个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前进，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向剑河、施秉前进；红三军团为左纵队，向台拱、黄平前进。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部进占桃源，围攻常德，吸引和调动大量敌人到湘西来。

常德是一个有10万人口的城市，它东扼800里洞庭，控制沅水，为湘西政治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城内守军只有一个保安团和罗启疆旅的残部，何键深恐红军攻下常德后，南渡沅水，进取益阳和安化，威逼长沙，因此，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说什么“贺、萧股匪乘我正在追剿朱毛，大股窜扰湘西，既陷数县”；“虽多方筹虑，而力不从心，迨陷桃源，围常德……情势紧张，全湘震撼。”还说“共军围攻常城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sup>①</sup>他又向湖北省主席、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乞援，要求“迅令在澧之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sup>②</sup>；同时急令远在湖南截击中央红军的李觉十九师、章亮基十六师、陶广六十二师兼程北调，回援常、桃；“令陈珍师，迅出大庸”<sup>③</sup>，断红军归路；令罗启疆、刘运乾固守待援。

蒋介石接到何键电报后，同意远在湘南截击中央红军的李觉第十九师、章亮基第十六师、陶广第六十二师兼程北调，还命令

①②③ 引自何键呈蒋介石巧已电，1934年12月18日。

川里郭汝栋率二十六师从赣西驰援常德；任命陈诚为“鄂湘川黔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该四省国民党军队向红二、六军团发起围攻。

湖北军阀徐源泉惧怕红军进入湖北境内，自作主张地改变了蒋介石要他率部入川“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将其第四十八、三十、五十八及新三旅、暂四旅等部，分别部署于湘鄂边、鄂西地区及湘西津、澧一带，防止红二、六军团北进鄂境。

红军围攻常德，历两昼夜，由于何键增调的援兵接踵而至，12月20日，便主动撤离，先后退到桃源、陬市、溪河、漆家河一带休整。

在撤离常德的前一天，即19日，中革军委曾电令红二、六军团指出，中央红军正向贵州挺进，二、六军团应在常德地区积极行动，以便调动湘军；当湘军调动部队北援时，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岳部及在印江、思南之黔军。

根据中革军委这一决定，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常、桃地区积极活动了七天，如组织许多宣传小组深入城镇乡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反蒋的道理和党的主张，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打开盐仓，将其廉价卖给穷人；打开当铺，要当主领回所当衣物；吸收数千工农分子加入红军，并筹得大批物资等。

24日，红军主动退出常、桃地区，向慈利、黄市、二坊坪、龙潭河等地开进。26日，分别在黄市、溪口歼敌一部，并乘胜占领了慈利县城。30日，西返大庸、永顺休整。至此，历时两个月的湘西攻势基本结束。

这期间，红二、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地区，先后占领了永顺、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歼灭了湘敌陈渠珍新编三十四师的大部和罗启疆三十四旅的大部，钳制了国民党正规军11个师又两个旅，开创了红军会师后的新局



面，部分地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胜利地完成了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突围远征的艰巨任务。

## 二 分田分地真忙

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开展，红军除巩固占领大庸、永顺、桑植三县外，并先后占领了龙山、保靖、慈利等县的一部分地区，扩大了新的割据区域，以永、大、龙、桑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基本形成，在任弼时等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湘、鄂、川、黔边界，地处武陵山区，几省军阀似管非管，敌人之间又有矛盾，其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且地势险要，森林茂密，便于作战防守，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其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盛，粮食充足，柴草不缺。另外，这一带曾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广大群众觉悟高，拥护红军，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具有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如果进一步发展，可以直接威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武汉、长沙，影响江南一片，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湘西大庸县的后坪宣告成立，并发出第一号通知：

一、根据党中央电示，在湘鄂川黔边成立新的临时省委，为这个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及张子意、刘士杰等同志及少共省委一人为省委委员。二、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在湘鄂川黔边区成立军区，以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军区政治委员。

同时，还成立了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

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机关，先设在大庸县城永定镇，于12月10日迁至永顺塔卧。

12月16日，湘鄂川黔省委作出《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

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域的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在任弼时等领导下，组织了工作队，迅速分布于以塔卧为中心的桑植、龙山、永顺、保靖、大庸和慈利等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活动。到2月底，先后建立了郭亮、永保、桑植、磊庸4个县的县、区、乡党的委员会和政权组织，成立了中共龙山县临时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组成了包括大庸、慈利的溪口地区在内的第一军分区和包括桑植、龙山、永顺在内的第二军分区。与此同时，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时，黔东特区和鄂川边区的革命斗争仍在坚持。湘鄂川黔根据地已粗具规模。

各级革命政权建立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斗争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这一带贫富悬殊很大，土地十分集中，大庸县的“八大家”、永顺的“六大家”、桑植的“八大诸侯”都是当地著名的大地主、大恶霸。仅塔卧黎家一户，就有田数千亩。而广大劳动农民土地则很少，主要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活。地租一般是“倒三七”或“倒二八”。高利贷名目繁多，盘剥更为苛刻，什么“滚滚息”、“筋斗息”，利高惊人。桑植洪家关的大地主谷得杰放高利贷，春借一担谷，秋还二担粮。有的比这还要多，把不少债户搞得倾家荡产。

官僚军阀也依权仗势，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湘西军阀陈渠

珍，为了豢养其大批走狗爪牙和庞大反动军队，除了滥发地方钞票外，还到处设关立卡，横征暴敛，什么月款、季款、寒衣款、被子款、临时借款；什么谷米税、包谷税、糖税、烟税、酒税、屠宰税、人头税，无奇不有。这些苛捐杂税，就像无数绳索，把贫苦农民紧紧捆住，使他们透不过气来，广大农民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儿子是中央军的，婆娘是保长的，谷子是财主的，一条命是区长的，苦难是自己的。”因此，砸碎封建枷锁，实行土地革命，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1934年12月1日，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条例规定了没收土地的对象：一、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等，一律没收；二、祠堂、庙宇、公堂、会社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一律没收；三、富家的土地应该没收（但富家兼商人者，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及财产不没收）。

土地分配办法，条例规定：“凡是雇农、贫农及农村工人、苦力，须一律平均分配土地。中农土地是否拿出来与雇农、贫农一律平分，以中农群众自己的意见来决定。”

条例还具体规定，以乡为单位（如果大多数群众要求以村为单位亦可），按照人口多少，土地肥瘦，实行平均分配。

对除田地以外的鱼塘、山林、耕畜、农具等的处置办法，也作了明确规定。

12月16日，省委又制定了《分田工作大纲》，就分田的意义、分配办法和分田工作的领导方式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和说明。

《条例》和《大纲》颁布后，土地革命很快在根据地内展开。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根据地建立初期，首先在大庸县城郊附近及永顺县塔卧、刘家寨、龙家寨、颗砂等地进行。为取得经验，省委对这种先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土地改革工作十分重视。

12月初，省委在大庸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召开了一次以部署土地革命运动为中心内容的扩大会议，就基本苏区的土地革命作了专门布置，同时，还举办了土改训练班，由省革委会副主席夏曦主持。

工作开展后，任弼时经常下到各区、乡，检查指导工作，王恩茂等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仅一个月时间即完成这一工作，一部分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更重要的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之后，土地革命运动在根据地内全面展开，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即取得较大成果。

各县的大体作法是：

首先，根据省委革委会对土地革命的要求，制定本县的具体办法。如大庸县制定的本县分田原则是：好田分给贫雇农，中农的田不动，富家只动出租部分，土豪田地全部没收。但少数区乡也给地主留了一定的田。

其次，建立区乡贫农团，组织以贫农为骨干的土地委员会，具体领导和组织群众分配土地。

第三，举办土改训练班。如大庸县对区、乡土地委员进行了为时10天的训练，使其了解政策，掌握方法，培养了土改中的积极分子。

第四，广泛宣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组织工作队深入乡村，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讲解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采用各种方法启发农民，使他们懂得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提高其觉悟，激发斗志。如永保、塔卧、龙家寨、刘家寨、首车、石堤溪、高峰、颗砂、万民岗等区，是土家族较为集中的聚居地，县委、县革委以乡为单位召集贫雇农会议，讲解政策，宣传土地革命的道理，动员少数民族自己起来革命。

第五，打土豪分财产，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组织群众涌进地主土豪家开仓挑谷，分配财物。土家族人民高兴地

说：“过去我们贫家人（穷人）被夏玛卡（地主）逼得翻山钻洞，可现在我们也把他们赶进了岩洞。”

第六，统计田亩，组织群众评定成分，丈量土地，烧田契，分田插牌到户。把各户的土地统计清楚，应分的土地一块一块地编号，好坏兼搭。然后在群众大会上把各家应得田亩数、地亩数配搭清楚，再经参加会议的人多次协商审定。当分配方案经群众会议定下来以后，就用木牌或竹签写上每个户主的名字，名字下面写清楚分得多少田，位置在什么地方，由农民自卫队带着写好的牌子，一一插到田里去。插好牌子的田就是新主人的了。

许多世世代代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如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其激动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龙家寨区亚东乡土家族农民彭松清，田无一丘，地无一角，母子俩相依为命，这次他分得了土豪的一丘三亩三分冬泡田，欣喜若狂地跳到田里，踩得泥水咕隆咕隆响，大声宣告：“这是我家的田啦！”

土地改革的进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35年秋，大部分家户获得了好收成，龙山县兴隆区兴坪朱少清、张青云一家，原来田无一角，地无一寸，夫妻俩常年给地主蒋家做长工，受尽打骂和折磨，两个孩子也因病死去。土改中他俩分到了30挑谷子的田，经过精耕细作，秋后得干谷20挑，为感谢共产党，他俩送了6挑谷支援红军。

在制定和颁布农村土地分配政策的同时，对城市中小工商业，则实行改造和保护的政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布告》（第一号）明文规定：“地主兼营商业者，商业部分不没收”，“商人可以营业自由，红军绝不干涉或没收，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法律，故意卡买卡卖或关闭停业，危及工农群众与红军的供给，即分别加以惩处。”

“岳忠兴布号”有资金1.3万块光洋，店员10人，每天营业

额达数百块，是一个中型商家，同时在乡下还有几十亩稻田出租。这家老板由于不了解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曾将库存的73匹布弄到乡下老家藏了起来，上面盖上谷子。土地革命中，这些谷子和布匹都被土地委员会没收。事后，这家老板将此事反映到政府有关部门，经调查核实，有关部门将布匹还给了他。这件事使许多店铺老板疑虑顿消，放心经营。有的主动与红军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苏区军民的生产和生活。

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一大批地方干部迅速成长起来，省委加强了对他们的使用和培养。任弼时教育上家族青年田永祥的故事至今仍在永顺塔卧、龙家寨一带流传。

1935年旧历腊月，省委在永顺塔卧召开五县苏维埃负责人联席会议，任弼时、王震等出门迎接与会代表。这时，只见一位青年，身穿皮大衣，头顶绒帽，手戴金戒指，脚踏大皮靴，大摇大摆地走来。有人向任弼时介绍说：“这就是永（顺）保（靖）县苏维埃主席田永祥同志。”

“好啊！”任弼时热情地走过去和田永祥握手，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哈哈大笑地对大家说：

“看！还真有个县长样子呢！国民党的县长，恐怕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

王震和大家都笑了起来。

田永祥听出了话中的意思，脸刷的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任弼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让他休息一下准备开会。

会议结束后，任弼时走到田永祥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小田，咱们谈一谈好吗？”

田永祥随任弼时来到他的住室。这是农家院子里的一间普通的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床旧棉絮，一只破旧的铁箱子，一双旧套鞋，一张旧方桌，桌子上摆着一些书。看到省委书记这样简朴的生活，田永祥的脸更红了。

任弼时招呼田永祥坐下，又给他递来一杯热茶，然后亲热地问道：

“小田，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铁匠。”

“小田呀，现在好啦，你当了人民的县长。不过，你可不要忘记自己是铁匠出身就好。你要知道，革命才开始啊！”

田永祥惭愧地低下了头。

“你读过书吗？”

“在私塾里读过‘人之初，性本善’。”

“那还是读过一点啰！这很好。搞革命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政治、军事、经济都要懂点，特别是要学好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你看贺老总、王震同志他们，文化水平本来不太高，但都在发奋学习。”

任弼时说完，送了几本书给田永祥，其中有《土地改革法》、《战略战术》和一些文件。

“任书记，您放心，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

任弼时高兴地点了点头。

不久，田永祥再次来省里开会，穿的是粗布褂，扎的是布头巾，完全恢复了铁匠的模祥。任弼时在大会上高兴地说：

“这才是人民县长的样子。”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省委提出了扩大红军的战斗任务，各部队、各级政府机关都组织扩军工作队（组）或宣传队深入下去，写标语，演节目，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保卫分田的胜利果实。有的还采取在土改中给红军家属分好田，积极做好各项优抚工作的办法，调动大家参加红军的积极性。从而使扩军运动迅速掀起高潮，不少地方出现母送子、妻送郎、父子一起参军、兄弟争相报名的动人景象，从县城到乡村都响起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的歌声。大庸县的瓢家坪乡，

先后就有 900 多人报名参军。郭亮县岩板铺村金永山，带领 3 个儿子一起参了军。从 1934 年 11 月到次年 1 月中间，共扩大红军 4 000 多名，进一步充实了红军主力部队，一部分地方武装发展成为骨干队伍，建立了十一、十七、五十 3 个新兵团。

在扩大红军队伍的同时，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先后在永保、大庸、桑植、郭亮 4 县成立了独立团和游击队，人数少的 300 多人，多的 700 余人，各区还有不少游击队。

红军的扩充，地方武装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为粉碎敌人“围剿”，开展清匪反霸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对开展土地革命，保卫胜利果实，巩固发展和建设根据地起到了重大作用。往日荒僻落后，死气沉沉的武陵山区，如今到处是欢歌笑语，一片生机，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当然，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仍不可避免地存有某些“左”的做法，但一些具体政策较过去有了明显进步，应该说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 三 丁家溶会议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的胜利，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扩大和各项建设的蓬勃发展，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和湘鄂军阀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了 80 多个团约 11 万兵力，向湘鄂川黔新苏区压来。

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多次召开省委会议和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分析了敌军进攻形势，积极投入了反对敌人“围剿”的准备工作。开展以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全军大整训，便是其中之一，而丁家溶会议又在这当中占有重要位置。

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作战到黔东会师，在极端险恶的斗争



中保留了骨干，奠定了此后大发展的基础。但是部队的严重损失使党的组织很不健全。特别是红二军团，虽然在会师以前已经开始恢复被强行解散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但由于夏曦还居于主要领导岗位上，党的建设仍是部队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此，1934年11月1日，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说：

红二军团到最近才开始恢复部队中的党团员，但不到十分之一。在连队中还没有党支部，有的两个连队才成立一个支部。多数支部只有几个党团员，也没有划分小组，而且组织也不健全，只有一个支部书记。师、团政委都是新提拔的，工作能力很弱。指导员缺少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部队中肃反的恐惧仍然存在。

两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从大局出发，对两军的干部作了适当调整，并将红六军团政治部编为红二军团政治部，红六军团另组政治部。同时，从红六军团抽调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红二军团工作。在贺龙的坚决斗争下，将一批被夏曦控制的保卫局借肃反为名逮捕、关押过的干部予以解放平反，分配他们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但是，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夏曦对红二军团政治工作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其流毒和恶劣影响决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部队中忽视和否认政治工作的倾向仍十分严重。

对夏曦的错误行径，贺龙和红二军团广大指战员进行过坚决的斗争，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也曾不同的会议上批评过夏曦的错误。

南腰界会师庆祝大会后的第二天，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负责人就开会批评夏曦的错误，并以萧克、任弼时、王震名义

致电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中央撤销夏曦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及中革军委会湘鄂西分会主席的职务，并提议贺龙为军分会主席，萧克、任弼时为副主席。

在红二、六军团攻占永顺后，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但是，由于红军主力部队发动湘西攻势，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停留几天后即挥师西进，部队流动性大，战斗频繁，省委和总指挥部忙于指挥战争和新开辟的苏区建设工作，以至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系统的清算。

红二、六军团从常德、桃源回师后，部队有了发展，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但是，由于夏曦的错误影响很深，许多受逮捕关押的干部有的刚刚释放，还未正式恢复名誉；一些被诬杀的党、政、军干部含冤九泉，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相当多的干部战士心有余悸，惶惶不安；而广大干部战士对夏曦所犯的严重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正如贺龙后来所说：“战士们看到夏曦是鼓起眼睛的呀。”<sup>①</sup>因此，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已成为深入战争动员的当务之急，以任弼时为书记的湘鄂川黔省委，因势利导地召开了丁家溶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1935年1月27日，虽值寒冬，但大庸县丁家溶的关庙里却热气腾腾，省委召开的第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正在这里热烈地进行，人们聚精会神地听取着任弼时的报告。

任弼时身披一件旧棉袄，语言激愤，系统地揭发了夏曦的错误：

“他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竟走到公开地解散党和团的组织，取消党所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号召群众‘重新组织……真正的苏维埃政

<sup>①</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权’，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工作，公开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道路。”

他“夸大反革命力量，形成错误的肃反路线”，以至“在反革命活动面前惊慌失措，认为部队中连长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组派，逮捕的在2000人以上”，在被肃反的干部中，“有一部分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完全是反革命分子的诬报，或被严刑所逼乱供的，当时没有详细审查而逮捕枪决，或开除军籍。那时曾在苏联学习回来、经中央派到湘鄂西的40多个学生，有不少的产业工人，也都被认为是改组派，拘捕枪决了。”

对于湘鄂西苏区的党、政干部，“夏同志同样认为，湘鄂西地方党、苏维埃区县省级的干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组派，只是由于退出苏维埃（区域）太张惶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他们都拘捕或枪决，只好以命令来宣布解散这些组织。总之，照夏同志的估计，当时反革命改组派是完全统治了湘鄂西的党、政府和红军”。

从对敌我形势的错误估量出发，夏曦“采取了扩大化的简单化的错误的肃反路线，这正是帮助反革命达到破坏党、政府和红军的阴谋，上了反革命的当”。

由于夏曦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肃反路线，“把工作中同志们所有的错误缺点都看成是反革命捣鬼，因而取消了思想斗争，造成党和部队中严重的肃反恐惧现象，把战士和党团员的自发性、创造性、积极性完全抑制下去，同志们有意见不敢说，甚至互相猜疑”。

夏曦“只相信自己一个人是唯一坚决革命的，其他的似乎都不可靠了”。

这条错误的肃反路线导致的严重后果是：

“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在敌人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生活。”“没有后方依托，只好东奔西走；打了仗，伤兵只好沿

途寄居群众家里，人员减少，得不到适时补充，弄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部队疲劳的时候，也得不到一个安全地方休息，整理训练，这样就使红军受到不应有的削弱。”

任弼时说：“我不去算一件一件的老帐，因为这是算不尽的，而且是无益的。我们要从这些错误中引出经验教训，找出根源，以利于在今后的工作中不致再犯。”<sup>①</sup>

任弼时指出，现在仍有一部分人，“对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形成一种不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反抗政治工作路线的危险倾向。这种错误与过去取消政治机关是有联系连带关系的。”

任弼时说：“在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全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他要求：“在扩大红军时要注意多吸收工人、雇农，提拔干部时要特别注意工人、雇农，发展党的组织要作到部队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sup>②</sup>

贺龙、关向应、卢冬生都在会议上发了言，他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夏曦在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相貌斯文的夏曦坐在主席台的一边，神色非常紧张，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断地冒出虚汗。他在会上检讨说：“在湘鄂西执行错误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一切错误、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但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中的错误。”

① 任弼时：《在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35年1月27日。

② 任弼时：《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1935年1月27日。

夏曦虽然对某些问题仍然想不通，但态度是比较诚恳的。

会议决定撤销夏曦全部领导职务。

会后，任弼时致电党中央，汇报了会议情况。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3月31日给任弼时并转省委的来电指出：

（甲）关于夏曦同志的错误，中央在你们同二军团会合后，曾明确指出，但并未说这种错误已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乙）最近期内夏曦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新犯的错误，应该指出与批评，在领导机关内开展斗争是应该的，但你们所采取的组织结论是不恰当的；（丙）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而并不是在处罚这一同志。在苏区内经常发生的“左”的极端与惩办主义必须防止，尤其在开始纠正错误的肃反路线之后，只有这样，才能发扬同志们的积极性到最高度；（丁）湘鄂西苏区目前是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领导机关内的团结与一致，比什么都重要；（戊）夏曦同志必须继续在领导机关内工作，以同志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说服与纠正他的错误。……

省委坚决贯彻了中央的这一指示，安排夏曦担任省委委员、省革委副主席和军分会委员。后调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底，他到贵州野马川七里关地区做席大明部的工作，不幸在过河时溺水身亡。

丁家溶会议对夏曦错误的系统批判，澄清了是非，消除了干部战士的思想顾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之后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建设，解放了受迫害的干部战士。

一天，部队正在进行射击训练，红二军团两个机枪手据守在

山坡上，老是打不准。这时，炊事员送饭来了。有个名叫余家海的把饭挑子一放说：“你们把机枪给我！”

他接过机枪，嗒嗒嗒——百发百中。

正在一旁的任弼时眨眨眼，问贺龙：“他怎么打得这样准？”

“他是在苏联学过打机枪、开坦克的。”

“怎么当了炊事员？”

“没杀就算不错了。”

原来，余家海是上海的工人，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分配在红三军工作，后被夏曦撤职而去做饭。

任弼时走上前去，亲切地拍了拍余家海的肩膀，指着前面的靶子说：“再打一下。”

“嗒嗒嗒——”，余家海一梭子弹射出，“敌人”又倒了几个。

任弼时连声称赞：“打得不错！”

任弼时与贺龙商量了一下，当场宣布：

“余家海同志担任训练科长。”

余家海双手紧抓围裙，泪水从眼里夺眶而出。

接着，任弼时问贺龙：“像这样的同志这里还有多少？”

贺龙道：“多啰！”

接着贺龙向任弼时介绍了这里还有个“特别连”，战士们称这个连为“改组派连”，因为里面全都是被抓起来的“改组派”分子。还有什么“主席连”，进这个连的人，都是当过县苏维埃主席和其他地方干部的人。还有“调皮鬼连”，进该连的都是些爱讲怪话，不满当时错误路线的人。

任弼时便和贺龙一起去看望大家。这里的同志有老有少，大家衣服破烂不堪，有的人手臂上还留有绳索捆绑的血痕。他们都是夏曦派人抓到这里来的，平时抬担架，罚苦工；战斗打响后就领了枪前去冲杀。

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情景啊！在红军内部，居然还有这么多

的好同志遭受非人的待遇！捆绑反动头目的绳索上，居然还带有这些同志殷红的鲜血！这些同志虽然天天面临着被无辜残杀的威胁，但他们在痛恨错误路线的同时，没有一个人逃跑，还都在忍辱负重地忘我工作，没有离开红军！这里面又蕴藏着何等伟大的精神啊！

任弼时、贺龙向大家问好，坐下来了解各种情况。

任弼时摸着一个干部身上的伤痕，激动地说：“革命同志没有被国民党杀掉，反而在自己的队伍里挨整、挨打，这种事情以后绝不能重演。”然后，又深情地告诫大家说：“同志们受了冤枉，受了苦，这只能怪我们工作没做好，只怪错误路线。大家不要记私仇，要把仇记在错误路线上。”

在任弼时的指示下，受迫害的干部马上被解放出来了。许多人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有个姓黄的同志，原来当过团长，被无故降职当了司务长，这次被任命为省苏维埃副主席；一个姓秦的同志，曾以莫须有的罪名降职当了马夫，这次被任命为副师长；还有个姓汤的同志曾被撤职当战士，这次被任命为团政委……

任弼时在解放被迫害干部的同时，对真正的坏分子却从不手软。有一天，一个女同志从桑植赶来，送来了张启龙给任弼时的一封信。信上说，刘士杰借口要带一个侦察连去侦察长江，想把这个连带出去投敌。结果那位连长掏出手枪来把他逮捕押送回来了，请示任弼时如何处理。

“崩”，从来很少动肝火的任弼时，脸气得铁青，拳头往桌子上狠狠一击，把茶杯震落在地。

但他很快平静下来，然后将信转交给身边的几位同志传阅，然后问道：

“你们说该怎么办？”

“干掉！”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对我们的情况知道得太多了。”

任弼时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立即发出了“枪毙”的命令。刘士杰，这个真正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 四 敌军围困万千重

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中屡遭惨败，更怕红二、六军团西进黔东与中央红军会合，因而急欲包围二、六军团于湘鄂川黔边区加以消灭。1935年初，六路“围剿”的形势初步形成：

北部地区：

陈耀汉纵队由新安、石门、桑植一带进攻；

郭汝栋纵队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一带进入；

李觉纵队由益阳出发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

南部地区：

陶广纵队分别经军大坪、四都坪向永顺、大庸一带进攻；

徐源泉纵队、张振汉纵队两部，由来凤、龙山一带向永顺、塔卧地区运动。

以上各部共 81 个团的兵力作为第一线“围剿”之主力，其中湖南军阀何键的李觉纵队、陶广纵队最为卖力。

敌入的作战方针是实行堡垒主义，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防结合的手段，先对根据地四面包围，然后节节筑路，发展交通，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碉堡、工事构成环形封锁线，然后紧缩包围圈，将红军压缩于狭小孤立地区聚而歼之。

为防止红二、六军团突出包围圈，敌还利用 8 个师的兵力，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实施堵截，防红军南下湘中，北渡长江，西进入黔。以上三个方面的兵力，构成对红军的外层封锁线。

此时湘鄂川黔苏区主力红军约 1.2 万余人，地方武装 3 000 余人，弹药比较缺乏，面对超过自己十倍以上敌人兵力的进攻，形势极为严峻。



总指挥部在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后，于1935年1月11日召开了两军团领导人的会议制定反“围剿”作战计划。

贺龙根据以往经验，“主张伸出去”。他说：“澧水、沅水挡不住我们。走南面可以出，东面也可以出，北面也可以出。张家湾、竹子口、黄石能打就打，不能打过澧水石门也可以。我们如一只拳头伸出去，可以威胁常德、桃源。在这期间打上一两个好仗，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sup>①</sup>

但他的意见没有得到与会多数人的同意，“当时争论不休”，“有的人不主张出去”，“根据地舍不得丢”<sup>②</sup>。最后确定的作战方案是：

“将红二、六军团主力集结在大庸地区，等待敌人前进，然后从正面远出迎击对大庸、永顺两城威胁最大的敌人。”

会后，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联名致电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

我们认为要在击溃敌两路和消灭敌人主力六团至八团有生力量条件下，才能击破敌人现有力量之围困。利用现在广阔新区，寻找在运动中突击封锁。应首先侧击由沅陵前进之湘敌主力陶（广）、章（亮基）部队，求得迅速转移地区，各个击破敌人。现集中二、六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待机。……我们若能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区迅速顺利地击灭敌人陶（广）、章（亮基）部队，则转移地区，争取侧击西进敌人，是最有利的局势。否则（大）庸、桑（植）、永（顺）城市均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主力将被迫转移至永

<sup>①</sup> <sup>②</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顺)、桑(植)、龙(山)较小地区进行战斗。<sup>①</sup>

面对强敌的进攻，将主力部队集结在大庸、永顺间，等待敌人进来，然后从正面迎击深入到根据地腹地来的敌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贺龙后来回忆说：“为什么当出去不出去？有（‘左’倾）尾巴，军事路线问题未解决。”<sup>②</sup>遵义会议后，2月1日，红色电波传来了《中央及军委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给二、六军团的指示》：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情形是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急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

① 《二、六军团关于反对敌人“围剿”的作战部署向朱德同志的请示电报》，1935年1月15日。

②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接到电报后,敏锐地感觉到电报中的“提法和过去提法大不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话向中央”。<sup>①</sup>

2月28日,中共中央回电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和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得知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红二、六军团领导人都十分激动。贺龙表示:

“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感他是我们正确领导者。”<sup>②</sup>

省委及二、六军团领导根据中央及军委2月1日指示,组成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并讨论确定反“围剿”的军事行动问题。但由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组织上和军事指导上的重大变化,尚未详细传达到湘鄂川黔根据地,清除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当时省委和军分会对中央及军委指示精神并未真正理解,贺龙提出的关于将主力前出到敌军侧翼和后方,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的建议也没有被省委和军分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因而,在反“围剿”初期执行的仍是1月11日制定的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反“围剿”战争是2月8日从溪口棉花山战斗开始的。面对诸路敌人的进攻,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决定先打东面的郭汝栋纵队,指挥主力出大庸迎敌,于溪口与郭部激战。但由于未能充

①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② 王震:《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纪念贺龙同志》,《解放军报》,1977年7月28日。

分发挥红军善打运动战的优势，未能先敌占领有利地形，而是仓促应战，故未收到歼敌制胜的效果。

棉花山战斗后，敌军仍未敢大进，这时红军没有能积极主动迂回，择敌一部以各个击破，而是自东线西返，集结于永顺和大庸间的根据地中心区域，等待迎战南面陶广纵队的来攻，并为此派出部分兵力，往南向军大坪附近，与敌六十二师对峙了较长时间，失去了歼敌的机会。

3月初，敌军开始了新的行动。至13日，陶广纵队、章亮基的第十六师一部和保安团，由永顺王村向永顺县城方向进犯。14日，红军主力迎战敌于高粱坪，先后各歼其一部。李觉部趁红军主力集中于南面的高粱坪，而东线防备空虚之际，于3月15日占领了大庸县城，并继续向石堤溪推进；郭汝栋纵队经大庸县城西进，欲从温塘等地渡过澧水，进击根据地首府塔卧；陈耀汉纵队则开始进犯桑植一带；陶广纵队北犯永顺地区；张振汉部也到达龙山的茨岩塘，窥伺塔卧。这样，各路敌军对根据地中心区域进一步形成了包围局面。

为扭转这种不利形势，军分会制定了首先突破中央，再转击两翼的作战计划，于是发起了后坪之战。

后坪位于大庸之西，其附近的鸡公坪，一侧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为澧水，其间有一条沿山麓通过的狭长隘路，地势十分险要，是大庸县城通往石堤溪、永顺县城等地的咽喉要道。3月20日，红军设伏于要隘两侧，第一天敌人没有就范，红军一部便后撤十余里休息，第二天返回伏击地时，敌李觉部先占领了制高点，构成了保障其主力渡河进隘的坚固阵地，红军反复发起攻击，均未夺回高地，两翼攻击部队虽打得英勇，但终因敌军制高点火力猛烈而受阻。此仗打了一整天，毙伤敌军近千人，但红军亦伤亡700余名，红四师师长卢冬生负重伤。五十一团团团长周克斌和五十团政委贺志高阵亡。

后坪战斗后，根据地中的县城相继沦陷。此时红二、六军团的总兵力已减至9 000余人，而大量的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日趋恶化。

3月22日，任弼时致电中央及军委：

根据目前情况，我们以最大决心争取这一地区的巩固，以与西方军（指中央红军）配合。（我们）正集中全力在保持有生力量条件下，首先求得侧击郭（汝栋）敌，必须取得两次伟大胜利，方能保持新区的巩固发展；否则，二、六军团将被迫退出新的苏区。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西方军放弃桐樟、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州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南）漳、兴（山）、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酉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施（南）、鹤（峰）、桑（植）逼进湘鄂敌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以指示。<sup>①</sup>

接着将地方武装编入主力红军，作了转移北上的准备。党中央书记处于4月5日复电，指出：

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至于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可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能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

---

<sup>①</sup> 任弼时：《二、六军团向中央军委报告敌军情况及我军部署》，1935年3月22日。

移地区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sup>①</sup>

中央的这一指示，再次体现和传达了遵义会议后新的军事指导方针的基本精神。

4月上旬，红二、六军团收到了遵义会议决议。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立即决定在团以上干部中传达贯彻。通过学习讨论，使指战员们对遵义会议的精神及中央在组织上的变化，以及战略上、军事指导方针上的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正如后来萧克所说：

“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就越来越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要采取积极防御。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在战略转移中，必须不放过有利时机坚决地消灭敌人，才能提高士气和武器弹药的补充，才能争取休息，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sup>②</sup>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使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明确了今后不要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认识到从狭小的被包围圈中转移到外线，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的必要性。

由于反“围剿”战争初期颇多失利，敌军步步紧逼，永顺城失守，省委和军委分会拟定了撤出塔卧和龙家寨基本根据地，北渡长江的行动计划。

1935年4月9日，红二、六军团有秩序地撤离塔卧，向北转移，拟经万民冈、陈家河，从香溪北渡长江，去湖北的南漳、兴

① 《中央对二、六军团是否应该北渡长江的问题给任弼时同志的指示》。

②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山和远安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出发前，贺龙跟部队讲话说：“陶广、李觉、郭汝栋、张振汉、陈耀汉这些乌龟王八都来了，要抄我们的家，我们这回是搬家，打烂一点坛坛罐罐不要紧，打烂了，我们要叫他们赔。”

贺龙风趣的讲话和乐观精神，感染了大家，人们顿时振奋起来。

这时敌人判断红军由龙家寨、万民冈向北突围，徐源泉命令纵队司令兼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进行堵截。4月8日，陈耀汉命令所属一七二旅：“于九日由桑植驰至两河口、陈家河一带，沿澧水北岸根据地形构成据点，扼要堵击；一七四旅三四八团留守桑植，维护后方运输；旅部率三四七团经陈家坡、万民冈一带攻击前进；师部率直属队进至周家峪居中策应。”敌企图与西面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截断红军去湖北的道路。

10日晨，红二、六军团的先头部队第四师行至桑植县的陈家河高地蒋家堰时，突与敌第一七二旅警戒分队遭遇。

陈家河是个百余户人家的小集镇，位于桑植县城以西60里处的澧水东岸，周围是迭嶂环绕的平川，有小径通往仓关峪，这是向北转移的必经之路。

红四师前卫第十团消灭了敌警戒分队，占领了蒋家堰北侧的田家坡，居高临下，监视敌军的行动，并迅速报告了指挥部。

贺龙随即命令队伍停止在离陈家河12里的地方待命。

同时命令侦察科长王尚荣带侦察小分队出去侦察。

又对十二团团团长钟子亭说：“你们先去打他一家伙！侦察一下，看街上有多少敌人。弄清楚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天黑了，一个尖兵排摸进了100多户人家的陈家河。

侦察科和尖兵排搞清了敌人的情况。原来这些从北面向红军进攻的敌人，在街上驻扎了两个营，在山腰土围子里驻了一个营，还有一个团驻在河东面山上。

“有没有小路可以绕过陈家河呢？”

“有，”侦察连政委李国良说，“河西岸大山背后有一条小路，可是这种小路，只能走人，根本不能走牲口。”

“那不行哟！”贺龙含着烟斗，沉吟道：“我们的伤员、骡子不能丢！我们要走，就走大路！”

贺龙随即主持召开了军委分会会议。会上他分析说：

“敌人武器装备虽比我们强，但当面就只有一个旅孤军进人，该敌惯于北方平原活动，不善于山地作战；远离桑植，交通不便，支援和撤退都困难；敌刚到陈家河，立足未稳，兵力配置分散，相互支援困难，工事不强，比较好打，而我军有 11 个团集中在一起，力量占绝对优势，并控制了有利地形，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打一个大胜仗，我们要走，也要打胜这一仗再走。”

贺龙说：“一定要给敌人一点厉害看看，免得他成天到处发疯。”

大家同意了贺龙的意见，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这股敌人。

会后，首长们连夜部署战斗，把队伍悄悄地布置在河西岸围子后面的大山上下和围子附近的 3 个小山包上。在这 3 个小山包上，集中了五六十挺机枪，封锁了陈家河的渡口。

黎明时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都在树林里，隐蔽着观察敌人。这时侦察连政委李国良匆匆走来，贺龙问道：

“敌人有什么动静吗？”

“敌军还在睡梦中，什么动静也没有。”

贺龙再次拿起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山下，然后向连长邓和高下达了作战命令：

“我们要先攻占那个制高点，不占领它就不能占领陈家河”，贺龙用手指着山下陈家寨后面的土寨子说：“据侦察人员说，里面有



一营敌人，你们连的任务，是去攻打土围子，但不能硬攻，而是要把敌人牵出来，消灭它！”

“贺老总的作战意图，你领会清楚了吗？”任弼时政委站在旁边对连长说。

“清楚了！”青年连长握着驳壳枪，两脚立正，声音低却坚定、严肃地回答。

拂晓，邓连长带领全连从树林里摸下山来到土寨子跟前，趴在外面的岩壳里，然后朝寨子里放了一阵枪。

土寨子里的敌人，遵照上司的命令，控制制高点，轻易是不出来的。外面的枪声，把大麻子营长从梦中惊醒。他定了定神，再听了听以为是当地游击队，便吩咐下面，不要理它。

邓连长打了一阵，见敌人仍无动静，就停止了打枪，让战士们一齐向土寨子里高声叫骂起来：

“陈耀汉的草包兵，你们有本事就出来，否则我们冲进去把你们一个个抓起来，像牵猴子一样押到贺龙将军处去领赏！”

“大麻子，太孬种，躲在里面是狗熊，有胆出来杀一程！”

……

麻子营长终于被激怒了，带领全营人马从寨子里冲了出来。

邓连长见敌人出来了，拔腿就往后跑。

麻子营长见红军“逃跑”，以为真是游击队，边追边骂道：

“有本事莫跑，看老子收拾你们！”

红军退到一道岩坎后伏了下来，向敌扫射一阵，打倒了几个，又用嘲弄的口气骂道：

“你们再追，我们就把你们这些乌龟王八全部打光！”

麻子营长见死了几个，越发起火，不顾一切拼命追来。红军且打且退，最后钻进了后山沟的树林里。

正在敌人追得起劲之时，红军埋伏在3个山头上的几十挺机枪，刮风似地一齐扫射起来，敌人死伤遍地，没有死的扭头就往

寨子里跑，可是寨门已被机枪火力封锁住了，只好往陈家河街上逃跑。

当邓连长与土围子敌人接上火时，贺龙指挥红军分三路包围了陈家河：一路经张家村直捣三浪子；一路经夹石界直插陈家河；一路经苏子溪堵住蒋家堰。

8时许，当红军准备发起进攻之时，庙凸山上守敌一个营的兵力，沿山脊向红军五十一团阵地发起了反攻，企图破坏红军的进攻。红五十一团抓住这个极为有利的时机，把这股突击之敌放到手榴弹有效距离之内，突然猛烈开火，予以大量杀伤，尔后趁敌混乱和逃窜之际，发起冲锋，从上往下压，一鼓作气攻占了庙凸、张家湾和吴家湾3个山头，从这些阵地向陈家河逃窜的敌人也被红军两翼部队消灭在山下河谷内。

战局很快打开，红军右翼二军团主力，立即涉澧水向蔡窠坪、麻画（今名玛瑙台）敌人进攻，左翼六军团主力和二军团第四师十团一部，向铜关槽之敌进攻；六军团一部，由中路直捣陈家河敌指挥部。同时，红军以一部兵力直插三樱子，切断敌人退路，完成了对陈家河的包围。

红军五十一团三营在营长罗章带领下，从中间迅猛地突入陈家河，消灭了敌一七二旅旅部，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割断了澧水南北敌人的联系。

红四师涉过澧水，全部消灭了澧水南岸蔡家坪和麻画的守敌。

红十八师从北上面出击敌人，向铜关槽一线的敌人阵地发起猛攻。到黄昏时，除少数残敌经仓关峪逃跑外，第一七二旅大部被歼，旅长李延龄被击毙在澧水河边。参谋长周植先被生俘。

经过陈家河战斗，进一步摸清了敌人情况，敌北路军纵队司令陈耀汉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贺龙料到敌人会向塔卧靠拢，立即指挥部队冒雨南下，追击逃跑之敌。他高兴地说：“既来之，就消灭之。消灭一个旅，就少一个旅。”

虽然下着大雨，但部队打了胜仗，指战员们依然精神加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骑马走在队伍中间。任弼时是很严肃的，这时也和同志们边走边说笑。贺龙一有闲空，就喜欢和人聊天。水淋淋的队伍里，在喧哗的雷雨中不断地传出呼喊声和阵阵说笑声。

“好大的雨呀！”

“好亮的闪呀！”

“贺龙是条龙，龙遇到雨水，能打大胜仗！”

“哈哈。”

战士们虽然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但情绪很高，他们差不多都是南方人，下雨行军是家常便饭，爬山、过河，走起来和晴天一样快。

部队翻过大山，走到陈家河通往桑植的大路上，傍晚，在通过离桃子溪 10 里的一条小河时，战士们发现河里的水很浑浊，马上警惕地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军团首长。

萧克立即命令部队就地停止，放好警戒。

这么大雨天，路上行人很少，如果不是过了部队，水不会浑浊不清。

萧克、王震到了前面仔细观察了一番，又到通往桑植城的路上看了看，断定是从桑植方向来了敌人，而且人数不少，过去不久。根据天色已晚，前方村子不多，北方来的敌人下雨天黑夜不能走路等情况判断，敌人可能会在桃子溪宿营，于是把这个情况和判断立即报告给总指挥部。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首长闻讯赶到前面，他们完全同意萧克、王震的判断，决心采取夜间急袭的手段全歼这股敌人。

桃子溪是红军走过多次的熟地方，位于陈家河到桑植城的大路右边，离桑植城 30 里，那个地方是一个山窝，四面是高山，山中间是块小平地，稀稀拉拉大约有 200 来户人家。村背后的山上，树木林密，石头块很多，这条鹅卵石大路就在那里穿村而过。

根据贺龙的指示，王震政委立即命令一个师从左边沿山梁隐蔽而迅速地绕到桃子溪村子背后，包围敌人，主力部队走大路从正面袭击；正面部队打响之后，山上的部队就往下压。

迂回部队先出发了，正面部队慢慢搜索前进，想等迂回部队包围好之后，再开始进攻。

侦察兵在前面抓来了几个敌人——正在村头架线的电话兵。一问，敌人正是从桑植开来的陈耀汉部，打算在此宿营。

等最先沿着右边的山梁绕到桃子溪背后的部队包围攻击敌人之后，从正面攻击的部队分成几路冲进村里和敌人打响了。这突然而猛烈的袭击，使正在吃饭和准备睡觉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有许多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冲出屋子，就当了俘虏。

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到处响起“缴枪不杀”的呼喊声，敌人乱放枪，打不着红军，倒给红军显示了目标。

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在突遭前后夹击之下，除陈耀汉本人和他的特务连的一部分跑掉外，共消灭敌一个师部、一个旅部、一个山炮营和三四七团全部，并活捉了师参谋长，缴获山炮两门（其中的一门至今还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

天亮了，雨停了，首长们走下山来。看到缴获的许多武器和俘虏，贺龙既高兴又惋惜地说：“可惜，陈耀汉让他跑了！”

“不要紧，下次还是会被抓住的！”任弼时满怀信心地说。

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夜里的战斗。有的说：“贺龙是活龙，龙一摆尾巴，就把敌人摆掉了。”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指挥下，3天打了两仗，取得了陈家河和桃子溪战斗的胜利，接着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并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

此后，各“围剿”之敌，震惊于五十八师的覆灭，纷纷后退，敌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转入被动。这样就胜利地粉碎了

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根据这种形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发展已经胜利开始了的反攻行动。

在这次战斗中，红军指挥员很好地体现了遵义会议后中央及军委指示的积极防御的原则，过去总怕敌人进入根据地，丢失地方，不敢诱敌深入，因而分兵把守，被动挨打。撤离塔卧后，丢掉了包袱，集中了兵力，转到敌人翼侧，在敌分进运动中，一下子就歼灭敌一个师，打破了敌人“围剿”，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形势，而且开始改变了红军消极防御的思想。

## 五 打到外线去

陈家河、桃子溪战斗胜利后，为调动敌人寻机歼之，发展红军，开辟新区，4月下旬，红军主力继续向东发展攻势，突入敌人后方，威逼津市、澧州和常德。对此敌人非常惊慌。湖南敌人怕红军切断其交通，主力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命李觉纵队三十九、十六师急向慈利、潭口地区撤退，防红军东取津、澧，南攻常、桃；湖北军阀则害怕红军乘虚渡江，进入湖北腹地，也命令张振汉纵队和第四十八师退守渔洋、长阳关地区，封锁长江；在塔卧的郭汝栋纵队也跟在湘军后而东撤。这时在根据地内只剩湘军第六十二师和新三十四师各一部，第十五师的一个旅和一些保安团，形势对红军非常有利。

当时贺龙坚持主张东进计划，红军在外线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寻机歼敌。但一些同志却主张停止东进回撤，先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红二、六军团主力便于5月初返回永顺、桑植、龙山地区。

敌人见红军西撤，鄂敌即返回了原地，湘敌也回到大庸停止

不动，红军在根据地内歼敌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这时，红二、六军团的许多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只有采取外线作战的手段，才能调动敌人，迫使其离开堡垒，红军才能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

与此同时，鉴于中央红军5月8日已渡过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红二、六军团的主要作战任务不再是配合中央红军的转移行动吸引更多的敌人，而在于如何保存和壮大自己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

贺龙召开紧急军分委会会议，对主要作战方向作了重新考虑。他分析当前敌情说：“湘敌兵力比较雄厚，战斗力较强，和红军作战经验也较多，鄂敌则分散薄弱，战斗力不强，是北方部队，不善于山地作战。同时，湘鄂敌军在地势上为红军分割，指挥上不统一，有可为红军利用的矛盾。”会议同意了贺龙的意见，决定把过去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而一直遵循着的对湘敌采攻势，对鄂敌采守势的方针，改变为对鄂敌采攻势、对湘敌采守势的方针。

1935年6月9日夜，红军突然以一部兵力，深入敌区，包围了湖北的宣恩县城，同时派出一部兵力切断宣恩、施南间的大道，佯攻城北的敌外围据点南山铜鼓堡。而将主力隐蔽在城南20里的地方，准备随时打击可能由来凤、李家河前来增援的敌军。贺龙断定：“那个做梦都想活捉贺龙的张振汉，听到我要打宣恩，就会带部队前来和我们决战。”

围城后的第三天晚上，贺龙正在指挥部踱步。

“报告！”

“请进。”

侦察员一进门就兴奋地说：“老总呵，张振汉果然要来了！”

“坐下，慢慢讲”，贺龙倒了杯茶，递到侦察员手里，让侦察员坐下。

侦察员喝了口水，然后汇报道：“据我们侦察到的情况，敌第

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听说我们打宣恩，将于明早带领四十一师和四十八师黄兴旅等从来凤出发来解围，他还吹牛说，这次一定活捉您领赏呢！”

任弼时闻讯也走了过来，他看了看贺龙说：“我们是否可以在来路上截住他，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

“好，就这么办。”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一起来到墙上挂着的一张大地图前，贺龙看了下，最后将目光集中在“忠堡”上。他用木棍指着说：“我看这里就是伏击的好地方！”

忠堡四周是险峻的高山，中间只有一条大路绕过这里，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是到宣恩的必经之路。

他们当即决定，除留一个团继续佯攻宣恩，监视和迷惑敌人外，主力于当日半夜秘密南下，沿两条道路急驰忠堡截击援敌。

指战员们听说要打张振汉，劲头一下子就上来了。队伍飞速出发，像长了翅膀的长龙一样，奔驰在崇山峻岭之中。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小跑着向前赶路，没有一个掉队的。宣传队员喊前呼后，热情鼓励说：“同志们，快快赶，忠堡去捉张振汉！”时值盛夏，烈日当空，战士们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嘘嘘，但谁也不肯落后。

经过 130 里的急行军，次日下午 2 点，以山地作战著称的红二军团到达指定地点，占领了忠堡附近的有利阵地，并且构筑了工事。战士们伏在隐蔽的工事里，静静地、焦急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下午 3 时，张振汉的右路部队首先进入忠堡；左路绕过老鸭关，进至离忠堡数里之遥的地方；中路部队进至韭菜园西侧。

为了防止敌军全部进入忠堡靠拢在一起，贺龙命令红四师首先发起攻击。他们歼灭敌行进中的右路部队后卫约一个营，然后又向忠堡以东的枸皮岭附近的敌左路部队发起攻击，歼灭其前卫

营，并将敌军压在构皮岭的山谷中。

与此同时，红四师一部又抢占了忠堡与构皮岭间的高地高升塘，抢筑简单工事，阻击忠堡之敌回援构皮岭。

当日黄昏，红六军团主力亦全部赶到忠堡地区，迅速展开了兵力，从红四师左翼投入战斗。

红六军团来到忠堡时，就听到前面枪声阵阵，干部战士们急得摩拳擦掌。接到命令后，迅速地向构皮岭侧后迂回，然后一个冲锋就占领了老鸭关东侧制高点，切断了敌左、中两路部队的联系，封住了左路敌军向来凤逃跑的退路并加固阵地，准备阻敌突围和打击增援之敌。

这样，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有利地形，完成了对敌军的分割包围。

夜幕降临后，忠堡之敌在几次增援攻击失败，部队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被迫停止了攻击，红军基本解除了敌军增援构皮岭的威胁，为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全歼被围之敌赢得了时间。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任弼时忽然发现贺龙的脸色变得蜡黄苍白，宽大的额角上不断地往外渗冷汗，便急切地问：

“老总，怎么啦？”

“没什么，稍微有点不舒服。”

任弼时一面扶贺龙坐下，一面让警卫员去找卫生员。

卫生部长贺彪闻讯赶来，他量了下贺龙的体温，已烧到39度了。

贺部长给他打了针，吃了药，嘱咐警卫人员说：

“贺龙疲劳过度，又受了凉，需要安静休息。”

“你到后边休息一下！”任弼时关切地对贺龙说，“前面的事我们负责。”

“这点小病没关系！”贺龙听任弼时要他休息，急着站起来，恳求似地说：“你饶了我吧！前线打得轰轰响，叫我到后边去休息，



看不到战斗情况，那才会把我整死哩，说不定还真急出大病来！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前线！”

贺龙抱病登上敌军指挥所对面的山头，俯瞰战场全貌，直接指挥战斗。

6月14日晨，构皮岭一片沉寂。贺龙在给几个主力团长下达任务。“你们都看清了吗？”他指点着敌人阵地的情形，就在南边那个凹进去的山崖下面，一块突出的岩石，像间凉棚似的从山崖上长长地伸出来，构成了一个防御工事。

“张振汉的指挥部就在那里，你们几个团从东西南北四面插进去，同时开展猛攻，大家来个比赛，看谁抓住张振汉！”

团长们迅速分头离去。

不一会儿，红军4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从四面同时向构皮岭之敌突然发起猛烈攻势。挤在狭窄山凹里的敌一二一旅在张振汉的督令下，利用各种地形地物顽抗，但终抵挡不住红军的凌厉攻势，红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这时，贺龙又让通讯员喊来了迫击炮连长刘彬和老炮手余东海，把全军仅有的4门迫击炮全部集中起来。“现在轮到你们炮兵了，”贺龙殷切地望着他俩说，“张振汉就在山崖下的茅屋里，你们要瞄得准准的，给我吊他几炮！”

不一会儿，第一发炮弹咝咝地飞了出去，落在了茅屋的旁边，腾起一股白烟，一群敌兵跑散了。连长马上校正了炮位，又接着“咣咣”连发两炮，山角前冒起了浓烟，茅屋燃烧起来，炸毁了敌军的无线电台，炸死了敌军参谋长，张振汉本人负了伤。敌指挥机关顿时陷入瘫痪，敌人阵地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嘀哒！嘀哒！”的雄壮的冲锋号声，在山下四处响起，红军战士们喊着“冲呀！杀呀！”穿过烟雾，向山角的石崖处冲去，将敌人压缩到山凹中心。

绝望中的敌人并不甘心灭亡，还在作垂死挣扎。一线红军伤

亡很大，红六师十八团团长高利国负伤，当时营以上干部只剩下2人。贺龙略一沉思，同任弼时、关向应交换了下意见，马上让通讯员把在红二军团当管理科长的贺炳炎召来。“现在，我命令你接替高利国同志担任十八团团长，听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坚决服从命令！”

稍停了下，贺龙又说：“你回去口头传达总指挥部的命令，一营总支书记余秋里同志为十八团政治委员。”

“是！”贺炳炎敬了个礼，转身向战场跑去。

贺炳炎是红二军团的一名战将，英勇善战，在湘鄂西苏区时被诬为“改组派”遭到逮捕。红二军团到达黔东后被释放，但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十万坪大战前夕，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又被突然免去十八团团长职务，但他工作仍然兢兢业业。现在，在这个白热化的战场上又重任团长，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他直奔火线，整顿部队，指挥战斗。

一线的红军战士看到一向身先士卒、英勇无畏的老团长重新复职，立刻一片欢腾，信心倍增。

“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战士们在贺炳炎的带领下，冒着枪林弹雨，蜂拥而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场上，刀光剑影，一片喊杀，杀得敌人抱头鼠窜。下午3时许，被围困的敌左纵队全部被歼。

在3昼夜的战斗中，消灭敌人1个旅，1个师部和1个特务营，其他6个团也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大批俘虏被押下来了，内有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穿了件又瘦又小的士兵衣服，特别引人注目，被一群战士单独押往总指挥所。

“报告贺总，张振汉抓到了，这就是他！”原来张振汉眼看大势已去，便换上了一身很不合体的士兵军装，混在散兵游勇中企

图溜掉，结果被红军战士抓获，乖乖地当了俘虏。

贺龙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猎物，只见他脖子上流着血，脸色灰白，头上缠着绷带，耷拉着脑袋，混身在瑟瑟发抖。

“呵呀！这不是张司令吗？我到处找你，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到了。”贺龙用嘲讽的口吻说：“你不是整天叫喊要活捉贺龙吗？今天到底谁捉到谁呢？”

“惭愧，惭愧！”张振汉满面羞涩地说。

“告诉卫生部给他治伤，以后留他给我们当教员吧！”

贺龙说完，向张振汉扫了一眼，跳上战马，往山下飞奔而去。

张振汉后来果然当上了红军教员。据萧克回忆：“忠堡战斗后不久，红二、六军团扩大了红军学校，请张振汉当战术教员。还请了一些解放区来的也有军事技术的军官、军士当教员，抽调有战争经验的干部及优秀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 800，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人。张振汉就在高级班教课。打败仗的人怎么能教打胜仗的？要知道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科学，不管红军白军，有很大共性。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至于如何运用，则决定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还有打败仗的人，可以从反面来进行教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和蒋介石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中许多打败仗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则。……长征时，我们带着他走，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决定放回去，回去后参加了抗战。他家住长沙，我军解放长沙时，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后还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sup>①</sup>

从张振汉身上充分体现了党和红军无比正确的俘虏政策。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红二、六军团消灭敌第四十一师之后，迅速连夜南下，一部

<sup>①</sup>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分休整，一部分从6月23日开始，包围了湘鄂两省交界的龙山县城。

当时军委分会认为，忠堡战斗后，湖北军阀遭此打击，军心浮动，战斗力受到削弱，短时间内敌军行动将会更加谨慎；湖南军阀因其战线过长，远离主要城镇，粮食等后勤供应发生困难，故难以对红军实行远途进袭。当时龙山城内有陈渠珍的1个正规团和1个保安团，共1400多人，加上敌军非嫡系部队，战斗力不强，城内存粮不多，难以久守，故作出打龙山的决定。

在围城的同时，总指挥部派出工作队，打击土豪劣绅，发动群众参军，进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但龙山西、北两面都是高山，东、南两面是平地，这种地形，对敌人防守很有利，而对红军进攻则带来很大困难，红军几次突击均未奏效，在初期曾经用坑道作业配合袭城行动，因作业工具缺乏和城墙坚固而没有获得成功。另外，对敌人固守孤城的能力估计过低，瓦解敌军和争取城内居民的战时政治工作也比较薄弱，敌军靠空投物资，凭险固守，红军围困龙山，久攻不下，拖延时日，又牵扯了不少兵力。打援战斗也未取得理想战果。

这天早晨，贺龙和任弼时来到一处池塘边，警卫员取出钓鱼竿，贺龙钓起鱼来。

不多久，池塘水面荡起波纹，他迅速拉起钓竿，一条鲤鱼顺着鱼钩，在水面上蹦跳起来。

“这次龙山战斗，我们也要放长线、钓大鱼！”贺龙一边从鱼钩上取下鱼交给警卫员，一边对坐在身边的任弼时说，“我们的方法要改变！”

“攻龙山城不应是我们的目的”，任弼时表示赞同说，“我们围在这里，应是为了钓鱼——围城打援才是。”

贺龙十分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久，大“鱼”果然来了。

为解龙山之围，蒋介石加强了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从江西调八十五师到湖北利川，归徐源泉指挥；调二十六路军一个师接替三十四师防务，并命令湘鄂敌军从南北夹击红军，鄂敌徐源泉因其部队迭遭红军打击，丧失了进攻的勇气，他只关心把部队部署在湖北边境，防红军再入鄂西。为此他在7月30日和8月1日命令驻太平镇第三十四师两个团和驻高罗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前进至沙道沟；驻小关的第八十五师开往李家河；驻高罗的暂四旅占领永坝；来凤的第一二三旅占领李家河，掩护八十五师，三十四师和四十八师向湘鄂边境开进。

在截获敌人的上述命令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决定利用敌八十五师孤军深入的弱点，集中主力，再次进入鄂西，采用伏击或截击方式，在运动中歼灭该敌。

8月2日，鄂军由太平镇、高罗和小关各地开始移动。同日，为麻痹敌人，红军由龙山兴隆街突然向北进到沙道沟附近。这一行动，立刻造成徐源泉的错觉，以为红军企图打击由太平镇和高罗向沙道沟前进的第三十四师或四十八师的第一四二旅，立即命令这两路敌军停止行动，这就给红军取得纵深楔入第八十五师翼侧的时机。

8月3日拂晓，红军主力突然改变方向，从高罗、李家河之间楔入，然后沿山间小径向西挺进，于上午时分，赶到了敌八十五师必经的板栗园东侧的利福田。

这是一个长约10里，宽不足1里的谷地，北侧山上是茂密的丛林，南侧是陡峭难攀的岩石，红四师和六师就分别埋伏在谷地北侧的安家坡大山上，准备伏击敌人。

总指挥部的首长和几位师长都赶来了，当看见十八团团长贺炳炎骑马赶到的时候，贺龙用马鞭子指着两条山脉，幽默地对他说：

“贺炳炎，今天要你做个瓶塞子呢，喏，你的任务，就是塞住

这个瓶口子！”

贺炳炎仔细一看，只见眼前群山起伏，山下是一条大冲，南经李家河，直通龙山城。山冲的两侧，都是高山，敌人如果从山冲通过，我们前后一堵，就成了“关门打狗”。

看了这个极为有利的地形，贺炳炎十分兴奋，他愉快地说道：“保证完成任务！”

各师团长一一领取了任务。贺龙总指挥又提醒大家说：

“八十五师是谢彬的部队。这个家伙，我认识，打仗有两手，不是好惹的。”

最后，任弼时政委也叮嘱说：

“敌人部队也比我们多，有九个团，都是北方兵。这是在敌人心脏里抓王八，一定要沉着、勇敢。我们决不能轻敌。两侧部队要埋伏好，不要暴露，以十八团枪响为号，一齐出动！”

板栗园两面的山界上、草丛里、岩石旁，红军战士一个个手握钢枪，瞪大眼睛，注视着下面的山冲。太阳渐渐偏向南方，火辣辣照耀在大地上，热得人汗水淋淋，闷得喘不过气来。

敌八十五师（缺五〇七团及工兵连）共约4 000人，步马枪13 000余支，重机枪20挺，轻机枪12挺，迫击炮6门，奉敌总司令徐源泉限期三日赶到李家河的命令，8月2日由小关出发。开始还比较谨慎，以五一〇团为前卫，该团一营沿山脊担任左翼警戒；师直和五〇五团为本部；五〇五团三营为后卫；师特务营和便衣队沿着向李家河的大道及两侧高地搜索前进。

上午10时，敌进至板栗园附近休息。

由于红军隐蔽得好，又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配合，敌在板栗园看到镇上赶集的人很多，其派往李家河回来的侦察分队也报告：“李家河有友军两个团，街上很安静，友军住在碉堡里，沿途无匪情。”因此，敌人的戒备逐渐松懈。

敌师长谢彬认为：“地方很平静，红军距离尚远，前面又有友

军掩护，现在首要的是快快到目的地。”11时，他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并撤回了沿山脊运动担任左翼警戒的五一〇团一营，全部沿谷底道路向李家河前进。

敌士兵们因为天热，有的脱掉衣服，有的横挂着步枪，十分散慢。一架滑杆行进在队伍中，上面搭着白布凉篷，由4个士兵抬着，两边还前呼后拥地跟着四五十个背短枪的，不用说里面坐的自然就是敌师长谢彬了。

12时左右，敌军人喊马嘶，熙熙攘攘地钻进了谷底。埋伏在山上的红军战士，对准朝谷底不断伸进的敌人，慢慢移动着枪口，等待着攻击的命令。

贺龙手拿望远镜，站在安家坡大山界的指挥部里，敌人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他像一头要猛扑下山的雄狮，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的猎物，这时，只见他摸了摸黑亮的一字胡，下达了“打”的命令。

安家坡大山界上响了3枪，随着嘹亮雄壮的冲锋号声，红军埋伏在山两侧的机枪、迫击炮立刻开火，手榴弹也纷纷掷向敌群。

敌军遭突然袭击，猛然煞住脚步，左顾右盼，方知中伏，顿时大乱起来。只见骡马惊叫、士兵乱窜，军官挥着指挥刀歇斯底里大发作，整个谷底活像一锅翻滚的热粥。

不过敌八十五师毕竟是一支经过正规训练的部队，经过了短暂慌乱后很快镇定下来，他们一小股一小股地分开强占四周的小山头 and 土包，或躲到田埂边、树丛里，一边拼命抵抗，一边卸下十字镐、铁锹，飞快地修挖工事。

为了不让敌人站稳脚跟，红军加强了火力，将敌前卫部队五一〇一团紧紧压缩在谷底，同时对敌行军纵队多路出击，将其分割切断。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各种轻重武器一齐向敌人扫射，使敌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最后不得不同红军肉搏。

红军战士个个精神振奋，人人如猛虎下山，他们汗流满面，脱

光脊背，往来厮杀。在灼人的阳光下，刀光闪闪，只听见枪打刀劈的撞击声、人的厮杀声。有的战士丢下砍得折弯的大刀，浑身血污地和敌人扭打在一起。

年轻的四师师长卢冬生，在战斗最紧张之时一直神色自若地站立在敌人的火网下，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掀起一股泥土，迷住了他的眼睛，他用手抹了一把，继续指挥战斗。当他发现敌师长谢彬率领警卫营死守一个土围子时，立即组织力量，带领队伍投入冲锋。就在这时，他突然受伤了。战士们要将他抬下去，但他却执拗地说：“等把谢彬抓到，我再走！”

总指挥部随即命令十八团团长贺炳炎代理四师师长指挥作战。

贺炳炎马上命令十八团向敌人冲击；其他各团占领四周阵地，防备敌人突围；又对身边的曾其云营长喊道：“你带预备队，准备接应！”

红十八团这时已伤亡近半，还有1000多人，个个打得眼都红了，把敌人压缩到了一起。四周部队一齐向上拥，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剩下那个土围子。

贺炳炎带队要往上冲，三营长曾其云嚷道：“这个围子你不能去！我不让你去！”他气喘吁吁地把贺炳炎往后一拉，抢在了前面。贺炳炎知道这时说也无用，只好关照一句：“好吧，当心些，我组织重机枪掩护！”

贺师长立即集中火力向敌射击。护卫谢彬的敌警卫营在红军机枪步枪的猛烈射击下，一批接一批地倒下去，终于没有勇气站到土围子墙边还击了。这时三营营长带队冲了上去，前面的战士架起人梯，跟在后面的一直跃入墙内，随着一阵沉闷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盘踞在里面的敌人全被消灭。谢彬脑腹受伤，举枪自戕。

红二、六军团的主力部队也从南北两侧、左右两翼向敌发起



攻击。

8月4日凌晨，战斗胜利结束。20多里的板栗园，到处横躺竖卧着敌人的死尸，遍地是丢弃了的枪支背包。清点战果，共歼灭敌八十五师师部，两个团和1个营，缴获各式长短枪1000余支，重机枪20余挺，手榴弹5000余枚，迫击炮6门，炮弹280余发，弹药600多箱，银元6万块。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穿过长满芭茅的田坎，精神抖擞地走向正在集合的英雄队伍。8月8日，红军又乘胜在龙山芭蕉坨击溃湘军陶广部10个团。至此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剿”。

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贺龙捏着点燃的烟斗，满怀豪情地向指战员们宣布：

“同志们，经过半年的战斗，敌人的两次反革命‘围剿’都被我们粉碎了，现在该我们打出去了！”

8月20日，红二、六军团再次大踏步东进，于8月28日先后解放了津市、澧州、临澧、石门等城市和广大地区，军队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由4个师8000人扩充到6个主力师2.1万余人。后来，当敌人又动员了100个团以上的兵力准备再次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围剿”时，他们便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

## 第四章 路 漫 漫

### 一 再见了桑植、大庸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它是红军长征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红二、六军团于1934年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以后，在贺龙、任弼时等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先后解放了湘西的永顺、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城市，很快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的革命行动，震惊了蒋介石和湖南的统治集团。1934年12月19日，湖南军阀何键向蒋介石发出了“情势紧张，全湘震惊”的急电，提出了“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肖萧（克）贺（龙）”的建议。

蒋介石再也不能对贺龙领导的这支江南“孤军”等闲视之。1935年初，蒋介石为了防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解除追击红军的后顾之忧，在以重兵围攻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了湘鄂之敌约四五十个团的兵力，向刚刚成立不到3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围剿”，妄图把红二、六军团消灭于大庸、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

这时，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遵义会议已经召开。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地获悉了敌人对红二、六军团的

“围剿”计划，于1935年2月11日发出了《中央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对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组织领导等问题给予了明确指示。

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重要的指示。从此以后，红二、六军团在战斗中不再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了，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机会打得赢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如果没有歼敌的可能，就转移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战略战术对头了，在作战中也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大小30余次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及湘鄂敌人两个师、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击毙击伤敌人万余，生俘敌人8000多；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及五十八师陈耀汉的参谋长、旅参谋长各1人，团长3人，营长以下军官300多人；击毙敌八十五师师长谢彬及旅长2人，团长5人；缴获长短枪近万支，轻重机枪100多挺，各种炮200余门，可谓战绩辉煌！

红二、六军团的作战，不仅牵制了湘鄂川黔等省的大量敌军，并且把进攻中央红军和江西、湘鄂赣红军的敌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光荣地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历史任务。

红二、六军团在粉碎敌人两次“围剿”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红军人数发展到1.7万多人，并建立了一个拥有八九百学员的红军学校。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还要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呢？

首先，敌我力量对比悬殊。1935年夏秋之际，当红一、四方面军进入雪山草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已无法派遣大批军队与红军作战。于是蒋介石除了调一部分兵力在草地东边和北边防堵红军外，调集了更多的兵力来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1935年9月，蒋介石在宜昌设立行营，由陈诚代他统一指挥

“围剿”各军。参加“围剿”二、六军团的敌人，除了湘敌何键、鄂敌徐源泉等率各纵队在湘鄂川黔边境围攻外，又从江西等处抽调其嫡系部队樊崧甫、汤恩伯纵队，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等部队，总计约130个团的庞大兵力，几乎等于前两次“围剿”部队的总数。

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后，蒋介石统治集团沮丧不已，这次“围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他们这次没有采用通常使用的那种长驱直入、急进猛追的战法，而是改为从四面八方对红军实行包围，逐段修筑碉堡，交替稳步前进的堡垒战术。他们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把红二、六军团压缩在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方，并予以消灭。

当时，红二、六军团计有12个团、红军学校（约1个团）、4个独立团（约等于2个团）及少数游击队，敌我力量对比显然十分悬殊，如果同敌人硬拼，那无疑等于以卵击石，后果难以预料。于是，红二、六军团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主力部队即撤向根据地中心地区，准备在内线歼击敌人。但由于敌人采取逐段筑堡、交替前进的持久战法，红军多次寻战，未找到有利战机，而敌人的封锁线却愈收愈紧，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情况十分严峻。

其次，地形条件不利。苏区面积本来就不大，东西约300里，南北约100余里，地理位置虽重要，但回旋余地小。根据地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为沅水、澧水，西北是崇山峻岭，这样的地形条件是不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的。况且，由于敌人的压迫，本来就不大的地区越来越小，红军难以展开兵力。

第三，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10%，而占有土地却在80%左右；二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很厉害。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但那时的土地政策过“左”，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这是错误的，激化了本来很复杂的社会矛盾。

另外，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改造他们，或者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相反，我们却实行了过“左”的政策。例如，当时曾解除了争取来的游杂武装队伍的武装，并杀掉了其首领。这样便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了敌人一边。所以苏区虽经近一年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并未彻底消灭，群众发动得也不充分。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下，原来躲进深山老林的反动武装又猖獗起来，进行反攻倒算。加上红军所处地区比较贫困，部队的给养和粮食供应都很困难，而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更加剧了这一困难。

10月中旬，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摆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突围转移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带与敌人周旋；二是突围后按照朱德、张国焘的电报要求，在苏区附近活动。

这里有一些情况需要加以叙述。1935年7月至8月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曾对电台的配置作了调整。负责中央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和通讯密码、通讯联络规定（呼号、波长）都留在了红四方面军。从此，中革军委失去了与二、六军团的电报联络。为了恢复联络，红二、六军团长期收听、寻找中革军委的电台。1935年9月29日，红二、六军团电台的同志在寻找中革军委电台时，与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了联系（因该台用的是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时的信号），二、六军团的同志误认为这就是中革军委的电台。

任弼时当即用密码给周恩来发去电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不料，这份回电却被攫取了红军总部通讯专用密码的张国焘所截获。9月30日，红二、六军团收到了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

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sup>1</sup>

二、六军团领导人此时还不知道，因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已率一、三军团北上，中革军委电台已在张国焘的控制之下。所以电讯联络恢复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直至1936年1月），二、六军团发给中央的电报，包括关于部队行动方针的请示报告，都未发到中央，而是拍发到了朱德、张国焘这里。这样，张国焘就独断地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向二、六军团发号施令。

10月15日，张国焘把持的红军总部电示红二、六军团：

现在小地区内，固守固然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sup>2</sup>

此即上文提到的朱德、张国焘电报。

会议根据中革军委2月1日关于“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的指示和遵义会议精神，结合面临的实际情况，对战略方针进行了认真研究。一致认为：二、六军团在长江以南是一支孤军，在现地域内，要粉碎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的“围剿”极为困难，根据地

1. 汪文：《红二、六军团与中央通讯联络的中断及恢复》，《军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28页。

2. 《黔山红迹》，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已不可能再继续固守；同时也不能按朱德、张国焘10月15日电报的建议在苏区周边活动。因为敌人进入苏区以后，便会逐段修筑碉堡，然后，依托他们的碉堡阵地返回来“清剿”苏区周边地区。红军突围后，如不远去，必然重新陷入困境之中。因此，会议决定，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远征，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前进，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转入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

贺龙在刘家坪红二军团长征动员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军团已经有了3个师8个团，六军团也建立了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两个军团有1.7万人，而且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好汉子，这比我们刚刚会师的时候，扩大了一倍多。蒋介石搞了130个团来围攻我们。他们修筑碉堡，步步为营，我们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小。我们苏区建设了近一年，人民群众尽了最大努力，支援红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哪还能养得起我们近两万人的红军？人要吃饭，马要吃料，可是老天爷长不出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只能转移到外线去，抛开这一大帮子乌龟壳子。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呀！”

战略转移的决策制定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转移。但是，要跳出这130多个团的包围，转到黔东去，谈何容易！在军委分会会议上，任弼时让贺龙拿个主意。贺龙想了想说道：

“怎么走？我们突围之后直奔贵州？那样，蒋介石围攻我们的几十万大军便会盯住我们不放。屁股后头跟着10万敌人，那可是很舒服的喽！你打又打不过，摆脱又摆脱不掉，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局面之中，这不是好办法喽。”

大家觉得贺龙的分析很有道理，但却没有道出“谜底”。所以关向应急切地问：“老贺，你有什么办法？”

贺龙沉默了一会儿，提出了他几天来反复考虑过的建议：

“我的意见是，我们先到湘中去。那里地区辽阔，物产丰富。

到了那里，一则可以补充物资，筹集款项，宣传抗日；二则可以威胁长沙。我们到了湘中，敌人怕我们进攻长沙，就会调兵追到湘中，这时我们再抛开敌人，转入贵州，在敌人部署被打乱后的无计划行动中，取得主动权。”

大家听后，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议论起来，最后一致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萧克说：“你这一步棋蛮鬼嘛！”

贺龙一笑，说道：“兵不厌诈嘛！打仗就得有点机灵劲。”

是啊，这的确是一次体现贺龙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当时包围苏区的敌军，东南有陈耀汉、郭汝栋、陶广、李觉等部；西北有徐源泉、樊崧甫、孙连仲等部。本来部队向贵州转移应该向西走，况且西边敌人也比较薄弱。但机智勇敢的红二、六军团却选择了东南作为突破口，直插敌人的心脏——兵力空虚的湘中。

战略意图明确之后，红二、六军团便开始了突围的准备工作。各部队迅速向根据地中心桑植一带集中，进行短期的休整。广大红军指战员除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外，还抽时间编草鞋、筹备干粮、制作轻便的担架、准备渡河搭浮桥的工具等，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

红二、六军团各政治机关深入连队进行政治动员，说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号召广大指战员以运动战打破敌人的“围剿”。与此同时，精简机关，从后方和领导机关中抽调多余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将各地的地方武装（独立团、营、游击队）组成第五、第十六两个师，分别编入二、六军团建制，随主力行动，使红军主力达到1.7万人；留下十八师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掩护主力突围；实行轻装，每个指战员只带几天粮食，必要的弹药和三五双草鞋；对老弱病残人员也作了适当的安置。

这时，红二、六军团的组织序列为：

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



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四师、第五师和第六师。

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冼恒汉，参谋长金承忠（不久由汤福林继任），政治部主任萧令彬（不久由刘亚球继任）。下辖第十团（团长刘开绪，政治委员朱绍田）、第十一团（团长覃耀楚，政治委员黄文榜）、第十二团（团长钟子庭，政治委员朱辉照）。

第五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谭友林，政治部主任萧新春。下辖第十三团（团长刘汉卿，政治委员陈世才）、第十四团（团长萧美臣）、第十五团（团长李文清，政治委员陈文彪）。

第六师：师长郭鹏，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常德善，政治部主任刘型。下辖第十六团（团长萧启荣）、第十七团（团长范春生，政治委员廖海光）、第十八团（团长成本新，政治委员余秋里）。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夏曦（牺牲后由张子意继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子意、袁任远。下辖第十六师、第十七师和第十八师。

第十六师：师长周保球，政治委员晏福生，参谋长刘子奇，政治部主任李铨。下辖第四十六团（团长张辉，政治委员胡荣）、第四十七团（团长黄珠子，政治委员罗章）。

第十七师：师长吴正卿，政治委员汤祥峰，参谋长刘转连（后贺庆积接任），政治部主任罗志敏。下辖第四十九团（团长王烈，政治委员陈东尧）、第五十团（团长刘忠，政治委员陈文彬）、第五十一团（团长贺庆积，政治委员王赤军）。

第十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振坤，参谋长刘风，政治部主任李信。下辖第五十三团（团长樊孝先，政治委员余立金）。

这一切，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为突围长征作了必要准备。

桑植是贺龙的家乡。在出发前两天，他为检查各师团行军前

的准备工作，骑马带1个警卫班，走过30多里的山坡路，顺便到了他出生的故土——洪家关。因为时间紧、军务忙，他没有进村，只从马背上跳下来站在山头上，对他熟悉的村庄望了片刻。村庄周围的峰峦，这时枫叶正红，像一片片色彩斑斓的晚霞，又像烈士的鲜血，染遍了山野。

往事如烟，却又历历在目。是啊，20年前举起义旗时，贺龙一家共9口人，而现在只剩下他一人了！特别是回忆起父亲、弟弟、大姐、二姐和满姑5人牺牲的情景时，他更是悲痛难忍，怒火满腔。他知道，红军走后的斗争更残酷，家乡的遭遇会更惨。他默默嘱咐道：英雄的村庄，英雄的人民，日后，一定要经得起血与火的考验！

贺龙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多灾多难的故土告别。

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下达了突围的命令。这是苏区人民难忘的一天。天空抹着一道道朝霞，地上铺盖着一层层明霜。广大指战员精神抖擞地集中在刘家坪前面的干田坝，排好队伍，整装待发。四乡八里的乡亲们来到队伍集合地的周围，有的提着葫芦装的包谷酒，有的带着橘叶包的糯米粑，热情地往亲人的红军手里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年轻的姑娘、媳妇们，他们怀里夹着新做的结结实实的布鞋，羞涩地在队伍中寻找着自己的未婚夫或爱人，对他们的亲人交待说：“穿着它，跟随贺老总去找毛主席吧！”那场面真是感人至极。

当晚，红二、六军团分别在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红军大会，誓师突围。红军指战员1.7万余人，在贺龙、任弼时等的领导下，从桑植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尽管乡亲们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长征，但人们眼里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泪水，目送着红军渐渐远去，深信红军一定会再回来！

## 二 恶战湘黔边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他们吸取了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西征时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轻装前进。只要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仗打好了，一则可以争取时间休整；二则可以补充粮草弹药；三则可以震慑敌人，使之不敢穷追猛进。所以，红二、六军团一路上非但没有减员，反而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了。

为了摆脱和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采取了声东击西，逐步转移的方法。为了迅速突破敌人的澧水和沅江封锁线，前卫部队日夜兼程疾进，经过一昼夜急行军，于20日黄昏出敌不意地到达了大庸和溪口之间的张家湾附近。

当夜，先头第四十九团团团长王烈率领一个营的战士，乘着木排竹筏，跟在突击队后面奋勇强渡，经过激烈战斗，突破了敌第十九师李觉部苦心经营的澧水封锁线。在战斗中，王烈团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幸中弹牺牲。

当红四十九团于半夜时分牢牢地控制了突破口，搭好了浮桥，刚准备让战士休息时，王震政委来到了四十九团，对大家说：“同志们，睡不得，睡不得，这不是睡觉的时候哩，再坚持一下，明天晚上一块睡吧！”然后，掏出地图，用手指着沅江洞庭溪，对团政委刘转连布置任务：“再走它200里，把这个地方也夺下来！”

作为军团政委，王震非常爱护士兵。他实在不忍心让已经极度困乏的战士再来急行军。然而他更知道兵贵神速的古训！此时吃苦受累，正是为了战士少流血、少牺牲。

红军不愧是钢铁战士。红四十九团指战员不顾一昼夜急行军加半夜激战的疲劳，连夜启程向南疾进，硬是在21日晚8时到达了洞庭溪。守敌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么快，毫无思想准备，红军

侦察排一枪未放就干净利落地收拾了两岸渡口的敌人；随后又俘虏了赶来洞庭溪布防的3大船1个营300多敌人。敌营长被俘后感到莫名其妙，连声说：“怪事，怪事，今天早上听说你们还在潭口，怎么这会儿就到了这里？”红军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靠两条腿就日行一二百里地，在敌人看来的确不可思议。对红军钢铁般的意志，勇猛顽强的作风，敌人恐怕是永远也理解不了。

这样，敌人的沅江封锁线又被红军顺利地突破了。

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澧水、沅江封锁线后，即兵分两路实行战役展开。红六军团东渡资水，到23日，先后占领了新化、蓝田（涟源）、锡矿山等地；二军团也相继夺取了溆浦、辰溪、浦市等地，从而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这一时期的战斗，在贺龙、任弼时指挥下，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战术运用自如，所向披靡，是红二方面军战史上的光辉范例。

在湘中站住脚后，贺龙对任弼时、关向应说：“敌人现在被我们弄蒙了，还来不及追过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在这里展开活动。两位是主角就看你们唱戏喽！”

任弼时笑着说：“也有你的份嘛！你想偷懒，是不是？”

贺龙把手一拱，笑答：“贺龙不敢，请政委吩咐就是。”

这年的湘中是个好收成，秋谷刚刚收好，谷草堆得像山一样。橘园里一片橙黄，金皮球一般的橘子成串成束，压折了臂腕粗的根根枝条。稻田里，放上了冬水。环顾四野，明亮耀目。橘园里的五彩六色，又从水中倒映出来，真像一幅优美的水彩画。只可惜地主豪绅当道，人民群众难温饱，没有歌声，也没有笑脸，到处都是死气沉沉，冷冷清清。

湘中地区，曾受过大革命风暴和秋收起义的影响，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所以红军到达时，广大劳动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欢迎。然而，红军的到来可把土豪劣绅吓昏了，刚从农民手里抢到的谷子也顾不得了，扔下算盘，挟起帐本，或逃

长沙，或躲进深山老林。

红军在湘中一带进行了短期休整，并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宣传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发动与组织群众。

红军每到一地，便召开大会，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不妥协的斗争。在红军的号召和帮助下，溆浦、新化、锡矿山等地先后成立了“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工人纠察队”、“职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当地工农群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镇压恶霸地主，大家扬眉吐气，拍手称快。辰溪有一个大土豪张圣琪，平时以1个月加1倍的高利贷，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逼得当地20多户贫苦农民妻离子散，民愤极大。这次，红军来了，张圣琪被逮捕，群众押着他游乡，背上背个空箩筐，每走一段路，就给加一倍的石头。最后，土豪张圣琪再也背不动了，不得不跪地求饶。红军责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加倍利息的阎王债给贫苦农民背呢？”土豪只得低头认罪。

红军政治部还在各地城镇召开工商业者座谈会，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打消了许多人的顾虑，得到了工商业者的支持与拥护。红军所到之地，各商店照常营业。一些城镇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居民，还为红军赶制军衣、军帽、皮带、背带等军需品。

与此同时，红军开展了扩军、筹款、筹粮等活动。在辰溪，红二军团截获了国民党“官船”运载的两万多匹布及大量其他物资。在新化，红六军团没收了国民党“官盐”300多万斤，立即标明价格：大包5块，小包3块，向广大人民出售。只消拿出1块银元，就能提回近百斤咸盐，足够食用几年，有些穷苦人家，实在没钱买，只要讲清楚尽可免费来搬。名义上是出售，实际上等于散发。可是，当地老百姓慑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焰，不敢来搬取。

红军便打出一个“出售”的名目，目的只不过是了解除群众的畏惧心理，堵塞日后蒋贼的毒口而已。当然，红军也可以从中略微为革命筹得一部分款项。当地群众，胆子大的白天到，胆子小的夜晚来，有的担筐，有的驮袋，络绎不绝，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由于红军的正确政策和模范言行，红军在湘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投红军，闹革命，顿时成了一股风气，两个军团在这一带共招收了三四千名新战士。

红二、六军团在湘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部队的人力和物力都得到了充实，为日后战胜敌人作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红二、六军团转战湘中，威震长沙，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当然蒋介石也不是傻瓜，他看到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后，便命陈诚撤离原在湘黔、湘鄂布置的防线，进行重新部署：以樊崧甫纵队的4个师渡沅江，向新化、溆浦前进，以李觉纵队的3个师从沅陵卢溪向辰溪、溆浦前进，这两个纵队组成“追剿军”，由何键任总司令，“追剿”红二、六军团；陶广纵队3个师、郭汝栋纵队8个团开抵沅江西岸，堵截红军西进；汤恩伯纵队2个师调长沙、岳阳防守，作预备队；新化、溆浦以南仅以保安团防守，兵力空虚。敌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企图将红军限制和消灭在沅江和资水之间的地区，如果不能给红军以打击，则极力将红军向南（两广）压迫，进入与蒋矛盾极深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的地区。

由于敌人主力7个师逼进了红军，其他敌人也在红军两翼迂回，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认为挺进湘中，已经达到休整和调动敌人的战略目的，决定按原定计划退出湘中地区，摆脱尾追之敌，向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

为了继续调动和迷惑敌人，红军采用大范围迂回和声东击西的战术。贺龙在研究战略战术方针的军委分会上发言说：

“湘中八天，我们得到了休整，开展了工作，装备、物资都比

过去充实了。敌人追来想吃掉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我看，我们是不是再把樊崧甫和李觉搅一阵子。不是说先东后西嘛！我说咱们来个声东击西，分兵两路向东边去兜个大圈子，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索性把何键这十几万人吸引过来，让他跟在我们屁股后边追；追得他人困马乏、精疲力尽。有机会，还可以敲他一砣子，没得机会，掉头向西北，去石阡。总而言之，不能让敌人搞清我们西去的意图。不过，我们也得辛苦点，脚板子要吃些苦头喽！”

任弼时一听，拍一下大腿，站起来说：“好，就按老贺的计划，我们来个声东击西，把他们拖个半死！”

12月11日，两军团从溆浦的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连续9天向东南方向急进，摆出东渡资水的姿态。敌人认为红军要重返原根据地，敌李觉、樊崧甫、王东原等部立即向东南方向“追剿”，以阻止红军东进。等把敌人吸引过来之后，红军随即挥师向西。

12月20日，红军进抵湘西南之高沙、洞口地区。12月22日，在瓦屋塘与陶广纵队打了一仗，没有给敌人造成大的伤亡。贺龙、任弼时突然下令：绕过陶广纵队，南取武阳，在绥宁以北的竹舟江渡过巫水，向北转进。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绥宁、洪江间用竹筏渡过巫水，向北进入高寒地区。这一带海拔都在1500米左右，山高岭险，气候寒冷。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威胁，沿着崎岖山路，昼夜兼程，在黔阳的江西街、托口一带，再次抢渡沅江，于1936年1月1日抵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一带，把数路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1936年的新年。在冷水铺，省委和军委分会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提出了在湘黔边境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任务。1月3日和4日，红军以少数兵力北出迷惑敌人，以部分兵力西取晃

县、玉屏，作为临时后方，主力则集中在晃县、龙溪口地区休整，以寻找机会对尾追之敌予以打击。

这时，追击红军较卖力的敌人，要数湘敌何键部的李觉和陶广纵队，但其主力距红军尚有一两天的路程，只有章亮基的第十六师穷追不舍，以4个团的兵力单独从苏江向晃县伸进。这是一个有利的战机，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组织便水战役，希望能在晃县、便水地区歼灭这股敌人，以争取新的有利局面的出现。

1936年1月5日中午，红二、六军团在便水地区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开始，敌人以为遇到了地方土匪，目的是截击部队，夺取枪械弹药。但不久敌人就明白了——遇到了红军主力部队！尽管由于红军战士勇猛作战，歼敌近千人，给敌十六师以重创，使敌人不敢贸然轻进，但因红军指挥上的不统一，兵力先后投入战斗，没有适度集中使用，没能速战速决地消灭敌人；加上对敌人援军也没有预先布置必要的兵力予以阻截，致使敌援军第十九师和六十三师相继到达并投入战斗，红军伤亡近千，遂先后撤出战斗，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的预期目的。便水战役是一次消耗战，但这次战役显示了红军坚强的战斗力，对制止敌人的急迫，起了重要作用。

1月7日，红二、六军团乘尾追之敌章亮基之第十七师受到沉重打击，不敢冒进的机会，从容向黔东进军。红六军团进抵玉屏的田心坪，消灭了黔军蒋在珍的一个营。8日，红二军团进入玉屏田冲。9日，红六军团占领江口。12日，红二军团占领石阡。到此，红二、六军团胜利完成了向石、镇、黄地区转移的战略任务。红二、六军团在江口、石阡一带进行了为期7天的休整，扩充新战士800多人，人力、物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

原留在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在主力突围时即向龙山附近积极活动，忽面前进，忽而折回，成功地钳制了敌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及敌湘鄂川黔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两部，有力地策应



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突围转移。但在红二、六军团南下湘中以后，红十八师曾数度陷入敌人重围，在敌强我弱的激战中，部队减员很大，已不利于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也于1935年12月中旬奉命突围，在师长张振坤领导下，采取迂回曲折，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经过浴血奋战，历尽艰辛，辗转经过鄂西、川东及黔东松桃的甘龙口、木黄，江口县的德旺、茶寨，于1月10日在孝闵与主力会合，归入红六军团建制，缩编为一个团，全军为之庆幸。军团政委王震跑出很远的路程去迎接他们归队，并对张振坤师长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全军感谢你们！”

进到石阡以后，红六军团西征路过这里时被敌人打散的一些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过了一年多不见天日的生活，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老战友们久别重逢，手牵着手，激动得泪如泉涌，竟一时语塞。

敌人一心一意要扑灭革命，可是闹来闹去，既找不到红军的主力，又摸不到红军的侧翼部队，连个把掉队的人员也没能摸去。红军可真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英雄部队！

为了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认清当前形势，确定目前行动方针，两个军团政治部在石阡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分析了当时全国各地苏维埃运动和民族革命形势；第二，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及意义作了一个估计；第三，提出扩大统一战线和建立新根据地的任务，并加紧扩大兵源以充实部队；第四，对部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了一次比较系统检查，纠正了某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

这次会议，对于统一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这时，蒋介石反动派认为红二、六军团在石阡一带，只是作

短暂停留，其目标要么是何机返回原来的根据地，要么是步中央红军后尘北渡乌江。因此，敌人追到贵州后并没有和红军纠缠，而是拼命地抢到红军前面布防。蒋介石派其“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到贵阳坐镇代他指挥，任命樊崧甫为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为第二纵队指挥官，从云南调孙渡到贵州任第三纵队指挥官，李觉为第四纵队指挥官；还将第九十九师由贵州镇远调到岑巩地区会同李觉纵队对红二、六军团跟踪尾追；令由湘入黔之敌樊崧甫、郭汝栋两纵队与新八师、第九十三师在思南方向截击；陶广纵队和九十二师、新三十四师在沿河、秀山、永绥、保靖地区布防，阻红军北进；调郝梦龄纵队进到后坪、思南地区，沿乌江西岸布防；令滇军孙渡纵队在威宁地区布防；敌二十三师则固守余庆、龙溪地区，掩护贵阳方向。

敌人此举的目的，是想趁红军向北运动之际围歼于乌江以东、松桃以西地区。如果此计不能得逞，则将红军南压至广西境内，妄图迫使红军与对蒋介石怀有敌意的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队作战，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而李宗仁、白崇禧为预防这种情况，则先将部队向黔桂边集结，其前锋已进至贵州独山地区，企图将红军御于其大本营——广西之外。

红二、六军团本拟在湘黔边的石、镇、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因石阡、江口一带地瘠民贫，粮秣缺乏，红军处在狭小地区，不利于打运动战；加之便水战役没能打开有利局面，而敌人又以15个师的兵力围拢上来，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当时，敌人的报纸一齐叫喊，什么“贺龙孤军势必就歼”啦，“贺龙走投无路”啦，“江南赤患削平有日”啦，真可谓忘乎所以，狂妄至极。

当然，假如红军冒冒失失地闯进敌人的“口袋”，那后果确实不堪设想；可是，红军的头脑没有敌人想的那么天真，明摆着的火坑是不会去跳的。

两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于1月19日在石阡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决定继续西进，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英明决策，使敌人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

根据会议的决定，红二、六军团于20日从石阡出发，经过白沙、马家屯、河坝场进入余庆县境。21日，在龙溪附近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第二十三师固守的纵深碉堡线。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急速向南挺进。24日，红军占领翁安县城。

随后红军又占领了平越（今福泉）县城。红军攻城时，敌二十五军参谋长刘继英坠城毙命，专员兼平越县长聂洸被红军活捉。与此同时，红四师第十八团在拦桥附近伏击由马场坪驰援平越的敌九十九师的1个团，将其拦腰截断，两头痛击，敌军遗尸累累，落荒而退。红军进城后，开仓济贫，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土豪劣绅，依民众要求就地正法。贫苦农民笑逐颜开，热情欢迎这支为老百姓说话做事的队伍。

27日，红军离开平越，西取龙里县属洗马河，前锋直指贵阳。这样一来，形势可就大变了，敌人由乐观而变为慌乱，红军则由被动变为主动。因为，这时敌人的主力大部分被红军将士抛在东面和北面地区，贵阳及其东南地域的敌人兵力十分空虚。红军倘若有兴趣，闯进贵阳城去逛逛，并不困难。

对敌人来说，贵阳是贵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大官僚们养身立命之所，此城万不可失。然而，敌人从湘北到湘中，从湘中到贵州，追来追去，就是为了凭借乌江天险来消灭红军。一旦放过这天赐良机，岂不可惜？江防不可不守，贵阳也要保卫，一身焉能二任？一时间调兵遣将，手忙脚乱，紧张万分。

当红军经开阳、杠寨及贵阳北部的百宜、羊昌进逼贵阳时，敌第九十九师、二十三师忙向贵阳收缩，加强贵阳方面的防守。这

样一来，就把贵阳以西和乌江的防务空了起来，为红军西进让开了大路。

红军本来就没有取贵阳的打算，因此，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虚晃一枪，突然改变方向，向西北急进，绕道贵阳北面，奔袭扎佐，歼灭守敌两个营近千人，然后袭击修文，直趋乌江渡口鸭池河。

鸭池河地处乌江上游，两岸山高岩陡，河下水深浪急。河北岸的滥泥沟（即大关），地处要津，又是川盐集散地。这时，敌人纠集盐商组织的盐防军和地方伪团防军约 100 多人扼守北岸，并控制了所有渡船，防止红军渡河。

2 月 1 日，红二、六军团总参谋处，从各师抽调了 120 多名精兵强将，组成一支精锐的临时侦察卫队。总指挥部命令他们当夜必须急行军 120 里，在天亮以前赶到鸭池河渡口，设法攻下滥泥沟，控制渡船，以便主力部队过江。

红军侦察员们斗志昂扬地准备向目的地进发，然而不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山路被雨水一浇，像抹上了一层油那样滑，侦察员们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山道，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进。但无坚不摧的红军战士，还是在天亮前赶到了离鸭池河 5 里的一个小村子，并从群众那里了解到了渡口守敌的情况，连哨兵的位置也弄准确了。侦察员们决定乘敌不备奇袭，于是选了一名贵州籍战士，走在队伍的前头，利用贵州乡音，去应付突然情况。除了一个班紧随他外，其余战士也随后跟进。

与此同时，红六师一支精锐部队已抄小路到下游 20 里处，越过铁索桥，直插滥泥沟背后，以隔断敌人与黔西城守敌的联系。

侦察队的战士们，很快机智勇敢地摸掉了渡口的哨兵，解决了驻扎在附近祠堂里的敌人一个连，将缴获来的枪支卸下枪机，叫俘虏们背着跟红军走。当他们赶到鸭池河渡口时，天已蒙蒙亮，侦察队便在一个山城下隐藏起来，命令俘虏向对岸喊话调船。不一会儿，一条小船便撑了过来。当小船快靠岸时，一个俘虏忽然纵

身跳上小船，劫船返回对岸。由于怕对岸守敌发觉，战士们没有开枪，谁知那个家伙一上岸就声嘶力竭地喊：“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此时，滥泥沟背后响起了枪声，守敌顿时慌了手脚，一窝蜂地从山沟小径鼠窜逃命。

侦察队战士们一边向对岸射击，一边向对岸船工喊话，请他们撑过船来。一会儿，果然有几条船撑了过来。侦察队战士们过河后，一部分协同红六师继续追歼逃敌，另一部分带领老百姓赶搭浮桥，以便大部队过江。

红军后卫部队在萧克军团长亲自指挥下，埋伏在鸭池河渡口的半山腰和河边一带，阻击追敌，消灭追兵约两个团后，随即尾追主力西去。至2月2日，红二、六团全部顺利地渡过乌江天险后，毁船封江，待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追到江边时，只有隔江鸣枪“欢送”的份了！

红军渡过乌江之后，前锋直指黔西。在这之前，已探知黔西城内只有敌宋马刀的保安大队约六七百人，于是决定予以消灭，进占黔西城。2月3日，红二军团第六师派出一支化装的小分队，智取了黔西县城北门。主力部队随后赶到将县城包围，2月4日，占领了黔西，城内敌人无一漏网，取得了进入黔西以来的第一场胜利，使红军有了一个立足之地。

红军进占黔西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敌樊崧甫、郭汝栋两纵队远在思南地区，郭汝栋的第九十二师和新八师被国民党的贵州省主席吴忠信留在了贵阳，用以加强城防。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被红军阻滞在鸭池河东南岸。敌前线总指挥湘系军阀刘建绪力图保存湘军实力，陶广纵队到湘黔边境后即返回湖南。李觉纵队，其时已远离红军向织金前进。川军、滇军各守畛域，只图自保。唯有乌江西岸蒋介石之嫡系郝梦龄纵队和万耀煌纵队共3个师的兵力，依托遵义，经金沙江向黔西急进。

根据上述敌情，两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

王震等在黔西召开会议，决定实行战略展开，以第五和第十六两个师继续西进，夺取大定、毕节；留十八师在黔西钳制敌人；其余3个师集中起来，向东北方向出击，首先对付由金沙江逼进的敌万耀煌纵队之第十三师，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

2月6日，红五师占领了大定，并在两路口、黄家坝两地，分别击溃敌万耀煌纵队和郝梦龄纵队的先头部队，俘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支，阻滞了敌人的急进。

当红军进入定县城时，当地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了一个100多人的拥护红军委员会，热情欢迎红军入城。他们在印发的《欢迎红军入城启事》中这样写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拥护工农红军。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对红军尽力支援。”这充分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希望和企盼，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憎恶和仇恨。

这时，活动于这一带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与红军取得了联系，报告了贵州地下党在黔西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的情况。2月9日，红军到达毕节时，邓止戈即率绿林武装席大明部前来迎接。红军在绿林武装的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毕节及其周围地区。

黔、大、毕地区，蒋介石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困，群众的革命要求十分强烈。而各“追剿”之敌大都落在红军的后面，且越趋不前。这就为红军休整和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红军在这里开展了20多天的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扩大抗日武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6年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新的民族革命高潮正在兴起。

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党的策略路线等问题。会

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这次会议则系统地说明了党在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充分阐明了在抗日的条件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揭示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时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正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

早在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之前，红二、六军团就接到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长征途中，夏曦起草了一份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红六军团政治部的名义发出。

前边几句是：

我们工农红军，  
志在救国救民，  
实行抗日反蒋，  
消灭卖国巨憨。

末尾两句是：

大家起来救国，  
胜利终归我们。<sup>①</sup>

---

① 《黔山红迹》，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红军指战员边走边打边宣传，到了黔、大、毕地区，红军很快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月7日，在大定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政权机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月17日迁往毕节）。2月21日颁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明确宣布：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省广大人民的临时革命政府”，其“战斗任务是：发动、团结、组织全民族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力量”。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武装队伍（如不愿受蒋贼压迫而携械散在山林之白军二十五军官佐士兵及民团绿林与一切反蒋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份，一律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联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以扩大民族解放战争。”宣布“本会对于一切愿抗日反蒋的白军官佐士兵当一律优待”。

布告还向千百万工农群众提出了7条施政方针，其主要精神为：立即成立反蒋抗日的各级革命政权，武装民众，挽救民族危亡。

在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号召下，黔、大、毕地区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红军各部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队，积极宣传和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城市，红军宣传队走向街头、广场，用演讲、演戏、唱歌、舞蹈、绘画、标语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揭露蒋介石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当时，两军团在长征途中，又远离党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但宣传队员们千方百计地搜集资料，将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登载的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和材料，加以分析和整理，写成简单的宣



传提纲和标语口号，向广大群众作生动、通俗的宣传。没有白纸，他们因陋就简，利用废纸和毛草纸。门板、墙壁、竹片便是标语牌，锅灰、木炭就是墨汁的代用品。

中央红军去年长征时曾路过这一带，人民群众受过党和红军一定的影响。因此，当红军宣传员讲到日寇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时，常常还没等讲完，听众就激愤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爱国情绪十分炽烈、感人。

这些地方的青年学生，更是积极热情，他们自动和红军一起，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跟红军学唱东北义勇军的歌曲，他们自己召开会议，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抗日反蒋，报名参军。

在农村，红军工作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对农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阶级教育，号召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团结起来，解放自己。在红军的帮助和组织下，各地相继建立起了土地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据统计，在黔、大、毕地区建立了50多个类似的组织。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动员农民踊跃参军。

在短短的20多天里，就有50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红军。红五师十四团就是在黔、大、毕扩军高潮中组建的。毕节朱昌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反映当时参加红军热潮的民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打倒土豪分田地，  
要耕田来有耕田。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指挥作战都一样，

没有哪个压迫人……

当时，红军还在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红军政治部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用文告或信件等方式分寄各地，号召各地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武装，同红军合作抗日，签订抗日停战协定，组织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等。在毕节，红军团结、争取了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先生。

周素园老先生，57岁，清末秀才，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1935年退出军界，在西南地区有很高的声望。红军来毕节前，国民党政府专员莫雄专程拜访周素园，劝其跟他一起逃走，不要当了红军的阶下囚。

周素园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是一员虎将，你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有的红军干部到周素园家里去拜见。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当过大官的人，真的没有多少家产，却有相当多的书。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书中，还有不少国民党明令禁止看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的已被这位老先生批注得密密麻麻。他们感到纳闷，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政委。王震听后，邀请了已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一块去拜访这位“古怪”的老先生。

寒暄之后，王震问道：“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走？”

周素园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当过大官，可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什么家产，两袖清风，我怕什么？何必跑呢！”

王震又问：“你为什么要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呀？”

“孙中山先生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

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吧？”周素园真挚地回答说：“你大概不相信吧？我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足足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他的理论。可惜人老了，只能是纸上谈兵喽！”

夏曦问道：“周老先生，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啊！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不知老先生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当然赞成！我完全赞成！”

王震、夏曦十分感动，把周素园的情况向贺龙作了汇报，并建议说：“总指挥，把他请出来，怎么样？”

贺龙兴奋地说：“对，王胡子，不请这样的人出来，我们请谁？我亲自去请。”

周素园真的被贺龙请了出来，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员。以周素园先生在地方上的威望，各方奔走，积极宣传抗日反蒋政策，工作很有成效，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帮助下，抗日救国军很快发展到1 000多人。

周素园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很熟悉。贺龙、任弼时请他给云南的龙云、孙渡写信，晓喻大义，言明利害，先生欣然同意。他在给孙渡的信中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崧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sup>①</sup>这封信打中了孙渡的要害，所以后来他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使红军能集中力量对付东面的敌人。

在红军撤离毕节时，贺龙对任弼时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跟我们一道长征，他是受不了的。这位先生为人刚正，影响又大，让他留在毕节也不合适。我看可以请他到香港去，为我们党做些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任弼时认为贺龙想得

<sup>①</sup>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周到，表示赞同。贺龙便派人向周素园转达了他们的意见，并给他送去一些黄金和银元，作为他到香港之后的生活费用。

周素园被感动得老泪纵横，坚决地说道：“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但是到处碰壁。现在我参加了红军，才看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其他首长，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

贺龙知道以后，高跷大拇指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要同他同生死，共患难喽！”<sup>①</sup>

在长征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周素园始终和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们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毛泽东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一个奋斗的人”<sup>②</sup>。

长征4个月来，红军天天行军打仗，与敌人周旋，在这里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红军在黔、大、毕地区的20多天时间里，群众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后被人们称为“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

当然，蒋介石对这一切自然不会听之任之，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边。

### 三 回旋乌蒙山

1936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保安的一间窑洞里会见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43岁的毛泽东，雄姿英发，侃侃而谈。当谈到二、六军团长征情形时，毛泽东望着贺龙、任弼时说道：

① 水工：《中国元帅·贺龙》，中共中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喔。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毛泽东的话没有错。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共有1.7万余人。经过历时1年，转战湘、鄂、黔、滇、康、川、青、甘、宁、陕10省，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尚有1.15万人，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兵力。但其他各路红军都有较大损失。红一方面军仅湘江之战，即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川康中，也由8万人减到了4万人。无怪乎毛泽东说二、六军团是个“奇迹。”

在一场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中，创造这样的奇迹，固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决然离不开战争指挥者的正确决策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的群众工作虽然比较顺利，但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却一直没有打开有利局面。

1936年2月初，虽然敌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一度远离其主力部队，孤军向金沙、三重堰方面冒进，但由于红军对敌人情况了解得不够充分，没有及时捕捉住这个有利的战机，及至红军向东北方向移动时，该师已占领了三重堰以东、金沙以南地区。

为了调动敌人，创造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条件，2月中旬，萧克军团长亲率十七师深入敌后，占领了交通要道金沙。在激战中，十七师师长吴正卿不幸牺牲。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也绕到了三重堰敌人的北面，计划在三重堰东北地区相机歼敌一部。出乎红军预料的是，敌人主力部队非但没有回头后顾，给受红军打击之敌以援助，反而趁红军正面兵力薄弱的机会，敌十三师于2月14日袭占了黔西县城，把被红军阻隔在乌江以东的敌九

十九师和二十三师接应过江，并进一步趁红军回援不及于2月15日又袭占了大定。2月下旬，敌樊崧甫、郝梦龄两纵队也都先后进抵大定、瓢儿井地区，郭汝栋纵队也渡过了乌江，正向大定前进。敌十三师更是气焰嚣张，向大定以西疾进。

红军这次主动出击，没有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根据地的预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十七师急从金沙江回师。2月19日，在大定城西10余里的将军山，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十三师向毕节进攻的先头部队7个连，这当头一棒，刹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制止了敌人的急追，给十三师以不小的震动。红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东面屏障。

但这时敌人已集中了约90个团的兵力，向毕节地区逼过来。大军压境，来势汹汹，怎么对付？中共川黔滇省委和军分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红军在黔、大、毕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未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未消灭其有生力量，目前形势已不利于红军继续在这一带活动。为了摆脱优势敌人，实行机动作战，两军团领导人遂决定撤出黔、大、毕地区。但是，向何处撤退呢？

不久前，朱德、张国焘曾给两军团来电，指示说：“一、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二、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所以，大部分人主张转往黔南安顺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以观时局，如有大变动，再东进湘黔边境。

2月26日晚，红军在毕节城内小校场召开军民大会。贺龙在会上讲了话，鼓励大家要加强团结，树立信心，争取抗日反蒋斗争的最后胜利。要离开根据地了，大家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但情绪高昂，坚信挫折只是暂时的，最终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参加大会的士兵和群众会后提灯游行，表达了军民之间的团结战斗精

神和鱼水难分的情谊。

2月27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又一次进行战略转移。因为敌人10个师又1个旅已在红军左侧和后面紧追而来，红军直接去安顺地区已不可能。为了把敌人西调，疲惫和摆脱敌人，两军团领导人决定沿毕（节）威（宁）大道西进，跨越乌蒙山区，寻找时机转向东南安顺地区。

从毕节出发时，红军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毕节、威宁大道向西前进，经茶亭、长春堡、撒拉溪、杨家湾、七星关进入赫章平山堡；另一路从毕节向南，经流沧、草堤、朱昌、化厂坪、田坝、阴底、杨家湾进入赫章。在平山堡与第一路会合后，一同经野马川到达妈姑，由妈姑北上，经可乐、以则河进入云南奎香地区。

部队到达毕节、赫章交界的七星关时，由原绿林部队改编的贵州抗日救国第一支队席大明部，不愿意离开家乡跟着红军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便带着两名警卫员前去做说服教育工作。匪首席大明事先知道夏曦要到他们大队，就设置了埋伏，在河边渡口只留下一条小船，夏曦和警卫员乘小船过河后，顺着大路向野马川山沟里席大明部走去。他们刚进入山谷，突然枪声大作，遭到两侧山上土匪的袭击。夏曦知道情况有变，即带领两个警卫员下山往回返。当他们退到河边时，渡船已经不见了。他们只得泅水而退，结果夏曦和一名警卫员不幸溺水牺牲。

夏曦是中共六大中央委员。1931年，党中央派他到洪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主要领导。在这段工作期间，由于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搞了肃反扩大化，犯了严重错误。二、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的主持下，曾对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在他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后，中央又任命他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政府主席。1935年11月，部队即将长征时，又把他调到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夏曦虽然犯过严重错误，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但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还是努力改正错误的，在最后一段时间里，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的牺牲，从军团的领导到政治部的同志，都非常难过。

对红二、六军团西进，各路敌人判断不一，打算各异，行动不一致。

云南军阀龙云既怕红军西入云南，又怕蒋介石“假道灭虢”，为保云南，他将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威宁地区防堵，并企图与追击部队造成夹击之势，逼迫红军北走四川。

四川军阀刘湘呢？他怕红军入川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建立根据地，遂派杨森、李家钰等部十几个团赶到川南金沙江地区防堵。

蒋介石则派其亲信顾祝同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的名义，坐镇贵阳，亲自督战。因此，各路敌人只有追击部队行动甚为积极。敌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3个纵队，沿着毕、威大道及两侧的平行道路，向红二、六军团追来。同时，敌李觉纵队由织金，郭汝栋纵队从大定，共同向水城、威宁截击，防止红二、六军团南出。顾祝同的意图很清楚，就是想利用滇军、川军严密防堵的形势，以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5个纵队的庞大兵力，从东、南两个方向，将红军压迫在金沙江以东滇、川、黔边境的狭小地区，然后进行“围剿”。

3月2日，红二、六军团进到赫章野马川地区时，敌李觉、郭汝栋、郝梦龄3个纵队都已转到红军东南方向，挡住了红军去安顺地区的道路。针对这一情况，两军团领导人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改变原定行动计划，继续西行，准备到妈姑再折向南行，经威宁、水城间的狗店，提前越过郭汝栋部，进到滇东的南北盘江地区。

然而，当红军于4日到达妈姑地区时，敌李觉、郭汝栋两纵队已进到水城、威宁之间，红军南进安顺的道路又被截断。而这



时，追击红军的敌人，也已接近红军后卫，敌樊崧甫纵队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二、六军团左前方的朱歪地区，对红军形成了包围态势。贺龙说：“南下不行了，向西有孙渡，我们走西北，那里的川军远在金沙江，还来不及过来。想办法把追我们的几个纵队往西北方向调，看看能不能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

于是，红军改变原定路线，暂时向西北方向——滇东北的奎香、彝良方向前进。3月6日、7日，红二、六军团经以则河、可乐等地，先后进到奎香地区。从此，开始了红二、六军团长征史上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

乌蒙山脉南北走向，位于贵州西北和云南的东北部地区。云南的胎通、彝良、镇雄和贵州的威宁、赫章等县，均处于乌蒙山脉的北端。这一带群山起伏，山路坎坷，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且多瘴疫。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与敌人周旋，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红军向西北方向的这一机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顾祝同认为红军将经过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入川。他命令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三个纵队衔尾向西北紧追，尤以樊崧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步步进逼，气焰嚣张。红二、六军团决定杀它一个回马枪，挫其锐气，以利红军争取主动。

于是，红军除了派出钳制部队外，命令红四师、十六师、十七师从驻地奎香、恒底地区返回50里，隐蔽在以则河、法冲之线以北山地伏击敌人。3月8日，红军部队按时进入阵地。敌第二十八师以一个步兵连、一个侦察连为先头，其势汹汹面来。当敌人两个先头连全部进入红军伏击圈以后，红军突然从多路发起猛攻，敌人两个连全部被歼。敌后续部队赶紧收缩，构筑工事，抗击我军的进攻。面红军并没有和敌人进一步纠缠，很快撤出战斗，连夜急返奎香、寸铁坝地区，经乌江寨、放马坝，向镇雄前进。红军在镇雄牛场广德关收拾了劣绅陈寡妇纠集的几百人的反动武装后，即转入深山小路向东南绕行，准备突破敌人的包围，南经杨

家湾穿过毕节大道向安顺地区转移。

红军进入镇雄西南大山后，坐镇贵阳的顾祝同狂妄地认为红军已经被追得精疲力尽，走投无路，开始瞎闯了，妄图迅速地歼灭红军于镇雄西南大山之中。他命令尾追的3个纵队全部东进，樊崧甫纵队尾红军紧追，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转向镇雄截击，寻红军主力决战；命令郭汝栋纵队经威宁北上在万耀煌纵队左翼加入战斗，向朱歪、安耳洞地区攻击；命令李觉纵队沿毕、威大道向毕节巡弋。

正当红军在镇雄西南大山之中行进的时候，敌郝梦龄纵队和万耀煌纵队的第九十九师已在红军之先进到镇雄。当贺龙从敌人的两名逃兵口中得知，万耀煌将亲自率领其第十三师于11日前后经则章坝（今哲庄坝）开往镇雄时，他当机立断，决定伏击这部分敌人，以打开南进道路。红四师、六师兼程前进，于3月11日先于敌十三师赶到则章坝，进入阵地。12日，敌十三师长驱直入，红军根据贺龙总指挥“打得猛，打得狠，把敌人打乱”的要求，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击，消灭敌人两个多连，前锋部队一直冲到万耀煌的司令部。这位纵队司令根本没有想到“逃跑”的红军会突然杀回来，他的部队一下子乱了阵脚，几乎失去了控制。万耀煌混在散兵中逃脱。但由于敌第十三师收缩较快，加上敌第九十九师和郝梦龄纵队迅速回援，红军未能消灭更多的敌人。贺龙便命令二、六军团向前急进，摆脱敌人。

就这样，贺龙、任弼时等指挥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千里，搞得顾祝同摸不着头脑，拖得万、樊、郝3个纵队疲惫不堪。

但是，这种整天有上百个团跟在后面的大回旋战，是一种在被动中求主动的仗，打起来异常艰苦。这一带山峦重叠，道路稀少，崎岖难行，既不便于迅速行动，又容易被敌人包围封锁。加之我军连续行军作战，给养困难，饥寒交迫，掉队现象很严重。贺

龙的脚底下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露出渗血的鲜肉，每迈一步疼得全身发抖。一到休息，他就坐在山坡石头上，给伤裂的脚板抹些凡士林，然后让勤务员用火把伤口烧平，痛得他脸色发白，满头大汗，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后来，凡士林用完了，便抹点猪油。连猪油也找不到时，只好干烧。一个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尚且如此，其他指战员的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

人有旦夕祸福。恰好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的肺病又犯了。尽管任弼时才30多岁，但国民党反动派的毒刑，繁重的工作负担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贺龙很着急，他把红二军团的卫生部长、有关的医生、护士还有副官都找来，十分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要照顾好任政委呀！你们晓得，不是他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来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他是有水平、有正义感的中央代表啊！”

卫生部长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任政委的！”

贺龙点头说：“那就好，我是怕你们马马虎虎出了毛病。”

其实，贺龙还是放心不下。他经常跟在任弼时的担架旁，拄着一根木棍，摇摇晃晃地走着，还不时地给任弼时讲点笑话，好像他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其实他的脚也在流血。

红二、六军团经则章坝南进的道路没有打开，于是改为西进。但敌人不想放弃这一消灭红军的好机会，所以仍紧追不舍，蜂拥围上来。13日，红军进至财神塘地区时，与敌郭汝栋纵队遭遇。这时，在红军后面的郝梦龄、万耀煌纵队已进到安耳洞以东地区，与红六军团接触；南面李觉纵队正在水槽堡、赫章地区，距红军很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北面樊崧甫纵队在红军来路上寻找红军的踪迹。

敌人越聚越多，包围圈也越来越紧，红军被围困在纵横约30里的狭小地区内。这是红二、六军团自桑植出发长征以来，处境

最险恶和最困难的时刻。

在这紧急关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军团领导沉着冷静，全面分析情况，正确决定方针。广大指战员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决心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一切困难。为便于机动作战，部队减掉了一些驮担和重装备。极为重要的是，军团领导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看到了此时战役上已出现了有利于红军的根本变化。

贺龙在一次军委分会会议上精辟地分析说：“我们的情况不妙啊！后面的赤梦龄、万耀煌跟得很紧，南面的李觉也赶了过来，北面的樊崧甫正在向这边靠拢。在乌蒙，敌人越聚越多，包围圈越来越紧。我们的部队已经非常疲劳，不过，敌人的情况更不妙。他们从湖南、湖北、四川过来，让我们拖着跑，罪受得比我们多。他们又不只听顾祝同一人的，行动常常不一致。现在敌人主力大部分被调动到我们的北面和东面去了。顾祝同还以为我们快垮了，有些骄傲了。我看，时候到了，应当从敌人的空隙中钻出去了。要迅雷不及掩耳，跳出包围圈，把他们留在乌蒙山。我们尽快进入云南，捅一捅龙云这个马蜂窝。”

大家认为贺龙的分析很有道理，经过讨论，决定从郭汝栋和樊崧甫两个纵队的结合部向西北方向突围。贺龙强调，他们的结合部虽是个薄弱点，但也要十分小心，秘密突围。根据贺龙的命令，红二、六军团果断采取了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在布设好疑兵，置稻草人于前沿阵地，插红旗于林木深处之后，迎着敌人的来路，偃旗息鼓，马裹蹄，人衔枚疾走，隐蔽地从郭、樊两纵队的夹缝中钻了过去，向北突进。到达安耳洞后，又突然西进，穿插到樊崧甫纵队之后和郭汝栋纵队外侧，胜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第三次进到奎香地区。红军突围两天后，敌人才知道中了贺龙、任弼时的“空城计”。

红二、六军团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立即兵分两路乘

虚兼程南进。一路由赫章可乐，另一路经威宁云贵桥，从昭通、威宁之间穿过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从乌蒙山直插滇东。

滇敌孙渡纵队的刘正富旅在宣威以北的来宾铺地区阻止红军前进。红军决定先打退这只“拦路虎”，然后再继续前进。

3月23日，敌刘正富旅倾巢出动，猛扑红军阵地。红军在来宾铺、虎头山一带设伏，开始以小部队诱敌，边打边撤，当敌人主力接近红军前沿阵地时，红军立即全线出击，打得敌人自相践踏，溃不成军。孙渡闻知战讯后，亲率援军赶赴虎头山，敌我双方进入了对峙状态。这一仗，红军歼敌近千人，给滇军以沉重的打击。同一天，红二军团五师在旧铺子钳制敌郭汝栋纵队时，将其先头营击溃。红军威震滇东。

这样，红二、六军团就基本上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由被动变为主动。按照原定计划，于3月28日，进占贵州盘县和亦资孔地区，胜利地进入了南北盘江之间，追敌大都被甩得远远的。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乌蒙山下千里回旋战。

红二、六军团的乌蒙山回旋战，历时23天，转战千余里。这是一次有上百个团敌人围追堵截，在退却中寻求进攻，在被动中求得主动的回旋战。为了调动敌人或者避免不利的战斗，红军有时不得不立即改变行动方向，有时为了创造有利条件，又不得不夜以继日地急行军。所以，行军打仗的艰苦自不待言。再加上恶劣的高寒气候，崎岖难行的山路，经常不断的缺粮少水，真是苦不堪言！然而，在英雄的红军指战员面前，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乌蒙磅礴走泥丸”，他们把乌蒙山踩在脚下，穿插行进于敌阵之中，硬是把顾祝同指挥的几个纵队，拖得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低落，一无所获。

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战胜困难的重要条件。军团领导一直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在急行军中及时告知指战员当时的敌情、解释行动的目的，使广大指战员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在复杂紧急情况下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战斗力；党员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吃苦在先，战斗在前，使得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患难与共，无往而不胜，从而完成了这场艰苦的回旋战斗。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处境最危险的一次。许多老同志事后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但是，却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出神入化的指挥下，硬是将十几万紧追不舍的敌人远远地甩开，化险为夷，依然保持着二、六军团的完整性，写下了红军作战史上光辉绚丽的篇章，无怪乎毛泽东对这一“奇迹”要大加赞赏！

#### 四 飞渡金沙江

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使红二、六军团进入了南北盘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创造了自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最有利的环境与条件，红军得以休整恢复。

南北盘江地区的敌情、群众基础、给养和地形等条件均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这时，敌人已从进攻黔、大、毕地区时的90个团减少到50个团左右，况且敌人被红军的长期运动战拖得疲惫沮丧，士气低落，暂时转入守势。川敌停留在长江边未再前进；黔敌一部为巩固黔防退出了“追剿”；李觉、郭汝栋纵队自称减员过半，请求调回湖南；靠红军最近的孙渡纵队兵力单薄，只图保境，不愿单独冒进；继续“追剿”红军的樊崧甫、郝梦龄、郭汝栋和李觉纵队，容易被红军各个击破。

南北盘江地区的群众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压迫，灾难深重，有迫切的革命要求。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此地时留下了良好的影响，群众热烈拥护红军。红二、六军团当时兵员充实，虽经大小战斗十余次，但仍保持着刚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时的人数，达

到 1.7 万余人，且士气高涨，信心百倍。

此外，这一地区广大，有回旋余地；物产丰富，部队给养可以得到良好补充。部队进入南北盘江地区后，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战斗能力。

根据上述有利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决定在这一带开展活动，首先集中全力击溃孙渡、郭汝栋两部，以打开新局面，建立根据地，坚持江南的斗争。这是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第三次准备建立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为使自己的行动部署与全国红军的战略方针取得一致，及时地将这一战略意图向当时的红军总部作了汇报。

3月5日，红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名义给二、六军团发来电报。电报指示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电报说：

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我们即派部队接应你们，如果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运动亦好。

电报还提出了过金沙江的 5 个渡河点。总部的指示显然与红二、六军团拟在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相矛盾。为了弄清军委意图，红二、六军团于 3 月 29 日在盘县向军委发报请示：

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包括敌之樊、郝、万、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

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

国内和国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竟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两天内电告。

当时，电示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主要是张国焘的主张，但朱德、刘伯承等也表示同意。当然，他们要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的目的却大相径庭。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的目的，是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推动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以打开西北地区抗日新局面。张国焘与中央分裂后南下遭到失败，被迫准备向西北转移。但这并非出自张国焘的情愿，所以他力主二、六军团北上的目的，是企图乘机拉拢和分化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增加他对抗中央的筹码。因此，红军总部于30日又电示红二、六军团：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并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应当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sup>①</sup>

当时红二、六军团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分裂反

① 任弼时：《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对中央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二、六军团接电后，根据电文中提出的最好是渡江北上的意图，认为这是出于全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要求，经军委分会研究，毅然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服从大局需要，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进一步打开革命的新局面，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北上方针确定以后，立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政治动员、组织整顿和物质准备。两军团在盘县扩充了700多名新战士，制定了北渡金沙江的计划，选定了渡江路线，部署了行军序列，决定经普渡河、元谋，从龙街渡江，即采取总部指出的第三渡河点为渡江路线；决定以二军团为右翼，经沾益、寻甸，六军团为左翼，经曲靖、马龙，一同向普渡河前进。

3月31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西进，一举突破孙渡纵队设在平彝附近的防线，进入滇中地区，开始了抢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

这时，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由龙云当总司令，并命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樊崧甫、李觉、郭汝栋3个蒋介石的嫡系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飞往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4月6日，红二军团六师攻战寻甸。在昆明的龙云认为，红二、六军团可能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从元谋渡金沙江，因此，他急令其近卫第一、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8日，红二军团前卫四师抢占了普渡河铁索桥，把龙云直接派出的近卫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打得狼狈逃窜。与此同进，红六军团也经马龙、白塔铺、羊街、可朗向普渡河前进。

红二、六军团深入滇中，昆明震动。龙云急令孙渡纵队加快追击速度，将红军阻止在普渡河东岸。孙渡受命后，即分两路尾追红军，并与张冲混成旅相配合，形成对红军的夹击。地方滇军也倾巢出动堵截。樊崧甫、郭汝栋、李觉各纵队也齐向滇中奔集。

蒋介石还出动飞机侦察轰炸，阻止红军渡河，妄图将红二、六军团围歼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

红二、六军团领导当即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定乘敌人还没有集中时加以打击，制止敌人的穷追。各围追堵截之敌中，邀功心切的樊崧甫纵队脚步最快，其先头部队与滇军已靠拢，距红军已不过百十里地，于是决定先给樊崧甫纵队以痛击。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因为不管红军是向前渡江也好，或是夺路转移也好，都要求红军立即止住樊崧甫的脚步。否则，前有金沙天险，后有断路敌军，左右伏兵尽发，红军回旋无地，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贺龙亲自把阻击敌人的地点选在六甲。这是红军昨天才经过的地方，这里左侧傍山，怪石嶙峋，易守难攻；右侧为一片丘陵，山包起伏，灌木丛生。贺龙命令红六师从可朗即刻返回50里，于4月9日拂晓前赶到六甲，最好超过六甲，以运动战防御阻击敌人，掩护主力的行动。还特别对红六师嘱咐道：“你们一定给我狠狠地敲，不敲则已，要敲就狠敲，抢时间，抢地形，什么也不要怕。”

红六师领受任务后，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干部会。师长郭鹏根据敌我双方情况，指出可能和敌人遭遇。政委廖汉生对大家说：“部队行动一定要快，抢占有利地形，打埋伏；如果一旦与敌人遭遇，那就不惜牺牲，争取把前面的敌人消灭掉！”大家都同意廖政委的意见。为了争取时间，决定全师向后移，前队改做后队，由郭师长带领十八团走在前边，廖政委带师直属队和十六团为本队，十七团担任后卫。

部署既定，马上快步出发。先头红十八团一路跑步前进，快到预定地点时，后边两个团已落下好长一段距离。红十八团是全师的前卫，目的就是让它占领左面山地，首先接敌。如果十八团早到一步，预先占领有利地形，守候敌人，吃掉敌人个把营不成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敌人的脚步也非常快，红军尖兵连刚刚转

过山脚，即和敌人的先头部队走了一个面对面。看来一场遭遇战不可避免！尽管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红军手里，因为红军是有备而来，而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红军会在这里杀它一个回马枪。尖兵连从正面用手榴弹一阵猛轰，另一边很快就抢占了左面山头的有利地形，压到了敌人的头顶上；第三个连跑步从右侧迂回。只听得一声“冲啊！”三个连同时行动，把目瞪口呆的敌人冲了个一塌糊涂。除了前边炸死炸伤的和后面跑掉的，至少一个整排顺顺当当地当了俘虏。

敌人的先头部队缩回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见动静。战场上的寂静是最急人的，它预兆着将有一场艰苦的大厮杀在后边。果然，敌人清醒过来后，便开始反扑，连续对红军阵地进行了十多次冲锋，最多时是4个团的大规模集团冲锋。英勇的红军战士以机枪、步枪、手榴弹、滚木、插石和刺刀，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凶猛进攻。

战斗最激烈，防守最吃力的要数红十八团。因为敌我双方的地势差不多，前边的敌人打倒了，后面的虽不敢立即冲上来，但是借着密集的树丛作掩护，却也没有退下去，稍一喘息，就又爬了上来。有时竟冲到阵地的前沿，迫使红军不得不与敌人进行肉搏，以至双方都有很大伤亡，红军阵地空缺越来越多。

天色将黑时，敌人竭尽全力发动了一次进攻。敌人这种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做法，正是它虚弱的表现。但敌人凭借强大炮火的掩护和优势兵力，顽强地进攻。就在战斗最紧张的关键时刻，贺龙又派红五师前来增援，归六师指挥，郭师长兴奋地对总部参谋说：“太好了！你立即快马加鞭告诉红五师跑步迂回到敌人侧后。15分钟后在敌人的背后打响！”这时敌人已冲到了红十八团阵地的前沿，双方拼起了刺刀；接着红十七团阵地上也展开了肉搏；红十六团子弹打光了，正在用枪托往下打敌人。突然，红五师在敌人背后发起了猛攻，一直冲到敌指挥所的跟前。敌人被这突如其

来的打击搅乱了神经，全线后撤。红军阵地的战士们一看，马上端起刺刀跟踪追了下去。有一个湖南战士，一条胳膊负了重伤，这时也咬着牙，手里握着一把刺刀摇摇晃晃地冲下山去。

六甲战斗激战一天，给樊崧甫纵队以重创，从此不敢穷追红军。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功山以南地区的狂妄计划，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当红六师、五师结束战斗，赶上大部队后，贺龙亲自跑出来迎接，对六甲战斗高度评价：“同志们！你们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很顽强，打得实在好！没有你们这一场苦战，全军就没有今天。同志们，好好休息一下，好好吃一顿饱饭，准备打过金沙江去！”

由于普渡河已被敌人封锁，红军已不能按原计划在此过江，遂决定改变路线，选择最偏僻的一条路线，即从金沙江上游的丽江、石鼓一带渡江，并电告红军总部，请派部队到江边接应。

怎样才能渡过金沙江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聚在一起研究对策，一致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能否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对此，贺龙提出在蒋介石的3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以甩掉滇军主力。贺龙说：“现在有一个渡江的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抢在樊崧甫、李觉、郭汝栋围拢上来之前，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了，把牌押在普渡河，他那个省会昆明成了空城。他要唱空城计。我们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子小。我看，我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吓得魂灵出窍。把兵调回昆明。这时候，我们一掉头向西，就能甩掉滇军，起码争取到3天、5天机动时间。这样，我们可以到石鼓、丽江去过金沙江。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要到元谋去过江呢？天下地方大得很，我们走我们的，不跟它纠缠。”

贺龙的这个大胆而巧妙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佯攻昆明的方案就决定了。

说打就打。六甲战斗后，红二、六军团复折兵沿普渡河南下穿过孙渡、张冲两部之间的空隙，直逼云南军阀龙云的老巢昆明。4月10日，先头部队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突然出现在昆明以北地区，并派小部队前出距昆明15公里之处。第二天，红前卫六师攻克距昆明约20公里的富民县城，全歼守敌1000余人，然后摆出一副即将攻打昆明的架式。

这可吓坏了顾祝同和龙云，尤其是龙云更是惊恐万分。这是他的老窝，要是被红军占领了，他便什么都没有了。昆明全市戒严，一片慌乱。龙云一方面把军官学校的学生拉出来守城，一方面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孙渡、张冲回援昆明。

滇军急如星火般地朝昆明赶来。红二、六军团却在贺龙指挥下，趁机回师涉渡普渡河，向滇西急进，使敌人完全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局面。

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不顾敌机骚扰轰炸，昼夜兼程向江边进发。沿途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一些反动地方武装防守，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每天占领一座县城，以破竹之势横扫滇西。4月1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告朱德、张国焘说：“我们决定采取鹤庆、丽江中间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7天到10天迟到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

直到这时，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的大当。但敌人又不甘心让红军溜走，所以继续调兵遣将，追堵红军。孙渡、李觉、樊崧甫三纵队奉命尾追；郭汝栋纵队从元谋以北渡过金沙江，向华坪、永仁方向急进，企图先占领金沙江北岸，阻红军渡江；蒋介石亲自乘飞机到金沙江边的宾川、鹤庆、丽江一带勘察地形，空投书信给孙渡，鼓励所属部队为他卖命，并电令李抱冰部从雅江南进，阻红军渡江北上。敌人再一次梦想在金沙江南岸至鹤庆、丽江的狭小地区内围歼红军。但是，由于敌人行动迟缓，更确切地说，由于红二、六军团动作神速，佯攻昆明调敌成功，把敌人远远地抛

在了后面，为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赢得了宝贵的几天时间。顾祝同气得只有骂娘的份！

4月19日，红二军团袭占祥云城，俘敌民团千余人，经过教育，大部分参加了红军。24日，红军前卫部队进占丽江，胜利到达了金沙江边的石鼓镇，两军团人马陆续到达。丽江之敌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早已闻风而逃，纳西族和其他各族人民，手举写着“丽江民众迎红军”、“欢迎义军”等标语口号的小红旗，热情欢迎红军的到来。

丽江，位于滇西北高原，周围群山环抱，北有高入云天的玉龙大雪山，南有富饶的平川坝子。丽江城依山傍水，高低错落，风光分外秀丽。丽江县的石鼓镇，是金沙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金沙江由北向南，从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间奔流而下，到石鼓镇又急转向北，回流200里，形成一个“V”字，这就是著名的“长江第一湾”。

石鼓渡口，江面宽阔，水势相对平缓，宜于摆渡。相传三国时诸葛亮“五月渡泸”，元世祖忽必烈“革囊渡江”，都是选择这一带作渡口的。旁边有一块又圆又扁，大有数围的青石碑碣，形状如鼓，面江而立，人称“石鼓”，该地因此而得名。

石鼓镇的对岸，驻有反动地方武装，凭碉扼守，封锁着渡口。但敌人没有料到红军来得如此迅速，认为至少还得两三天才能到达江边，因而防守比较松弛。

要渡江，必须首先夺取对岸渡口，并且解决船只等渡河工具。前卫六师担任了夺取对岸渡口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挑选水性好的干部战士组成3个突击队，泅水过江，分担任务。当晚11时左右，突击队开始渡江。为了避免水响，突击队员们一律踩水前进。共青团员小李因连续急行军过分疲劳，不慎掉进了漩涡，“啊”了一声，暴露了目标，招来了敌人轻重机枪的射击，小李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突击队员们冒着敌人密集的

子弹，奋勇地劈波斩浪，终于到达对岸，迅速地消灭了敌人，攻下了碉堡。

红二军团主力用几条小船及门板扎成的木排、竹筏，在这里络绎过江。由于船少人多，渡江速度很慢。红六军团为争取早日过江，便转到另一渡口——巨甸。巨甸渡口同样缺乏渡河工具，只有一条可载40人的渡船，很多战士是抱着木头过的江，一根大木头拖在船后可带20多人。那些会游泳的战士，是拽着骡马的尾巴过的江。

在当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下，经过三昼夜的奋战，到28日黄昏，红二、六军团全体指战员1.7万人，终于在从巨甸到石鼓100多里长的江面上，分别从木瓜寨、木秋地、格子、茨柯、巨甸等渡口，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一些纳西族青年参加了红军，跟随队伍一起北上。红军战士隔江高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快拣起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请功吧！”

红军渡过金沙江3天后，蒋介石的飞机才到石鼓、巨甸一带寻找红二、六军团的踪影。蒋介石的“围歼”美梦和一年前中央红军来到皎平渡时的结果一样，转瞬便成了泡影。

红二、六军团尽管在丽江地区只呆了几天时间，但却给当地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红军渡江的时候，贺龙、任弼时等来到江边，满怀豪情，手击石鼓，嘲笑了梦想消灭红军的蒋介石。他们过江后，纵马飞驰，沿着玉龙大雪山，胜利北上了。

红军走后，在丽江、石鼓一带的纳西族人民中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动人的歌谣：

贺龙敲石鼓，  
红旗满天舞，  
天兵飞渡金沙江，

嘲笑当年元世祖。<sup>①</sup>  
 纳西穷人见太阳，  
 不管那“木天王”府。<sup>②</sup>  
 龙云队伍像豆渣，  
 夹尾逃窜像灰鼠。  
 纳西人跟着闹革命，  
 管理江山来作主。

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大获成功。红二、六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后，立即向总部报告，朱德总司令和红四方面军发来贺电：

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贺龙、任弼时指示政治部：“立即将这个电文迅速传达到全军！”贺电向部队传达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广大指战员热烈盼望两大主力红军即将到来的胜利会师，从而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向北挺进。

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宣告了敌人南北夹击、妄图聚歼红军于金沙江南岸计划彻底破产，预示着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已为期不远了。

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于4月中旬以四军及

① 元代忽必烈曾从此处以羊囊（皮筏）渡金沙江，完成了对南宋的包围歼灭战。

② 木天王：即世袭丽江土宣慰司。为纳西族历代的统治者，丽江城中有天王府。传说江边石鼓是明朝嘉靖年间，木天王（高）进军土蕃凯旋，镌刻凯歌记功于其上。



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进攻雅江。16日，攻占东俄洛，19日，进逼雅江，守敌两个团闻风逃窜，三十三军在追击中歼其一部，占领雅江城。接着又占领了西俄洛，将康定之敌阻在雅江以东的地区，阻止了李抱冰部的南下，保障了红二、六军团北上道路侧翼的安全。5月中旬，三十三军向西发展，攻占理化，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

此时，追击红二、六军团的敌人由于过度疲惫，无法克服藏区物质条件和高原地形方面的困难，所以都怅然而止；湘军为保存实力，更不愿人康远追与红军作战。这样，敌人不得不改“追剿”为防止红军南返的部署。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即沿着秀丽壮观的玉龙大雪山西角、金沙江东岸北进。这一带属青藏高原，都是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在这样的地区行军作战，其困难可想而知。

红二、六军团在格罗湾一带休整了3天，以便做好过雪山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调查当地的地理条件、气候特点和过雪山的注意事项，向群众购买棉花、粮食、辣椒、生姜、急救药品等必备物资。但由于当地居民稀少，地瘠民贫，筹集的物资很有限。然而，这里不是目的地，困难再大也要继续前进。

贺龙、任弼时率二、六军团开始了征服玉龙大雪山的壮举。贺龙拿起望远镜，朝山顶望了一下，只见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刺得眼睛胀痛。他用手揉了揉眼睛，挺起胸脯，打起精神，挥手号召广大指战员们说：“上！”

长长的人流，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越攀越高，山势也越来越陡。贺龙的马平素不是驮东西，就是让给伤病员骑。而这时，马也无能为力，它自己还要人前拉后推才能走。贺龙手里拄根木棍，随部队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攀登着。特别是到了永久积雪区，气压急剧下降，呼吸十分困难，每走一步

都要费很大力气。

山上气温很低，终年积雪，有的深达10米以上。这里是西北高原气候和南部亚热带气候交接处，天气像小孩的脾气，变化无常，素有“十里不同天”的说法。有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有时寒气袭来，大雪纷飞；有时，狂风大作，卷起一块块雪团，可以填平一个山谷。夏天的太阳炽热，向阳坡上冰雪消融形成一道道溪水往下流；阴坡不见阳光，仍然是晶莹透亮的冰山。

有一次，贺龙正率队伍在陡坡上行走，突然远处飘来一团乌云，狂风随之而来，直刮得山旋人晃。本来行走就很艰难，这时几乎无法前进。贺龙大声对战士们说：“我们红军是铁打的硬骨头，来，大家把手拉在一起上！”于是战士们手拉手，向高处攀登。大风过后，暴雨夹着冰雹又来了，衣服打湿后，很快结成冰块，走起路来咯吱咯吱直响。贺龙开玩笑地说：“看，我们都穿上了铠甲，刀枪不入，赶快前进喽！”战士们在贺龙的鼓励下，信心十足地继续前进。但脚底下是冰，滑得很，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山谷之中。

雪山难爬，但难不倒铁打的红军英雄汉。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部队终于在5月1日到达中甸及其附近地区。

红二、六军团自退出黔、大、毕地区后，一直处于紧张的长途行军作战之中，尤其是渡过金沙江后，几天艰难的雪山行军，入困马乏，粮食不济。所以，红二、六军团领导原准备在中甸作短期休整，恢复体力，补充粮草，扩大红军，然后北进。但是没有料到原来寄予很大希望的中甸是一个只有几百户藏族的聚居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时向广大干部战士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要求部队没有房子住也不允许住喇嘛寺。最初，藏族同胞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恶意煽惑的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大都藏匿起来，街头巷尾空荡荡的，少见人影。但藏族同胞亲眼目睹红军纪律严明，秋

毫无犯，知道这是一支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的仁义之师，纷纷把粮食等物品卖给红军，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

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人，带头模范遵守革命纪律。贺龙在中甸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文告。文告宣布：

本军以扶助藏军，解除藏民的痛苦，兴藏灭蒋，为藏民谋利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川康，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沿途藏民安居乐道，勿得惊慌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sup>①</sup>

在中甸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曰归化寺，是中甸的实际统治中心，僧侣众多。他们虽没有逃走，但寺中最高僧侣松木活佛严令众僧侣紧闭寺门，防范红军。为了缓和红军与归化寺僧侣之间的紧张关系，消除误会，贺龙在中心镇经常亲自接见归化寺的谈判代表夏拿古瓦，<sup>②</sup>给他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红军取道北上抗日的重大意义，并以个人名义向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请他捎去。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掌八大老僧台鉴：

（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叭寺所有僧侣生命

① 萧华：《忆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1983年第8期。

② 夏拿为其姓，古瓦为职务名称，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服，在喇嘛寺中是一种低级职务。

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常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食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金钱。（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贺龙<sup>①</sup>

夏拿见红军首长如此平易近人，通情达理，回归化寺后如实向老僧们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喇嘛寺僧侣见到红军尊重少数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非常感动。他们主动与红军改善关系，帮助红军解决了不少粮食，并破例举行“跳神”（这是藏族地区最隆重的活动之一，每年冬月举行一次，是庆丰收和吉利的一种表示）盛会，欢迎红军代表。

贺龙等欣然接受邀请，率领红军代表40余人应邀入寺，并向喇嘛寺献了哈达。在欢迎仪式上，贺龙代表红军广大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我们是为各族人民的解放来到中甸地区。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还要北上，到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喇嘛寺对红军的支持与帮助很大，我代表红军指战员对贵寺表示诚挚的感谢。贺龙讲完话后，又把一幅亲自书写的“兴盛蕃族”锦幛赠送给喇嘛寺。然后红军代表与藏族僧俗民众一起举行“跳神”活动。

在中甸，红军通过向藏民调查，进一步了解了西康地区和雪山的情况，进一步做了过雪山的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

根据红二军团总部的要求（其实是张国焘个人的意见，目的是为了离间和分化二、六军团），同时也为了减轻沿途供应方面的困难，从5月上旬开始，红二、六军团分两路先后由中甸出发北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德荣（今得

① 《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荣)、巴安(今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萧克、王震率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今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化(今新龙),同时向甘孜前进。

由于红二、六军团在中甸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物资,部队没走上几天,粮食就被吃光了。战士们靠吃树皮、啃草根充饥,行军近两个月,历尽千辛万苦,于6月底翻过雀儿山,到达四川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

## 第五章 滚滚洪流向北方

### — 甘孜沸腾了

从1936年5月上旬开始，红二、六军团先后从中甸出发北进。在西康地区，红二、六军团没有碰到国民党正规部队的阻击，但却经常遭到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组织的反动藏骑的袭扰。藏骑熟悉地形，动作速度快，有一定战斗力。红二、六军团还没有组建骑兵，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所以开始时有些难以应付。但红二、六军团毕竟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在找到藏骑弱点，狠狠地打击了几次之后，反动藏骑袭扰红军的次数明显减少。

最难以克服的困难仍然是过雪山。从中甸到甘孜需要翻越好几座大雪山。红二军团在前进路上连续翻越了3座大雪山，红六军团翻过了两座大雪山。他们在翻越这些大雪山时，遇到了中央红军爬雪山时所遇到的同样困难。

雪山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红军来到山脚下时，正值炎热盛夏，大汗淋漓；行进到山腰时，只见莺飞草长，山花烂漫；在山的北阴处，清风徐徐吹来，凉爽如秋；再往山上攀登时，则满目白雪皑皑，寒风砭骨。高山上积雪厚达一二尺，风又大，坡又陡，行动极其艰难。

红二、六军团指战员多数是南方人，对这种“六月飞雪”的高原气候极不适应。在中甸时，红军各部虽曾千方百计地筹集衣服、粮食、火镰等物，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准备。但是由于地处荒僻，产物甚少，故仍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面对严重的自然困难，各级党组织发挥了坚强的领导作用。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思想互助

和体力互助；党团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动员一切马匹驮运伤病员，加强收容工作，等等。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最终战胜了雪山险阻。但是由于恶劣的环境和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红二、六军团的数千名忠诚的红色战士由于饥寒交迫，体力衰竭，经受不住高山酷寒和风雪的袭击，不幸溘然长眠在雪山之中。

在离开中甸时，虽然得到了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援，但这里毕竟太穷，粮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没走几天粮食就吃光了，红军战士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胜利，忍着饥饿前进。沿途藏民，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欺骗宣传，纷纷逃避躲匿，把牛羊都赶跑了，门上还贴着封门的“神符”。红军粮食奇缺，屡次断炊。但无论怎样困难，红军铁的群众纪律不能违犯。任弼时曾动情地对指战员们说：“我知道现在同志们饥寒交迫，但我们是天下穷人的队伍，维护群众利益是我们的天职。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红军的群众纪律，决不自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1936年5月10日，红二军团前卫部队进占德荣。13日，红二军团全部人马到达德荣县城。干粮袋早已空空的战士们，把筹粮的希望寄托在这里。但到这里一看，却大失所望。这里的藏族同胞受反动派的胁迫，已经逃避一空，只留下一些空荡荡的房子。但为了生存，必须解决粮食问题。贺龙亲自到前卫四师抓筹粮工作。关向应政委亲自对政治机关派到各师帮助工作的同志交待：各单位把现有的粮食集中起来，明天出发前一定叫部队吃上一顿饱饭；行军中加强收容工作，保证全部人员都到达目的地；到喇嘛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单位要有组织地去筹粮，筹完粮要登记留条，筹集的粮食要上交统一分配。关向应政委还特别要求各级干部：“困难当头，要身先士卒。”

关向应对侦察员找来的喇嘛，和蔼可亲地说：“我们是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我们路过这里断了粮，听说附近

有喇嘛寺，想去借点粮，但是找不到路，请你给我们指点一下。”在关政委耐心教育下，喇嘛答应为红军带路去喇嘛寺。喇嘛寺内果真有大批的大米、白面、青稞、糌粑，但是主人不在，他们听了反动宣传之后逃跑了。关政委就让战士们留下足够的白洋，把一封感谢信，连同一份粮食清单一并交给当向导的喇嘛，再三对他说：“寺院里没有人，只好请你把钱物交给这里的主人，并请你替我们向主人道歉了。”红军的严明纪律及和气态度使这位喇嘛深受感动。是啊，如果是国民党的军队，人可以随便抓，粮可以到处抢，哪受过红军对他的这等礼遇呢？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由于红二、六军团指战员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尽力维护群众的利益，终于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欢迎。后来在行军路上，常有藏民向红军献糌粑，送酥油；有的藏民把自己的奶羊牵到路边，一定要给战士们挤奶喝；有的用牦牛为红军运送掉队的伤病员；有的主动为红军带路，当“通司”（向导）。对那些积极协助红军工作的藏民，贺龙亲自为他们颁发了委任状，要求全军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和帮助。因此，藏族群众不断地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红军“耶莫！耶莫！”<sup>①</sup>

后来，在巴塘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我的家乡在柳树林中，  
看到柳树发绿就想起我的家乡。  
我的朋友贺龙像太阳，  
看见了太阳就想起了贺龙。

贺龙和红军在藏族人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美好啊！

<sup>①</sup> 藏语，“好”、“顶呱呱”的意思。



在红二军团之后，红六军团也于5月9日从中甸出发北进。14日进占定乡县城。由于刚越过雪山，人困马乏，粮草缺乏，故部队在这里休整了6天，一方面对红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筹集粮草，为继续北上作准备。红军还在这里召开了六军团积极分子会议，王震政委在会议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使部队更加意气风发地向前进。

5月20日，红六军团继续北上，经水洼、百根、桑川等地，于22日进占稻城县。一天早晨，部队正要准备出发时，王震政委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到队伍前面，他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四方面军就在甘孜，他们已派三十二军接我们来了。同志们加把劲，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去！”六军团的同志们听到这一好消息后，兴高采烈，欢腾雀跃，大大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6月3日，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十六师，在萧克军团长、王震政委的率领下，在理化南的甲洼首先与远道前来迎接的，由罗炳辉军长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第九军团）会师，揭开了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序幕。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徐向前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sup>①</sup>会后，各部队广

---

<sup>①</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页。

泛地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热情地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捻毛线，织毛衣毛裤，缝制皮衣等。在地方群众中，也普遍进行了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宣传教育。

为了迎接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也普遍地进行了团结友爱、遵守纪律以及会师前后注意事项的教育，整顿了军容风纪和个人卫生。

所以会师捷报传来，两军指战员都非常高兴。当时受张国焘迫害的原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晨得电我二、六军团之先头十六师由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于昨日与我三十二军会合于理化南70里之甲洼寺。近日来连得各方好消息，真是年来所未有的快事，所以近来心气亦较开阔，精神亦为之健旺。”

6月7日，红六军团向理化前进。在理化休整了几天，13日继续北进，于17日到达新龙，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整队欢迎，并召开了联欢大会。22日，到达了甘孜以南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6月30日，红六军团移驻甘海子（甘孜县属）。

在这期间，红二军团在绕过巴塘城，19日占领白玉县城后，也于30日到达甘孜西面的绒巴岔，与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第八十八师胜利会师，并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欢迎。中共中央立即发来贺电：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

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

革命战争。<sup>①</sup>

在绒巴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才知道朱德、刘伯承等已专程从甘孜出发，前来迎接他们。他们哪能坐得住？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他们赶去甘海子，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及张国焘等人会面。

绿油油的平川上，阳光明媚，水草肥美。到处可以看到藏族同胞放牧的牛群和羊群，到处可以听到悠扬动听的牧歌声。路两旁常有藏民骑着马，手捧糌粑酥油，表示欢迎，口里不停地念着：“耶莫，耶莫！”

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心里已经充满了喜悦，何况，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还远道来迎。现在，他们的心境，就像这川西高原一样，晴空万里。心情好，话也就多，他们并辔面行，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任弼时不知想起了什么，问贺龙：“老贺，你认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吗？”

“认得。南昌起义时就认识了。我还同他发了脾气呢！”贺龙回答说。

任弼时好奇地问道：“喔，为什么？”

“那时，他以中央代表身分来阻止起义，我看不惯。我还不是党员，不买他的账也没关系，哈哈。”说着，贺龙爽朗地笑起来。

“哈哈，你啊！”任弼时也笑了起来，“这么说，你对我们这位总政委有所了解喽？”

“那是啊！我在瑞金入党以后，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整天混在一起，到了潮汕失败才分手喽。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红四方面军去了。”贺龙说。

---

①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任弼时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对这位总政委可没有你这么了解呀！”

……

说着说着，已经到了甘海子。朱总司令远远就迎了上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赶紧下马迎了上去。朱总司令穿着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踏草鞋，还是那样朴素。他声音嘶哑，脸庞更加黄瘦，颧骨微微突出，这显然是近来和张国焘艰苦斗争的结果。现在，他显出少有的高兴，老远就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任弼时的手说道：“你们终于来了，欢迎，欢迎！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了！”

任弼时会意地笑笑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

贺龙走上前，热烈地和朱总司令这位南昌起义时的老战友握手，并爽朗地笑道：“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理！”

朱总司令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接着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握手的是刘伯承。这位红军的总参谋长，驰名中外的战略家，戴着一副眼镜，脸庞十分瘦削，他微笑着，操着四川口音道：“朱总司令盼望你们，连觉都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现在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你们这一路走得漂亮，打得也漂亮，你们带来了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

贺龙笑答：“走路打仗家常饭，算不了什么。”

首长们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张国焘也来了，他40来岁，浑身肥胖而皮肤光滑，说话阴阳怪气的，笑得也不大自然。在恭维了贺龙、任弼时等一阵之后，他手一摆，高声请大家到指挥部去赴宴。

宴会办得非常丰盛，各种菜肴摆了满满几大桌。表面上看来气氛很热烈，但一场激烈的斗争已从这里悄然开始了。

张国焘连连祝酒。他高举酒杯说，今天是正式会师之日，我建议在座的同志，为我们两大主力会师甘攸而干杯！

任弼时坐在朱德总司令的旁边。他站起来也举着酒杯说，今天是党的生日，我建议为我们党的钢铁般的团结，为党的神圣事业而干杯！张国焘在一片碰杯声中迟疑了一下，流露出内心的紧张。张国焘的这种紧张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加强了坚持正确路线一方的力量，而他也难以再施展伎俩，去欺骗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了。

当天晚上，朱德、刘伯承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进行了彻夜长谈。甲洼会师后，王震曾向贺龙等汇报过张国焘的一些不正常活动，但这次谈话，使贺龙他们大吃一惊。

朱德告诉他们，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冒着大雨欢迎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而他却态度傲慢。为了统一认识，实行北上的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28日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先取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

说到这里，朱德拿出两份文件，指着其中一份说：“这一份就是两河口决议。哪个晓得，张国焘是反对的呀！这一份是后来的毛儿盖决议，你们可以看一看。”

朱德接着说，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7月6日，中央派伯承同志，还有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并帮助传达两河口决议。谁晓得，张国焘却提出了一个与中央决议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的主张，并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的军阀逻辑，让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不然就无法集中领导，顺利消灭敌人。也许

张国焘以为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不把只有一二万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这不是想夺取红军的指挥权吗？党中央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利益为重的原则，耐心地对张国焘争取教育，任命他当了红军总政委。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的计划，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共同向甘南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开会，就上述方针形成了一个《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但是，当他们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却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已东进的红五军团返回阿坝，准备南下。他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团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几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北上才是出路，向南对前途极为不利。

到了9月份，中共中央再一次指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但是，张国焘置之不理，反而下令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他还在阿坝召开的中央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挂了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不行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颠

倒黑白地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美化张国焘的南下错误方针，认为是“进攻路线”。他们还煽动一些人围攻朱德、刘伯承，逼他们表态。朱总司令临大节而不辱，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与张国焘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到了10月份，张国焘已经再过草地南下，公然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自封党中央“主席”，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sup>①</sup>。他致电中共中央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还要给朱德、刘伯承的头上加许多头衔，意在收买，但遭到了朱、刘的严辞拒绝，并呼吁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结果，张国焘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去当红军大学校长。

张国焘发起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虽取得歼灭川军1.5万余人的胜利，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红四方面军南下东进皆已不成。这时候，又不断传来消息说，红一、三军团已与陕北红军会合，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部队指战员开始议论纷纷，认为不应当违背中央路线。中共中央又来电，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与“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要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张国焘走投无路，才被迫同意北上，最后退到了这里。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听了，十分气愤，贺龙“啪”地把他的烟竿摔在桌子上说：“这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

<sup>①</sup>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1页。

关向应问道：“这么说，我们一直没有同中革军委联络上呀？”

“是啊，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电台作了调整，与你们联系的电台调到红军总部，由张国焘管了。”朱德回答说。

任弼时苦笑一声说：“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了。”

朱德最后对他们说：“张国焘目前同意取消非法中央和北上，是不得已的，他还是反对毛、周、张、博的，他反对中央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他们是拥护中央，拥护北上的。所以，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团结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也就是如何想办法带他们去和中央会合。我就盼望你们来，和我一起做这项工作。现在力量加强了，有人不想北上已经办不到了。”

刘伯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南下打了败仗，西边又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事实证明是不对的。总指挥说得对，我们现在要多做团结工作，说服他们北上。”他看看贺龙，语重心长地说：“老贺，对张国焘可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你知道，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嘛！”

任弼时问朱德：“总指挥，张国焘要我们过金沙江，北上会合，他是什么意思呢？”

朱德说：“要你们渡江的电报是我和他共同签发的。不过，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可不一样。我让你们来会合，是想把你们那边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在这里一直很孤立。你们过了江，我们的气就壮了，北上的把握更大了。他的想法，无非是想拉拢和控制你们，增加他对抗中央的分量。”

刘伯承点头说：“你们可得小心，他很会搞这一套喽！”

贺龙一笑：“没有关系，我有我的办法。”

7月2日，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地区，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的标语，人丛中还不时发出阵阵响亮的口号声；



“热烈祝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向转战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战友们致敬！”

“向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学习、致敬！”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

在欢迎的队伍中，还唱着热情洋溢的歌：

看，战胜了一切！  
听，震动了全国！  
英勇弟兄们，  
伟大的会合。  
欢迎二、六军团，  
举红旗向前进，  
一定要胜利，  
杀敌齐努力，  
团结抗日反蒋的力量！  
推动中华民族的解放，  
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大踏步向前进，  
赤化全西北。

要艰苦的奋斗，  
要钢铁的团结，  
赤化全西北，  
创造根据地。  
为全国的胜利，  
为民族的解放，  
团结和一致，  
奋勇和坚决。

横扫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  
纵横无敌的弟兄们，  
抗日反蒋主力是我们，  
齐团结，齐奋进，  
胜利归我们。

甘孜地区的藏族同胞，也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甩着长袖，载歌载舞，夹道欢迎红二、六军团指战员。

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在经历了与一方面军分离的痛苦后，更感到与二方面军会合的珍贵。他们以满腔的热忱来迎接自己的战友，筹集了粮食、牛羊，腾出了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柴火，烧好了开水，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很好的驻地；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还送给二、六军团的同志们自己亲手赶制的慰问品毛衣或毛袜等，充分体现了两支兄弟部队之间的深厚阶级情谊，使红二、六军团的同志深受感动。贺龙对关向应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好啊！”

至此，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了。

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总司令身穿粗布军装，脚穿自编的草鞋，笑容满面地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朱总司令在简要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后，兴奋地告诉大家说：“毛主席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

也壮大了。”<sup>①</sup>

朱总司令坚持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坚持到陕北去与党中央会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讲话，给了全体指战员以深刻的教育，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会场上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也在会议上讲了话。后来贺龙回忆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嘛！”<sup>②</sup>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具有重大意义。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促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起了重大的作用。

## 二 贺龙、任弼时与张国焘的交锋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对一切拥护党中央，维护革命团结的人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对企图施展阴谋的张国焘来说，事情却没有如他想像的那样发展，相反却使他感到忐忑不安，凶多吉少。

1936年5月间，党中央为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军委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以

① 谭尚雄：《甘孜会师》，《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13～314页。

② 水工：《中国元帅·贺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进行西征战役。5月中旬，西征军相继出发，向陕甘宁边区前进，连克环县、定边、盐池、曲子镇、同心等城镇，有力地打击了这个地区的敌人马鸿逵、马鸿宾，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向对蒋介石独裁政府不满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变”，组织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反对蒋介石政府。蒋介石被迫将他的嫡系、陕甘“剿共”主力胡宗南部队从西北地区调往湖南。这样，敌人在甘南的兵力就势孤力薄了。

中共中央有鉴于此，连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乘隙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开创西北抗日根据地，以进一步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形成。但张国焘对抗中央的指示，准备继续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在青海、甘肃、新疆等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独树一帜，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但由于张国焘南下川康陷入困境，由于中共中央的严肃斗争，在红二、六军团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形势上，怕引起红二、六军团的反感与不满，不得不宣布取消了伪中央。6月3日，红四方面军发出通知：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恢复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旧制。

6月6日，张国焘在所谓“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虽然仍对中央进行攻击，但他被迫正式宣布：党“在组织上也完全归于统一了”；“我们在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张国焘成立8个月之久的伪中央，终于寿终正寝，宣告了其反党分裂活动的失败。

当然，张国焘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张国焘仍多次施展阴谋，妄图欺骗

和拉拢红二方面军干部支持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受到贺龙、任弼时、王震等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渡过了金沙江，进入西康地区。张国焘心怀鬼胎，企图利用红二、六军团远离中央的机会，欺骗与吞并之，共同反对党中央。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他利用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别有用心地电令红二、六军团分成两路向甘孜前进，并派出先遣队远道去“欢迎”，以便进行离间和分化。

甲洼会师后，整个部队欢腾鼓舞，心情激动，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部队兄弟般的团结。同党中央失掉联系的红六军团指战员，还以为这里就是中央呢！但是，很快事情就清楚了。

会师以后，张国焘马上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派出了一些“工作组”到二、六军团“联络”。他派陈昌浩来到红六军团总部。陈昌浩曾就读于苏联中山大学。1931年他到了鄂豫皖苏区，先后任第四军政委、第四方面军总政委、中共鄂豫皖分局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一见到王震、萧克迎面走来，很热情地迎上去握手。

“你们好！国焘政委向你们问好！”陈昌浩首先问候。

王震、萧克也问候说：“你好！”

随后，王震邀请陈昌浩到指挥部里去坐。陈昌浩同意并交待警卫员将车上几大包文件也送到屋里去。

“这是什么文件？”王震问。

陈昌浩答说：“中央文件。”在指挥部里，王震翻了翻那些文件，发现很不对头。这哪里是什么中央文件！全是“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必读》之类的小册子，王震感到疑惑不解。

陈昌浩笑着解释说：“为了使你们更清楚地了解当前局势，我们准备把这些材料发给你们的干部学习。”王震把一本小册子合上，严肃地说：“材料不能发！”毅然命令战士们将那些小册子全

收起来，一把火烧了。这样红六军团第一次击退了张国焘的试探性进攻。

贺龙、任弼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共署电令说：“做得对，不要发！烧得好！”

甲洼会师后，红六军团领导人参加了中共西康南路工作委员会会议，很快了解到张国焘搞反党分裂活动的情况，王震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了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贺龙、任弼时。

在绒巴岔，“工作组”的人对红二军团的同志们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不在张国焘，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是“错误”。贺龙、任弼时立即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任弼时特别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叮嘱：通知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介绍过草地的经验，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对中央、毛泽东和红一、四方面军的争论；政治部门一律不准下发红四方面军带来的任何文件。

当贺龙看到张国焘鼓吹南下、攻击中央北上的《干部必读》、《西北讲座》等小册子后，拍案而起：“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些小册子统统放在政治部，一本也不准发。谁也不准看，谁看了，要追究责任。”

贺龙知道“来者不善”，他立刻给红二、六军团各师首长打电话，下令说：“把你们接到的《干部必读》小册子统统给我收上来，烧掉。这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

这一斗争，下层也在开展着——

受张国焘派遣的一些人，打着“联欢”、“慰问”的招牌来到红二、六军团战士们的驻地。在红六军团的一个连队里，受张国焘派遣的一个人，大谈部队留在川康地区的必要性。说这里敌人力量薄弱，军委关于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决策是十分英明的……

这个连队的干部察觉对方的讲话不大对劲，站起来反驳道：

“这怎么能是军委的决策？朱总司令给我们说了，部队还要北上！”

几个战士也纷纷站起来发言：“对！那天会师大会上，朱总司令说得很清楚：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还要继续北上，朱总司令根本没说部队要留在这里！”“朱总指挥还说毛主席带着一方面军已经到了陕甘地区，说我们要去和他们会合！”

那个人见一开始就不顺利，知道多说无益，只好另外换了个话题，问起了红六军团以前的情况，谈了几句，就灰溜溜地回去了。

张国焘派到红二、六军团的人还进行游说宣传：党中央在这里。红二、六军团因久与中央失去电台联络，有些不了解内情的同志也以为这里就是党中央。但却疑虑重重：中央是毛主席在领导，怎么这里又钻出个张国焘的中央来呢？贺龙及时对红二方面军的干部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主席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sup>①</sup>

这场斗争还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

张国焘的确想控制红二、六军团，以增加他对抗中央的实力。他仗着人马多，装备好，又占有粮草基地，妄图以此来利诱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的红二、六军团；如果此计不成，则准备用武力吞并之。

张国焘亲自出马找红二、六军团师以上干部谈话。王震有一次在谈到红二方面军历史时说：“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不像话。”后来贺龙知道此事后，怒斥张国焘的这种鄙劣行径：“嘿，我以前在旧军队见得多了，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他也就是这么一套。”

<sup>①</sup> 《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1页。

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反党错误路线，贺龙曾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他当面质问张国焘说：“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要反对毛主席，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sup>①</sup>张国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是严重的。迁就他，就会使红军陷入严重的分裂，夭折整个中国革命；反对他，则有可能导致红军的内战，这种结果是中央所不希望看到的。此前有的同志曾气愤地要求率军攻打张国焘，被毛泽东制止。因此，应付眼前的形势，既需要有坚定的立场、敏锐的洞察力，又需要巧妙的斗争艺术。

红二、六军团的主要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度的识别能力，他们了解张国焘机会主义的历史，对他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贺龙是个从不愿打被动仗的人。对张国焘如此明目张胆地到二、六军团来搞阴谋活动，十分愤慨。他要反击。可是，朱德已经说了，目前主要是做好团结工作，带他们北上。那怎么办呢？他看到，张国焘之所以敢对抗中央、分裂红军，就是因为红四方面军人多，我们为什么不从这里下手呢？于是，贺龙准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削弱和分散张国焘的实力。他找到张国焘，对他说，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你这个总政委，能不能从四方面军抽两个师给我们？你们人那么多呢！张国焘弄不明白贺龙的真实意图，又无法驳回这种堂而皇之的要求，另一方面他还想拉拢红二、六军团，因此，未置可否。贺龙便经常就此事纠缠他，终于把原属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从张国焘那里要了过来。朱德后来对此评价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不多。张

<sup>①</sup> 《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8页。



国焘对任弼时、贺龙都有些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的确，贺龙是个胆大心细之人。这一时期，他处事十分谨慎，既要斗争，又要保持团结。1961年，他在谈起这一时期的斗争时说：

“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不过，张国焘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焘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小组，整天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人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子，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sup>①</sup>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时尚有1.4万余人。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正式成立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二军组成。原二军团第五师改编为第九十六师，划归三十二军建制。其编制序列和领导人为：

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红二军：军长贺龙（兼），政治委员关向应（兼），参谋长李达（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兼）。下辖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李并泉），第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

<sup>①</sup> 水工：《中国元帅·贺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红六军：军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周球保，政委晏福生），第十七师（师长贺庆积，政委汤祥峰），第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政委余秋里），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彭栋材）。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张平化。下辖第九十四师（师长萧兴怀，政委辛世修），第九十六师（师长王尚荣，政委谭友林）。

从此以后，红二方面军重新得到了中央革军委的直接指挥，张国焘妄图控制红二方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此之前，曾有较长一段时间，红二、六军团失去了与中央的无线电联络，虽双方都力求恢复直接通讯，但因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加上张国焘有意阻断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的直接通讯，因而无法实现。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通报时，突然有一个不知呼号、不明所属的电台插进来呼叫红二、六军团，经询问方知是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在亲自上机呼叫，当即约定了保持联络的有关事项。联络恢复后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是用明码，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在老四处……弟豪。这是周恩来（曾化名伍豪）给任弼时的电报，说明党中央已到陕北，原来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了。因没有密码本，怕长期通信泄密，中央指示暂停直接联络，所有电报都经红四方面军转达。

甘孜会师后，任弼时向张国焘要来了与中央通讯的密码本，红二、六军团才得以沟通了与中革军委的直接联络。直接联络恢复后，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就是授予红二、六军团以红二方面军的番号。同时，中央又发来了一份给任弼时亲译的长电报，大意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北上同中央红

军会合；要团结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并阐明北上的有利条件。”<sup>①</sup>这样，中央就把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任务和方针通告了任弼时，要他根据实际情况贯彻实施。

张国焘见贺龙、任弼时不买他的账，反对他的错误路线，就想以多数压少数，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在甘孜，张国焘先是提议召开党的联席会议，企图从组织上强迫红二方面军同意他的反党路线。任弼时看到了这一点，当即表示反对，他机智地向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开这样的会，由谁主持？报告哪个做？有了争论，结论怎么做？

贺龙支持任弼时的这一意见，他说：“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在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张国焘又提出召开两个方面军的干部联席会议，企图通过“决议”来拥护他。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提出，开会可以，但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又一次把张国焘顶了回去，会议又没有开成。

斗争还在另外的场合进行着——

任弼时还以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主动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谈话，宣传团结统一的重要意义，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朱德、刘伯承还请任弼时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作报告。他在讲话中，以极大的热忱说：现在北上之势在必行。由于抗日，全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我党我军应该前进而不应该退却。同时陕甘地区比这边好，有群众斗争基础，又可影响华北、中原。而甘孜地区，极不利于大部队活动，起码粮草就十分紧张。因此，我

---

<sup>①</sup> 江文：《红二、六军团与中央通讯联络的中断及恢复》，《军史资料》，1985年第3期。

们应该团结一致，坚决北上！

在任弼时的教育下，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认识到了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在《怀念任弼时》一文中说：“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你（指任弼时）的到来，才将叛徒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内所造成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加以逐步地澄清。你每次亲切地和我们在一起作长夜谈，都使我们衷心地愉快地领会你的精神。你那种和蔼诚挚的态度教育了我，并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张国焘对任弼时的正常工作极为不满，亲自出面干涉。任弼时严词予以驳斥，说：“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我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张国焘又一次碰了钉子。

斗争在上层更激烈地进行着——

为了研究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1936年7月2日，召开了两个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甘孜会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因在炉霍布置北上出发事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室里，首长们在会谈。门口布置了更多的岗哨，拒绝一般的人接近会场。

会场里不时传出任弼时那坚定的声音。据始终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回忆，任弼时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他批评张国焘盗用中央名义把红二、六军团调过来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张国焘辩解说：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有敌人跟着，和我们靠近一点，就可以威慑敌人，保持力量。这些理由看起来似乎冠冕堂皇，其实是张国焘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而进行的狡辩，毫无说服力。

其次，批评了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路线。任弼时说：“你的南下路线是错误的，这样做分散了红军主力，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把我们逼到草地里，粮没粮，草没草，吃没吃，穿没穿，给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你北上又南下，南下复北上，在草地里拉来拉去，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牺牲在这漫无边际的草地里啊？！”任弼时越讲越生气，“你张国焘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恶果，打算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纯粹是幻想。在川北都没能站住脚，又怎么能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呢？敌人教训了你们，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如果把这些力量用到陕北去，用到抗日前线去，那将会起多大作用！所以，现在其他问题不谈，我们现在神圣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和一方面军会合。”任弼时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中肯，张国焘没有反驳。

再次，他批评了张国焘自立中央。任弼时严肃地指出：“自立中央是严重的反党行为，是自绝于中国革命，是党纪所决不容许的。”针对张国焘那种蛮横无理，诋毁毛主席的恶毒言论，任弼时沉下脸说道：“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有最高信仰。”他警告张国焘说：“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现在你们已经宣布撤销第二中央，我们欢迎。”

最后，任弼时对形势作了精辟分析。他声音宏亮地说：“目前陕甘根据地形势很好，中央已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根据地有了发展，东渡黄河取得了胜利，西征战役正顺利进行。就全国形势而言，日本已占领了东三省，又虎视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使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央已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团结、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中国革命又处于高潮时期。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北上，与中央会合。这个会开了就应立即北上，到青海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任弼时发言慷慨激昂，富有感情，非常精彩。当张国焘谈到红四方面军有些干部北上对北上有不同意见，企图为自己开脱时，贺龙坚定地说：“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北上。我们二、四方面军团结起来，继续北上，与中央会合。三大主力会合以后，北方情况会有很大变化，可能中国革命的中心点要移到北方，在陕北根据地落脚，再向全国展开。南下是不对的，弼时同志已经讲过了，你们这样做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行为，给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广大指战员，是抵制你张国焘的错误的。四方面军同志编织了大量毛背心、毛袜送给我们二方面军，充分体现了兄弟部队的战斗情谊。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继续北上。”

朱德发言说：“我们原来就决定北上，张国焘同志一直坚持南下，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南下走不通了，天全吃了败仗，敌人跟得很紧，原来计划不可能实现了，只有一条路：北上，与中央会合。”

刘伯承、关向应等也发言，认为应该完全同意朱德、任弼时、贺龙的主张，坚决北上！

张国焘在他们坚定的态度面前没了章法。他知道贺龙的脾气，他更记起了1927年任弼时在武汉同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面对面斗争的一幕幕情景。那些会议，他张国焘也参加了，对任弼时的革命斗争锋芒，他是领教过的，在原则问题上任弼时从来不让步。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会上，尽管张国焘不愿意北上与中央会合，企图向夏、洮西北行动，但由于党中央、共产国际代表的不断敦促，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红军的团结，坚持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也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在他的南下分裂方针四处碰壁，日益孤立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的决定。张国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宣告失败。

甘孜会议，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促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起了重大作用。朱德高兴地说：“现在大家统一起来了，两个方面军一道北上，这是会议的一大收获，认识统一了，力量集中了，力量也更大了。”

虽然认识统一了，但斗争还以特殊的方式出现着——

曾经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过的廖承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他作为在押的“罪犯”，在部队的行列中行走，远远看见任弼时和张国焘在路边一个小土坡上打着手势，进行交谈。任弼时打量着这支队伍，忽然走上前来问：“这不是廖承志同志吗？我是任弼时。”

廖承志又惊又喜地点点头：“是，是我。”任弼时紧紧地和他握手，并问了他一些工作上，生活上的情况。见他一身衣服破破烂烂，又被武装人员押送，立刻显出惊异的神情，回头问张国焘：“这是怎么回事？”

张国焘张口结舌，支支吾吾，不好答话。任弼时郑重有力地对张国焘说：“请你告诉我，他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他。”

任弼时摆出和廖承志十分熟悉的样子。其实，他俩根本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但他在这个时候来“认”廖承志，而且还拖着张国焘一起，其用意十分明显。

不久，红四方面军内部一批不满、抵制和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而被他迫害的干部，在任弼时等的关切和干预之下，恢复了局部的自由。这其中就包括廖承志、罗世文等。

贺龙、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加强了朱德这位红军总指挥的发言权。张国焘被迫放弃他的主张，同意北上，标志着惊心动魄的甘孜斗争暂告一个段落。

当然，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张国焘的欺骗宣传，红二方面军

的个别同志也受了暂时的蒙蔽。萧克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当六军团6月3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sup>①</sup> 萧克这一段总结历史教训的话，表现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

### 三 并肩北上

甘孜会议之后，红二、四方面军开始了共同北上的战略行动。早在5月下旬，党中央就来电，提出了红四、二方面军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

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sup>①</sup>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sup>19</sup>

6月间，两广事件发生后，中央再次电示：四、二方面军出甘南最有利。

根据党的战略方针，朱德、徐向前等于6月25日作出了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松潘、包座一带前进的部署，并决定派李先念率八十九师和骑兵师组成先遣军，经西倾寺先出阿坝，为全军顺利通过草地作好物资准备。27日，许世友率领骑兵师先行出发，为后续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

6月2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颁布了《二次北上政治命令》，指出：“党目前的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策）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sup>20</sup>命令传达到各部队后，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兴高采烈，积极准备北进。

这次北进的部署为：集结在粮雀地区的红九军、四军十二师和独立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红四方面军总部为中纵队，由徐向前率领，由炉霍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开进；集结在甘孜地区的红四军十师和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及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总司令率领，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

19. 郑广瑾等：《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1页。

20. 郑广瑾等：《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5页。

佑前进；集结在绥靖、崇化地区的红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后卫支队，实际上是收容队，支队长张广才，政委何长工，副支队长余洪远。

根据朱德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这样，他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双重身分，亲自去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人的工作，也便于同红四方面军其他干部交流思想，了解情况，做团结工作。

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决定传达后，朱德总司令亲自部署和检查部队的准备工作。部队出发前两天，他来到了后卫支队。后卫支队有近3000人，摊子大，人员杂，有妇女队、担架队，七八个医院，1000多个彩号（有不少是师团两级干部），按规定团级以上干部一定要带走，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朱总司令在余洪远陪同下到甘孜设在尼姑庵内的医院，了解伤病员情况和出发的准备工作，并到病房看望了全体伤病员，鼓励他们要好好养病养伤争取早日痊愈。朱总司令指示医院，对“伤病员的生活要尽可能改善好一些，我们没有病没有伤的人要有革命的同情心，哪怕我们自己少吃一点，也要留给伤病员吃。要根据前段行军的经验，做好行军中对伤病员的照管工作。”朱总司令的到来，使伤病员感到巨大的温暖，激发了他们养病养伤、战胜困难险阻的勇气和信心。

7月1日，朱总司令亲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要他指挥部队“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良机”。2日，徐向前即率中纵队出发。3日，朱总司令率领左纵队开始北进，右纵队也随之出发北上。

离开甘孜，前面是更艰苦的历程。

从甘孜地区北进，沿途大部分地区是广漠的草原，地势很高，空气稀薄，气候多变，人烟稀少。尤其是从阿坝、毛儿盖到包座之间，是一段水草地，绵延约四五百里，需走5至7天时间。从

草地边缘抬头远望，只见遍野是茸密的青草，茫茫无边；到处是淤黑的水流，漫漫泽国，很多地方水深齐膝，有些地方，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颌。这里的水，有的尽管清澈见底，但却含有毒汁，不能饮用，走路划破腿脚，水一泡会红肿溃烂，难于医治。这里没有人烟，没有道路，方向难辨。有的地方，面硬而下软，地面上草茎交错，人马在上面走，就像手指弹豆腐一样，周围几十步的地面，全部颤动起来。走路时只能拣草根最密的地方走，一个跟着一个，一不小心，踏破地皮，就可能陷入泥中，如果不赶快救出来，就会越陷越深，被黑糊糊的泥浆恶水吞没进去。骡马陷入泥中，就很难再爬出来。这里气候多变，一天之中就可以过春夏秋冬四季，中午烈日炎炎，午后气温骤降，到了夜晚便寒风刺骨，俨如隆冬。刚刚是万里晴空，刹那间乌云密布；一忽儿大雨倾盆，一忽儿又风雪交加。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古诗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草地行军，恐怕比“上青天”更难。

许世友率骑兵师走在最前头。许世友是红军中的一员骁将，从来不知道困难为何物。他已经有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深知粮草对部队走出草地的重要，他决心“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筹集到更多的粮食，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草地”。

第一天，在色曲河畔向牧民们购买了400多头牛、1000多头羊和一部分粮食。当时反动土司占有大量的牛羊和粮食，但不愿卖给红军。相反，晚上还派反动武装来袭击红军。许世友立即指挥部队出击，一个冲锋就打垮了他们，抓了几个俘虏，了解到了反动土司的牛羊转移点和窝藏处。红军连夜搜索，按照“破坏抗日红军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把反动土司的800多头牛羊全部收缴归红军。

随后，红军骑兵师在西倾寺、壤塘等地，又筹集了3000多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于7月13日抵达阿坝地区。阿坝的土司头人

叫墨桑，非常反动。他有几千人的武装，武艺高强，枪法很准。他获悉红军将经过阿坝北上，即将当地群众赶走，把粮食和牛羊全部转移到外地。骑兵师在阿坝找到了两个藏民，了解到一些情况，搜索到 600 多头牛羊和 1 万多斤粮食，但未发现土司武装。

原来，土司武装已转移到阿坝通查理的要道麦加尔康、觉儿黄、赛苟共巴地区，准备在这里阻击红军。15 日黄昏，红军骑兵师东进到这一地区时，发现 1 公里外驻有土司武装约四五千。红军骑兵师经过长途征战后减员很大，敌人数倍于我，强攻自然不行。但这股敌人是红军北上的绊脚石，必须搬掉，怎么办呢？许世友决定乘敌人没有发现红军之前，进行奇袭，靠智取战胜敌人。敌人没有估计到红军骑兵师会到此地，所以几乎没有戒备，围着火堆躺在地上，马匹零散地拴在周围。红军骑兵师在夜深、敌人正熟睡之时隐蔽地接近敌营地，先是向敌营火堆甩出一排手榴弹，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受惊马匹踩得哭爹喊娘，而大部分敌人在红军战士们的马刀下毙命。这一仗缴获近百匹马和一批枪支弹药，这是红四方面军骑兵师组建后打得最大也是最顺利的一仗。

骑兵师乘胜前进，在安曲留了 1 000 多头牛羊给后续部队。随后渡过葛曲河，踏进了松潘大草地。由于士气高昂，又有过草地的经验，较顺利地走过了草地。红军骑兵师沿途经过 72 次大小战斗，筹集了两三万头牛羊和几万斤粮食，虽然这支部队最后只剩下 200 多人，但胜利完成了“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任务，为主力红军通过草地作出了贡献。

红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经验比较丰富，准备也比较充分。但是因为路程远，行军时间长，所带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部队仍然遇到了严重的缺粮困难。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困难，团结互助的精神，粮食不够，匀着吃，以野菜、树根、皮带、牛皮来充饥，终于再一次征服了草地，于 8 月 1 日到达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的第一步胜利。

继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分成两梯队，于7月上旬从甘孜出发，沿左纵队<sup>①</sup>行进路线，经日庆、西倾寺、绒玉、阿坝、包座向哈达铺前进。

红二方面军是首次过草地，尽管他们也作了认真的准备：深入地进行动员，学习党中央的指示，讲明过草地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号召大家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克服困难，走出草地，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物资方面，在筹集粮食，准备衣服、草鞋、干柴、帐篷等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因为红二方面军是全军的后卫，饥饿问题更严重地威胁着他们，而张国焘的干扰更加重了这一困难。贺龙回忆说：“到绒巴岔，（张国焘）答应给我们衣服、粮食、补兵。当我们不同意他的路线时，什么都没有了，要饿死我们，困死我们，他们先走，都把东西带走了。”<sup>②</sup>从甘孜出发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筹措到七八天的粮食，原预计10天可到达阿坝，但由于刚走出极艰苦的雪山地区，体力受到严重消耗，尚未完全恢复；沿途荒无人烟又无法补充粮食，结果走了20多天，到7月下旬才先后到达阿坝。部队在青海班玛县、阿坝，尽管全力筹粮，但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

朱总司令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红二方面军。在甘孜，由于朱总司令的努力，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情红二方面军，主动给红二方面军留下了部分粮食，帮助解决了部分困难。

为了保证对后续部队的供应，在葛曲河设了一个兵站，负责对部队分发牛羊，由总部四局杨以山负责。朱德来到兵站郑重地对杨以山说：“同志，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后卫还有几万红军，总指挥部决定将四方面军直属队所有驮帐篷、驮行李的牦牛留下来，供应后续部队。从这里走出草地还得六七天，咱们每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一斤，其余的都留下。否则，后

①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卫部队就过不了草地。”朱德强调说：“羊子杀了用开水烫，牛皮用火烧，肠肚也要吃掉。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肠肚可不能丢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

接着，朱总司令站在一个小土坡上，对四方面军直属队的同志们说：“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自从甘孜出发以来，同志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大家每天勒着裤腰带行军，很艰苦啊！我也想让同志们杀一两头牛羊，改善一下生活。但是现在不行，这是因为我们整个部队正处在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在我们后边，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他们的粮食早就很困难了，尤其是二方面军的同志，他们大都是从南方过来的，对草地的自然气候不习惯，又在我们的后面，生活更困难，常常连野菜也吃不上，想想他们，这牛羊该不该杀？”大家齐声说：“不该杀！”

停了一下，朱德继续说道：“对，我们要咬紧牙关，把困难自己承担起来，尽可能为后续部队提供一些方便。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困难只会在我们面前低头让路，草地也终将被我们所战胜！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到达陕北，去和毛主席会师的。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都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也全给二方面军留下……”四方面军指战员真是好样的，不等朱总司令把话说完，就激动地欢呼起来，自觉自愿地纷纷把牦牛身上的东西卸下来，把牦牛交给了兵站。

可惜的是，由于敌人骑兵的突然袭击，这些牦牛被抢走了不少。真是有点雪上加霜！

正如朱总司令所说，红二方面军在大草地中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粮荒，开始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三两青稞粉，尽管被雨水淋过的青稞粉变成硬疙瘩，非常难吃，但尚能充饥，到后来干脆断了粮。自然环境如此恶劣，红军能否走出草地，贺龙作为总指挥责任重大。他号召各级政治机关在部队中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开展群众性的思想和体力互助，提出“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口号鼓励指战员。

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想尽了各种办法：严格节约粮食，互相调剂，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优先照顾伤病员；粮食吃光了，把牛皮、牛羊骨髓煮熟烤焦充饥；挖野菜吃；用树枝、扁担作钓杆，用粗绳、绑带作线，把针烧弯作钩，用点臭牛肉做饵，到河里钓鱼充饥。有时甚至连马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也挑出来洗净再吃。更有一些说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是当事者不愿意说，而人们也不便再听的！

在部队最困难的日子里，为了给部队找吃的，贺龙冒着中毒的危险亲尝各种野草，充当“神农氏”。兵站分给他的食物，他坚决不要，说：“我的生活大家别管，我自己会料理！”兵站的同志感到疑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用手一比划，说：“我会钓鱼！”每到休息时，他就到小溪中钓鱼、捉青蛙充饥，有时把自己钓的鱼，叫警卫员熬成浓汤，送给有病的同志喝。战士们喝了他送来的鱼汤，想起首长的关怀，浑身充满了力量。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下令将那匹一直跟随他征战的枣红马杀掉，把马肉分给战士们充饥，以维持生命。李少卿回忆说：最使我难忘的要算是那次吃烤马肉了，大约进入草地半个月的光景，粮食、牛皮都吃了个干净，大家心里饿得发慌，不知谁半夜里弄来一匹马杀掉了，全连每人分到了一斤多马肉，大家围着篝火吃了个痛快。第二天听说贺老总的马不见了，想起昨天晚上那一顿烤肉，大家心里暗想：“这下可坏啦，一定得受处分！”临出发前，贺龙笑眯眯地走了过来，我们都低着头，好像犯了过错的小孩子，不敢抬起头来望他一眼。

贺老总用温和的声调对大家说：“同志们，为什么这么没精打彩呀？是不是被困难吓倒啦？”“不，不是困难，是大家吃了总指挥的马，感到……”连长赶忙回答。

贺龙安慰大家说：“同志们饿了，不吃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到10岁就放马，十来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为革命。我们常说，当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现在，为了革命，难道还不舍得一匹马吗？”停了片刻，他笑着说：“同志们，吃了马肉，应该有精神才对呀！挺起胸膛，让我们一道前进吧，闯过草地胜利就是我们的！”

无论多么困难，贺龙总是乐哈哈的，经常给大家讲故事，说笑话，鼓舞斗志，活跃部队气氛。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乐观豪迈的英雄气概，教育和感染着整个部队。指战员们说，有贺龙和我们在一起，就有信心，贺总指挥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充满欢乐。

衣履单薄，气候严寒，是过草地的另一大困难。红二方面军自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后，就一直处于紧张的行军作战之中，到甘孜后由于张国焘的破坏，衣物没有得到必要的补充，所以，御寒防雨的衣服、帐篷极端缺乏。为了抵御严寒，只好找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等披在身上。有的战士既无军帽，又无雨伞、斗笠，成了“秃头军”，任凭日晒雨淋。白天艰苦行军，晚上到了宿营地，既无房子可以躲避暴风雨和冰雪的袭击，又无干柴可供烤火。战士们只能找些比较干的地方，或拣些草叶子垫在湿地上，几个人背靠背地坐着睡觉，互相取暖。半夜里，狂风卷着雪花袭来，不少战士就在草地中被严寒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7月22日，全天雨雪不停，部队在向绒玉前进途中，许多体弱、生病的战士没有经受住饥寒的侵袭。这一天，仅红六师就有140多位同志牺牲。艰苦的环境，死人成了经常的事。今天掩埋了战友，而自己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被别的战友所掩埋。有的伤病员甚至变得披头散发，尘垢满面，形如野人，只有两只骨碌碌的眼睛仍然闪射着坚定的光芒……



在整个草地行军中，红二方面军有数千名红色战士饮冰寝雪，餐风露宿，口含野草，饥肠辘辘，不幸长眠在草地上。贺龙、关向应等方面军领导，每当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倒下去，便不胜悲痛。贺龙一再强调：“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活着的同志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抢救，这是阶级兄弟啊！”一次，在一个无名烈士面前贺龙对战士们说：“我们已经有很多好同志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要永远记住他们！我们将来要建造一座最宏伟的纪念碑来纪念他们！”他遥望天际，深情而坚定地说：“他们将成为世世代代后来人的榜样！我们之间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这个人就要把革命的红旗扛到底，继承他们的遗志！”

“我们一定做到！”一个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红军战士，用各种不同的方言腔调齐声回答。

草地行军，尽管红军战士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但贺龙、任弼时要求部队一定要遵守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由于沿途许多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或闭门不出，或关门逃走，部队只能露宿在外。遇到这种情况，任弼时常常不顾自己的疲劳和饥饿，披件旧棉袄，拄着拐棍，来安慰和鼓励大家：“我们今天就苦一夜吧！坚持一下到前面就好了！”

有一次，战士们在地里发现有老百姓留下的青稞和豆角，欣喜若狂，当即拿来烧着吃。任弼时知道后，立即召集干部战士谈话，严肃地指出：“我们应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遵守红军的纪律，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战士们觉得有些委屈，说：“我们要给钱，但没有见到老百姓啊！”

任弼时说：“那就照老办法，在拣粮食的地方留下钱，让老百姓来取嘛！”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红军不光要学会打仗，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过去打仗有根据地，这次长征，是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的情况下打仗，那就更应该注意做群众工作。而模范地遵守红军纪律，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群众工作’。”

是啊，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在进行着一次怎样的行军啊！每天自己嚼着树皮、草根和皮带充饥，衣衫褴褛难御严寒，却对群众利益维护有加、秋毫无犯！

在草地行军中，任弼时、贺龙极其关心党和红军的团结，设法解决党内分歧。徐向前回忆说：

“任弼时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他到甘孜后，即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在草地里，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倡议，讲了几点看法：（一）中央和毛泽东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弼时同志很高兴，表示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任弼时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贺龙在北进途中也时刻告诫二方面军指战员：“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地把党中央、毛主席交待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他还特别叮嘱二方面军的后卫部队：“收容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这

种以大局为重力谋团结的情怀，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多么需要啊！

8月9日，随总部一起行动的任弼时从救济寺给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写了一封信，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认为是迫切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作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重新估计过去中央领导。”“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示，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面谈决定。”<sup>①</sup>

收到这封信后，贺龙立即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赞成任弼时的意见。8月16日，他们致电任弼时说：“在救济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地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8月底，红二方面军刚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立即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为着不放松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们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这再次体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对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关注和期望。

<sup>①</sup> 水工：《中国元帅·贺龙》，第199页。

尽管贺龙长期远离中央，单独在一个地区活动，但却有极强的党性。他一贯认为，党中央如同人的脑壳，各根据地好比四肢，党员应该像保护头颅一样地保护党中央。遵义会议后，贺龙深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更听不得对中央的任何攻击和诬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贺龙极为愤慨。他认为，张国焘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为什么把他领导的几万红军作为自己的资本呢？而且竟以此来反对中央、分裂中央，这同那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有什么不同？完全一样啊！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他自己也没有像张国焘今天这样打这种牌谋一己之私利。但是，共产党里却有人说他是“军阀”，他感到好笑。现在，一个共产党的老党员却真的成了利用军队谋私利的军阀。这真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大倒退啊！

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着手解决党内、军内以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除讨论政治形势外，还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贺龙在会上对张国焘说：

“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令人深思，甚得与会者的赞赏。

党中央、毛泽东对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极为欣慰，不断给予重要指示和关怀，鼓励和指导他们战胜困难，胜利北进。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二、四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并指出：二、四方面军“如能迅速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

7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致电二、四方面军，希

望他们走出草地后迅速攻占陇南的岷州城（今岷县），这对打击马鸿逵、毛炳文、王均等敌均十分有利，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势”。

7月22日，党中央再次电告红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创西北的伟大局面。”<sup>①</sup>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为委员。这一措施对贯彻中央正确路线，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7月28日，毛泽东等电询二、四方面军：“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在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并强调指出：“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

8月1日，红四方面军刚走出草地，到达包座，党中央即来电祝贺：“接占包座捷电，无限欣慰。”并指示：“四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同一天，朱德、任弼时等联名致电中央，说明两军北上的行动步骤：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前进。约8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并且表示：红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求西北首先胜利而奋斗到底！并希望以此转告红一方面军，以战斗会合我们。

中央接得电报后，马上于8月3日来电加以热情鼓励：

---

<sup>①</sup> 《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甲)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乙)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正确地分析了敌情,明确地提出了行动方针,加强了红二、四方面军的集体领导,充分表达了对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情关怀。这一系列指示,对于粉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阴谋,引导红二、四方面军沿着正确的道路北上,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红二方面军经过近50天的艰苦行军,终于在9月1日全部抵达哈达铺地区(今属宕昌县),取得了北进甘南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 四 横扫甘南

红四、二方面军先后走出绵延数百里的大草地后,党中央、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为实现三军胜利会师,开拓抗日新局面面继续努力。

1936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继3月间炮制伪“蒙古自治军政府”之后,又策动和协助伪蒙军对绥远发动了进攻。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新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慨,并以支援绥远抗战为契机,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的影响更加扩大,党对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东北军、西北军的张学良、杨虎城更加接近我党;“两广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求同我党我军订立抗日协定;四川的刘湘等开始趋向

抗日反蒋；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等也相继开始同我党我军商谈抗日问题。与此同时，英、美、法等国政府，也从它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更加趋向于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较强硬的政策；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支持中国对日作战。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抗日的呼声日高。

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党中央决定乘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之机，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打通苏联，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党中央经同张学良等协商后，于8月12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计划。其要点是：

（一）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sup>①</sup>，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日战争之实现。（二）从9月初起，第一方面军主力应由清水河以东、豫旺堡南北地区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之海原、固原、靖远地区，寻歼敌马鸿逵、马鸿宾部，策应第二、四方面军作战；第四方面军应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建立和发展甘南根据地；第二方面军应向陕甘南部边界地区活动，占领康县、成县、徽县、两当、凤县地区，巩固与发展陕南根据地，并同甘南根据地联结起来。（三）10月和11月，实现三个方面军在西兰大道的会合，发展和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准备进攻宁夏。（四）从12月起，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对付蒋介石军队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反共的马鸿逵部，占领宁夏。（五）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队，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寇和伪蒙军的进攻，把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这时，经一方面军西征已进到同心、固原、海原一带，红二、

---

<sup>①</sup> 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是中共中央当时的主张。同年9月中旬，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了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政策。

四方面军先头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形成了三大主力红军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对此，蒋介石极为恐慌，急令因“两广事变”面南调的胡宗南从长沙兼程北进陕甘，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之静宁、会宁、西段，以截断红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也隔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但是远水不解近渴，胡宗南部队一时之间难以赶到。

蒋介石为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只好调兵遣将，在甘南仓促布防。他令川军孙震、邓锡侯部进入陇东堵截；令王均第三军之第七、第十二师布防于文县、武都、天水、西固一线；以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之第八、第二十四师布防在陇西、定西、武山一线；以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在岷州、洮州、西固堵截，企图构成西固至临潭（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还令张学良派何柱国、王以哲率军进至平凉、固原一线防堵。同时，蒋介石还阴谋撤换赞同中共抗日政策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以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但敌人的部署同样一时难以完成，存在着明显的弱点：战线很长，分兵据城，力量分散，处处薄弱，容易各个击破。

鉴于此，中央指示红二、四方面军，以一部兵力迅速攻占腊子口。腊子口是红军北上途中最后一道险要关口，突破腊子口，敌人企图阻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阴谋就会彻底破产。若是攻不下腊子口，红军就将被迫掉头南下，重返草地，或绕道西出青海，或东进川东北取道汉中，这样就会陷入敌人重兵的包围，处境将极为不利。

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的敌情，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局（即二、四方面军的领导机关）决定乘敌人的布置尚未就绪之际，由红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并相机夺取岷、洮、西地区。

战役的具体部署是：以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为



第一纵队，主力由包座经俄界、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州，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城相机夺取西固，向武都方向佯攻；以四军、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而后主力向临洮方向活动，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以保障左侧安全；以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第二纵队。这一战役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会合红一方面军。

根据这一计划，从8月5日开始，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势如破竹般地向甘南发展。

当面的敌人是中央红军的手下败将鲁大昌。鲁大昌，原是盘踞在临洮、岷县一带的地方军阀，后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是一支拥有1万多人的反动武装。7月30日，蒋介石电告鲁大昌：红军“似有进窜陇南模样”，命令他“远侦布防”。鲁大昌随即以其第一旅进驻哈达铺、阿乌河一带；以第二旅布防中寨、梅川、红水沟一带；以第三旅驻临潭；以特务团、机枪营、骑兵团防守岷县县城，准备死守他的老巢岷县。

8月9日，红军一纵队之八十八师经激战枪占天险腊子口。10日，八十九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随后，徐向前率领三十军一部攻克漳县，陈昌浩指挥九军和五军围攻岷州。

红军的强大攻势，使岷州守敌鲁大昌非常惊慌，为了防备不测，急急忙忙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兰州，同时加筑碉堡工事，挖掘战壕，搜集粮食，清查户口，烧毁民房，扫清射界，烧毁洮河渡船，断绝城乡交通，准备顽抗到底。

10日晚，红军开始向岷州城南天然屏障二良山敌人阵地发动猛攻，击毙击伤1000余敌人，缴获重机枪8挺，轻机枪3挺，迫击炮5门。敌人在红军勇猛攻击之下，完全乱了阵脚，敌人骑兵团擅自向梅川方向逃跑。鲁大昌急电蒋介石，请求派兵援助。8月

14日，蒋介石来电给鲁大昌打气：“希督励所部‘杀贼’，再建殊勋。”朱绍良和王均也都来电要他“坚守待援”。鲁大昌进退两难，只得凭坚死守，红军围城经月，久攻未下。

与此同时，红军第二纵队的四军经野狐桥、新堡向洮州旧城进攻。在妇女先锋团的配合下，8月20日，十师占领旧城，十二师占领洮州，随后便向临洮方向扩展。敌人马步芳骑兵凭借熟悉地形、速度快的优势，向红四军发动猛烈进攻，以阻红军北进。红十师广大官兵奋勇杀敌，激战一周，将马步芳的骑兵击退。

红军围岷州、克漳县，土豪劣绅纷纷逃向渭源。渭源守敌为毛炳文三十七军第八师的一个团，加上民团共2000多人。徐向前总指挥派四方面军总直属队指挥、曾任八十九师政委的杜义德，率领有名的“夜老虎”二六四团和三十一军的两个团去袭取渭源。

参战部队集结在靠近陇西城的菜子河、官亭村附近，摆出一付要强攻陇西城的架势，以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麻痹渭源守敌。杜义德是夜战英雄，他决定实行夜间长距离奔袭，要求各参战部队作好一切夜袭的战斗准备。他亲自带领部分团营干部化装成老百姓，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直奔渭源城，仔细观察敌情和地形，选定突破口。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兵分两路，从主攻和助攻两个方向同时登城，夹击敌人。

在一个狂风呼啸，乌云翻滚，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的夜晚，杜义德带领部队逼近渭源城下，敌人没有丝毫察觉。红军两路突击队迅速登上了城墙，砍死了敌人的哨兵。等敌人发觉红军来攻城时，组织部队分4路向红军主攻突击队反扑，战斗甚为激烈。在红军攻城部队两路夹击下，敌人很快溃退，乱作一团，有的拔腿逃跑，有的为了活命乖乖地举手投降。8月26日拂晓，红军攻克渭源。这一仗击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16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轻重机枪30多挺，迫击炮6门，电台1部。在渭源，红军筹集了万余匹土棉布和洋布，以及部分棉花、羊毛、羊

皮等，为红军解决冬装问题准备了条件。

9月7日，红军二纵队九十三师攻克通渭。通渭是甘南的一座古老县城，三面环山，西靠渭河。苍老颓败的城墙，全是用黄土构成的。镇上的房屋和窑洞，也是用黄土筑成的。黄土路上，来往走动着行骡和手推车。到处是一片单调的黄色，是典型的西北高原风貌。

至此，岷、洮、西战役胜利结束。这一战役从8月9日到9月7日，历时30天，红军横扫甘南，沉重打击了敌人，先后攻克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4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西山等县的广大地区，粉碎了敌人阻红军进入甘南的计划，极有利于红军的继续北进。

8月30日，中共中央将在12日提出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电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等。

在红四方面军进行岷、洮、西战役的同时，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部署，胜利地进行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

9月1日，红二军团到达哈达铺集结，红六军团抵达礼县城下。根据党中央关于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地区出动的战略计划，红二方面军于9月8日在哈达铺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要求乘陕甘敌人分散的时机，东出陕甘边界，通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并袭取以上县城；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战役的具体部署为：第六军为左纵队，从西固进据武都通成县公路上佛耳岩地段要点，向武都敌人佯动并扼止其回援成县，俟中纵队袭取成县时即北取康县、略阳；以二军团主力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由荔川经同井、洮坪西北附近石峡关进攻，袭取成县、徽县；以六军团为左纵队，伪装成攻天水模样，经监关镇、天水镇（非城）、商桥，袭取两当，然后跟袭凤县。

9月11日，红二方面军三个纵队同时开始行动。在贺龙、任弼时等正确指挥下，部队所向披靡，进展顺利。9月17日和19日，红军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城，歼灭守敌1部，迅速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取得了成、徽、两、康战役的胜利。

之后，红二方面军数次击退敌王均部从武都向城县的进攻，并抽出力量发动群众，筹集物资，开展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仅在半个月内，红军就招收了2000多名新战士。

红二、四方面军横扫甘南，势如破竹，在取得岷、洮、西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胜利后，出现了三个方面军南北夹击敌人，即将实现三大主力会师，打开陕甘宁大局面的有利形势。然而，张国焘此时却居心诡谲，又起来反对和破坏党中央、毛泽东等关于实现三军会合、打开新局面的战略计划。

## 五 西北局与岷州会议

原来，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并不是真的要到陕北同党中央会合，只是想到甘南休整一下，以便伺机向青海、甘北退却。所以，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并且立住脚跟后，张国焘便违反甘孜会议决定，要部队停下来，建立“甘南根据地”，成立“甘南省委”和“甘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

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之后，急将胡宗南部队北调，其先头部队已于9月初到达西北战场。根据敌情变化，党中央、毛泽东为粉碎敌胡宗南赶赴西北地区阻止红军会师的企图，制定了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敌的《静会战役计划》，并准备尔后红军北进向宁夏发展。《静会战役计划》要点是：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二

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使三个方面军提前会合，协同消灭胡宗南部。中央强调指出：“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的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sup>①</sup>

对于中央的静会战役计划，以及于三个方面军战略行动的统一，红二方面军领导人感到极大欢欣，并立即投入战役准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当即表示拥护，致电中共中央，表示：

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sup>②</sup>

为了执行中央静会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即决定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以阻敌西进，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

对于中央的静会战役计划，张国焘的态度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于9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随后，他跑到前方，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北渡黄河，准备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

9月中旬，中革军委、毛泽东、周恩来等连日多次电告朱德、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页。

②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62页。

张国焘：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石河地区之部相机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敌人。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

朱德接到电报后，便找张国焘研究行军作战的路线和如何与派来接应的部队会合等问题，整整商议了两天两夜，但没有任何结果。张国焘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国民党的“围剿”怕得要死，极力宣传逃跑主义，主张西入青海。朱德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指出张国焘的主张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指示，是错误的，要他丢掉自己的主张，跟毛主席、党中央走。朱德严肃地说：

“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大增，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得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统一步调，中共中央西北局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张国焘在会上仍主张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进入甘北，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在这里，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中央的一些主张，但其目的是为了实他的逃跑主义计划。朱德、任弼时等坚决执行中革军委的静会战役计划，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力主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要张国焘以党和红军的团结为重，不要西出青海。

会议开到第三天时，张国焘以辞职不干相要挟。朱德气愤地说：“你不干我干！”参加会议的除了张国焘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北上的正确主张，不同意张国焘西进的错误意见，连陈昌浩也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处

境孤立，最后不得不虚伪地说：“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sup>①</sup>这样，经过激烈斗争，会议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当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傅钟回忆说：“西北局在岷州开过好多次会，有一次是讨论关于军队行动的会议，会上主要是任弼时同志与张国焘争论，过去还没有谁敢像弼时那样和张国焘争论。弼时同志坚持北上会合，坚持党内团结，坚决拥护毛主席，说毛泽东是对的。会议决定北上会合，不得西进。”<sup>②</sup>

会后，红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18日，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名义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规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

9月19日，红二、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朱德总司令除了及时向党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向静、会进军的行动外，还迅速部署部队北进事宜，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中央《静会战役计划》，这是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真正放弃向西北退却的方针。9月20日，张国焘带着警卫部队，星夜跑到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他一到就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利用大家还不了解已经开过岷州会议的机会，欺骗前方部队干部，煽动部队西进，污蔑北上“断送红军”，妄图推翻岷州会议决定。

① 潘开元：《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7月6日。

② 《关于岷州会议和漳州会议情况介绍——傅钟同志谈话纪要》。

9月22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和红二方面军，说什么：“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宣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由兰州西面的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他下令让红四方面军所有北上部队，停止北上，调头西进。为了封锁中央、蒙蔽部队，还卑鄙地命令各部队机要部门不得接收朱德总司令的电令，凡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拍发。

9月21日，朱德总司令在北上途中，收到了张国焘要部队停止北上，改向西进的电报。22日凌晨，朱德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反对他的错误决定。电报说：

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

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望勿失良机，党、国幸甚。<sup>①</sup>

表现了朱德总司令对张国焘既坚持原则，又耐心劝导的“韧性战斗”精神。

同时，朱德直接致电中共中央及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等，告知张国焘拟根本推翻岷州会议决定和西进青海的严重错误：

西北局会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sup>②</sup>

<sup>①</sup> <sup>②</sup> 郑广瑾等：《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60页。



这充分体现了朱德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坚持中央正确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原则立场。

为了制止张国焘的错误做法，朱德积极促成西北局漳县会议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陈昌浩等，都一致反对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企图西进青海的错误主张，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坚决要求北上。会上有人说：“张国焘是政委。”意思是书记有权作出最后决定，企图为张国焘辩解。但立即遭到了有力的反驳。大家指出，北上党中央的正确方针，静、会战役是西北局委员会集体决定的，政委只能执行委员会的集体决定。

李特想插话为张国焘帮腔，也遭到了斥责，有人回敬他说：“你不是西北局委员，不要插话。”李特只好低头不语，躲到一边。

会议最后坚持了北上会合的方针，张国焘分裂退却的阴谋再次被挫败。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的歧见。9月26日，张国焘等<sup>①</sup>又连电党中央和军委，继续坚持西进青海的计划，并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兰州以西渡黄河，准备经青海占领甘北地区，并吹嘘说这有“伟大历史意义”。后来，陈昌浩在讲到这件事情时说：

“国焘同志，虽然在西康地区已经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红军进入甘南，可是他当时对时局的估计，及其自定的路线方针显然是与中央背道而驰，而继续其一贯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不在相当

---

<sup>①</sup> 张国焘的这些电报，都与朱德联署。事实上，朱德一直反对张国焘违背中央方针、指示的行为。1936年7月14日，党中央向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张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张国焘的。”据此，凡由朱、张联署的违背中央指示的电报，叙述时只提张，以反映历史现象的本质。

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如果此举不成，甚至可以进入陕南与川北地区，单独行动。张国焘同志这一企图的确是延迟与逃避这一会合，仍然是想造成与中央对立局势。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张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sup>①</sup>

中共中央知道张国焘的所为之后，立即打电报给张国焘和红二、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红军西进，要红二、四方面军按原计划北上。9月17日，中央连续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令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这时，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已经吃够了张国焘逃跑主义的苦头，对张国焘擅自率领他们南下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痛苦仍记忆犹新，对这次张国焘又企图驱使他们西进青海，穿过荒凉的草地，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徐向前同志也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张国焘随身带的一支‘传令队’（即警卫队）的战士们，当听说张国焘要带他们西进时，便集体离开了他，以示抵制。临走时，他们给张国焘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张主席，我们跟随你多年了。我们听说你要带我们去青海，再过草地。我们不愿意去了，我们不愿无辜地死在草地。请你相信我们，我们决不会投降敌人，我们要革命。”

<sup>①</sup>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的指战员们，听到张国焘要带红军西进的消息后，大家的情绪甚为不安，议论纷纷，“怎么又要西开呢？”这充分说明张国焘向西逃跑，破坏中央北上的方针不得人心，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

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的斗争和反对，由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不满和抵制，再加上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不得不暂时放弃他的西进计划，企图阻止三军会师北上的阴谋遭到了失败。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对此，中央当日来电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并指示四方面军“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进占通渭以取先机”。次日，红四方面军分5路纵队由岷县、漳县等地向会宁、静宁、通渭、庄浪等地前进。

由于张国焘阻挠中央静会战役计划的实施，迟滞了时日，延误了战机，使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央部署这一战役时，敌毛炳文部和王均部都处于比较孤立态势，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拖延，队伍拉去，敌胡宗南乘机到了清水、秦安、庄浪一带，对红军尤其是对红二方面军构成了严重威胁。

还在9月中旬，红二方面军就遵照党中央指示，分三路纵队向陕甘交界地区出动，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取得了成、徽、两、康战役的胜利，在陕甘交界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形成了一个与红一、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可随时实现会师的有利局面。但由于张国焘一再破坏党中央的作战计划，擅令红四方面军西进，敌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军得以南下渭河，一齐向比较孤立的红二方面军压来，加上红六军团十七师政委汤祥峰叛变，情况异常严重。

贺龙和任弼时考虑到：如果红二方面军单独留在陇南和陕西

西南部活动，有被敌人隔断在渭水以南各个击破的危险，遂致电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部队渡渭水北进。

中央根据敌情变化，决定迅速实现三大主力会师，集中力量，整理队伍，选择时机，坚决打击胡宗南部。10月2日，电示红二方面军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北进。3日，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发布北进会合红一、四方面军的命令，规定：“我方面军具有会合第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之目的，由现地经天水、甘谷与麻沿河、永兴镇、武山的中间地带进到通渭地域，并相机消灭相遇的敌单个兵团。”

在北进途中，党中央虽多次电令张国焘派兵切实控制甘谷、武山地区，掩护红二方面军前进；派有力部队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泰安迫近游击，以确保掩护红二方面军之到达。但张国焘根本没有执行命令。他不顾大局，造成军事行动的不统一，使敌人有机可乘，敌人得以集中兵力追堵红二方面军。

10月4日，红二方面军以六军团为右纵队，以二军团及三十二军为左纵队向通渭方向前进。由于敌情紧迫，部队仓促转移，在康县活动的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团，收拢不及，在康县白马关地区遭到王均部优势敌人的包围截击，红军指战员奋勇突击，虽给敌人以重创，但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十七团全部损失。

在通过敌人的渭河封锁线时，红六军团在甘谷以南的盐关镇又遭到敌人的侧击，由于敌人以逸待劳，加之地形有利，在战斗中红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负伤，部队也损失一部，部队在徒涉渭河时，由于上游连降暴雨，河水陡涨，被冲走了一些同志。红二方面军刚走出草地不久，体力没有得到恢复，又连续急行军，所以有几千名红军战士掉队。部队在通过西兰大道向六盘山前进时，敌送来了恐吓信，声称要在几小时内把红军消灭在六盘山下。六盘山是陕北和陇中两高原的界山，它南连秦岭，北濒大河，遥遥200里，陡峭峥嵘。西兰公路曲曲折折，盘旋而上，当地谚语说：“六

盘山，十八旋，上山二十五，下山三十一。”敌人妄图凭借险要地势消灭红军。

红四师奉命在六盘山南麓阻击敌人，掩护全军从北山脚绕道转移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师仅1000多人，而敌人为马鸿逵部与东北军，大约有两个军的兵力，敌人数倍于红军，要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十分艰巨。师长卢冬生、团长黄新廷亲自到担任最关键任务的十二团二营阵地指挥作战。红六师指战员为了大部队的安全转移，英勇阻击，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疯狂进攻，胜利地掩护主力通过了北山脚下。敌人为了置红二方面军于死地，一方面派部队在陆上围追堵截，另一方面还派出空军对红军进行狂轰滥炸，贺龙总指挥险遭不测，红军后勤机关遭到巨大损失。

这次向北转移，是红二方面军长征以来经历的最危险、损失最大的一次。贺龙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张国焘违背中革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乌蒙山并不紧张，埋炮我都不准埋，到黔（西）、大（定）、毕（节）那边都可以打，封锁线我们一冲就破了。要说紧张，第一次是甘孜，张国焘要困死我们；二次就是成徽两康战役。我们原来估计四方面军不会走的。”“张国焘整了我们一手，损失相当大”<sup>①</sup>。这是张国焘对红二方面军、对中国革命事业犯下的又一桩罪行。

如果张国焘忠实执行中央命令，三个方面军当时会在西北消灭更多的敌人，红二方面军也会少受些损失。

## 六 会师欢聚将台堡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下，在红一、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之下，三军胜利会师的局面终于出现！广

<sup>①</sup>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大红军指战员以无比兴奋、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久久盼望的日子的到来。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5个纵队，自岷县、漳县等地北进后，于10月5日重占通渭城。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9日，徐向前率领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城，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来到会宁，受到红一师师长陈赓及其所属部队的热烈欢迎。

继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历尽艰险，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于10月22日、23日在甘肃境内西占城正南不远的将台堡和兴隆镇（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保存了11500人的红军武装。

果敢豪爽的左权笑着对贺龙、任弼时说：“有你们这一来，红军兵多将广，大西北可就热闹罗！”

任弼时也笑着说：“大家早就想和中央红军的老大哥会师。这下好了，三个兄弟会到一起了，打开新局面不成问题了！”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二、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战略大转移。他们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会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三大主力实现会师，是三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红一方面军先遣军政治委员聂荣臻在给朱德和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信中写道：“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无疑的将首先在西北开展新局面，成为团聚和领导全国抗日的中心。”<sup>①</sup>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印发的《庆祝一、四方面军大会合战上讲话大纲》，就充分表达了指战员的这种心情。大纲热情洋溢地写道：

①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89页。

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眼睛望穿了。听到党和军委决定要四方面军北上会合红一方面军的消息，我们个个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不放松一秒一分的准备，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准备铲除任何企图阻拦我们的敌人，来会合你们。不管蒋介石的计划和碉堡封锁线怎样严密，不管胡宗南、毛炳文怎样费尽心机，不管少数民族地区雪山草地怎样的困难，都没有能阻止我们的前进。环境越困难，我们的斗争与会合的决心越坚固。就这样，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的会合。当会合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在行军中在宿营地，在火线上……没有一个人不在欢喜的庆祝这件事。

现在我们会合了。不论在任何人的眼睛里看起来，这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蒋介石想阻拦我们的会合，企图消灭我们这一个，再消灭那一个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我们三只铁拳在一条火线上合起来作战，一定有把握打更大的胜仗！

同志们！携手前进吧！卖国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我们的伟大的会合面前发抖了！胜利就在眼前！

三军胜利会师的场面是极其感人的。在会宁城，一方面军的同志打着红旗欢迎红四方面军同志的到来，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招展红旗向欢迎队伍涌去。

“红军大会师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

表达欢跃心情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指战员们还情不自禁地纵声歌唱：

三大主力军，  
西北高原胜利会合了，  
欢呼三个方面军，  
百战百胜英勇弟兄。  
团结我们工农红军全部的力量，  
咳！团结我们工农红军全部的力量，  
走向抗日的最前线！

两万五千里长征，  
经历十一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建立人民政权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宏亮的歌声，唱出了全体指战员欢愉的心情。兄弟部队转战万里，穿过枪林弹雨，历尽千难万险，战友一旦相逢，大家格外高兴。指战员们喜泪盈眶，紧握战友的手，亲切地交谈，热情地慰问，表达长久的思念之情。

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把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送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并每人给了一套棉衣。当四方面军同志穿上上面绣着“欢迎阶级兄弟”等字样的毛衣，收到其他礼品时，总是对一方面军的同志说：“好同志，你们关照得真周到！”而一方面军的同志总是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辛苦了！”

在将台堡和兴隆镇，在红一、二方面军会师的那天半夜时分，当二方面军的同志在急行军中突然听到“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喜讯时，广大指战员精神大振，由衷地热烈高呼：“到家了！到家



了！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就要见到毛主席了！”

胜利会师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在黑夜的微光中，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亲切地呼唤对方：“你们是中央红军吧？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二方面军吧？你们更辛苦！”互相扑向对方，喜泪禁不住从钢铁汉子们的眼中流出，一双双粗糙有力的大手紧紧相握，战友们热烈拥抱。大家有好多好多的话要互相倾诉，但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红军指战员们只是一个劲地高呼：

“红军大团结万岁！”

“打倒蒋介石！”

“赶走日本侵略军！”

阵阵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广阔的原野上回荡。那动人的情景，是难以用语言和笔墨来准确表达的。

会师后，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观看了红一方面军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

“……哎呀哩，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拖得敌人叫爹娘，哎呀哩……”

这种兴国民歌，已经好久没有听见了。任弼时和红六军团中的一些江西籍同志，因此感到特别亲切，忍不住跟着轻轻哼了起来，场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

为了表示对红二方面军指战员的敬意和关切之情，聂荣臻政委派红三军团政委萧锋同志带一个连，把100只羊，50头猪，300套棉衣，500匹布和5万块现洋送给二方面军。贺龙笑着说：“太感谢你们了！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回去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总、左权军团长和聂政委，代我向他们问好！”<sup>①</sup>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

<sup>①</sup> 萧锋，《十年征战亲历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委员会发出了《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首先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接着深刻阐明了三大主力会师的意义，提出了红军在新时期的任务。

第一，阐明了红军大会师的重大历史意义。“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沿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军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防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第二，《通电》为会师后的红军三大主力提出了明确的任务。《通电》说：“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sup>①</sup>

中共中央《通电》的传达，极大地振奋了三军广大指战员的

<sup>①</sup>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第262页。

士气与斗志，大家自觉地展开热烈的讨论，一致表示为完成新阶段的任务而奋斗。

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地区的胜利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宣告了敌人妄图歼灭红军于长征途中的反革命计划的彻底破产。当红军指战员开会庆祝胜利会师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竟也不知羞耻地开会宣告他们“围剿”的最后“胜利”。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恼怒和愤慨。例如，国民党御用文人胡羽高就以讥讽的笔调写道：“该匪（红军——引者注）以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枪万弹中冒死逃生，居然开会大事庆祝，固属当之无愧；惟有剿匪各军开祝捷大会者，视此则感想如何？内心是否抱咎？颜面是否难堪？倘麻木不仁，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则余又何说耶？”这段话比较真实地道出了反动派之间的悲观失望和相互抱怨的心态。

会宁会师，标志着三支被敌人长期隔断的主力红军，终于克服了人为的、自然界的一切艰难险阻而聚集、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打击国内外敌人的强大的战斗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坚强的中心支柱，成为打击日本侵略者、阻止蒋介石集团妥协投降的主要力量。正如张闻天所指出的：“三个主力的会合，一定要更进一步推进全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强有力地保卫着西北并促进西北抗日大局面的实现。”<sup>1</sup>这对推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展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会师后，红二方面军根据党中央指示向甘肃东北开进，部队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派邓小平前来慰问。他脸庞瘦削，身架精悍，眼神干练而愉快，紧紧地握着任弼时和贺龙的手，笑眯眯地说：“毛主席要我来慰问大家。”

1. 张闻天：《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1936年8月15日。

任弼时非常高兴地说：“谢谢！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二方面军的关怀。”

邓小平向贺龙、任弼时等二方面军首长传达了党中央最近的指示精神。他说：“中央已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决定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936年1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签发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穿着东北军制服的红军联络人员不久便出现在西安；5月，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8月，又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主席还致书蔡元培等知名人士，鼓励他们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民众，逼蒋抗日，促成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任弼时沉思了一下，随即对邓小平说：“请转告中央，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制定的路线和策略，并将在全军迅速贯彻实行。”

贺龙也高兴地说：“好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了！”

后来，党中央又派周恩来来到洪德城慰问红二方面军。此时的周恩来副主席，留着长长的胡须，面颊清瘦，戴着灰布八角帽，穿着灰色军棉衣，腰束宽皮带，两道浓浓的剑眉下，目光深沉而炯炯有神。

贺龙、任弼时和周恩来副主席都是久别的老战友，如今在西北高原重逢聚首，分外亲切，忍不住互相久久地握手拥抱。周副主席激情满怀地说：“毛主席、党中央很关怀二方面军的同志们。毛主席派我来看望大家，毛主席让我转达他对同志们的问候！”

周副主席兴致勃勃地询问了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情况后，向大家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情况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好形势。他说，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赢得这场民族战争；而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

必须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对资产阶级作出局部的让步，这是民族大义。

任弼时对周副主席说：“中央的决策是十分英明的。从我们二方面军一路上的情况来看，也同样证明：只要宣传抗日，我们就有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但是，要使全党全军都真正理解中央决策的正确性，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贺龙接口道：“正是！这一些日子，总有人找我直哼哼，说什么我们长征都过来了，为什么还要和国民党讲客气、谈联合？蛮不服气咧！”

周副主席笑着说：“要给大家多讲讲，相信会理解的。”

另外，周副主席还谈到了红军领导问题。贺龙回忆说：“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同志由延安到洪德城，他和我见面后，问我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我说统一归彭（即彭德怀同志，当时任前敌总指挥）指挥吧。那是我们二方面军表示态度拥护中央。”<sup>①</sup>

这样，会宁会师后，三个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相互砥砺，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并肩战斗。当红四方面军初到会宁时，即派出干部到红一方面军部队中学习红一师等的工作经验和组织经验，红一方面军也虚心地向兄弟的红二、四方面军学习他们的经验。

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对反共投降的蒋介石是当头一棒，对迫切希望抗日救国的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红军主力会师后，曾多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红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错误地认为，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连续作战的力量和能力已经大为削弱，刚到陕北未得到休整机会，立

<sup>①</sup>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0页。

足未稳。于是他急调 260 个团的兵力，分 4 路向红军追击，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以东地区。根据敌情特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红军打击尾追之敌，以利北进的作战方针：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主力胡宗南以歼灭性打击；对王均、毛炳文部则予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已和红军建立某些联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则展开积极的统战工作。为统一作战指挥，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

11 月 19 日，红军主力先后集结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山城堡一带土寨众多，地形复杂，便于红军进行隐蔽集结，是一个较好的战场。

这时，胡宗南的第一军由南向北急急追来，孤军冒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军委指示，决定在山城堡给敌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具体战役部署为：红一军团从南面向山城堡进攻；红十五军团从西面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一军从北面向山城堡进攻；红二方面军主力在山城堡与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集结，准备策应各方。

11 月 20 日，敌胡宗南之七十八师侵占了山城堡。21 日，当敌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进入红军预先设置的伏击圈时，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三十一军，在红二方面军的密切配合之下，突然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敌人凭借围寨拼命抵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敌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全部和第二三四旅两个团歼灭。敌人遭到红军主力的沉重打击后，便仓皇向西北山谷撤退。

山城堡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旅又两个团的胜利。这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战斗，也是长征胜利结束的最后一战。它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反动派的气焰，壮大了红军的声威，进一步分化了敌人营垒，推动了国内和平的实现。

为了适应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新情况，保障红军在组织上的统一指挥，以争取革命的新胜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2月7日转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任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从此，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都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准备抗战，迎接抗日战争新时期的伟大任务而英勇奋斗。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给世界人民树立了一座坚定无畏的丰碑。

红军长征，是在人间罕见的困难情形下进行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工业基地，既没有汽车，更没有飞机，缺乏金钱，缺乏弹药，给养不济；但红军对手却异常强大，是全国统治者，有帝国主义的援助，不但有汽车，而且还有飞机和大炮，有金钱，弹药充足，给养丰裕，经常以几倍及至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横亘着巍巍雪山，茫茫草地，道道天险，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加上前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后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使红军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

但是，所有这一切困难，都被英勇无畏的红军指战员克服了。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部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上说来是那么无敌，……那6000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12个省份，

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的根据地上。”<sup>①</sup>那么，红军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长征，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依靠的是两个基本条件：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团结与巩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转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得以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领导红军三大主力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斯大林曾说过一句名言：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之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具有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乌蒙山中，红二方面军在强大的敌人重兵重围中间来回穿插，声东击西，打击敌人，甩掉敌人，依靠的是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勇敢；爬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飞越天险，依靠的还是广大指战员无与伦比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在接见负伤未愈就要求归队抗日的红军战士时说：“红军都是英雄好汉！长征的胜利是我们毛主席英明指挥的结果，也是同志们英勇战斗的结果。在这次震惊中外的长征中，许多同志献出了生命，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们！同志们，我们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还有更多更艰险

<sup>①</sup>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页。



的雪山草地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丢掉长征精神！”<sup>(1)</sup>

长征精神的深层底蕴是什么？老一辈革命家曾作过精辟论述：

徐向前说：“‘长征精神’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献身精神。”<sup>(2)</sup>

杨尚昆说：“什么是红军的‘长征精神’呢？概括地说，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sup>(3)</sup>

长征精神，是无产阶级本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的传家宝。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成为广大群众和革命战士战胜敌人的有力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我国人民克服困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长征史上具有重要的和特殊的地位。

红二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周逸群、贺龙、任弼时、段德昌、关向应、王震、萧克等指挥下，艰苦奋斗，英勇杀敌，相继创建、巩固了湘鄂西、湘赣边、黔

(1) 赵启华：《长征精神永远不能丢》，《星火燎原》1984年第2期，第77页。

(2) 徐向前：《红军不怕远征难》，《红旗》，1986年第20期，第5页。

(3) 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东和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了敌人多次大规模“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同时，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批判和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自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出发，到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历时11个月，行程1.6万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10省，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据不完全统计），攻占大小城镇39座。

英雄的红二方面军以一万数千之众，战胜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在沿途各省广大群众中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促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谱写这首史诗的不仅有中国人民的优秀男儿，更有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其中红二方面军有李真、陈琼英、冼任、冼福、周雪林、徐远德、石芝、陈罗英、马玉湘、胡自强、张士美、曾纪林等12位，安全到达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女同志可真不简单，她们和七尺男儿一样，顶风冒雪，行军作战，历尽了辛苦，是中国革命中的“巾帼英雄”，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勇敢战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忠诚革命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妇女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红二方面军到会师时只剩下1万余人，但他们是经过长征锻炼，战胜了严寒、疲劳、疾病、流血、战斗、分裂之后保留下来的革命骨干，是中华民族精华的荟萃。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红二方面军为基础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下开赴抗日前线，继续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同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前赴后继的、波澜壮阔的血战，并赢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一幅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是一部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它内容丰厚，值得以万卷史书对此加以记叙和研究。它包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伟大秘密，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结晶。

---

##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湖南部分），档案出版社 1991 年版。

贵州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蒋风波等编选：《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贺彪：《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

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

李立：《远征万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张二牧：《贺龙在湘鄂西》，长江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

本书编写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张延贵、袁伟：《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健英：《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蒋国维、蒋永康：《红二、六军团在黔东》，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廖国良、田园乐：《中国工农红军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本书资料征集组：《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贺龙元帅丰碑永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共四川涪陵地委党史委编：《贺龙在川东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本书编写组：《贺龙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年版。

顾永忠等：《贺龙用兵》，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社科院现代革命史室：《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共汨罗县委宣传部：《怀念任弼时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共汨罗县委：《任弼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穆欣：《关向应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瞭望编辑部：《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瞭望编辑部：《红军女英雄传》（增补本）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红军长征全史 第二卷 百川归海——红二方面军战史

作者=

页数=295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